



In  
Defence  
Of History

# 捍卫历史

*Richard J. Evans*

[英] 理查德·艾文斯 著 张仲民 潘玮琳 章可 译

In  
Defence  
Of History

# 捍卫历史

*Richard E. Evans*

[英] 理查德·艾文斯 著 张仲民 潘玮琳 章可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IN DEFENCE OF HISTORY

Copyright © 1997, Richard J. Evans

Afterword Copyright © 2000, Richard J. Evan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7-117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捍卫历史/(英)理查德·艾文斯(Evans, R. J.)著;  
张仲民,潘玮琳,章可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2

ISBN 978-7-5633-7885-2

I. 捍… II. ①理…②张…③潘…④章… III. 史学—研  
究 IV. K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582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杨浦区嫩江路199号 邮政编码:200438)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11.25 字数:250千字

2009年2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已审阅

子居 14-01-03, 18:4

谨以此书献给亲爱的克莉丝汀  
For Christine, with love

## 谢 辞

我首先要感谢伦敦大学白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的学生,我与他们在关于历史学的知识、真相和客观性的讨论中,度过了许多进益颇丰的夜晚。同时,我要感谢白贝克学院历史系的同事们,是他们鼓励了我,将自己对历史学及其目前困境的一些粗浅想法写成一本书。自那时起,我数度改写或重新研究本书内容,期间许多人给予我建设性的评论,使我获益匪浅。我要特别感谢大卫·坎纳丁(David Cannadine)的睿智批评,以及葛兰塔书店(Granta Books)的尼尔·贝尔顿(Neil Belton)详尽而有益的评论。罗丝·塔腾(Ros Tatham)帮助我了解斯坦利布里奇的守灵节(Stalybridge Wakes)是怎么回事。克莉丝汀·寇顿(Christine Corton)一如既往地支持和鼓励我。贝奇·哈迪(Becky Hardie)和葛兰塔书店的印刷、装帧团队出色地将本书付梓。我感谢他们所有人。

理查德·艾文斯  
伦敦,1997年3月

# 目录 CONTENTS

导 论 .....	1
第一章 史学史 .....	17
第二章 历史学、科学与道德 .....	45
第三章 史家及其事实 .....	74
第四章 材料和话语 .....	102
第五章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	129
第六章 社会与个人 .....	160
第七章 知识和权力 .....	190
第八章 客观性及其局限 .....	224
跋 .....	254
进阶阅读书目 .....	309
索 引 .....	335
译后记 .....	345

## 导 论



这本书论述了我们如何学习、研究、书写,以及阅读历史。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历史学家被迫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当然,过去已有许多人尝试处理这些问题。但是,每一个新世代的历史学家仍须直面它们。就目前而言,这个研究领域的定论仍由三十多年前出版的两本书所把持,其作者是两位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哈雷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与杰夫里·艾尔顿爵士(Sir Geoffrey Elton)。卡尔的《历史学是什么?》(*What is History?*)一书自1961年出版以来,就被广大师生视为历史学的入门书,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卡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专业史家,他有能力厘清一些艰涩的哲学议题,并能用一种简明、睿智,又饶有趣味的笔调来传达他的想法。《历史学是什么?》一书,并不像一些传统的史学入门书或史学研究导论那样对学生进行说教。面对读者,卡尔未将自己高看,他就历史的本质与许多史学家进行了热烈的争论,他挑战并颠覆了众多大学新生的固有信念,即历史仅仅是一些客观事实而已。他启示学生,历史著作恰如其作者,都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作者都是带着各自独特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来审视过去的。

一提到卡尔那种相对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人们通常会拿艾尔

顿于1967年所出版的《史学实践》(*The Practice of History*)来进行比较。艾尔顿此书有力地守卫了这一立场,即历史学是为了探索关于过去的真相。该书乐观地总结道,历史学家的这种努力常常能取得成功。艾尔顿也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史学家,他在书中就如何学习、书写和教授历史,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忠告;同时,他也不时评论某些史家达到了或(在更多情况下)未达到他所宣扬的理念。卡尔提倡用社会学的方法探究过去;艾尔顿则宣称,任何一本严肃的史学著作,都必须以叙述政治事件为主干。他拒绝承认那些缺乏这一主干的作品为真正的史著。卡尔叮嘱读者,在研究一位历史学家的“事实”之前,应该先研究这位历史学家;而艾尔顿却告诉读者,应当撇开历史学家和他们的写作动机,首先关注真凭实据,即历史精确性和真相的最高仲裁者。

尽管艾尔顿与卡尔的书依然颇具研读价值,可是两本写于三十多年前的书仍被当作一个学科的入门指南,未免教人咄咄称奇。<sup>①</sup> 3 不过,在许多大学里,这两本书仍是不刊之论。<sup>②</sup> 卡尔的书很快就被译成多种语言,并屡屡重版。虽然,有些历史学家似乎仍认定艾尔顿是“史学专业中传统智慧”的代表<sup>③</sup>,甚至(更夸张地)称之为“职

---

① 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1995), pp. 2-3.

② 例如约翰·托什(John Tosh)在1991年的一本通用史学导读中,仍然认为卡尔与艾尔顿之间的争讼,是“进入有关辩论历史知识根基何在的最佳起点”。见 John Tosh, *The Pursuit of History* (London, 1991), p. 236.

③ 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and Criticism* (Ithaca, New York, 1987), p. 136. 然而拉卡普拉后来却不无矛盾地说,大多数大学的历史导论课,“大体上”不过是提供给一种“对这两本书实用而折中的‘综合’”,而且事实上他也隐约地赞同这样的做法,因为他说:“极端的文献上的客观主义(documentary objectivism)与相对性的主观主义(relativistic subjectivism),二者在根本上并不对立。”*History and Criticism*, p. 137.



业学院派史家的**教主**(*doxa*)”<sup>①</sup>,然而,实际上,这早已是陈年旧事了。如今,几乎没有历史学家会再坚持艾尔顿所倡导的不可动摇的历史客观性。数十年来,在历史学这个行当里,论战的形式蔚然成风,因此,历史学家早已省悟到,真相埋藏在文献里、且能够被一劳永逸地挖掘出来的这一想法,应当被放弃了。

1980年代,后现代理论横空出世,艾尔顿和卡尔的许多论点都因此受到质疑,这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它们已成了明日黄花。<sup>②</sup> 卡尔认为探究原因是历史研究的核心,而在“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之后,我们认为话语(discourses)才是重点。并且,历史普遍地被看作是某一种话语。所谓科学的历史,即以对手材料的严格探

①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pp. 87 - 88. Arthur Marwick, *The Nature of History* (3<sup>rd</sup> edn., London, 1989), p. 412, 该书也把艾尔顿的《史学实践》誉为“对该专业主流见解的清晰陈述”。

② 为了避免别人对自己立场的批判,有一些后现代主义者试图先发制人地否认有后现代主义这事儿(就如他们中的一位所述:“我个人根本不知道一种后现代的立场会是什么样子”),或给这个词儿贴上“大而无当”(largely unhelpful)的标签——因其把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当代思想家的观点都混为一炉。但是,另有一些人已经指出,这个标签所适用的观念,有时确实会彼此抵牾、冲突,然而这一事实恰恰引发了人们对这些观念进行批判性的探讨,而不是默然接受。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便利的标签。它既不是一场有组织的运动,也称不上一种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而且本书提及后现代主义之处,不应被泛化地理解为对后现代主义的任一形态或个人的解读。与之相较,对于另一个常用术语,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我们可以做更狭义的理解,即专指某些阅读本文的方法。以上各种正反主张,参看 James Vernon, 'Who's afraid of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history and its discontents', *Social History*, Vol. 19 (1994), pp. 81 - 97, 此处引文见 pp. 96 - 97; Neville Kirk, 'History, language, ideas and Post-modernism: a materialist view', *Social History*, Vol. 20 (1995), pp. 222 - 240, 引文见 p. 222。另外,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sm: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1991), 对此问题的调研也很有参考价值。

究为基础的做法,遭到了猛烈的抨击。越来越多的人在自己的著作中否认所谓历史真相和客观性的存在,而这两种观念恰是卡尔和艾尔顿各自努力捍卫的。如今,“什么是历史?”已不再是个问题,我们应该要问的是“做历史究竟是否可能?”卡尔和艾尔顿都乐观地相信历史学科在不断进步,区别只是前者相信历史研究群体的壮大,后者则寄望于历史知识的累积;然而到了20世纪末,历史学家却无法将这种乐观继续。譬如,思想史家大卫·哈兰(David Harlan)在

4 1989年写道,历史研究正经历“一场大范围的认识论危机”<sup>①</sup>。1990年代中期,美国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林·亨特(Lynn Hunt)和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也表述了类似的看法:“历史学的科学性与文化基础业已动摇。”<sup>②</sup>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语言只与其自身而不是别的发生联系。正如某位忧心忡忡的史家所注意到的,这种观点“必然带来历史学的瓦解”,并且“不可避免地危及常识意义上的历史学研究”<sup>③</sup>。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警告说,后现代主义者发出的挑战,已经把历史学这项事业抛入了“一场不知何者可为、如何可为的自信心危机”<sup>④</sup>。对此,另有论者宣称:“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对象的

---

① David Harla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Return of Litera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p. 581-609, 引文见 p. 581。

② 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1995), p. 1.

③ Gabrielle Spiege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135 (May, 1992), pp. 194-208, 引文见 p. 195, 另外可参看 Nancy Partner, 'Making Up Lost Time: Writing o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Speculum*, Vol. lxi (1986), pp. 90-117, 引文见 p. 95。

④ Lawrence 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131 (1991), pp. 217-218.

合法性,已经在理论上受到严峻挑战。”<sup>①</sup>事实上,有些人认为这种挑战不只是理论上的,如一位史家所述,“后结构主义”甚至要剥夺历史学科的传统合法性与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由此“砸烂历史学家的饭碗”。<sup>②</sup>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学的批判是如此具有威力且影响深远,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停止了对真相的追寻,放弃了对客观性的信仰,而且不再以科学性的取径来探索过去。如此看来,难怪有这么多的历史学家要担心他们学科的未来了。

## 二

然而,这种危机意识并不普遍。相反,许多评论家注意到,1980至1990年代活跃着的历史学家,大都泰然自处。尽管,在1989年,美国思想史家艾伦·梅吉尔(Allan Megill)已经指责历史学界在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时,表现出“硬化症一般的自满”<sup>③</sup>;美国中古史学家南希·帕特娜(Nancy F. Partner)在她写于1995年的文章中,仍然认为这种自满的态度“完全值得赞许”,并且补充道:

基于语言学的批评模式给历史学在理论上造成的波动,对学术实践毫无实质性影响。因为,学术界如果卸掉

---

① Beverley Southgate, *History: What and Why? Ancient, Modern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London, 1996), p. 71. 另外可参看 Ala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1997)。

② Diane Purkiss, *The Witch in History: Early Modern and Twentieth-Century Representations* (London, 1996), p. 69.

③ Allan Megill, 'Recounting the Past: "Description", Explanation, and Narrative in Historiograp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p. 627 - 653, 引文见 p. 631。

从证据出发进行推理的这一鲜明特征,让自己暴露在对欺骗、作假、冒充等行为的必然指责中,那么他们不仅将一无所得,而且会失去一切。<sup>①</sup>

类似地,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弗农(James Vernon)在1994年的文章中,也颇为不满地指出,在面对后现代主义时,他的同行中“弥漫着自满的空气”。他还写道:“1990年代,别处地方的历史学家,至少在讨论书写社会史所需应对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就是在讨论,身处后现代的史家是否可能书写‘历史’的问题;然而,《社会史》(*Social History*)杂志第50期(即19卷第1期)刊出的社论竟断然宣布:‘社会史绝对没有陷入危机。’”<sup>②</sup>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 Joyce)于1991年指出:“学院史学的战略高地,在外来的小规模冲击面前固若金汤,虽然某些著名的高墙(主要在美国)倒塌了,但对历史学家的合围之势远未形成。”据乔伊斯观察,在英国,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反应”,“不是公然的敌视,而是彻底的漠视”。<sup>③</sup>他抱怨道,许多“职业历史学家,普遍说来”往往“对自己时代的思想史很隔膜,尤其是疏于理会数十年来针对公认的历史思维方式的挑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大概可以称

---

① Nancy F. Partner, ‘Historicity in an Age of Reality-Fictions’, in 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eds.),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 1995), pp. 21–39, 引文见 p. 22。

② Vernon, ‘Who’s afraid of the “linguistic turn?”’, *Social History*, Vol. 19, No. 1 (Jan., 1994), pp. 81–97, 引文见 p. 81。(此处的《社会史》不同于后文说及的《社会史杂志》,《社会史》是在英国出版的刊物,《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则是在美国出版的刊物。——译者注)

③ Patrick Joyc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133 (November, 1991), pp. 204–209, 引文见 pp. 204–205。

其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吧”<sup>①</sup>。1995年,他在权威社会史杂志《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上撰文,再次申明了上述控诉。他在言辞间对这份为他提供申论平台的杂志未免稍嫌唐突。他说道:“《过去与现在》这本杂志,是从偷猎起家而后转变为猎场看护人的……典型例子。社会史领域的前辈们,地位依然稳若泰山,并且受到年轻一代学者的支持,而年轻人中的大部分又对我们时代的思想史无动于衷。”<sup>②</sup>

当然,乔伊斯所谓的“我们时代的思想史”,其实就是他自己的一些观念。事实上,《过去与现在》刊出的围绕这些观念的争鸣文章,已是对其怨词的无言反驳。乔伊斯的介入起到的作用不小,由此,这次争鸣在英国逐步升温,越来越多学术期刊的加入使争论日趋频密。早在1993年,两位美国的英国史专家已经能把后现代主义描述为“一种在当前四处弥漫的学术话语”了。<sup>③</sup>在1995年,甚至连那位深受诟病的《社会史》之主编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横空出世,他在1970年代后期创立该刊时的那份踌躇满志,现在只剩得“残山剩水”(in shreds)。<sup>④</sup>所以,到了1990年代末,毋庸置疑,由后现代主义发动的有关历史、真相和客观性的辩论,已成沛然莫

---

① Patrick Joyce, 'The imaginary discontents of social history: a note of response to Mayfield and Thorne, and Lawrence and Taylor', *Social History*, Vol. 18 (1993), pp. 81-85, 引文见 p. 83; 该作者重申此一指责的文章见 'The end of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Vol. 20 (1995), pp. 73-91, 引文见 p. 73。

② Patrick Joyce, 'The end of social history?', pp. 80-81.

③ David Mayfield and Susan Thorne, 'Reply to "The poverty of protest" and "The imaginary discontents"', *Social History*, Vol. 18 (1993), pp. 219-233, 引文见 p. 221。

④ Geoff Eley and Keith Nield, 'Starting over: the present, the post-modern and the moment of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Vol. 20 (1995), pp. 355-364, 引文见 p. 364。

之能御之势。任何人,除非是极端的蒙昧者,都无法对其视而不见。批评家不满于历史学界的泰然自若与自鸣得意,如今不过成了引起论战的激将修辞。

传统主义者,正如杰夫里·艾尔顿爵士,在他去世前不久,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这凸显出历史学家与时俱进的危机意识,他们的学术志业正遭受严峻而空前的攻击。艾尔顿有力地谴责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念是在“耸人听闻”,“图谋破坏”,“荒谬绝伦”,且“毫无意义”。他声称,“全盘相对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异端”,是一种“轻率的虚无主义”的“病毒”,它感染了相当数量(尤其是在美国)的年轻历史学者。他宣告说:“当我们历史学家与那些妄图使历史研究听从文学批评指挥的人斗争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在捍卫自己的生活。当然,我们也是为了捍卫少不更事的年轻人的生活,那些激进的诱惑包围着他们,宣称可以提供更高明的思想和更深邃的真知灼见——这不过是一种智力毒品罢了(the intellectual equivalent of crack)。”<sup>①</sup>警钟并非只在艾尔顿这样的保守主义者耳旁敲响。左翼自由派史学家劳伦斯·斯通也号召历史学家武装起来,去击退那些兵临历史学科城下的智识领域的新蛮族。他警告说,如果后现代主义者的影响力继续扩大,那么“历史学就离绝种不远了”<sup>②</sup>。在左翼社会主义阵营中,《历史作坊》(*History Workshop*)杂志的创始人,激进派历史学家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在他有生之年最后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警告说:“当代思想中的解构性转向”,诱使每一个人“不再视历史为一种大致忠于事实的、对过去的纪录”,而是把

---

① G. R. Elton, *Return to Essential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Historical Study* (Cambridge, 1991), pp. 27, 34, 41, 43, 49.

② 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在此必须解释一下,斯通这番危言耸听似的说法意在于激将。

它当作“历史学家自己的发明或编造”。<sup>①</sup> 这是他完全无法接受的。英国广播电视大学(Britain's Open University)历史系创立者,阿瑟·马威克(Arthur Marwick)教授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担心后现代主义者对于历史学“武断而浅陋的批评”,会令历史学的学生“误入歧途”,更有甚者,“使他们认定历史学家所写出的历史根本一文不名”。<sup>②</sup> 他声称,后现代主义观念是“一种对严谨历史学研究的恫吓”。<sup>③</sup> 两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家补充道:那些“暗示历史学家从事的是发明创造——而非发现或诠释——历史的意义”的理论,“破坏了我们的权威、我们学术志业的神秘感,以及我们工作的根本目的”。<sup>④</sup>

这么多历史学家用耸动的言语发出危机警示,足以说明发生了某些重大的事情。毋庸置疑,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学的挑战,不论是以卡尔还是以艾尔顿所感受到的方式来说,的确来势汹汹。一些智识领域的蛮族(intellectual barbarians)在历史学的城下逡巡,腾腾杀气扑面而来。1990年,荷兰的后现代主义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得意洋洋地宣布:“西方历史编纂学已到了知秋时节。”<sup>⑤</sup>无

① Raphael Samuel, 'Reading the Signs II',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33 (1992), pp. 220-251, 引文见 pp. 220-221.

② Arthur Marwick, '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 The Metaphysical (Including "Postmodernism") an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 (1995), pp. 5-35, 引文见 p. 5.

③ Arthur Marwick, '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 The Metaphysical (Including "Postmodernism") and the Historical', p. 29.

④ Ellen Somekawa and Elizabeth A. Smith, 'Theorizing the Writing of History, or, "I can't think why it should be so dull, for a great deal of it must be inventio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22 (1988), pp. 149-161, 引文见 p. 150.

⑤ F. R. 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8 (1989), pp. 137-153, 引文见 p. 149.

独有偶,凯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这位刚出版了两部后现代立场的批判史学之作者,在其1995年出版的一本重估卡尔著作的专著中,踌躇满志地宣称:“现代主义对‘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之时。”<sup>①</sup>帕特里克·乔伊斯已经声明,“当代的历史学”,即当今实践中的历史学,“事实上,本身就是现代性(modernity)的产物”,因此,它也隶属于当下已被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攻占的智识世界。<sup>②</sup> 吉欧夫·艾理(Geoff Eley)和凯斯·尼尔德(Keith Nield)这两位英国史家试图平息这场争论,他们对论辩双方做了如下一番评价:“一方在理论上不可一世,冲着对面的在方法论上的保守主义者阵营指手画脚,后者当然也寸土不让地予以回击;而两者之间横亘着一片死寂,使双方老死不相往来。”<sup>③</sup>

然而,对历史学家而言,收起通往自己学科堡垒的吊桥,并不是明智之举。数百年来,由于相邻学科的渗透,历史学家可谓获益匪浅。首先是文献学,为史料批评打下了方法论基础,其中居功厥伟的是19世纪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接踵而来的还有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地理学、心理学等各类学科。劳伦斯·斯通本人过去也是支持历史学向社会科学敞开怀抱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那么,为什么在面对来自文学批评和语言学分析的影响时就改变态度了呢?历史学家

---

①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p. 35. 更多来自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批判,参看 Pauline Marie Rosenau,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sights, Inroads, and Intrusions* (Princeton, 1992), pp. 62-76.

② Joyce, 'The end of social history?', p. 73. 他对社会学的看法也如出一辙(前揭书, p. 83)。加上傅柯式的对心理学、精神病理学、人口学、统计学、经济学和犯罪心理学等诸种分类系统的批判,除去自然科学,各种现代知识体系几乎已被一网打尽。

③ Eley and Nield, 'Starting over', p. 364.



应该更加有区别地对待符号语言学派(semioticians)、后结构主义学派(post-structuralists)、新历史主义学派(New Historicists)、傅柯学派(Foucauldians)、拉康学派(Lacanian)等各支进犯部落。有些乍看是敌人,其实何妨当作良师益友呢。

除此之外,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获得客观性知识的可能性,真相的游移性和相对性,辨别事实与虚构的难处等等。这些不仅促使历史学家重审自己学科的理论与实践,而且让他们能够走出象牙塔,追求更丰富的意义。如此说来,历史学家如何获得关于过去的知识,以及他们是否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志业,就成了一个更大问题的引子,即对于我们时代的重大议题,整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确实地掌握它们的客观情况,从而使我们敢于在面对21世纪的人类未来时,作出性命攸关的抉择。

### 三

从许多方面来看,要处理这样一些较为宏大的问题,的确应该从我们获得关于过去的知识之途径这一点着手。历史学家需要面对的问题,与许多涉及当代社会及政治的问题十分相似。然而,要理解过去更为困难,因为它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此外,在卡尔与艾尔顿之后,历史学的理论及历史学本身的历史,已成为完全独立的学问。在此之后,这一研究主题逐步发展出自己的概念和专业术语,这些往往都不足为外人道。的确有论者主张,历史解释的性质这个话题,最好还是留给哲学家去解决。我们如何了解过去?何为历史因果?史实的定义为何?所谓历史真相或客观性是否存在?对于以上种种问题,大部分的历史学家只是付之一笑,与整理档案这个工作核心相比,它们不过是旁骛而已。<sup>①</sup> 有一位观察家认识到:

---

<sup>①</sup> Appleby, Hunt and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p. 9.

“许多历史学家面对哲学上和方法论上的批评不自觉地便会产生敌意,他们常常宁可依靠‘常识’行事。”<sup>①</sup>而少数的历史家确实尝试为自己的学科著书立说,但却很难受到其他同行的赞赏。牛津大学的法国史专家狄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就曾指出:“历史学家……如果充当自己作品的导读者,可靠程度恐怕不会比政客解说自己政策的情况好多少。”<sup>②</sup>或者,用泽尔丁以前的同事诺曼·斯通(Norman Stone)常用的比方来说就是:“叫一个从事具体研究的历史学家议论他的研究主题,大概就像叫一个画家发表他的美学观点一样,只能说你找错人了。”<sup>③</sup>

当然,在职业哲学家的眼中,很少有从事实证的历史学家能够具备他们所认可的探讨史学理论所需的基本专业素质。另一方面,大部分历史知识论研究高度抽象,以致理论性太强,离开实证研究的实际问题太远。因此之故,总体上,在操作层面对历史学家来说并无多大关联。<sup>④</sup>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是20世纪少有的兼通历史与哲学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包括了《牛津罗马征服时期不列颠史》(*Oxford History of Roman Britain*)和《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后者是一本脍炙人口的哲学论著。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两本书有何渊源,它们更像是出自两个作者的手笔。某位历史哲学家曾自大地宣称:“哲学家对历史的兴趣是出于个人的

---

① Christopher Lloyd, 'For Realism and Against the Inadequacies of Common Sense: A 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1 (1996), pp. 191 - 207, 引文见 p. 192。

② Theodore Zeldin, 'Social History and Total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10 (1976), pp. 237 - 245, 引文见 p. 237。

③ Norman Stone, 'Grim Eminenc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20, 1983), pp. 982.

④ 相关思考,参看 J. H. Hexter, *Doing History* (London, 1971), pp. 67 - 71。

目的,至于他们对历史的探究到底有没有实用价值,这一点完全是次要的。”<sup>①</sup>因此,我们看到的哲学与历史学之间如果有对话,往往也像是鸡同鸭讲。

有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非史学专业者(non-historians)根本不当论述历史知识和历史解释的性质。杰夫里·艾尔顿爵士就持如上观点,这一点自是意料之中的事。请注意他又一次收起历史学堡垒前的吊桥了,他说道:“伟大的(或哪怕是资质平凡的)历史学家的思考和工作方式都应该得到研究,但是,研究者必须证明,自己在一开始就明白处理过去留下的材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否则那样的研究只是徒劳的。”<sup>②</sup>换句话说,只有历史学家才有资格谈论历史。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诸如阿瑟·马威克等人的响应,只是后者略微低调些而已。即便是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也曾宣称,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只有通过实际研究,才能了解它”<sup>③</sup>。然而,深具影响力的美国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却旗帜鲜明地反驳道:“坚持只有历史学家才明白历史学家真正在做什么的这一看法,就好像现代科学家拒绝被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一样。”<sup>④</sup>由此可见,历史学家主张自己要享有权利,却恰恰拒绝赋予其他学科同等的权利。

怀特坚称,历史学家——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需要从自己学科之外的地方学习很多的东西。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此外, 12

---

① Ronald F. Atkinson, *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 1978), p. 8.

② Elton, *Return*, p. 34.

③ Marwick, 'Two Approaches', p. 6; J. H. Hexter, *On Historians: Reappraisals of Some of the Makers of Modern History* (London, 1979), p. 145.

④ Hayden White, '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 (1995), pp. 233 - 246, 引文见 p. 245。

雷蒙·马丁(Raymond Martin)这样说道：“当我们要理解过去时，历史学家当然是公认的专家；但是，当我们要理解我们是如何理解过去时，没有人是专家。”<sup>①</sup>与之相比，美国计量史学的创始者罗伯特·傅果(Robert Fogel)的看法显得更加黯淡一些，他认为历史学家有选择的余地，即：“他可以不用理睬那些哲学家，而继续自己的工作；但是，那可能意味着，虽然他们的工作在继续，但他们不会明白它们是如何进行的。或者，他们扔掉自己的吃饭家伙去听哲学家的话，这很可能意味着，这些家伙不会再被拾起。”<sup>②</sup>然而，现实并不尽如这种绝望的忠告所勾画的图景，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从事实际研究的历史学家在两方面都应付裕如的实例。也许是受到后现代主义挑战的激励，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觉得有必要反省一下他们所从事工作的性质。我们当然乐见这样的趋势。有三位美国历史学家在近期合著的一本书中指出：“现在是我们历史学家负责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如何作为与为何作为的时候了。”<sup>③</sup>

的确，对历史和历史学界进行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评论家，有时不屑听取从事实际研究的史学家的观点（当然，除非后者能全盘接纳后现代主义者的意见）。在美国著名的17世纪英国史专家佩瑞·查哥林(Perez Zagorin)看来，“那些宣布后现代主义已经来到的人”，频频声称这是“大势所趋”。<sup>④</sup>事实的确如此。帕特里克·乔

---

① Raymond Martin, 'Objectivity and Meaning in Historical Studies: Toward a Post-Analytic View',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2 (1993), pp. 25 - 50, 引文见 p. 31。

② 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G. R. Elton, *Which Road to the Past? Two Views of History* (London, 1983), p. 2.

③ Appleby, Hunt and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p. 9.

④ Perez Zagorin,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Reconsiderations',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9 (1990), pp. 263 - 274, 引文见 p. 264。

伊斯也说：“时代在前进”，“历史学家就得学着与之俱进”。<sup>①</sup> 同样地，凯斯·詹金斯也有力地断言：“现今，我们无往而不在后现代性之中。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后现代性不是我们可以取舍的一种‘意识形态’或立场；后现代性恰是我们的境遇：它是我们的命运。”<sup>②</sup>因此，来回地争论我们是否要接受它，是完全徒劳的。不过，后现代性只是我们用来描述人类境遇中出现的某种东西的一个语词，对于这种东西，有的人已摸出底细，而有的人还争论不休。詹金斯以权威的口吻宣告后现代性乃生活中一个不可否认的生活事实，但如果考虑到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概念的游移不定的本质，语词与现实间迂回的、偶然的、无常的甚至子虚乌有的关联，那么，他的话未免显得有些出位，好像是一个后现代主义支持者的公开声明似的。

况且，我们不能只因为一种思潮看似所向披靡，就心安理得地望尘而拜。为免教人以为这是我在牛津这个以出产“徒劳事业”（lost causes）闻名之地濡染的习气，我要在此举例论证一番。下面就来看看这个起始时大获全胜，而后走火入魔的思潮的例子。在1920到193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普遍相信，外交政策在形塑国族历史中的优先地位，并把这种想法和一种政治目标挂钩，即从历史上找论据，争取修改《凡尔赛条约》，并收回德国在一战末失去的土地。德国历史学界在清理了异见者后，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都自愿与纳粹政权合作，并接受了纳粹化的大学教育体制。然而，这就是顺从这种思潮的理由吗？结果，这种所向披靡的潮流摧毁了整整一代德国历史学术的品质和声誉，不是吗？当然，我们不会把后现代主义与法西斯意识形态相提并论。通过上面的例子，我要真正说明的是，

---

① Joyce, 'The imaginary discontents', p. 84.

②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p. 6.

主导一时代思想的论点和理论,尽管它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仍然应该得到就事论事的评价,而不是无条件的接受。一些为后现代主义保驾护航的人,也有类似的倾向,他们宣称自己已经大获全胜,历史学家已经没有可以反驳的余地了。<sup>①</sup> 事实是,历史学家对于一些后现代主义历史学批判的回应,已经促使这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对自己的观点作出不少根本性的修正,反之亦然。换句话说,现在的情形已不再是鸡同鸭讲,我们看到了有交锋的论战。历史学家本身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历史学理论太过重要,怎能完全交给理论家呢。上天可能没有赐予从事实际研究的历史学家以机敏的辩才,但是,他们与其他人一样,完全具有思考和写作的权利,而且他们所具备的实际研究中的经验,理应使他们能够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

---

<sup>①</sup>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p. 92.

## 第一章 史学史

### —

无论历史学家在对精确性和真实性的需求上有多少共性,每个时代的 15  
历史学家仍然保有各自追求精确和真实的目的,以及阐述事实的方式。在中古与近代早期,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自己的职能就是为上帝的意志在人世的显现做编年史。世事变化,根本说来,是出于上帝的意志;人类历史就是善与恶两种超自然力量的竞技场。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模式却是以人的力量为中心,但是他们仍旧把自己的作品看成一种道德示范。譬如,在启蒙时代最伟大的史著——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一书的主角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是品德。它给人的根本教训是:迷信、狂热,以及宗教信仰——所有这些启蒙时代理性主义所诅咒的事物——搞垮了一个 16  
伟大而仁慈的帝国;若不彻底铲除这些危险的力量,将来还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历史是“现身说法的哲学”(philosophy teaching by

example), 而人性则是普遍而恒常的, 不会与时俱进。<sup>①</sup>

到了浪漫主义时期, 历史学家开始批驳这种想法。在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等作家的影响下, 历史学家看到的过去越来越令他们兴奋, 因为它变得不同了。而在爱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等政治理论家的影响下, 历史学家主张, 1789年法国大革命狂暴地摧毁了政治的稳定, 而重新建立稳定的政治唯一可行的基础是过去。历史学的目的, 不再是为某些抽象的哲学教条或原则提供例证, 而仅仅是把过去珍藏起来, 并把它当作切实理解和准确估量当代政治和社会体制的独一无二正当基础。这一转变的先驱是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他那不同寻常的高寿和多产使其成为学术史上的一段传奇。他一生写作了六十多部著作, 其中包括关于历代教皇、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 以及拉丁与日耳曼国家的几部多卷本史著。他在83岁时动笔撰写一部世界史, 到1886年他以91岁高龄逝世为止, 已完成了十七册之多。他早先是在发现司各特的小说《昆丁·杜瓦》(*Quentin Durward*) 偏离史实之后, 心里深受震动, 才转而研究历史的。因此, 他决定要用学到的文献学方法来研读历史文本, 以避免类似的史实错误再次发生。

17 兰克对历史学的贡献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首先, 他促使历史学从哲学或文学中脱离出来, 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在自己某本著作的序言里这样写道: “过去, 历史学被赋予了鉴往知来、指导当下的权柄。本书并不奢望于此, 我只想展现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

---

<sup>①</sup> 更详细的论述, 参看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2nd edn., London, 1994)。人们常以为这句话出自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波林布洛克(Bolingbroke), 其实, 这是古希腊雄辩家哈利卡纳苏斯的丢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说的(*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3<sup>rd</sup> edn., Oxford, 1979, p. 184)。



情而已。”<sup>①</sup>最后这句大概是兰克最广为传颂的名言了,但它的本意却常常遭到误解。兰克的德文原句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我们把它译成“如其本然”(how it essentially was)比较好,因为兰克的意图不仅是收集事实而已,而是要理解过去的内在本质(the inner being)。<sup>②</sup>

兰克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历史学家必须认识到“每一个时代都是贴近上帝的”<sup>③</sup>。即不朽的上帝对历史上的每个时代一视同仁。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用当下的标准来评鉴过去;我们必须用过去的标准来看待它。这便是兰克对历史学做出的第二大贡献:下定决心要脱掉伏尔泰(Voltaire)等哲学化了的史家为过去披上的华贵外衣,使它露出本来的样子;努力地以过去的人理解自己生活时代的方式去理解过去,甚至抓住那些大部分哲学化了的史家都未曾注意到的过去与当下间的会通性(interconnectedness)<sup>④</sup>。从以上学说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包括当下在内的任何时代所存在过的任何事物都应被视为神定的。兰克是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他把理想等同于现实,并把自己时代的欧洲各国视为“灵性的实体……上帝

---

①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Cleveland, Ohio, 1956), p. 57.

②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U. K., 1988), pp. 27-29; Leopold von Ranke, *The Secret of World History: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History* (ed. Roger Wines, New York, 1981), p. 21; 另外可参看 Stephen Bann, *The Clothing of Clío: A study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France* (Cambridge, U. K., 1984), pp. 8-10.

③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p. 55.

④ 会通性是一种一神论世界观的术语。这种世界观在万事万物中都发现唯一的存在(oneness)。会通性指所有事物都是由一个单一的根本的物质和本体构成的,表面看来各不相干,但实际不存在绝对的分隔。有人认为这与神秘主义有关系。——译者注

的意图”<sup>①</sup>。这使得他与德国普鲁士历史学派,以及特赖齐克(Treitschke)等民族主义者相疏远,后者谴责他的不偏不倚,并为他的普世主义而惋惜。事实上,正是因为他把普鲁士之外的国家也一律视为上帝的意志投射到人世间的至高无上的作品,使他获得了不偏不倚的声名,这大大有助于他在德国之外影响力的扩展。<sup>②</sup>

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兰克把文献学在考辨上古、中古文学(比如,莎剧或《尼伯龙根指环》等中古传奇)的成书过程、真实作者和可靠版本方面新近发展出的一些方法,引介到近代历史的研究中。兰克指出,历史学家必须把作伪和篡改之处从记录中根除。他们还必须检验文件本身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并且是否与同时代的其他文件对得上号。他们必须紧紧盯牢“一手资料”,亲历者的报道,以及产生于那个被研究时代的、兰克所谓的“最纯正、直接的文件”,而不是依靠回忆录或事后概括的历史等“二手资料”。此外,他们必须调查并鉴别所有(all)与自己研究课题相关的资料。他们不应该像吉本那样,满足于依靠图书馆里现成的已经整理出版的文件和编年录。他们必须像兰克当年那样,瞄准档案,钻到欧洲各个大使馆,去发掘汗牛充栋的未经整理出版的原始手稿。只有在穷尽、鉴别、核对所有可用的资料之后,才能把它们排列组合,精确地重建过去。

19 用文献学技术处理历史资料,是一项重大的突破。直到今天,兰克的原则仍然是不少历史研究与教学的基础。举个例子来说,在许多英国大学的专门史教学中,就有对文献考订的基本训练。在考试中,学生要对某些文件的断编残简进行评述,考察文本的内

---

① 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eds. Geor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Indianapolis, 1973), p. 119.

②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p. 36.

在一致性,以及与同主题下其他文献的关联,并最终判断它们作为史料的可靠程度和价值大小。对于真实性和归属问题的追寻仍然是历史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像十余年前出现的伪“希特勒日记”那样的可悲例子,仍然所在多有。有关一战和第三帝国起源等问题的文件汇编和别的出版品中,彻头彻尾的赝品或经过篡改的证据,还是大量存在。而这种情况在中古史中更是屡见不鲜。科技的进步使得兰克学派如虎添翼,譬如,人们轻而易举地就发现了“希特勒日记”的虚假性,因为通过测定书写用纸的年代,发现该日记所用纸张是1950年出产的;也许最初在《伦敦日报》上声称这部日记为真品的休·久佛-罗帕暨戴克勋爵(Hugh Trevor-Roper[ Lord Dacre]),不该根据每页最后阿道夫·希特勒的签名就轻易地信以为真了。<sup>①</sup> 无论历史学家选取何种研究方法,他们还是要从兰克式的基本功夫入手:考察特定文件的出处、作者的写作动机、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这些文件与同主题所涉其余文件之间的关系。如果做不到以上这些,那么后果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

自19世纪以来,这些都属于历史学家的基本训练,这也是理所应当的。无论有多少的伪作和篡改的案例,它们能侥幸不被识破的时间也不会太长。有些怀疑论者指出任何资料都是“带有片面性的”这一事实,但据此认为历史学家就会想当然地受到材料的误导,未免言过其实,这就好像政治家以为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对他们的回

---

<sup>①</sup> Robert Harris, *Selling Hitler: The Story of the Hitler Diaries* (London, 1986), pp. 23, 354. 对一战起源进行伪造和篡改的例子,参看 J. C. G. Röhl, 'Admiral von Müller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Historical Journal*, Vol. XII (1969), pp. 651 - 673; 以及 Fritz Fischer, *Juli 1914: Wir sind nicht hineingeschlittert: Das Staatsgeheimnis um die Riezler-Tagebücher. Ein Streitschrift* (Reinbek, 1983), pp. 49 - 54, 75 - 82.

忆录用而不疑一样。一门现代学科仍然主要依据一个半世纪前奠定的原则,也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事。譬如说,化学,仍然在使用元素周期表,而医学研究也还在运用 19 世纪中期的“科霍病原学法则”(Koch's postulates),来证明某一微生物是某种疾病的致病源。这类科学方法的相似性突出了一个事实,即当文献考订的方法被引入历史研究时,人们也把它当作了一种“科学的”技术。正是这种技术的应用,使历史学建立了自己学科的合法性,而那些希望在本国建立史学专业的历史学家,涌入德国,拜倒在哥廷根和柏林的几位主要倡导者的门下,接受训练。

美国历史学家赫尔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写道,在这场“兰克派史学革命”的进程中,历史学训练学生的主要场所,即以大学为据点的史学研讨班,已经“从一个灌输教条的托儿所进化成一个科学真理的实验室”<sup>①</sup>。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法国历史学家福斯泰尔·德·古朗治(Fustel de Coulanges)在 1862 年就宣称:“历史学是,也应该是,一门科学。”<sup>②</sup>这种论调背后的观念,是把科学纯粹理解为一种归纳推理(inductive)。也就是说,那儿摆着文件,事实就在里面,等着被历史学家发现;就像群星闪耀在苍穹,等着被天文学家找到。历史学家所要做的就是,运用适当的科学方法,并且摒除个人的意见,如此这般,事实就会浮现出来。因此,研究的目的便成了在知识上“拾遗补缺”——今天,这仍是大量历史学博士论文赖以通过的基本原则。法国历史学家克劳德·朗格鲁瓦(Claude Langlois)与查尔斯·色涅波(Charles Seignobos)合著的史学研究法入门书曾是风靡一时的首选,他们在书中指出:“当所有的资料都被知晓,且经过处理,可以付诸应用的时候,最主要的学

①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p. 33.

②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p. 179.

术工作就已经完成了。在研究某些上古时期时,资料比较稀少,因此我们可以预知,在一两代之内,所有的工作就都可以做完了。”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也能发现类似的信念。例如,德国物理学家麦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在1870年代开始进行研究时,就被他的教授警告说,他的研究将是浪费时间,因为那个领域中已经没什么可以再被发现的了。<sup>①</sup>

但是,这些观点都是建立在一连串误解的基础之上。过去流传下来的所有证据都可以被仔细审视和估量,这一信念早在19世纪末就遭到质疑,因为当时考古学领域的新技术和新发现为人们打开了通往最遥远时代的知识的一扇扇大门。而自20世纪初起,历史学家的视线也慢慢从狭隘范畴的历史和国族缔造者的身上移开,开始探索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以及后来出现的各种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这样看来,新的问题的提出,可以使以往遭到忽视的那类证据获得崭新的意义。流年似水,不断将新的时代送往历史的彼岸,历史学家也意识到他们可以使用的资料量,几乎是幂数倍地增长着。19世纪后半期的美洲和欧洲社会,人口较以往稠密得多,非但如此,那里不仅制造了更多的文件(这反映了识字率的提高和迅速扩张的国家职能),还创造了从大众报纸到相片、电影等新形态的资料。利顿·史崔奇(Lytton Strachey)语带反讽地感叹说:“我们永远无法写出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因为我们对它所知过多。”<sup>②</sup>

22

在19、20世纪之交,不仅是对全部事实终将被揭开的信念发生明显的动摇,连所谓真正的科学的史学这一概念也开始站不住脚

<sup>①</sup> 引自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pp. 37-39。截至目前,这是关于“兰克派史学革命”对美国专业历史学影响的最佳论述。

<sup>②</sup> Lytton Strachey, *Eminent Victorians: Cardinal Manning-Florence Nightingale-Dr. Arnold-General Gordon* (London, 1925), p. .

了。许多提倡科学地研究历史的人并没能实践自己的主张。伦敦大学历史学研究所(该所旨在为历史学的研究生提供本专业的科学化训练)的创办人波拉德(A. F. Pollard),他在自己关于都铎王朝史的研究中,几乎没有使用手稿这类资料,而宁可使用《国家文件系日表》(*Calendars of State Papers*)中错漏百出的抄件和摘要,导致其著作的可靠性大打折扣。<sup>①</sup> 即便是伟大的兰克,以他自己处心积虑建立的标准来衡量,也有不少可以指摘之处。在一些人看来,他的作品并非“质胜其文”(colourless),而是充满了隐喻。<sup>②</sup> 兰克自信写作的是客观的历史,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有相当多的研究,依据的是威尼斯大使寄往欧洲各国的急件,而这些文件本身仿佛刻意要给人留下一一种中立和如实汇报的印象。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潘勃(John Pemble)所指出的,“对于兰克之后的人而言,兰克自己(Ranke)还不够兰克(Rankean)”。他用到的威尼斯史料是片面的、有选择性的,且狭隘的,他对其余的档案资料利用不足;不过,确实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做到如此高产。潘勃说道:“福楼拜(Flaubert)曾评论说,书写历史就像饮尽西沧海,却只溺一杯。而兰克所做的似乎恰好相反。”<sup>③</sup>

吊诡的是,那些科学历史学的开创者往往无法遵循自己设定的规则,然而,一战前的历史学家虽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仍在不停歌颂科学取径的好处;不但如此,他们还大受激励。1903年,剑桥大学近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伯利(J. B. Bury)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这样宣称:“历史学不折不扣是一门科学。……历史学不是文学的分支。

---

① John Kenyon, *The History Men: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n England since the Renaissance*, (2nd edn., London, 1993), p. 212.

② Peter Gay, *Style in History* (London, 1975), ch. 2.

③ John Pemble, *Venice Rediscovered* (Oxford, 1995), pp. 82-83.

历史学的事实,和地质学或天文学上的事实一样,都可以为文学艺术提供素材……但是,为人类社会的故事披上一件文学的外衣,不再是历史学家的分内事情;就像不该要求天文学家提供关于星星的艺术化故事一样。”伯利以其所谓的“当今世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德国的狄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为例,来说明作为学的历史与作为科学的历史的差异。伯利宣称,蒙森之所以是历史学家,并非因为他写了一本脍炙人口的《罗马史》——这本书只不过给了他“美文家”的雅号(而且,这本书确实使他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因为他详细阐述了关键的罗马碑铭文集,并且深入研究了罗马法律。这正是他施展科学方法的领域,因此也是真正成就其历史学家美名的原因。伯利暗示,这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榜样。<sup>①</sup>

## 二

1903年在剑桥举行的那场讲演会上,有一个听众叫乔治·麦考莱·屈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当时年仅26岁。1927年,伯利逝世,屈威廉便成了那个钦定讲座席位的后继者。屈威廉把那次演说看作是对他的舅公暨辉格派(Whig)历史学家麦考莱勋爵(Lord Macaulay)蓄意的人身攻击。麦考莱勋爵曾著有《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该书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最伟大的文学性著作之一。于是,屈威廉迫不及待地印发了一篇名为《克里奥:一位缪斯女神》(*Clio: A Muse*)的文章(文章标题指的是古希腊神话中司掌

---

<sup>①</sup> J. B. Bury,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in the Divinity School, Cambridge, on January 26, 1903* (Cambridge, 1903);另外可参看 Stern(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pp. 209-226。

历史的女神)。他在文中以少见的激烈方式抨击了伯利。<sup>①</sup> 然而,屈威廉也说:伯利等人对“以艺术化及情感化的方式处理整个人类历史的做法”所发动的“圣战”,实在太成功了,乃至极有可能“歼灭那些硕果仅存的”将历史当作一门艺术的人。如果历史仅仅是“以科学的原则按时序排比的实事而已”,那么“文学、情感和猜想 (speculative thought)”将被“摒弃”在人类对自己过去的研究之外。<sup>②</sup> 屈威廉在自己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写作了不少像《英国社会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这样脍炙人口的作品,力图将历史学家和公众间的鸿沟变成通途。与许多诋毁他的言词正相反的是,他在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上都堪称专业,尤其是像他的皇皇巨著,三卷本《安妮女王治下的英国》等作品所反映的,他的研究可谓既严谨又宏阔。<sup>③</sup> 不过,尽管他对自己研究课题的“科学性”方面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仍然认为:“如果认定历史上的事实有价值,仅仅因为它们属于一个只有专家才得以企及的全然科学的领域,那就是误将历史比附于自然科学的结果。”他认为无论大众是如何理解的,自然科学的价值只在于实用性和因果律的推导。但是历史学没有任何实用价值,除非它能被广为传播;即便如此,没有人曾经成功地从历史中得出过那种经得起自然科学检验的普遍的因果律——换句话说,就是使人能够预测未来的规律。屈威廉退了一步说,“收集史实,审定证据,从而判断过去发生了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科学的,但是发现事件背后的因果律又是另外一码事了”。

---

① 爱德华时代 (Edwardian, 即英皇爱德华七世在位时期, 1901—1910 年——译者注) 的历史学家对伯利讲演与观点的类似反弹或响应, 参看 Kenyon, *The History Men*, pp. 183 - 186.

②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pp. 227 - 245.

③ G. M. Trevelyan, *England under Queen Anne*, 3 vols. (London, 1930 - 1934).



当屈威廉做出以上判断的时候,他其实呼应了兰克的基本原则。兰克在他自己的时代已经区分了两种取径,其一,为了精确论述过去发生的事件,必须采取严格的材料考辨原则;其二,为了建立事件之间的“会通性”并触及一个时代的“本质”(essence),则须要运用直觉的方法(intuitive method)。对于后一种取径,兰克指向的是浪漫主义和宗教的层面,而屈威廉则是在美学和文学的意义上提出的,但是他们两人都认为,运用直觉的方法与否,是年代记编撰者和历史学家的分野所在。屈威廉说,历史学乃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想象或猜想的(诠释)与文学的(表现)之混合体物。历史学家要求的不是“关于事实的更多知识”,那样的要求是无论如何无法满足的。没有人曾想过以科学的方法去一一剖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两千万法国人的心态。我们也无法仅仅靠归纳对这一事件做出解释。我们永远不可能像揭示化学反应中的因果关系那样,科学地阐明大革命的前因后果;我们也不可能像发现万有引力或热力学第二定律那样探知它背后的规律。要想对大革命做出最佳解释的历史学家,必须“找到并估量所有可能被发现的重要证据,此外,还要有最敏锐的领悟力,最丰富的同情心,和最高超的想象力”。

26

屈威廉本质上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他主要从事的是英国史的写作,而他之所以反对“科学的”历史学的概念,何尝不是因为那是来自德国的观念呢。他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设问道:“盎格鲁-撒克逊史学家的祖国在哪里?”“有人回答是‘德国’,可我们中的其他人更愿意回答是‘英国’。德国学问的方法和局限,想来应该挺适合德国人的,可是对英国人来说一定是束手束脚的、浑不对劲儿。”他宣称,“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土地上,寻找到自由自在、人人喜闻乐见而有文学气息的历史学传统”。他还为“当代历史学者被德国化的权威训练得不把历史当……‘故事’,而当作‘科学’”的现状深感痛惜。他认为,这一时代的德国化倾向是专横而等级森严的,

不适合自己国家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sup>①</sup>

一如屈威廉在英国的传统和环境中追寻历史学的灵感之源,其他欧洲国家的历史学家也抵制伏尔泰和吉本等启蒙主义作家和兰克等浪漫主义者的普遍化(universalizing)倾向。由于英国的麦考莱、法国的米什莱(Michelet)和德国的特赖齐克等人的推波助澜,大众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在以上国家都盛极一时。而且,这股潮流甚至影响到了19世纪后期最具“科学性”的学者。一个例证就是,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定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历史学研究的首要对象。笼罩着新生历史学专业的一个观点是,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国家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那些最为专门而严谨的学术文章也往往不能超脱这个框架;与此同时,科学性研究所需的大量资源也被倾注在刊印诸如《德意志历史文献》(*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和《国家文件系日表》这样为国家历史提供基本素材的大型档案汇编上。

以德罗伊森(J. G. Droysen)等学者为首的普鲁士学派的历史学家高兴地宣称,在用批判的方法考察历史材料方面,“德意志民族使其他所有民族都相形见绌”;但是像屈威廉一样,他们也对那种认为这就足以写出历史的想法持批判的态度。德罗伊森论道:“历史是唯一被要求同时还要成为一门艺术的模棱两可的科学。”他之所以这样抱怨,是因为德意志的中产阶级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德意志历史研究法既迂阔封闭,又索然无味”,他们宁愿读麦考莱,或伟大的法兰西历史学家暨政治家梯也尔(Thiers)的作品,因此,“由于其他民族在语言修辞上的优越性”,“德意志人的历史判断”,甚至“德意志人的政治判断”,“都任其形塑和支配”。19世纪的大部分时候,德意志的中产阶级确实以英国自由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为

---

①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pp. 229 - 233.

自己的榜样。普鲁士学派的历史学家则致力于通过科学方法、历史直觉和文学技巧的结合运用,去彰显普鲁士价值的优越性,并且以1871年德意志统一来证明这些价值的必然胜利。在一战爆发前的三十年间,德国中产阶级从自由主义转向更具威权性质的民族主义,普鲁士学派确实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sup>①</sup> 28

因此,早在1914年以前,一些人对科学的方法究竟能否提供一个中立而不带价值观偏见的历史,已经产生质疑。1914至1918年发生的事件及其后续发展,使人们的信心愈加动摇。各个国家的职业历史学家都忙于发表论著,掩饰本国政府的战争动机,而指责别的强国是挑起事端的祸首。有关战争起源的文件确实得到编辑和出版,且整个过程用上了一切的专业手段,并由声誉卓著的专家操刀,只是他们的选编原则一定不会得到别国同行的认同。历史学家所受的严格的科学训练根本无法使他们以真正中立和“客观”的态度对待过去不久的历史。对此,1920年代,各国专业史家围绕战争起源进行的激烈而持久的论战,恰是一个绝佳写照。<sup>②</sup> 不仅如此,对一些英国、法国、美国的历史学家来说,当他们得知自己曾一度仰慕的极具“科学性的”德国同事们,居然绝大多数都支持战争,不啻又一记当头棒喝。<sup>③</sup> 许多曾在德国求学的历史学家,现在急着抨击德

---

① Droysen的话,转引自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p. 138。对此更全面的说法,参看 Georg G. Iggers,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 (Middletown, Conn., 1968)。

②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pp. 116 - 132, 206 - 224; Christopher Parker, *The English Historical Tradition since 1850* (Edinburgh, 1990), pp. 104 - 117.

③ Klaus Schwabe, *Wissenschaft und Kriegsmoral* (Göttingen, 1969); Stuart Wallace, *War and the Image of Germany: British Academics 1914 - 1918* (Edinburgh, 1988), pp. 29 - 42, 58 - 73.

国学界的迂腐和反民主。正如他们中有人在1915年所说的：“德式注脚的时代正日薄西山。”<sup>①</sup>而在屈威廉看来，德国的战败也象征了“德国‘科学史学’的失败”，这个曾“被这个民族目为政治的先知和向导”的幻象，使那些引颈而望的信徒与它一起走上了一条不归路。<sup>②</sup>

29 一战也暴露了先前关于诸如德国或19世纪欧洲的一些看似中立的历史著作在诠释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瑕疵。俄国革命、《凡尔赛条约》，以及现代主义在艺术、音乐、文学领域的兴盛，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让历史学家越来越手足无措。老一辈历史学家中具有反思能力的人意识到，他们对客观性的信念，使他们以为自己活在一个井然有序且无所不可预见的世界中。资深的美国历史学家克拉伦斯·艾弗德(Clarence Alvord)在战后坦言，自己曾总是“安于遵循本学科的法则……沿着学界公认的一条道儿走到底……学会言必称兰克……自诩是如其本然地(*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在讲故事……”一切本来都很好，他接着说，因为这个世界还是个安全的栖息地，而人们也可以相信循序渐进、有理有据且必将到来的进步。然而，如今，“牛鬼蛇神肆意横行，把大地变成了废墟……我们这代人设计并建造起来的整栋历史华夏已被分隔得支离破碎……我们历史学家从事件中发掘的意义成了妄言，彻底的妄言。”如果现在是由一些不可预知、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塑造的，那么，以往历史学家相信经由简单归纳就可理解形塑过去的力量，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sup>③</sup>

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完全放弃了从过去中寻找模式或意义的念头。正如英国的自由主义史学家费士(H. A. L. Fisher)在1934年

---

① 转引自 Wallace, *War and the Image of Germany*, p. 37, quoting L. P. Jacks, Principal of Manchester College, Oxford.

② David Cannadine, *G. M. Trevelyan: A Life in History* (London, 1992), pp. 213 - 215.

③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pp. 131 - 132.

出版的那本脍炙人口的《欧洲史》(*History of Europe*)自序中指出的:

比我明智而博闻的人已从历史中找到了一种预谋,或节奏,或可预知的模式。我却隔膜于这些结构。我只能看到如波涛起伏般接踵而来的突发事件;只能看到一个个独一无二的事实;只能看到一条安全的历史学法则:必须看到人类命运发展中偶发的和不可预见的作用力……一代人据以为实的东西对下一代人可未必成立。<sup>①</sup>

30

从这种深陷迷惘的观点出发,历史只不过是“一件接一件的混账事体”,没有意义,也无法解释。

此一时期自然科学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于是,上述这类观点在理论层次上更加得到了强化。1919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1913年)经天文学观测证实后风靡一时,在思想界亦造成了一种风气,人们认为“事物的面貌”会因观察者的立场不同而变化。一大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活跃的哲学家,将观察者与事实的相对性观念应用到史学领域,其中尤以两位自由主义思想家,意大利的贝内蒂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和英国的柯林武德为最。他们的做法回应了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等战前德国哲学家的观点,后者首先对人们获得关于过去客观知识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他们的观点也和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Weimar Republic)的文化悲观论相仿佛,在那些文化悲观论者看来,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使历史几乎丧失了意义。克罗齐指出,历史学家受到自己当下关怀的引导,对过去

---

<sup>①</sup> H. A. L. Fisher, *A History of Europe*, 3 vols. (London, 1935), p. vii. 对费士上述观点的肆意攻击,见 Christopher Hill, 'A Whig Historian', *The Modern Quarterly*, Vol. 3 (1938), pp. 276-284.

31 的文献和事件的重要与否进行判断。因此,所有的历史,无论笔者是否有心,都是从当下的视角出发写成的;用克罗齐的名言来说,即“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sup>①</sup>。柯林武德则走得更远,他说:“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因为,除非历史学家重新组织(reconstituted)文献中表达的思想,否则这些过去的遗存便毫无意义可言。柯林武德总结道:“历史学家研究的是思想的历史,而历史就是思想在他头脑中的重演(History is the reenactment in the historian's mind of the thought whose history he is studying)。”<sup>②</sup>

我们暂且不论上述观点的得失,广义上讲,只是为了模糊战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屈威廉这样具有文学倾向的人)惯于在事实和诠释之间所作的区分。在他们看来,并不是历史学家观察、搜集并验证事实后,再对其进行“解释”。观察、搜集事实的举动本身,就受制于历史学家对过去所持有的先在(a priori)信念。这类观点的流行,如卡尔所指出的,并不仅仅因为“一战后,事实似乎变得不再像1914年以前那样对我们有利,我们也因此更易接受一种试图减损其重要性的哲学”<sup>③</sup>。在四面楚歌的20世纪20至40年代所爆发的经济困顿、国际冲突、革命暴乱,加上有过之无不及的,发生在意大利、西班牙、俄国和德国的空前规模的暴力与非人道行为,严重打击了战前历史学家所怀抱的对进步的信念。科学上的新发现和新观念,使那种以为等一切都被发现后历史写作就会终结的信念不复存在。如果所谓“发现”多少会取决于受自身时代语境影响的历史学家之  
32 意图和设想,那么我们就明白,每一个新的时代都要对先前所有时

---

① Benedetto Croce,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London, 1941), p. 19.

②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1946), Part V, Sections 4-5.

③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2nd edn., London, 1987), p. 21. (此书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译本。——译者注)

代的历史重新写过。

### 三

以上这些发展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体而论,一战与二战之间的混乱动荡期实在称不上历史学的光辉岁月。欧美国家的经济紊乱使历史学家的收入减少,能够得到训练的新历史学家也相对较少,而且在许多(事实上是大多数)沦为独裁统治的欧洲国家中,自由的历史研究被打断了。只有等到二战后,经济开始复苏,1930、1940年代集结的大批军队终于被裁撤,一批新生力量才得以注入历史学这个行当。这批历史学家遇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克服两次大战间前辈学者的那种怀疑一切的态度和迷惘失序的状态。许多历史学家力图重新肯定他们眼中的史学传统价值,他们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些价值已经为一些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压迫和动乱扭曲。这批新生代历史学者在英国的导师和模范是波兰裔历史学家路韦士·纳米尔爵士(Sir Lewis Namier),他的研究以勤恳、细致和精确而著称。他的一位门生曾指出,纳米尔认为,“如果历史学不想变成假想的总称……就必须坚实地建立在至纤至细的事实之上”。他还认为,与其说是兰克,莫如说是弗洛伊德(Freud)创立了一些科学的准则,使我们对过去的研究基础较以往更为扎实,以此看来,纳米尔已准备好去更新“科学性”历史学的概念了。但是,他由此信念所得出的结果,却与后来几十年中那些理论先行(speculative)的美国心理史学家的东西相去甚远。纳米尔总是回避理论先行的做法,所以他从来不认为自己能够为过去存在的某个个体找到充足材料,从而对其性格进行精神分析。然而,由于他采纳了弗洛伊德的观念,他确实认为,人们主要是出于个人的动机和魄力,而非意识形态或信仰,才会去做某些事情。

33

纳米尔以这种取径,配合他那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研究,撰写成了自己最享有盛名和惊心动魄的作品《乔治三世时期的政治结构》(*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这本书对“辉格党的”英国史发起了正面攻击,后者把18世纪的英国政治看成是辉格党倡导的自由、宪政与托利党(Tories)代表的专制、皇权间的斗争。按辉格党的说法,最后乔治三世及其弄臣布特勋爵(Lord Bute)采纳了托利党的主张。这位新国君的专制倾向,使得英国在诺斯勋爵(Lord North)担任首相期间,失去了她在美洲的殖民地。而纳米尔越过这些意识形态,研究了当时那些参政者的个人关系。经由对他们的细致研究,他指出,“党派”无关宏旨,意识形态也不是重点;真正要紧的是,个人假借官场和亲缘网络围绕权力、金钱、地位展开的逐鹿。由此看来,当时的政治危机,完全是由新君即位对原有网络的破坏所引发的,而不是因为他支持某种信仰,或冲击某种政治原则。如此这般,纳米尔一针见血地击中了辉格党式英国史的痛处,把它打得落花流水。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成就。1960年代,在我还在念本科时,纳米尔的这本著作被历史学的导师视为英国史方面最伟大的作品,纳米尔被他们奉若神明。有一位历史学家说:“纳米尔恐怕已经找到了研究历史的终极方法。”另一位历史学家则指出:“如果纳米尔继续进行下去,那么所有的论战都将被平息,我们也将能够穷尽人类所能穷尽的一切历史真相。”他的一位弟子在1960年初宣布:“今后的五十年间,全部的历史都将按照刘易斯爵士所示范的那样被写完。”甚至连卡尔也承认,纳米尔乃是“一战以来,英国学术界出现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sup>①</sup>。然而,站在1990年代的角度回顾,上

---

<sup>①</sup> 此处所有涉及纳米尔的引文均来自 Ved Mehta, *Fly and the Fly-Bottle: Encounters with British Intellectuals* (London, 1963), pp. 179, 183。



述说法未免夸张得令人失笑。<sup>①</sup> 典型的英国经验论者推崇的是纳米尔穷尽式的研究,而多少按下不表他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Freudianism)的应用,在他们看来,那是一种难于启齿却又可以谅解的欧陆异端。纳米尔以降的许多历史学家,在档案研究的刻苦程度上毫不逊色于他。然而,现在没有人会认为,乔治三世的宪政措施与前代君主的如出一辙,而且,那些勤奋的历史学家也终于发现了,纳米尔急于为乔治三世开脱,因而他的史料是经过高度筛选的,并且不惜对引文“断章取义”(pruning)来为他的论断服务。<sup>②</sup> 人们已经不再相信纳米尔找到历史写作新方法的说法。早在1950年代已经有人抱怨说,他把政治行动化约为个人私利的操弄,岂不是“把人的思想从历史中抽走了”嘛。<sup>③</sup> 在他的学生和对手的手中,事实上,最终也是在他自己的手中,他的研究法退化成为无所用心的集体传记(prosopography),不过是孕育了一系列精致而乏味的关于18世纪内阁的研究,并为20世纪的英国历史学界生产了一个伟大的陈列品——一部卷帙浩繁(且定价昂贵)的《国会史》(*History of Parliament*)。这部皇皇巨著到头来不过是一本详尽的有关历代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传记辞典,因此,它完全有理由获得出版资助,但广义上

35

---

① 不过,即使在1995年,约翰·文森特(John Vincent)教授仍然认为“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有两个:一是纳米尔,一是巴特菲尔德(Butterfield)”。他还加了一句:“他们两位之所以突出,是因为他们周围尽是庸才。”他说,他们的伟大,并不在于写了多么伟大的历史著作,而是因为他们击垮了以所谓的议会政治崛起为基础的主流“辉格党”历史“叙述”,从而对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John Vincent, *An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to History* [London, 1995], pp. 58-62)。

② Linda Colley, *Lewis Namier* (London, 1989), p. 63.

③ Anon., 'The Namier View of History',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August 28, 1953.

说,它在增进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方面毫无助益。<sup>①</sup>

纳米尔和费士一样,不承认历史有任何的模式,他也不相信观念和意识形态,这种取径再次确证了英国知识人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他对大众既藐视又怀疑,因为战后工党政府崛起后,大众便紧跟着登上了社会与政治的舞台,这对保守的学院精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纳米尔对未刊手稿至纤至细的态度和不懈探寻的执念,为英国历史学界树立了研究标尺,就这一点而言,他的确功不可没。不过,英国的历史学家被这个高标准惊吓过度,还以为纳米尔已经用货真价实的客观性取代了辉格党史学的神话呢。事实并非如此。纳米尔的著作在1927年问世之初,并未引起瞩目。他的影响直到战后才真正显现。1950和1960年代他的观点风靡英国历史学界,多少是因为贴合当时的冷战氛围吧。当时,共产党鼓吹群众利益,相信历史和进步有其内在的“规律”,并把意识形态和信仰推到历史进程和历史诠释的中心位置,这些原则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看来,都是个体自由的大敌,必须与之斗争到底。<sup>②</sup>人们相信,苏联史

---

① 参看 L. B. Namier,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London, 1927, 2nd edn., 1957); 同作者, *England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ondon, 1930)。这方面更全面的著作,参看 Frank O'Gorman, *The Rise of Party in England: The Rockingham Whigs 1760 - 1782* (London, 1975); John Cannon, *The Fox-North Coalition: Crisis of the Constitution 1782 - 1784* (London, 1969), 及 John Brewer, *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London, 1976)。纳米尔对于《国会史》的执迷,遭到了卡尔的批判,他说:“砖是重要的,但是一堆砖不等于一栋房子。难道一位建筑大师该把时间都花在晒砖厂吗?”(E. H. Carr, 'English History's Towering Outsider',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y 21, 1957.)

② L. B. Namier,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pp. 91 - 93. 对辉格党史学的左翼攻击,来自克里斯多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和 E. P. 汤普逊(E. P. Thompson)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们认为,17、18 世纪那些鼓吹议会政治的中产阶级带有强烈的私心,这与纳米尔发动的右翼攻击,在效果上殊途同归。

学家与纳粹史学家一样,已经背离了实事求是、态度中立和立场超然的治学理想。历史学被国家临时征用,成为灌输和传播共产主义教条的工具。与此相反,西方历史学现在则致力于展现精准、客观,以及真实的力量。 36

冷战时代促使人们再次提出客观性的要求,这是纳米尔在1950到1960年代初风靡英国的关键所在。无独有偶,科学哲学领域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出身维也纳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爵士(Sir Karl Popper),毕生都在反驳将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性准则的论断,他在两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中,重申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波普尔主张,获得客观知识的最佳途径,是首先提出命题,然后找出可以证明命题为假的条件。他认为,只有那些并不试图解释一切,又经得起各种证伪法考验的理论,才是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具有清晰可辨的走向,且遵循一定的规律,这是波普尔所不赞同的;他认为,只有在中、短期进程的断限内,人们才能获得历史的客观知识,因为只有在这个断限内,我们才清楚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用来证伪被提出的历史解释。比如,认为一战由德国的侵略所引起的说法,(至少在理论上) 37 可以被证伪,因为我们可以同时找到支持和反驳它的证据。<sup>①</sup>

## 四

在1950至1960年代,人们重新肯定历史学客观性的同时,历史学正缓慢而稳健地开始重建自己的学科,并争取赢回自己在19世纪

---

① 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1800 - 1996* (London, 1957).

后期曾一度享有的社会地位和财政支持。不只在英国和美国是如此,其他国家的历史学科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在联邦德国,战后“经济奇迹”带来的蓬勃气象,使历史学家,和大学里其他学科的教授一样,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恢复到了魏玛社会剧变和纳粹反智戕害之前的水平。他们决心远离纳粹历史编纂学的无耻谎言和歪曲,信仰一种从未完全遗弃他们的“客观的”历史学取径。1968年代的这批德国历史学家是战后成熟起来的第一批职业史家。他们在研究中急切地引用美国的理论与方法,尤其是新韦伯学派的社会学,为的是免于堕入主观性的危险境地,毕竟前车之鉴未远,1930—1940年代,德国旧有的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nationalist)史学传统就是被这种主观性所吞噬的。社会科学对德国历史编纂学的影响是如此无孔不入,以至于有人建议,把历史课从中学的课表上抹去,并入社会研究、公民教育、政治学之类的科目中;而大学老师则教导本科生放弃传统的散文体写作方式,努力向社会科学研究报告的风格靠拢,今天在德国,情况依然如此。德国专业史学作品中也充斥着社会科学的修辞,在典型的德国式研究专著与综合论文中,被动语态和匿名式写作是主导的形式,一切涉及作为个体之作者的地方都被抹杀了,序言与谢辞中也不能出现“我”这个第一人称代词。纳粹主义盛行时的个人崇拜,也曾在德国历史学家中引发过类似的消极反应。他们回避个人传记的写作,而热衷于写作过去人民的历史,且主要是把它看作关于普通人、群体和全球潮流的历史。<sup>①</sup>

同样是在这个年代,社会科学也入侵了英国历史学界,契机是1966年著名的某期《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刊登的一组年轻历史学家的文章,宣告了引入人类学、社

---

<sup>①</sup> 详细的论述及更多例子,参看 Richard J. Evans, *Rereading German History: From Unification to Reunification 1800 - 1996* (London, 1997)。

会学理论和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以促进历史学转变的发端。以卡尔本人为首,历史学家纷纷行动起来,努力拉近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距离。<sup>①</sup> 1976年,劳伦斯·斯通写道,社会科学的影响正不断改进历史学家的概念工具和研究策略,但与此同时,严格的量化也在毁坏许多珍贵的历史神话。社会科学向历史学家提出了有待回答的新问题、有待检验的新假说,结果把历史学改得面目全非。<sup>②</sup> 二战后的法国,一种“科学的”、“客观的”的历史学取径也声誉鹊起、大行其道。最显著的例证就是参与《年鉴》(*Annales*)期刊的历史学家群体,他们在大战前就已开始从事历史学的工作,但直到战后才发生重要影响。他们将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尤其是)地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结合到自己的历史研究中,认为这样可能让历史学较以往获得更多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对象已不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历史学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的中心和集其大成的学科。它必须被量化。《年鉴》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依曼纽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9年指出:“不能被量化的历史学,就不能称其为科学。”他还说道:“以后的历史学家必须学会电脑编程才能生存。”<sup>③</sup>

39

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社会科学历史学”(social science history)在美国的兴起,大概可算是上述信念登峰造极的表现了。他们中的一位核心人物,计量经济史学家(econometric historian)罗伯特·傅果(Robert Fogel)就在“科学的”和“传统的”历史学之间,做

---

① Peter Burke, *Sociology and History* (London, 1980). 该书是这类著作中出现较晚但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② Lawrence Stone,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wrence Ston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London, 1981), pp. 3-44.

③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 (Chicago, 1979), pp. 15-16.

了泾渭分明的区分<sup>①</sup>；科学的历史学赖以存在的最重要工具是计算机。传统的历史学建立在一套模糊、残缺、含混而断裂的关于人类行为的猜想之上；而科学的历史学之基础是界限清晰的，有时甚至是可用计量方法严格检验的数学模型。科学的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群体而非个体；它并不针对某个具体对象提出解释，而是致力于建构一些可以用统计的方法加以检验的一般性假说。它假定历史上的各种事件、结构和过程，彼此之间存在着一些系统性的关联。它是中性的、不含意识形态的。就像自然科学的项目一样，科学的历史学讲求团队协作，而不是单枪匹马型的传统模式。同样地，它的读者对象是本专业的科学家而非一般的普罗大众。

傅果指出，通过以上科学方法的应用，在不少地方，传统历史学的智慧遗产被颠覆了，科学的研究法以此证明了自己的优越性。举例而言，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和剑桥人口史学团队就以统计学的方法证明了，工业化之前的社会主流就是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且人们相对较晚结婚；这就打破了传统历史学认为的以数代同堂家庭(extended family)和早婚为主的论断。同样地，由于科学的和统计学的方法的应用，经济史上的许多专题都取得了重大突破。<sup>②</sup> 1970年代的“计量经济史家”(cliometricians)深信，不只是人口史和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事实上所有种类的历史，都必须建立在这一新的科学平台之上，于是他们展开了一场野心勃勃的学科转化计划，希望一举终结传统的历史学研究。<sup>③</sup> 1970年代，人们普

---

① Oscar Handlin *et al.*,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 (Cambridge, Mass., 1954), pp. 24-25.

② Fogel, '“Scientific” and Traditional History', in Fogel and Elton, *Which Road?*, pp. 7-70.

③ 摩根·库瑟(J. Morgan Kousser)等美国计量学家的雄心在早期的《社会科学史学》(*Social Science History*)上已初露端倪。值得一提的是，(转下页)

遍感到，“传统的”历史学在卡尔等相对主义者的批判声中的确是不堪一击，因为它不够科学。正如乔治·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所指出的，到了1970年代末，对历史学界进行观察的人普遍同意，历史学在这十年间，“在科学性方面变得更加精确了”，“历史学家前所未有地忠实于历史学科学化的理想”。<sup>①</sup>

然而，“科学的”与“传统的”历史学之间的实际差距，真有如此之大吗？杰夫里·艾尔顿显然不会赞同。他指出，他理解的“传统的”历史学，一直到20世纪下半叶，仍被为它抗辩的人普遍地视为“科学的”历史学。从史料编撰到集体传记的写作，团队研究在一些“传统的”历史学领域里也屡见不鲜。计量经济史学只是解答了极为有限的，且一般而言比较专门的问题而已。当我们遇上一些真正重大的历史议题的时候，计量经济史学只能保持缄默，因为这些议题无法通过计量的方法加以解决。<sup>②</sup>只要看一看计量经济史学的代表刊物《社会科学史学》，我们就很容易赞同艾尔顿的说法。此外，我们很快就看清了，傅果的科学性方法能否解决争议性问题（哪怕是那些他已经宣称解决的问题），仍然十分可疑。1974年，傅果与史

---

（接上页）在英国，由政府资助的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负责奖励经济与社会史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大学的研究所要想获得资助，必须首先开设包括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史”在内的系统课程。针对广大教职人员研究计划的奖金，大部分都授予了那些以计算机辅助编辑与分析系统性数据，并据此撰写专业论文而非一般性书籍的研究团队。结果，历史认识论就这样变成了真金白银。

① Georg Iggers, 导言,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 Contemporary Research and Theory* (eds. Iggers and Harold Parker, Westport, Conn., 1979)。

② Elton, ‘Two Kinds of History,’ in Fogel and Elton, *Which Road?*, pp. 71–122, esp. pp. 83, 106; Stone,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32–35.

坦利·英格曼(Stanley L. Engerman)合作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美国南方奴隶制度研究。书中充满了精心绘制的数据图表和方程式,作者声称该书在检验某些旧说时的科学严谨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结果,该书提出了一系列的结论,颠覆了现有“传统”史学的正统说法。奴隶制,并不像以往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利润少、经济效率低,且虐待奴隶的制度。相反,傅果和英格曼认为,奴隶制度的经济效率非常高,以至于奴隶因此达到的生活质量至少也与当时的自由工人一样高。面对指责他们政治不正确的声浪,两位作者辩称,该书的结论显示了奴隶足以为自己的业绩而自豪,与此同时,那些质疑他们劳动效率的说法是多么不靠谱,甚至带有种族偏见。<sup>①</sup>

傅果和英格曼的同行立即就指出了他们统计过程的失当、对资料的误用和过度诠释之处、模棱两可的假说以及显而易见的错误。有一群评论者在重新检视这一大堆材料后,总结道:

42

《被钉十字架的时代》(*Time on the Cross*)是一本错漏百出的书。该书不仅有计算出错,无视统计推理的标准,材料出处抄错,引文断章取义,曲解其他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与发现,而且依赖于一些无把握又多半未加解释的市场行为、经济动力、社会化、性行为、生育,乃至遗传等诸种模型(此处不一一列举)。

而且,所有这些谬误显然“一致地倾向于”支持傅果和英格曼的总体论点。当这些谬误被纠正、证据得到重新检视,两人的总体论点就顿时垮塌了。由此可见,计量和统计显然无法带来鼓吹者所宣称的

---

<sup>①</sup> 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Boston, 1974).



那类“科学的”确凿事实。<sup>①</sup>

除此以外,计量经济史家曾宣称,通过正确的科学性方法,可以获得更高层次的(且事实上是无懈可击的)客观性和确定性;然而,科学哲学领域内的新发展也已颠覆了这一说法。1950年代,波普尔旗帜鲜明的经验论立场所向披靡;而后,1962年,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科学的后经验论(Post-empiricist)看法,从此库恩的说法成为了最主流的见解。以往人们认为科学在持续不断地进步,但库恩却指出,多数的科学家,往往是不自觉地,在一个既定的“典范”(paradigm)或一套理论、假说、研究主题等等之内从事研究,这使他们个人的经验得到引导,并确保了他们的观察符合他们原来就坚持的理论。因此,典范无法被证伪,而异样的情况,即数据不符合典范,通常会被忽略不计或刻意绕开。只有当异常现象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让从事研究的学科共同体普遍感到不安的时候,人们才会开始寻找一种新的典范。然而,一个新典范的缺点往往在于,它无法解释一些原有典范能够解释的现象。而且,不同的典范组成了不同的思想世界,它们之间无从比较。因此,科学不一定就在进步,而可以被证伪的科学理论并非建立在实验验证的基础上,而是由智识上的共识来维系的。许多科学家抨击这一观点是非理性和相对主义的,照此观点,他们的学科岂不成了“暴民统治”(mob rule)的领地。然而,到了1970年代,这种观点便成了科学哲学界的主流,甚至被用来解释其他形式的知识。当

43

---

① Paul A. David et al., *Reckoning with Slavery: A Critical Study in the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New York, 1976), p. 339; 深入的批评,参看 Herbert Gutman, *Slavery and the Numbers Game: A Critique of 'Time on the Cross'* (Urbana, 1975), 以及 Peter Kolchin, 'Toward a Reinterpretation of Slave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9 (1975), pp. 99 - 111。

然,库恩相信,自然科学的进步是完全不受外力影响的;并且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不适用于其他的领域。类似地,我们认为,库恩提出的典范概念并不真正适用于历史学;一般而言,历史学家的工作并不局限在严格而有束缚力的典范中。<sup>①</sup> 但是,如果我们把“科学典范”这个词换成“历史解释”的话,我们便能看到,那些确实借用了库恩观点的历史学家会发现,自己的论调带有强烈的相对主义意味,并且会逐步破坏以下的观念:即确保能生产出关于过去的“客观”知识的方法,是历史学“具有科学性”的证明书。

44 所以,到1980年代为止,人们长久以来不懈地追寻一个历史学的科学方法,却没有任何确定性的结果。在卡尔等历史学家的推动下,社会科学对历史研究的实践确实产生了影响,甚至出现了一些傅果那样的试图完全取代“传统”史学方法的极端事例。但这样的时代似乎已经到头了。历史学是或应该是一门科学,它在本质上与量子力学或晶体学无异,这样的主张开始受到新一轮的持续的攻击,且较之过去更为猛烈。在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信念,是如何经受这新一轮的暴风雨洗礼的。

---

<sup>①</sup>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n., Chicago, 1970), pp. 164 - 165.

## 第二章 历史学、科学与道德

### —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把史学变成一门科学,几乎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可以说今天仍是如此。然而,诚如卡尔所观察到的那样,英美学术圈汲汲于讨论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的问题,多半是因为“英语本身在作怪(eccentricity)”。<sup>①</sup>问题的症结在于,德语 *Wissenschaft* 这个字仅仅指的是一个学科或一部分被组织起来的知识(a discipline or body of organized knowledge)。德国人尽可以把这个词加诸一切科目,不管是“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还是“社会科学”(Sozialwissenschaft)、“历史科学”(Geschichtswissenschaft)和“文学科学”(Literaturwissenschaft),都不足为怪。然而一旦把这些词汇译成英文,麻烦就接踵而来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听着还算顺耳<sup>②</sup>;可轮到“历史科学”和“文学科学”就不对劲儿起来。

---

① Carr, *What is History?*, p. 56.

② 不过,在英国,1980年代初,正当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内阁执政时期,教育部长凯斯·约瑟夫爵士(Sir Keith Joseph)就勒令由政府资助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更名为“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因为他满不以为有“社会科学”这种东西。

“社会学”(sociology)或“地质学”(geology)这样的用法稀松平常;可不知怎地,“以‘学’称‘史’”(histori-ology)却从未被大家普遍采纳。在德语中,历史学科(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即 *Geschichtswissenschaft*,由始便被纳入“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的范畴,成为了对46 人类精神系统性研究的一个方面,因此从未引起关于历史学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争论。<sup>①</sup>

卡尔说,近代的科学哲学家煞有介事地宣称,自然科学家绝不是在实验室里对自发的实验过程进行中立的观察。当然,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研究;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物而非人。然而,实际上这样的界限,在医药、生物、生化、实验心理学等学科那里,已经不攻自破。<sup>②</sup> 卡尔只差一语道破,没有哪一门学科的研究者和被研究的客体,可以俨如楚河汉界,互无干扰。诚如艾尔顿爵士的观察:“后牛顿(Post-Newtonian)时代的对物理世界的看法,是否定绝对性,它既为无法预料的偶然性留了余地,也准备接纳观察者的具体观察结果。好的历史学大率类此,这样说应该是不错的。”<sup>③</sup> 如此看来,卡尔与艾尔顿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并不见得相差太远;尽管艾尔顿认为,历史学说到底既非一门艺术,也非一门科学。他曾自豪地宣布:“历史学自成一格,与其他研究都不相同,自有其独门法则。”<sup>④</sup> 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既不是捡芝麻丢西瓜的争吵,也不是一句“术语误解”就能概括的,这恰恰是百余年来攸关史家自我认识的核心问题。即使在德国,人们也在为此争讼不休:比如,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径路是否适用于假“人的科学”(human

---

① 对此的足资参考之论,见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pp. 24 - 25.

② Carr, *What is History?*, pp. 72 - 73.

③ Elton, *Return*, p. 51.

④ Elton, *Return*, pp. 62 - 63.

science)之名以行的历史学?或者说,历史学是否可以且应该被归入“社会科学”?因此,事实上争议的产生并非只是英美语言上的问题而已。 47

不少论者认为,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因为科学的知识是累进的(cumulative),历史学的则不然。我们现在的物理、化学知识,仍然依靠的是自牛顿、法拉第(Faraday)以降,到爱因斯坦、卢瑟福(Rutherford)等前辈的科学发现所打下的基础,尽管这些学科奠基人提出的部分理论已经被超越了。返观历史学,每一个史学家基本上都是在以往学者的同主题论断之外,提出自己的不同理解,乃有不少评论者总结道,历史学的知识并不像科学的知识那般累进;历史学家通常着力于反驳而非发展前人的发现。杰夫里·艾尔顿强烈驳斥了这样的结论。他乐观地宣称,随着经验知识的不断累进,职业史家正“不断逼近真相的源泉”,虽然他们永远不能真正抵达。他也退一步承认,历史研究当然要经过评论和修正,但是一个好的研究对过去的重建,必能在最大程度上经受住后来者的检验。<sup>①</sup>就某一方面的历史写出一部不刊之论,所谓不刊即无需重写的意思,在他看来,是其志可嘉而其功可毕的壮举。但是,读者可以想见,这样的说法大概也很难不遭诟病。举个例子说,艾尔顿宣称历史知识确实与时俱增,譬如以都铎时代而言,今日所知就远甚于二三十年前。对此,凯斯·詹京斯却不以为然,称艾氏是“自恃站在”历史知识累积“过程的终端”,而对过去史家进行月旦的标准,就看他们对这种艾氏目的论(Eltonian teleology)贡献的大小而定。如此自矜攻伐,历史学家还是戒之为妙。<sup>②</sup> 48

但凡从事过一点史学研究的人,很快便会自觉个人的知识较旁

① Elton, *Return*, pp. 49, 66.

②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p. 70.

人完整：这种经验很稀松平常，哪怕一个初试身手个把月的最谦逊不过的博士生也会有所体会。这是因为，过去遗留下来的材料实在是浩如汪洋，且随着时日推移，仍在不断扩充，再多的历史学家做再多的工作也不过是沧海一粟。当然，我们追溯的年代愈久远，留下的证据就愈稀少，而相关的前人研究也愈彻底。然而，即使是上古或中古历史，仍有许多新鲜事有待发掘，且不尽是基于对旧材料的重读。事实上，尽管大学的课堂上着重于论战、辩难和阐释，大部分的历史工作者恐怕仍然认为，增进我们对过去的知识，即“填补空白”，与改变我们对历史的已有认知，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就此而言，历史学的知识，首先是在累进的。研究者根据已知之事来锁定未知之物。这意味着，我们是根据前人对我们自己的研究课题的贡献来评价他们；可事实远非如此，我们通常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开他们，寻找新的下手处。不仅如此，距离有助于增进我们的知识，甚至是我们的理解力。即便是卡尔也不得不承认，历史学家距离研究对象——比如俾斯麦——的年代越久远，他们就越可能在研究中做出客观的判断。<sup>①</sup>而且，事实上，正是因为历史知识不断扩充，历史学家才得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提出新的解释，无论这些新解释来自何种理论的刺激。

另一个使历史学区别于科学的论据是，前者必然包含道德评断的成分，而后者则不然。卡尔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卡尔认为，历史学家不应该对过去做道德上的评价；而应当理解过去是如何推动人类进步的。譬如说，谴责上古时期的奴隶制是毫无意义的，关键是要了解它的产生、运作和衰亡，以及如何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的诞生。对这一观点阐述最力的莫过于伟大的英国中古史家大卫·诺利斯(David Knowles)教授。他抵制将道德评断纳入历

---

① Carr, *What is History?*, p. 162.

史学中的做法,并指出,“历史学家不是法官,更不是一位惯于施用绞刑的法官”<sup>①</sup>。因为诺利斯不仅是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以圣徒的品格和苦行僧的外貌示人的本笃会士(Benedictine),所以他的观点理当受到重视。此外,回顾以往历史学家做出的道德评断,不难发现,它们不过也是自身时代偏见的产物。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就特别热衷于谴责历史人物的性行为,他们倾向于以古典讽刺小品的形式对历史课本进行无休无止的嘲讽,一个例子就是赛勒(Sellar)和叶特曼(Yeatman)合著的《1066年诸事纪》(*1066 and All That*),然而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些不过是少见多怪,真真可以休矣。<sup>②</sup> 尽管现在的历史学家不会再说一个中古君主是“一个坏人,却是一个好国王”,或者“一个好人,却是一个坏国王”,但在处理希特勒和斯大林等20世纪的独裁者时,态度又立刻不同了。卡尔指出,对这类道德谴责,往往可以转移人们对造就这些人物的社会大环境的拷问,因此觉得对他们加以道德挞伐是再合适不过的了。<sup>③</sup> 但是,卡尔的这种说法也颇有问题,因为他又进一步提出,道德标准是相对的,历史学家不应该以某些绝对的标准来评价过去的社会,而应该将它们相互比较后再得出结论。<sup>④</sup> 由于卡尔曾经嘲笑过维多利亚人用自己时代的道德标准去评价中古时代的做法,因此,他的上述原则在实际中是否可行,很值得怀疑。

诺利斯当然能理直气壮地告诫历史学家不要对过去施加鲜明的道德评断,因为在15至16世纪初的英国,新教历史学家正对天主教教士和修女的各种不端举止大加非议,作为天主教教士的诺利

① David Knowles, *The Historian and Character* (Cambridge, 1955), p. 19.

② W. C. Sellar and R. J. Yeatman, *1066 and All That: a memorable history of England: comprising all the parts you can remember...* (London, 1930).

③ Carr, *What is History?*, pp. 78-79.

④ Carr, *What is History?*, pp. 80-86.

斯,在面对天主教修院制度时,实在太容易采取上述的立场。然而,在从事实际研究时,诺利斯哪能不做道德判断,他笔下所有人物的举止,不都得和僧院始祖圣本笃(St Benedict)的永恒而神圣的戒律扯上关系嘛。他的意思是,任何历史学家,作为人,都无法像上帝那样行使审判的权能。诺利斯在其巨著的末页写道,该书所给人们的教训是,“当一个宗教场所或条规不再能引导它的孩子们不去沾惹上帝所不悦的事物时……它便降格为一个纯粹的人的建制了”<sup>①</sup>。因此,他对伍斯特(Worcester)隐修院副院长威廉·莫尔(William More)的评价是,“他大半辈子都活得像个乡绅”,“……按俗世的方式度日”,这番话不就是道德批判嘛。<sup>②</sup> 在诺利斯看来,中世纪晚期修院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的确,以这样高的宗教标准衡量,谁能说不是呢。诺利斯的四卷本著作主要就是,一丝不苟而锱铢必较地,拿这些标准衡量中世纪教士和修女。这种有些过分简化的取径,使他在研究受教规约束的神职人员的行为时,丧失了一种深晓其义而明察秋毫的诠释视野。我们自然可以证明这一点,比方说,他本可以像较之稍为晚出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巫术等其他信仰体系时那样,利用某些人类学的理论,来研究那些神职人员的信仰体系,及其在世俗层面上不断变化的社会角色和道德观念。

诺利斯主张,要避免对过去及生活其间的人进行鲜明的道德评断,尽管他自己并未躬行履践,这一原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仍是金玉良言。一个历史学家如果对古人使用“缺德的”或“邪恶的”之类的形容词,只会让他自己成为笑柄。然而,我们完全可以用实事实

---

① David Knowles, *The Religious Orders in England*, Vol. III (Cambridge, U. K., 1959), p. 468.

② David Knowles, *The Religious Orders in England*, Vol. III, pp. 121, 126.



是的语言指出,诸如教士和修女等古代人在私底下的行事有悖于他们公开宣扬的或自诩的举止。在更大规模的层面上,举例来说,有人也许会像卡尔曾主张的那样认为,俄国的集体化对工业化来说是必要的,而俄国农民所经受的暴行和迫害,且不提集体谋杀,都是谋求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斯大林政府的品行,如果想要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方式去反驳上述观点的话,就不应该对“去富农化”(dekulakization)的罪行(没收、囚禁、殴打和杀害农民中最富有的群体)进行道德批判;也不应该去争辩说,没有任何一种如此这般的经济变革进程,可以允许这样或其他任何规模的肆意酷行和谋杀。一个**历史学家**瓦解卡尔观点的道德有效性的途径,当然是瓦解其**历史**的有效性,并且让读者做出道德上的判断。比如说,向读者展示,1930年代俄罗斯工业发展的增速并未高于1920年代半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时期的增速。或者,向读者证明,“清洗”富农的政策,根据的只是来自莫斯科的武断定额,与地方上集体化的性质和规模根本不符。<sup>①</sup>历史学家的文本过多负载道德义愤的言辞,不能让其论述更为雄辩。

52

要对过去进行道德评断,比起单纯的谴责来,历史学家掌握着更具威力的修辞和文体的武器,他们尽可以运用讽刺和反语,排比修辞与事实,如实揭露伪善、自利和贪婪,或者平铺直叙反叛与抵抗的壮举。所有这一切,都无须假借史家所处的社会中仅仅一时盛行的道德语汇。<sup>②</sup>历史学家在1914—1945年这样经历浩劫的特殊时期,很难捐弃一种道德立场;但是,这种道德立场最好还是用历史的

---

① Robert 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New York, 1985); Alec Nove, *Was Stalin Really Necessary?* (London, 1965).

② 这些技巧的应用效果的绝佳例证,参看 Michael Burleigh 的著作,尤其是 *Death and Deliverance: 'Euthanasia' in Germany 1900 - 1945* (Cambridge, 1994)。

方式来表述为妙。无独有偶,从胚胎学到核物理的各种自然科学研究,也免不了要牵涉到道德的因素。道德关怀既可能是推动科学研究的动力,也可能是科学研究的产物;然而,正如对历史学那样,毋庸置疑,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道德评断的因素如何发挥,它并不内含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之中,说到底它是与研究本身无关的外物。

53 如果有人已经以历史学的道德取向为由驳斥它的科学性,那么,另一个常被引用的论据是,对历史学家的结论我们不可能进行重复实验(experimentally replicated)。但是,毋庸置疑,许多科学像历史学一样,它们的一些重要方面是基于观察而非实验。我们可以举天文学为例。这类观察不一定是直接可见,有时可能是间接的。比方说,人们假定冥王星的存在,是因为观测到位于太阳系次边缘的海王星运行轨道的异常,进而判断这只能是一个迄今未见的巨大而位置更边缘的物体之重力牵引所致。我们可借这个证据,或者诸如无线电波等其他形式的迹象,来推断外太空存在的某些物体,正如我们从历史文献出发所做的推断一样,但是,我们无法像观测化学反应那样,在实验室里炮制出这些结论。然而,并没有人试图否认天文学是一门科学。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像艾尔顿那样殚精竭虑地辩护历史学的科学性——他曾声称,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制造历史事实,所以实际上,历史事实比起科学事实来,更不受观察者的影响。<sup>①</sup>但是在非实验的科学面前,这种区分很容易就失效了。

## 二

历史学具有科学性这一论断,所受到的最大挑战恐怕来自这样

---

<sup>①</sup> Elton, *Return*, pp. 62 - 63.

一种信念,即只有能够提出普遍定律(laws)的才算真科学。这种论调真是老生常谈了,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1864年英国的兰克派史学家詹姆士·安东尼·浮罗德(James Anthony Froude)所发表的臭名昭著之言论:“我常常觉得,历史就像是孩子玩的字母游戏,我们可以随意拼凑出任何单词。我们只要挑出自己想要的字母,随心所欲地排列一番,对于不合我们心意的东西,我们绝口不提。”<sup>①</sup>浮罗德的论敌抓住这一点,证明他本人的研究步骤是武断而不科学的。但是,事实上,他说这番话的用意在于,批驳与其同时的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等人的历史哲学;巴克尔认定,历史的运动可以被科学地化约为一系列的数学公式。在浮罗德看来,历史学必须自囿于呈现事实的范围内,决不能被用来“具体说明”(spell out)具有“科学”本质的理论。的确,每次历史学家试图论证某些普世的历史定律,总有批评者跳出来用一些例外情况反驳他们。最著名的例子大概要数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那部风靡一时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了。<sup>②</sup>这部从1934到1947年间分十三册出版的巨著,囊括了二十一种人类“文明”,上下六千年的人类历史,并根据各文明的兴衰提出了一系列的普遍定律。

汤因比的定律既精细入微又言之凿凿。例如,他曾指出,历史上,每当一个文明危在旦夕之际现身的伟人,不外乎用四种方法来力挽狂澜;他还用图表的形式展示了,从一个行将解体的文明内部孕育出新制度所需经历的若干阶段。这部著作被坊间誉为“不朽的

---

<sup>①</sup> J. A. Froude, *Short Studies on Great Subjects* (London, 1963, 1<sup>st</sup> edn., 1867), p. 21.

<sup>②</sup> 该书在1959—1964年间即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节译本,此后多次再版,2000年,该社又推出此书的全一册修订插图本。——译者注

杰作”、“本时代最伟大的作品”。然而，专业的历史学家，尤其是对近现代史学史和低地国家史(The Netherlands)皆深有研究的彼得·盖尔(Pieter Geyl)，对此深表怀疑。盖尔指责汤因比只是在筛选证据，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抽出一些武断的线索。例如，汤因比在论述“安逸”不利于文明的成长时就举证说，在17、18世纪的北美洲，吃苦耐劳的新英格兰人不是打败了路易斯安那的疲弱的法国人和佛罗里达的懒散的西班牙人嘛。“困难越大，鞭策越力”，因此通过直面险恶环境的挑战，美国文明在艰难和厄运中呱呱坠地，并高歌猛进。然而，汤因比忽略了，新阿姆斯特丹被征服并改名新英格兰，是在1664年，正当穷奢极欲的查理二世(Charles II)宫廷主政之时；而且，汤因比将其他关于新英格兰人最终称霸的解释按下不表，譬如西班牙帝国的式微，以及英国趁法国卷入欧陆鏖战之际，攫取海上霸权。换言之，要解释这段历史，应该先去探究各殖民势力间的权势消长，而非新英格兰移民与环境间的关系。在这里，“挑战与回应”说完全不得要领。

盖尔指出，“整本书建立在难以数计的错误观点和无中生有的论证之上”，以上展示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汤因比是一个先知，而不是历史学家。盖尔说：

令人不悦的不仅仅是对法则的追寻、普遍化，乃至思维逻辑(faulty reasonings)——这些甚至都不是最首要的原因；症结在于他的视野，在其中，每一个时代或文明，都受到一个自身之外之标准的评断，而它们自身的重要性则完全取决于它们对他乾纲独断的法则所定义的进步有无贡献。一个历史学家如果确信，历史可以增益自己时代的文明，尤其是当我们进入到过往世代人们的思维习惯和彼此间关系的时候，而且只有进入之后，才能产生理解……那

么,他就会认为,一个自以为是的历史学家把整个美妙而神奇的历史活动归结于一个单一的主题,把整整几百年当作乏味的东西扔掉,把整个历史都挤进一个预设的体系中,恰好违背了所有成其为历史的东西。

盖尔还痛斥了汤因比笔下“一发不可收拾的道德评断”,尤其是《历史研究》的最后一卷,作者在其中对于“新兴异教”(neo-paganism)大加鞭挞,并为基督教说项,誉之为二战期间只有它在对抗肆虐德国和欧洲的暴行,从而捍卫文明的防线。所有这些骨子里都是非历史的,全然有违历史学家的职业精神。<sup>①</sup>

汤因比这部庞杂而自夸的著作,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便被打入冷宫,考虑到巴克尔的《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s*)等著作的境遇,这不过是又一次的重蹈覆辙。<sup>②</sup>多数历史学家总是感到,树立普遍定律将有悖于他们的学术志业。显然,这使他们与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天壤之别。当然,还是存在例外,卡尔就是近几十年来最著名的例子。因为历史学不提出普遍定律而否认它是一门科学,这是卡尔不能同意的,为了要驳倒这一观点,他指出,如果说没有任何两桩历史事件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我们不是也找不出两个相同的原子、星星、活的有机体,或者任何科学家研究的东西嘛。然而,这没有妨碍科学家构建自己的定律。以此类推,他说:“语言的使用让历史学家,像科学家那样,致力于归纳通则(*generalization*)。”<sup>③</sup>他指出,历史学,像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一样,关注通则;它并不只是去求证特

57

① Pieter Geyl, *Debates with Historians* (London, 1955), pp. 176 - 182, 201 - 203, 210.

② H. T. Buckl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2 vols. (London, 1856 and 1861).

③ Carr, *What is History?*, p. 63.

殊而孤立的事实。历史学给人以教训,比如,1919年凡尔赛会议的代表们一再溯及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就此而论,在掌握特定条件的基础上,历史学可以被用来预测未来,从而塑造未来。有人认为历史学不能预测未来,所以它不是一门科学;对此,卡尔嗤之以鼻。他说,万有引力定律难道能预测出某个苹果会在某时某刻落到某个特定的地方吗?科学定律只在某些具体的条件下才行之有效,而卡尔为了挽回历史学能够预知未来的声名,宣称历史学家可以判断,比如,某个国家将会发生革命,只要过去一国发生革命的条件同样出现在这个国家。<sup>①</sup>因此,他总结道,历史学在孕育法则和预测能力上,和别的任何科学都一样。

那些试图把历史学纳入社会科学范畴的人,通常会朝向这一方面努力思考。社会科学式的历史学极度关注普通群体及其平均状态,而不是离散的个体。年鉴学派的研究旨趣在集体而非个人的行为和心态,而计量经济史学如果也算研究人的话,他们也只在乎数量达到统计学研究价值的群体。然而,显然历史学既有关于个体的人、事件和结构的研究,也有对群体和集体的研究。两个人之间的差异,哪怕他们处于同一个时空,较之两个原子或分子间的差异,真是大巫见小巫了。人类的个体性远远胜过微生物的个体性。因此,要构想人世的普遍定律是格外困难的。

此外,卡尔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模糊了一些重要的区分。因为定律并不等于通则。正像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文森特所指出的,“科学上的论断,比如说热力学第二定律,不仅仅是提出一个必然存在例外的模式”<sup>②</sup>。然而,这种模式正是历史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史学,企望去追求的。再者,一个初出茅庐的历史专业学生也可以去反驳

---

① Carr, *What is History?*, p. 69.

② Vincent,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p. 19.

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提出的解释；而化学或生物专业的学生不会去争辩最年轻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科学定律。美国思想史家艾伦·梅吉尔已经十分清楚地区分了定律和通则：

在历史学家的语言中，下列虚构的陈述被当作是通则……：“在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欧洲，由于市镇和贸易的发展，封建制让位于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历史学家考虑“通则的问题”时，通常是在思索如何从支离而混乱的资料中得出一个如上所述的更大的论断。但是，诸如此类的论断，与逻辑实证主义者或较之更早的文德尔班(Windelband)等人论述的普遍定律，不是一回事儿。科学就是“万象归宗的”(nomothetic)，因此它所想要的通则是超越特定时空的，譬如，下面这段虚构的陈述：“无论在何地(*wherever*)，一个封建制度内，市镇和贸易开始发展了……于是(*then*)，封建制让位于资本主义。”<sup>①</sup>

对于后面那个陈述，只要找到一个例外就足以使该定律失效。而对于前一个陈述，例外非但不会破坏通则，反而足够有趣，值得人们对

---

<sup>①</sup> Allan Megill, 'Recounting the Past: "Description", Explanation, and Narrative in Historiograp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p. 627 - 653, 引文见 p. 633。德国哲人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划分出关于普遍定律的“万象归宗的”科学，以及关于特定实体的“独树一帜的”(idiographic)科学，但并没有继续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排斥在科学之外。相反，他认为两者都是科学。但这就意味着，德语的 *Wissenschaft*，即体系化的知识(organized knowledge)，与英语世界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几乎没有关系。见 Wilhelm Windelband, 'History and Natural Scienc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19 (1980), pp. 169 - 185。(原文刊于1894年，此处为英译版，附有盖·欧克斯[Guy Oakes]的导言。)

其本身进行解释。

尽管有许多人,特别是政客,都试图从历史中获得教训,但是回顾历史本身,可以发现这些教训中很少是真正对症下药的。我们一再地看到,历史原来是这样一个差劲的预言家。这是因为历史本身从来不重复;在历史学家最为关心的人类社会中,没有任何一桩事情以完全相同的条件或方式重现过。而当人们试图利用历史的时候,往往不是要去适应那些必然发生的事情,而恰恰是要规避它们。举例而言,二战后的英国政治家在制订外交政策时,往往以1938到1939年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与希特勒的关系为鉴,坚信对独裁者采取“绥靖政策”(appeasement),只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然而,实际上,这一信条反倒不时导致灾难。最臭名昭著的是英国首相艾登爵士(Sir Anthony Eden)的例子。他在1930年代后期因对独裁者采取“绥靖政策”而遭到抨击,因此在1956年,当埃及总统纳赛尔(Nasser)上校宣布收回英法共有的苏伊士运河的自主权时,艾登过分害怕会重蹈绥靖之旧辙,于是发动了一场鲁莽而失败的军事行动。

与之相仿,许多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Bolsheviks)也认为,因为1917年发生的事件相当于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必须耐心等待下一波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从而实现他们的终极目标。列宁(Lenin)和托洛茨基(Trotsky)则主张,俄国革命并不像以往的(比如,1640年的英国或1789年的法国所经历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会持久进行下去,从而立即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越过这个难关后,他们却遭遇到下面这个事实,即回顾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它们无一例外地以军事独裁告终,掌权者分别是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和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1924年列宁死后,人们对历史重演的担忧甚嚣尘上,导致布尔什维克领导集体内部发起了对托洛茨基的攻击,因为每个人都



认为这位红军领袖最有可能成为俄罗斯的波拿巴。在实践中,革命的历史定律被打破了,因为参与一场革命的人利用对以往革命的记忆,改变了革命发生的方式。

同样地,无论如何定义革命,历史无法使人预言革命之发生。举例而言,众所周知,历史学家不曾预料到,1989到1991年,柏林围墙会倒塌,苏联会解体。<sup>①</sup> 无论如何,卡尔反复主张,历史学家扮演的角色,就是以他们对过去的理解去掌控未来,但是就以过去为基础去实际地预测未来这一点来说,很少有历史学家真正认同这一职能。事实上,比方说,一个化学家事先就知道在坩埚里混合两种化学成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相反,历史学家则完全没有这类预先就有的期待,而且也没有试图把这种期待放在历史研究的核心。

因此,历史学可以生产出通则,但是这些通则越宽泛,出现的例外就可能越多,而它们与可资佐证的坚实证据就会愈行愈远。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绝不仅仅限于特定的个人或事件。它能够以一种十拿九稳的口吻去确认或提出一些存在于人类过去之中的模式、趋势和结构。就这些方面而言,它理当被视为科学。但是,历史学不能创造具有预见力的定律。理解过去可能有助于当下,只要它拓展我们关于人性的认识,给予我们启发(或警示),抑或告诉我们在特定条件下发生某些事情的可能性——当然它们听似可信,却往往是错误的。即便如此,这些也无法匹敌科学定律那永恒的绝对预见性。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的,那些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发现了一个历史定律,紧接着他们所做的是竭尽所能去打破它。

61

近来,一个有益的例子是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

<sup>①</sup> 此次失败中最触目惊心的一个例子,参看 Richard J. Evans, *In Hitler's Shadow: West 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ttempt to Escape from the Nazi Past* (New York, 1989), pp. 105 - 106。

Kennedy)的深入研究、小心论证的著作《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sup>①</sup>。他在书中指出,近代历史中存在一种模式,即富国创造了帝国,但其资源逐渐无法支撑帝国的扩张,最终使其走向衰落。该书的论述富于历史细节,但它之所以引人注目,并非因为作者调动其丰厚的学识,解释了为什么在16、17世纪哈布斯堡帝国(the Habsburg Empire)失去了欧洲霸主的地位,而是因为该书总结道,美国将无法在21世纪延续其全球霸权。当时,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期即将结束,这番前景黯淡的预言使美国公众深感焦虑。于是该书一夜走俏。这本写于1987年的书还主张,苏联并未濒临崩溃,这种形势也令许多美国读者深感不妙。<sup>②</sup>可是,过了没几年,这些预言就一一被挫败了。苏联的确解体了。肯尼迪曾主张,国际战争永远是这类进程必不可少的导火索,可实际上促使苏联解体的并不是国际战争,而是其内部的转化和分裂。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看来是前所未有的稳固,而1990年代的经济繁荣,也没有露出肯尼迪所预言的“帝国过度扩张”贻害的迹象。换言之,肯尼迪在全书的前七章,还显得像个历史学家的样子,他提出了一些有益而有效的通则,解释了国际间超级大国的兴衰,以及经济和军事力量间的关系。这些章节恰好也显示出“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在历史学中依然具有活力和生机。如果肯尼迪的写作到此打住的话,该书就不会引起如此广泛的注意,也不会如此畅销。但是,它将会是一本更出色的历史著作。当肯尼迪把他的通则变成了定律,并在全书的最后一章预言未来时,他就引火烧身了。历史学家万万不可预言未来。生活,与科学不同,里面充满了

---

① 该书从1988年以来,在中国大陆至少有三个中文译本。——译者注

②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London, 1987), p. 513.

太多不可预知的东西。

### 三

如果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那么,历史学家在本质上与小说家或诗人有什么区别呢?历史学家要把自己的工作与艺术家的区别开来,经常的办法是强调自己的学科需要严格的职业或科学的训练;然而,如果说人们仍然需要接受教育才能掌握艺术和音乐方面的专业技巧的话,尽管近年来创意写作班越开越多,小说和诗歌的创作其实根本不需要训练。杰夫里·艾尔顿就特别强调这一观点。63 艾尔顿用了一系列阅读资料的例证来说明他的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指的“训练”,是历史学家必须掌握他们所用材料的技术细节,或者说,材料所用语言在当时的含义,以及制造材料的制度本身之性质与惯习。因此,我们必须知道,譬如说,当一位中世纪英格兰国王在通信中,使用“忠诚而可爱的”(trusty and well-beloved)和“至诚而可爱的”(right trusty and well-beloved)不同抬头时,并不意味着收信人与他在政治结盟上的亲疏远近,这其实是后者社会地位的反映。还有,在近代早期欧洲的贵族肖像画里,孩子们都穿着成人的服装,那位业余史家菲利比·阿利亚斯(Philippe Ariès)曾猜测,这说明他们没有把童年视为人生的一个独立阶段的概念。这并不真确,有其他的资料显示,当时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的穿着打扮与成人不同,只是在让人画肖像时,才穿上成人的衣服而已。<sup>①</sup>

所有这些或许都值得赞赏并且都是事实,但是,这和科学的训练有什么关系呢?艾尔顿想表达的基本观点似乎是,历史学家如果

<sup>①</sup> Elton, *Return*, pp. 56 - 58.

64 要理解一种材料,必须询问材料是如何得来的,作者的意图是什么,还有作者是如何制作的。但是,要做到这些,历史学家需要接受多少的训练,训练的内容又是什么?传统上,历史学家要经过本科的训练,进入以文献为基础的专门研究,然后攻读博士学位。这其中包含了一直反复试验的技术,即学生把自己的文章、草稿或论文章节提交给导师,导师评阅后再发还作者本人。研究讨论班(research seminar)不断强化这一训练,课上,教授和其他人引导大家对学生的功课进行细致的讨论,但这基本上也是照着雷同的原则进行的。即便像英国中古史专家陶特(T. F. Tout)这样严谨的历史学家(他在20世纪初期首次将德国的研究方法介绍到英国的大学)也说道,学生“进行观察,被潜移默化,并偶尔接受忠告”,如此被训练成职业历史学家。<sup>①</sup> 他的说法与伟大的德国古罗马史家狄奥多·蒙森的说法一致。蒙森在1874年就宣称:“历史学的教授要是相信,可以用训练文献学家或数学家的方法在大学里培养历史学家,这准是一种危险而有害的错觉。”他说,真正的历史学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天生的”。<sup>②</sup> 近代的历史学家经常赞同这一看法。为了确凿可信地追索过去留下的轨迹,我们的确已经有足够多的训练和条规,但正如两位美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没有训练和法则指导我们如何从支离破碎的证据中构建出一个故事来……当我们要从这些证据的碎片中造出一个连贯的叙述时,历史学的方法只是诉诸灵感的缪斯而已。”<sup>③</sup>

65 蒙森怀疑要培养一个好的历史学家是否真的需要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训练。一个世纪后,牛津大学的法国近现代史专家狄奥多·泽尔丁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后者在1976年指出,“历史学家

---

① 转引自 Kenyon, *The History Men*, p. 198。

② 转引自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p. 193。

③ Somekawa and Smith, 'Theorizing', p. 152。

为学生树立的理念或典范,总是很快地被他们抛诸脑后”。“我个人,”他接着说道:

不愿强迫任何人以任何特定的方式写作历史。我相信,你写的历史是你自己个性的写照;我同意蒙森的看法,没人能指导别人写作历史;我认为鼓励年轻的历史学家发展自己的个性、视野和怪癖(eccentricities),比起为他们树立榜样来,要有益得多。原创的历史学是原创性思想的体现,这是任何画地为牢的做法(prescription)都无法塑造的。<sup>①</sup>

这一位牛津的教书先生认为,成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家的最佳途径是成为一个好的怪人,这也许是别具英格兰风味的想法吧。人们可能会说,怪人写出来的历史岂不怪亦如其人。泽尔丁本人确实就是一个例子,且让我们假定他是遵循了自己的原则吧。他最近的两部作品,《幸福》(*Happiness*)和畅销书《人性内史》(*Intimate History of Humanity*),分别以一个名叫“孙棣”(Sumdy)的女孩想象出来的冒险经历,和几个当代人(以法国人为主)的真实生活—历史为起点,思考西方世界中的个体,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塑造个人生活的诸种可能途径。

实际上,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会同意,年轻学者需要一定程度的训练和指导,以便展开他们的职业生涯,而读博士大概是最好的办法。历史学家在博士阶段的训练,必须把重点放在工作上,即在实践中学习。但是,历史学家在放手处理他们的资料前,还必须掌握

66

---

<sup>①</sup> Theodore Zeldin, 'Social History and Total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10(1976/7), pp. 237 - 245, 此处见 p. 237。

理论和技术；他们不光要学习兰克关于史料批判和引用的原则，还要掌握语言、古文书、统计等相关技术。此外，他们还得阅读并融会贯通大量彼此关联的史料，并熟悉与研究主题相关的二手文献。有人已经指出，这样的训练，更像是一门手艺，而非科学。美国历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就曾说道，历史学不是“运用技术语言、受实验方法控制的假设—推理论断，以及业内人士普遍较为赞同的试验程序的一门科学”，它“更像是一门类似手艺的学科，就是说，它更倾向于服从于成规惯例而非方法论和理论，而它使用的语言是平常或自然的”。<sup>①</sup> 但是，科学是否真如怀特所说，具有历史学所不具备的那些特征呢？我们已经了解到，实验的方法和实验室的程序，并不是一种以观测为主的科学（如天文学）的必要因素。不少科学学科的训练，相当部分（即使不是绝大部分）是在学习材料（如元素的性质等），掌握辅助技术（如数学、光谱学、电子成像等）。历史学说来也不外如此。还有一点，历史学研究也有自己形成共识的程序。说到底，历史学与科学的差异，可能并不像乍看之下那么巨大。

## 四

67 诚如怀特所言，历史学本身，不像微生物学或气象学之类的，拥有自己专门的技术语言。和许多历史学家一样，艾尔顿爵士就主张，所有历史学家的写作都应该尽可能清楚、明白。这并不错。但他又宣称，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是“不可以一清二楚地向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解释的”。在实践层面，这种说法就是见仁见智了。<sup>②</sup> 许多历史著述，譬如经济史和人口史方面的，显然需要读者具备大量的

---

① White, 'Response', p. 243.

② Elton, *Practice*, p. 148.

技术性知识才能理解。许多历史学家在专门的研究领域也会使用技术性语言。如果讨论的话题是,中世纪庄园经济、18世纪中欧的租佃结构、美国老南部奴隶体制的法律基础,或者美国在独立战争前夕的(Pre-revolutionary America)印花税及其他税务政策,恐怕就太过技术性了,只有这个领域的人才能理解。但是,运用技术性语言的历史学就是科学的吗?或者说,不用技术性语言写作的历史著作就不是科学的呢?这样的区分恐怕是一厢情愿。当然,在实践中,当我们的研究涉及到现在已经不再使用的技术性词汇时,通常免不了要用到专门的术语。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还是有义务去尽量清楚而平实地把它们写出来。近年来这一习惯逐渐被人们抛诸脑后,为此劳伦斯·斯通叹息道,他受的教育是,“尽一切可能使用平实的英文,避免专业术语和晦涩的说法,表达要尽量做到让读者读得懂”<sup>①</sup>。他的话十分中肯。毕竟,明晰的表达,是智识精准性的要件之一。这里,不消说,没有什么可以是“非科学的”或敷衍了事的。

然而,正像怀特所指出的,历史学家习惯于借助文学的体裁,其中涉及的各种形象和比喻是他们所使用的史料中所没有的。这意味着,他们所作的绝不仅仅是报道或反映史料的内容。不过,实际上,怀特非但没有要求历史学家从自己的著作中彻底去除文学雕饰,相反,他积极鼓励他们用一种生动的方式进行写作,因为在他看来,平铺直叙地讲故事,并不会使历史文本显得多么“科学”,相反,不过是语言贫乏和想象力不足的表现而已。<sup>②</sup> 同样地,另一位美国

<sup>①</sup> Lawrence 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II’, *Past and Present* 135 (May, 1992), pp. 189–194, 引文见 p. 189。

<sup>②</sup> 作者原注释标为前揭书, p. 99; 而前注释即斯通之文(‘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II’), 但此文页码区间是第189—194页, 故此注释应该为误植页码或书名。——译者注

思想史家拉卡普拉也指出了一种书写历史的方式,即“在历史学家的‘声音’中……承载着对研究方案的自我批判性反思,并且通过讽刺、戏仿、自嘲和幽默等方式的运用,达到一种双/三声道的言说效果”<sup>①</sup>。他接着又呼吁历史学家,对自己的用语保持更多的自觉。他指出,“反对修辞的平实写作风格,或者美其名曰具有‘科学性’”,意味着追求一种达到数学上精确性的语言,但这不过是一种错觉。<sup>②</sup>可以说,这种语言本身也算得上一种修辞形式了。

怀特的勉励之词当然大有汲取之处,拉卡普拉的亦然。譬喻与象征,与统计学和社会学理论一样,可以阐明过去。然而,这应该是为历史学家写作的准确和明晰性锦上添花,而不是釜底抽薪。在经验不足的人手里,让历史学回归到文学的写作方式,可能会导致不幸的后果。例如,美国历史学家玛乔丽·贝克(Marjorie Becker)在她研究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专著中宣称,她在书中“挥洒自如地”使用譬喻,因为,“将历史与诗歌分离,是完全错误和危险的”。出版商在该书的广告样品中宣称,她的这一写作理念孕育出了一部“美妙的作品”。然而,一位该领域的资深专家却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批评该书“混乱暧昧,而又矫揉造作”<sup>③</sup>。也许,最终,历史学

---

① LaCapra, *History and Criticism*, p. 36. 很遗憾,拉卡普拉在此没有提供任何运用如此言说方式的例证。类似地,雅各比(Russell Jacoby)也注意到了拉卡普拉“很少告诉我们,到底是哪些历史学家或历史研究犯了他所强烈谴责的那类‘罪过’”。参看氏著‘A New Intellectu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7 (April 1992), pp. 405 - 424, 此处引文见 p. 416。另外可参看 Anthony Pagden, ‘Rethinking the Linguistic Turn: Current Anxieti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49 (1988), pp. 519 - 529。

② LaCapra, *History and Criticism*, p. 42.

③ Alan Knight 对贝克的 *Setting the Virgin on Fire: Lázaro Cárdenas, Michoacán peasants and the redemption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 (Berkeley, 1995) 一书的评价见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No. 4864 (June 21, 1996), p. 31。



家最好还是守住平铺直叙的风格,除非他们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确信自己清楚地意识到他是在使用文学技巧,是为了使表述更清楚,而非制造更多的混沌。

虽然大部分历史学家继续采取一种或是平实或是文学的写作方式,间或有一部分精于数字的人更喜欢用数学公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文艺理论家写作历史时采取的策略完全不同。一位极为敏锐的批评者罗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指出,海登·怀特“采取了头脑冷静的科学家对于艺术家情感泛滥(emotionalism)的那种嘲笑”。雅各比评论道,如果看看怀特自己的修辞,就能发现“那种咄咄逼人的科学的语言和口吻”。同样地,在他看来,拉卡普拉也表现出一种对“没有技术含量的文体”的“明显蔑视”。这种倾向的登峰造极(*ne plus ultra*),或许也是反证式(*reductio ad absurdum*)表现的,是桑迪·柯文(Sande Cohen)的《历史学的文化》(*Historical Culture*),该书的语言技术含量太高了,以至于需要附上一张生词表,以便一般读者理解书中频繁使用的词汇,比如“actantial”(行动元)<sup>①</sup>、“psychologeme”(心理逻辑解析元)<sup>②</sup>和“distransitivity”(无传递性)<sup>③</sup>

---

① 原书词条为,Actantial/actant,指一种“历史”叙述允许其作为行为主体的事物(譬如,资本主义被当作变革的行动元[actant],或者说资本主义代表了辩证性变化[*dialectical transformation*])的主体),与(一般)读者对一种文化的必要行动的原始主体的认知能力间的复杂互动。见 Sande Cohen, *Historical Culture*, p. 327。——译者注

② 原书词条为,Psychologeme,指对欲望和需求的普遍形式的呈现,叙述者在“历史”中“发现”了它们,并且它们是读者按照当下经验可以接受的符码。见 Sande Cohen, *Historical Culture*, p. 330。——译者注

③ 原书词条为,Distransitivity,指呈现的意义和反义本身十分混乱、无理性、无法理解且无可名状,除非把它们放到“无缝的”“历史”文本中去。人们相信,呈现本身是含糊和不可阅读的,除非把它们放到与之相同和相异的类别下去理解。见 Sande Cohen, *Historical Culture*, p. 329。——译者注

等。<sup>①</sup> 如今,发明新词来指示新发现或推断的现象,本身自然是无可非议。但是,这已经超出了必要的技术性范围。此外,正如雅各比指出的,“新思想史家把全副精神都用于研究语言和文本,这使他们忽略了自己的语言和文本”<sup>②</sup>。令他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些提倡历史回归文学的学者,自己的文笔却如此糟糕。不过,雅各比此言并未搔到痒处——他所评论的这些人,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历史学家了;尤其是以他们所宣扬的标准来衡量,与其说他们是历史学家,不如说是文艺的科学家(literary scientists)。

三位美国历史学家在反思这场争论的近期动向时指出,“历史学绝不仅是以文字优劣区分高下的文学之分支”<sup>③</sup>。倘若判别高下的标尺果真如此,则一般说来历史学就只能打出佳作欠奉的牌子了。历史学家的写作好手堪称凤毛麟角,而能以出版的作品一展其语言长才的就更是罕见。绝大多数历史书真是教人不忍卒读。对于这种情形,过去三十年中占据主导的社会科学模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把一本专业历史学家写的书从头读到尾,因为这些书很清楚地是供人参考而非阅读的。历史学家通常都缺乏文学才能,这使他们的著作甚至无法同二流的诗歌或小说一争长短。要是他们真有文学才能的话,不就去写诗、写小说了嘛。

---

① 请注意《历史学的文化》的封面上,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教授那巧妙的一语双关的评论:“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在阅读并理解本书后,会以同样的方式书写历史。”见 Sande Cohen, *Historical Culture: On the Recoding of an Academic Discipline* (Berkeley, 1988)。

② Jacoby, 'A New Intellectual History?', pp. 413, 419.

③ Appleby, Hunt and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p. 229. 另见 Zagorin,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Reconsiderations', p. 264, 及 *History and Theory*, Beiheft 19 (1980) 对海登·怀特《后设史学》的讨论(*Metahistory: Six Critiques*)。

历史学著作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接受文学和语言学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可以使我們更敏锐地了解历史学家的想法。史学书写的风格千差万别,既有专门到令人发指、且充斥着数据公式的计量经济史或人口史作品,也有辞藻华丽的讲故事老手的作品。不过,无论把历史学作品当成语言学文本来研究多么启迪人心,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把它们当作历史研究来详加考量。历史学家中能写出给人阅读愉悦感作品的人确实是凤毛麟角,而大部分这样的长才,比如吉本、米什莱、托克维尔(Tocqueville)和卡莱尔(Carlyle),都活跃于18或19世纪。这就难怪文学分析家都要关注这一时段,而不是把自己的本领用在分析20世纪上。在20世纪,使历史学科学化的诉求逐步把文学的因素从史学文本中驱逐出去。因此,一个矛盾的情形出现了,我们关于整个历史学性质的看法极为进步——这得益于海登·怀特、史蒂芬·班恩(Stephen Bann)和琳达·欧尔(Linda Orr)等人的工作——但这些看法却是建立在对一个世纪或更久以前的历史作品的阅读之上。<sup>①</sup>与18、19世纪相比,历史研究在纯粹经验的层面上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比如,关于法国大革命,

71

---

①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1973); 怀特之后的著作几乎完全未涉及20世纪的史学研究和著作。另见 Stephen Bann, *The Clothing of Clio* (Cambridge, 1984); 同作者 *The Inventions of History: Essays on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Manchester, U. K., 1990); Linda Orr, *Jules Michelet: Nature, History and Language* (Ithaca, 1990); 同作者 *Headless History: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Historiography of the Revolution* (关于米什莱、布朗克[Blanc]、魁奈[Quinet]和托克维尔); Ann Rigney, *The Rhetoric of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Cambridge, U. K., 1990), 该书也是关于19世纪法国大革命历史的; Frank Ankersmit, 'Tocqueville and the Sublimity of Democracy', *Tocqueville Review*, Vols. 14 (1993), pp. 173 - 201, and Vols. 15 (1994), pp. 193 - 218; L. Shiner, *The Secret Mirror: Literary Form and History in Tocqueville's Recollections* (Ithaca, New York, 1988)。

我们现在所知的超出那些 19 世纪的史家不知凡几,无怪乎经验主义的研究取径,可以泰然自若地忽略米什莱、托克维尔和他们同时代人著作的经验性内容。然而,近代和当代的历史学家普遍地更加看重他们的作品在历史研究水准上所经受住的详细审查,而不是作为文学文本所遭到的批评。

## 五

如今,面对风格迥异而形式多样的历史研究和写作,辩称历史学应当且完全是科学的,将是十分危险的举动。然而,还是有许多历史学家坚称,无论以大学为基地的职业史家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从事研究,历史学科在整体上的特点,正在于它是比语言学和文学更好的分析形式。譬如,英国广播电视大学的阿瑟·马威克就说:“解构或话语分析的技术,与历史学家多年来发展出来的精深方法相比,简直微不足道。”<sup>①</sup>既然他对历史学家的精深方法如此胸有成竹,我们或许应该来看看他本人是如何在著作中展现这些精深技艺的。我们从他关于杰弗瑞·阿彻(Jeffrey Archer)的通俗小说的研究——《1945 年以来的英国文化》(*Culture in Britain since 1945*)中选取一个例子:

“这些小说,我只读了其中的一本。在阅读时我全心投入,但读毕全书,我只感到无限的空虚:既没有增加知识,也没有引发思考,总之,什么都没有——这是最典型的无聊娱乐的结果,与严肃艺术风马牛不相及。”<sup>②</sup>

---

① Marwick, ‘Two Approaches’, p. 29.

② Arthur Marwick, *Culture in Britain since 1945* (Oxford, 1991), p. 5.

这样的论断当真体现了“历史学家多年来发展出来的精深方法”吗？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历史中的美人》(*Beauty in History*)中，马威克开始大抒胸怀，说道：“我个人看过最标致的黑美人，有着一张五官比例绝伦而极其惹人爱怜的脸庞，且留着极短而柔密的头发。”我们还可以在这本书中进一步发现他那“精深的方法”的例证，比如他说道：“大部分人的正面比侧脸好看。”还有，“我们最渴望的就是最美丽的，而美丽的总是我们想拥有的”。<sup>①</sup> 全书充满了这类缀以朴素智慧的个人见识，面对汗牛充栋的历史证据，作者断言，无论处于什么时代或社会，美人总是美人。在马威克看来，人类历史上的美人观是永恒不变的。当然，这些不过是马威克这样一个生活在20世纪末的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的管见罢了。除了耽于这种明显的自大和草率的臆断外，马威克的所谓“精深的方法”，还包括无数意义晦涩而思虑不周的譬喻，比如说：“政客喜欢谈论福利国家的‘马赛克’(*mosaic*)；而事实上，它更像是‘碎石路’(*crazy paving*)。”又如：“这些艰难岁月只是整个战后时代第一期的开端，它们坚硬而灰暗，或许仅有奉献与劳作使它稍显皎洁，却从内里通向了更加温暖的时代。”<sup>②</sup> 这种马威克式譬喻的最大特点就是完全的不知所云。伯利、福斯泰尔·德·古朗治等更严格遵循科学史观的人恐怕难以接受这样的调调儿吧。

73

多年以前，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就曾指出，在历史学中，“显而易见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方法和程序，大大超出了逻辑学和

---

① Arthur Marwick, *Beauty in History: Society, Politics and Personal Appearance c. 1500 – the Present* (London, 1988), pp. 365, 347.

② Arthur Marwick, *British Society since 1945* (London, 1982), pp. 63, 75.

科学方法的教科书所涉及的范围”<sup>①</sup>。最终,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会被视作一种科学,也只是在德语词 *Wissenschaft* 中最微弱意义上的那种科学,即它是一套有序的知识体系,运用公认的方法进行研究,以报告的形式公开发表,经由同行的评阅,然后研究成果被确定为知识。这种科学,不是能构建定律并预测未来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不过,也有部分科学,如地质学,是无法预测未来的。事实看来,这些英语里统称为科学的各学科间存在的差异,并不比所有这些学科与一门像历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间的差异小多少。“科学”在此只是一个便宜行事的标签,因此,难怪它的适用范围在不同的语言中有这样的大差异。追求一种真正“科学的”历史学,就像是在追求一个幻影。在催生新方法和新技术这点上,这种追求还是有益的。但是,每当新一波的历史学家出现,并宣称他们的方法——不管是像 19 世纪的文献学,还是 20 世纪的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统计学、语言学,或文学理论——是真正“科学的”研究过去的方法,以往所有历史学方法都可以淘汰了,以往所有历史学研究都只不过是神话,任何人听到这样耸人听闻的言语,都有权保留一种适当的怀疑态度吧。因为这类宣称总是过不多久就烟消云散了。历史不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科学,它还(或者可以)是一门艺术。称其为艺术,是指有技巧的作家可以用广受褒奖而毫不逊色于其他文学艺术作品的文学形式和语言来表现历史。并且,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所坚信的,历史学是一项技艺,因为史学工作者在工作中学会如何处理他们的材料、使用他们的工具。<sup>②</sup> 这

---

① Isaiah Berlin,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London, 1954), p. 5, n. 1. 关于历史学混杂性的类似见解,请参看 Michel de Certeau, *Heterologies: Discourse on the Other* (Manchester, U. K., 1980), pp. 199 - 224, 和 Bann, *The Clothing of Clio*, pp. 164 - 177。

②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附有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导言(Manchester, U. K., 1992)。

一切不仅是由于历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且千变万化的学科,而历史学家研究的取向也不尽相同。宣称历史学在总体上比文学或语言学的分析更“专业”或更“科学”,和那些反过来宣称后者更优越的言论,都搞错了论辩对象。此处关于历史学科学性的争论,就像其他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一样,都应该暂且消停一下了吧。

### 第三章 史家及其事实

—

75 什么才是一个历史事实？艾尔顿爵士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确凿无疑（事实上他对此类问题极少怀疑）。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发生在过去，并在文献里留下了痕迹，可以为史家用在当下重建它的那个东西。为了成功地完成这种重建，历史学家必须首先摒除所有的偏见和预设，用一种完全开放的心态去处理这些文献。艾尔顿断言：“观念性的理论会威胁到历史学家的工作，它会使史家屈从于各种预先确定的解释框架，并迫使他剪裁自己的论据使之符合被强加于其身的所谓典范。”艾尔顿认为，我们对于过去遗留下来的材料，必须“在生成它的那个语境里”进行解读，“如果我们希望尽可能成功地去追寻历史过去的真相，那么我们必须将当下排除在过去之外”。<sup>①</sup> 因此，历史学家的那些问题，不应该由什么当下的理论来确定，而应该是出自历史材料本身。<sup>②</sup>

在提出这种观点的同时，艾尔顿强烈反对卡尔对历史事实的定

---

① Elton, *Return*, pp. 27, 65.

② Elton, *Return*, p. 68.



义。卡尔认为,一个过去的事件,只有在被历史学家当作一个历史事实接受之后,才能成其为一个历史事实。举例来说,在1850年斯坦利布里奇的守灵节上,一个卖姜味面包的小贩被人踢死的事,卡尔认为,只有克拉克(George Kitson Clark)在讲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的书中提到这件事之后,它才真正成为了一个历史事实。因而在他看来,历史事实是由理论和诠释构建出来的,它们并不能独立地存在。<sup>①</sup> 卡尔在这里陷入了一种语义上的混乱,这种混乱已经造成了无休止的问题,在我们继续讨论之前,必须厘清这种混乱。一个历史事实,是一个在历史中发生的,并且可以通过历史留下来的痕迹去加以证实的事实。而无论史家有没有做这种证实的行为,和历史事实的实在性是没有关系的——它完全是独立于历史学家之外而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一般都说,在过去里“发现”事实。举例来说,当偶然遇见一份材料,向历史学家昭示在斯坦利布里奇守灵节上这个先前不为人知的事件时,我们加入理论和诠释的地方,就正是事实(facts)转变成证据(evidence)之处(也就是说,事实被用来支持一项论证)。即在此,理论和诠释确实扮演了建构性的角色。因为,历史学家很少出于对它们本身的兴趣而去关注那些散乱的事实,他们几乎总是关心这些事实之间的兰克所谓“会通性”。因而,卖姜味面包的小贩之死这个事实,按照历史学家不同的目的,可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拿来当论据:作为这个时代群众行为的一个侧面,作为对食物供应研究的一个部分,作为节庆和休闲活动的一个例证,作为曼彻斯特地方史的一个事件,或者更多。无论如何,当它以多种面目被当作论据呈现时,这个小贩之死还依然是一

77

---

<sup>①</sup> Carr, *What is History?*, p. 12. Gareth Stedman Jones 也这么认为,参看 Gareth Stedman Jones, 'History: the poverty of empiricism', in Robin Blackburn (ed.),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1972), p. 113.

桩个体的事实。所以,理论上说,事实是先于诠释的,而诠释是先于论据的。

以此而言,这个小贩的不幸身亡要成为一个历史事实,其可信度只能说一般,而不具备很强的说服力,因为克拉克所引用的并不是当时的直接材料,而是桑格“勋爵”(‘Lord’ George Sanger)在事后的一些回忆,而此类回忆通常并不一定被认为可靠,即使它提供了过去事件发生时目击者的声称。如果我是克拉克的话,我就会找一些当时的材料来证实我的论述。我想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件事没有在别处被广泛提到(只在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一书里出现)<sup>①</sup>,1850年的这个面包小贩之死要作为一个历史事实,依然存有疑问。卡尔要使这件事位列于历史事实的行列(不是相当精挑细选的)之中,他所需要的附议者和担保人,还不是其他的历史学家,而是更有说服力的当时的文献,而这些文献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当时报纸对那次活动有非常详尽的报道,但是当克拉克强调了醉酒对引起暴力活动的作用时,报纸却说道:“在守灵节期间的任何时候,很少能在大街上看到醉酒的人。”我们能看见报纸对莫里斯舞者(morris dancers)和弓箭表演的描述,对气球升空场景的报道,却没有提到任何的暴力事件,尽管有份报纸确实报道了从曼彻斯特过来的几个不值一提的小偷被逮捕的消息。克拉克引用桑格对那次守灵节的回忆,是作为例证说明从18世纪到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粗野、残暴、酗酒行为的持续存在,可当时的资料都在说,当星期天有“一群禁酒主义者”来到守灵节进行演讲时,“一大部分听众”都在“耐心地倾听”,这似乎和克拉克所说的刚好

---

<sup>①</sup> 例如可以参看 Anthony Easthope, ‘Romancing the Stone: history-writing and rhetoric’, *Social History*, Vol. 18 (1993), pp. 235 - 249 中的 p. 236, 以及 Marwick, *The Nature of History*, pp. 194 - 196。

相反。<sup>①</sup>

但是,即使我们能找到当时的其他材料来证明面包小贩之死属实,历史学家的论述是不是真的就能和当时的文献一样反映事实呢?我们很难得到确定的答案。当克拉克仅仅提到这个事件之时,理论上我们还能把他的文字看成是对一个真实事件的直接反映,而当他用这个事实当作论据,来证明维多利亚时代的暴力行为时,问题就大不相同了。如果我们要接受他的这种论证,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别的论据。还有,克拉克可能首先想要提出维多利亚时代暴力行为这一论点,然后再去找寻论据,而不是反过来。所以就像我们所发现的,他没有看到足够多的证据,否则他就会意识到,他所选的论据是并不可靠的。至少就这个例子而言,历史学家的工作其实不是从看到档案才发端的,它早就开始了。历史学家首先确定一个论题,然后由此出发去寻找论据,从而发现事实。<sup>②</sup>

因而,从概念上我们应该把事实和论据区分开来,而不是像卡

① George Kitson Clark, *The Making of Victorian England* (Cambridge, 1962), pp. 61–62. 援引自 Lord George Sanger, *Seventy Years a Showman* (2nd edn., London, 1926), pp. 188–189. 这里的群众被认定是一帮穿着铁尖木底鞋的矿工。关于当时的报道,参看 *Manchester Guardian*, 17 July 1850, p. 7, col. 3; 27 July 1850, p. 9, col. 6; *Manchester Examiner and Times*, 17 July 1850, p. 7, col. 6; 20 July 1850, p. 7, col. 3; *Manchester Courier and Lancashire General Advertiser*, 20 July 1850, p. 8, col. 1; 27 July 1850, p. 8, col. 2; *Manchester Spectator and Commercial Gazette*, 20 July 1850, p. 8, col. 3; 27 July 1850, p. 8, col. 4。1850年的斯坦利布里奇属于兰开郡(Lancashire)地区(现在则属于柴郡[Cheshire]),当地没有报纸,而离它最近的差不多大小的镇子榆林的阿什屯(Ashton-under-Lyme)也没有,所以曼彻斯特的报纸就把斯坦利布里奇的新闻放在“Stalybridge”或者“Ashton-under-Lyme”的标题下面,在1851年和1852年也没有任何关于守灵节骚乱报道,这就排除了桑格记错年份的可能性。

② 对这个普遍性问题的讨论,参看 Partner, ‘Making Up Lost Time’, p. 105。

79 尔那样将它们混淆。但是这种困扰整个关于历史事实争论的术语上的混淆并没有就这么结束。这种和卡尔差不多的误解,在怀特对事实(facts)和事件(events)的区分之中同样能够找到。怀特说,一个事件是以前曾经发生过的,而一个事实则是由历史学家构建出来的,或者它只存在于过去或者文献的遗存之中。<sup>①</sup>就历史学之术语而言,我敢说一个事实并不一定就是一个事件。比如,一个“事实”可以是一幢曾经在某地早已消失的建筑,或是两国之间的一条边界,或是某个政府部长拥有的一些股票和股份,一条对某些活动的法律禁令,某个政客和情妇的私通,或是一条战舰,或是一辆坦克装甲板的厚度,还可以是别的很多很多东西,它们中没有一个可以被描述成一个“事件”,即使它和某个事件有所关联。一个事件是一个事实,但一个事实并不必然是一个事件。历史学并不仅仅是关于“事件”的学问,它也关乎过去的许多其他方面。这一点并不仅仅适用于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或是思想史,也适用于那些更具有“事件倾向”(event-oriented)的历史分支,比如政治史或军事史。

故此,如果怀特的意思是,对于过去的任何事件的历史学共识,都是难以达成的,都处在开放的状态,要接受别种立场的修正;如果他认为将来的历史学家甚至可以说1850年根本就没有斯坦利布里奇的守灵节,或者守灵节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卖姜味面包的小贩(而实际上报纸里确实提到了这些小贩),或者作出其他此类事实论断的话,那么他就错了。只有在新的证据被发现,并能修改或质疑历史学家对于事实的论述——就像在斯坦利布里奇的守灵节上卖姜味面包的小贩之死(现在看起来很不确定)这个例子上——这种修正才能成立。但怀特的意思究竟是不是这样,依然存在疑问。如果他认为(我觉得他是这么认为的),对于所谓的面包小贩之死,此事

---

① White, 'Response', pp. 233 - 246.

究竟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公共秩序有何意义,它又如何被当作有关这一时代的更宏大的论述之证据来加以诠释,此类问题人们总是应存在争论,那么当然他就是对的。<sup>①</sup>

## 二

所以,真正构成问题的是,历史学家利用文献不是为了建立具体的事实,而是将它们作为论据去建立更大的,能够将事实联系起来的模式(patterns)。那么,这种模式、这些联系,是早已存在,只等着人们以不偏不倚的认知取向去发现它们,还是由历史学家自己构建出来的呢?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如果历史学家把他们处理的文献想象成一扇透明的窗户,透过窗户,更大的关于过去的真相就能够一目了然,那他们无疑是在欺骗自己。在这些学者看来,文献究竟能呈现出什么,是很有疑问的事情,历史学家拥有一种“传统的信心”(traditional confidence),认为他们能够“正确地”(right)找到他们需要的事实,或者通过材料他们能够触到那高高在上的“本质的真相”(essential truth),这样的一种信心是完全的错误。<sup>②</sup> 以此而言,就像美国中世纪史学者南希·帕特娜指出的,历史“事实”变成了“人为构建的东西,就认知的根源而言,它无异于任何人造的东西,或者说‘小说’”。<sup>③</sup> 她的两位同行也充满自信地声称,“‘叙述乃基于事实之上’这一历史学家基本的主张,可以说,事实上已经是站不

① White, 'Response', p. 239.

② Beverley Southgate, *History: What and Why? Ancient, Modern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London, 1996), pp. 26 - 27.

③ Partner, 'History in an Age of Reality-Fictions', p. 23. 对这个问题的详细阐述,也可参看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住脚了”<sup>①</sup>。还有,正如拉卡普拉评论道,“文献是补充或者重写‘真实’(reality)的一些文本,它并不是可以让有关‘真实’的事实显现出来的简单材料”<sup>②</sup>。文献永远是从某人的观点出发写成的,带有某种特定的目的和对读者的想象,如果我们不将这些东西都发掘出来,我们就可能会被误导。拉卡普拉还说,历史学家太多次地把这些文献中所藏的偏见,无意地直接带进了他们自己的著作中(或者按他所说:“此外,尽管或多或少有些盲目,一切的历史学都要面对与过去之间一种转让[transferential]关系的处理,即由这种关系,他们研究对象的某些环节,需要在史家的叙述中也找到它们的对等物”)。<sup>③</sup>“历史学家往往只是在内容分析的层次上,把文本当作简单包含信息的资料去解读。”<sup>④</sup>这个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对文本和文献的化约(reductive)式使用”<sup>⑤</sup>。

出于类似的情感,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凯丽(Catriona Kelly)说道,“那些对抗性的(antagonistic)、斗争性的(combative)和反直觉式的(counter-intuitive)文本解读的策略,都在解构主义的兴起之后发展起来”,在她看来这是后现代理论的成就之一。她要求历史学家对材料采用一种“侵略性的态度”,“不要专注在那些最为明显的解释上,而要致力发掘更深一层的意蕴”。但是,这种训诫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正如帕特纳所说,“尽管我们有了非指涉性(non-referential)的语言理论,我们对以往被看作中立性的叙述之中所藏的霸权的利益(hegemonic interests)进行了解构和揭露,但这些所造成的冲

---

① Somekawa and Smith, ‘Theorizing’, p. 151.

② LaCapra, *History and Criticism*, p. 11.

③ LaCapra, *History and Criticism*, pp. 11, 17.

④ LaCapra, *History and Criticism*, p. 38.

⑤ LaCapra, *History and Criticism*, p. 47.

击,并没有使(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破碎到无法复原的地步”<sup>①</sup>。这可能是因为,凯丽告诫史家应该开始去做的“抛开作者之意图去阅读材料”(reading against the grain),早就是这一行里的老把戏了。<sup>②</sup> 就像劳伦斯·斯通所说,早在他年轻时候(“四五十年前”),历史学家就被教导“文献——我们当时还不叫它文本——都是由那些易犯错误的人写出来的,他们会犯错,会提出谬误的观点,会以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引导他们的写作,所以我们就需要慎重地考察他们,仔细考虑诸如写作的意图、文献的特性、写作所处的语境等问题”。但斯通在这篇写于1992年的论文里同样还说到,“在四五十年前”他被教导“要遵从卡尔的建议,当我们阅读历史著作之前,先要考察历史学家所处的背景”,而卡尔直到1961年出版《历史是什么?》一书之前,都没有提出过此类建议,也就是说那只是在三十年前,我们或许可以质疑,斯通究竟有没有在他年轻时代被灌输过这些东西。但他现在肯定是明确地相信这些,而且他说的这些是历史学家惯常开始其工作前的预设,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也说,他曾接受教诲,“对事实的认知和再现,往往和事实本身大不相同,但有时却和事实在历史学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同样,这也是任何要处理原始资料的历史学家经常会痛苦地感受到的事实,这种痛苦是因为它使得历史写作的工作,比起先前认为资料就是真实世界一对一的反映(后现代主义者声称历史学家都是这么认为的)而言,要复杂得多了。<sup>③</sup>

82

拉斐尔·萨缪尔在他最近的某部著作中指出,“在很多情况下,

① Partner, ‘History in an Age of Reality-Fictions’, p. 21.

② Catriona Kelly,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133 (November, 1991), pp. 209–213.

③ 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II’, pp. 189–190.

历史研究的精妙技巧就在于,把作为‘话语’(discourse)一部分的某些文献从‘话语’中分离(*detach*)出来,并将它们与别类性质完全不同的文献组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忽视或者低估文献所使用的语言之作用,而是要把它和同一论题下其他文献的语言进行比较。如萨缪尔所言,起始自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历史学家就已经掌握到“将言行分开考量”的问题,并“试图去判断它们各自的代表性”。在某些研究中,将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件并列,或是自由地将其组合在历史叙述之中,无视历史特殊性的问题——除非历史特殊性同样也能被吸收到那些自由飘浮(*free-floating*)的话语之中,就像法国哲学—历史学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所做的那样,可能是富有启发性的。但这种尝试要成为普遍性的价值,却是很有局限的。萨缪尔抱怨道:“他们(也就是那些后现代主义者)不在档案材料里努力挖掘,而是居高临下,在那里,各种意义的领域发生碰撞,层峦叠嶂的奇峰驱散了未知的迷雾。他们不是艰辛地使用文献考察过去,而只需要带着想象力去重新发明它。”<sup>①</sup>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萨缪尔的意思是,要享有这样的自由,就意味着放弃某种责任感。

那么,真正关键的问题就是,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对材料进行“抛开作者意图式”的解读?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求之于理论。任何的理论——无论是关于人类社会如何构成、人类如何行动等普遍性的论题,还是那种较狭窄的命题,比如历史中的节庆、前工业时代乡村人际交流的特性等——都是从历史学家自身所处之当下生发出来的,而不是来自于他们所用的材料。理论的使用,对历史学家是极其重要的。举例来说,如果没有20世纪在非洲乡村社会研究中

---

<sup>①</sup> Raphael Samuel, ‘Reading the Sign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32 (1991), pp. 88 – 109, and 33 (1992), pp. 220 – 251; 引自 p. 233。



发展起来的人类学理论,过去二十五年我们对17世纪欧洲巫术史的研究,就不会取得这样大的飞跃。这是因为,此类理论能够让诸如凯斯·托马斯(Keith Thomas)等学者用一种全新的更具独创性的方式去解读材料。<sup>①</sup> 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城市史和劳工史的研究可能会极快地走向枯竭,而像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样一部厚重而极富影响的经典著作,可能永远无法写成。<sup>②</sup> 没有现代经济学理论,历史学家无法像现在这样理解工业化,也无法知道怎样阅读和使用量化的资料,以及由量化材料派生出的别的论据。

如果史家所处时代的观念和理论,能允许其人用一种超出甚至违背作者本意的方式去解读原始资料,那么同样会允许该原始资料为各怀鬼胎之各色史家用作证据。很显然,一份材料文献中所能提供的“证据”,和它自身所指向的那个“事实”,并不永远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法国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在他的名著《蒙塔尤》(*Montaillou*)中,便把那些审判材料,当作(与发现这些材料的前辈学者所作)迥然不同的“证据”,甚至是“历史事实”来加以解读。那些前辈学者所感兴趣的,是审判本身,以及审判所希望清除的卡特里派(Cathar)异端,而勒华·拉杜里所着眼的,则是在审判中所附带透露出来的有关那些异端信徒之日常生活细节,从而描绘出一幅中世纪村庄里人际关系和人们生活的相当私密性图景。<sup>③</sup> 艾尔顿爵士以他特有的立场批评勒华·拉杜里,认为他应该像他的前辈那样,

84

---

① 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Studies 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1977).

②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1963).

③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aris, 1978).

专注于宗教审判本身。<sup>①</sup> 但是这种批评很难找到理由。艾尔顿的观点是,对于一个既定的文献,只能用一种正当的方式去解读。这完全错了,文献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解读,而且至少从理论上说,所有这些解读都具有同样的正当性。还有,很显然,我们解读材料的方式,是由我们当下的关怀出发的,是由当下的理论和观念引导我们形成的问题出发的,这也没有什么不对。

对“文献拜物化”(documentary fetishism)的批判往往集中于上述这点,并把艾尔顿式的立场看成是被普遍接受的正统观点。思想史家休斯(H. Stuart Hughes)曾经批评道,美国的历史学家“似乎都已经忘了——如果他们曾经知道的话——一个简单的真理,那就是新的研究进展不仅仅来自于新材料的发现,而至少也能来自于对已有材料的新解读”<sup>②</sup>。休斯本人当然很乐于尽力宣扬这个“简单的真理”,因为在他任何的著作中都没有使用过新材料,其所有的工作都是奠基于旧资料之上。芝加哥大学的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也赞同这种主张,他在1986年做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演讲时,曾力劝他的同行,不要总埋头苦修一种“旨在不断地接近文献——所有文献,而且仅仅是文献——的历史编纂学”,因为这种编撰学仅仅意味着“与散乱、混杂和无意义渐行渐近”<sup>③</sup>。这样的观点(尽管表达得不算太明智)出自一位终生研究从人类诞生到当下的整体世界的历史,且对原始资料的掌握相当有限的历史学家之口,或许并不出人意料。

---

① Elton, *Return*, p. 55.

② H. Stuart Hughes,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Progress, Paradigms, and the Regression toward Positivism', in Gabriel Almond, Marvin Chodorow and Roy Harvey (eds.), *Progress and its Discontents* (Berkeley, 1982), p. 245.

③ William H. McNeill, 'Mythistory, or Truth, Myt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1. (1986), pp. 8-9.

如果我们略微拓宽视界,艾尔顿曾注意到,对“文献拜物化”的批评,以及将“再诠释”看成是历史学家首要任务的鼓吹,往往出自思想史家,这个观察是有道理的。毕竟,与大多数历史学家相比,他们是在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材料:把材料视为诠释观念的工具,而不是视为接近外在真相的线索。况且,他们研究的往往只是很有限的一些经典文本,出自一小群经典作家之手,或者说,他们身处于一个很少会有新材料发现的领域。所以,“再诠释”几乎成了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sup>①</sup> 当一个思想史家去解读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或是马克思的《资本论》(*Das kapital*)的时候,他不是要利用他们这些著作去重新建构一个外在于这些书的新东西,而是试图对著作本身的意义做出新的诠释。确实,对这些思想家的观念,业已有过形形色色的解释,一方面,霍布斯和马克思所建立的思想体系是如此的庞杂,以至于很难被归纳概括;另一方面,要通过发现新文献来对他们进行再诠释的可能性,基本等于零。(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确定,霍布斯和马克思所写的,或有关他们的文献不会再出现,但几十年来学者们已经搜寻了所有可能的档案,看起来应该不会有新的发现。)

86

思想史家对于他们的同行太关注于原始材料的发掘很不耐烦,看起来也是能理解的,但在这里我们也需要倡导一种小小的学术宽容态度:历史知识和历史理解,当然可以同时由新材料的发现和对旧材料的创造性诠释这两条途径获得。比如说,死海古卷在1947年的发现,就导致了一些与当时政治风向大相径庭的新诠释之产生,而就在同时,比尔德(Charles Beard)对美国宪法的再解释——基本不是源于新发现的史料——则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认识,也激起了

<sup>①</sup> Elton, *Return*, p. 53.

大规模的讨论,可谓引领了历史理解的一次真正的进步。<sup>①</sup> 历史学家永远是受到他们在当下的关注点驱使的,真理不会简单地从对材料无党无偏的阅读(如果这种情况存在的话)中生发出来,即使死海古卷本身,从它被发现起始,就一直是大量争议的焦点。不是所有的材料都同样地能被加以各种诠释,或被派作各种用途,有的确实只能作单一的理解。而其他的,比如哲学的文本,则在许多年里已经历了不断的再诠释。有的材料被用来探求一个超越于它们的历史事实,有的则就其本身而被研究。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方式因人而异,某一领域的专家不该去责备别的领域的同行——就因他们没有遵循自己推崇的方法。

### 三

87 拉卡普拉曾指出,过去所遗留下来的痕迹,并不是完整的。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档案,只是某些文献偶然保存下来的结果,相应地,也有很多失传了,或是被有意销毁了。这些能看到的档案,同样也是档案管理员职业活动的成果,而后者则影响了对过去的记录,从而影响了历史学家的诠释。档案管理者往往会除掉那些他们认为不重要的记录,而保留那些他们认为有长久价值的。这就意味着,比如说,那些为数巨大的低层国家雇员(例如普通兵士、水手、手工业者等)的人事档案就可能会被毁掉,而把拥挤的书架空间留给那些高级国家官员的人事材料。这种做法背后反映了一种意见,即把“历史”看作单纯是精英的历史,而当下的历史学家会把这种见解斥之为过时。那些被认为对某一个时代毫无价值、理应扔进碎纸机里

---

① Spitzer, *Historical Truth*, p. 61.

销毁的文献,可能对另一个时代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

从我的个人经验里就能举出一个例子说明。20世纪80年代,当我在汉堡州立档案馆从事研究的时候,我逐渐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二十年里,警察部门派出了很多便衣侦探到城市的各个酒馆、酒吧,并让他们写下秘密报告,记录酒馆、酒吧里的支持社会主义的工人说了什么。我看到的这些报告是一些更大的文件卷宗之一部分,那些文件是有关这些工人所属之组织的。考虑到参阅更多的实例可能会产生有趣的发现,我又取出了一份由档案管理员整理打印的警局文献的目录,在目录标题上赫然写着“无价值的报告”。走进档案保管室之后,我才发现就在相关的序号之下,包括有总量超过两万份的报告,这些报告被当时的警局上层认为缺乏价值,而被排除在我最先接触到这个主题的文献卷宗之外。非常幸运的是,它们并没有被毁掉。这些报告里包含着极其生动鲜活、富有趣味的描述,有关那些被记录在册的支持社会主义的工人如何看待那个时代几乎所能想象得到的每一个议题,从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到汉堡繁华大街上的交通状况。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浏览过这些报告。研究劳工运动的历史学家只关心组织和意识形态。当我去考察这些报告的时候,学界的研究兴趣已经开始转向了日常生活史,工人对家庭、犯罪、法律、食品饮料、休闲娱乐的看法,已经成了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我发现整理和出版关于这些文件的一个选集很有必要,于是,在几年的研究之后,我完成了这项工作。<sup>①</sup> 作为这个成果的选集,表明了那些被记录在册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往往会有一些简化和曲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而以往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只是接受了党教导他们

88

---

<sup>①</sup> Richard J. Evans (ed.), *Kneipengespräche im Kaiserreich: Die Stimmungsberichte des Hamburger Politischen Polizei, 1892 - 1914* (Reinbek, 1989).

的教条,因为以往的学者只关注官方的声明通告,缺乏更深入的资料发掘,而在汉堡发现的这些警局报告,则使进一步的研究成为可能。故而,从这些“无价值的报告”里,却产生了对先前历史解释的一个很有益的纠正。这种偶然留存下来的宝贵材料,只有等整个历史研究气候(historiographical climate)转变之后,才会为人发掘与利用。

89 不可否认,史料能否留存下来,是历史学本身的一个问题。过去留给我们的记录当然是支离破碎的,可对记录进行选择的过程却不总是武断的。历史学家一直很清楚这点,知道把那些可见的碎片置入由遗存的其他碎片所建构的更广大背景,从而能够获得对一个整体的看法(即使这个整体的关键部分依然缺失),这是相当重要的。从事历史研究就像在做一个拼图游戏,那些拼板分散在一个屋子里的许多盒子之中,其中有一些已经被毁掉,即使我们把所有拼板组合在一起,依然有很多重要的拼板无法找到。最后这幅图像什么模样,部分要依仗有多少盒子留下来且被我们发现而定,这又大致要看我们到哪里搜寻它们。不论如何,尽管我们没法找到所有的拼板,这幅图像的大致轮廓总能被我们把握。于是,我们“想象”着这幅图像的轮廓,并试图去深入它的细节。然而同时,那些我们已经发现的拼板却会对这种想象构成某种限制。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已经发现的拼板只能拼出一个蒸汽引擎的图像,那我们就别想着能把它们拼成一个乡野庭园,这根本办不到。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过去留给我们的痕迹是支离破碎的,历史学家在重建它的时候完全能够海阔天空地进行想象发挥。

这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些痕迹转换为我们能够加以理解的一种言语?常常,它们不仅仅在字面上是由不同的语言(拉丁语,希腊语,盎格鲁-萨克森语或是其他的什么)写成,而且在寓意上也有天壤之别。故此,同样一个词,在17世纪和

20 世纪或者 21 世纪,可能会有难以把握的意义差别。比如我们以“家庭”(family)这个词而言,在 17 世纪它应该包括那些居于主家的仆人,而到了今天则完全不这样,即使在那些稀少的依然保有仆人的家族里。这个问题在我们解读材料时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在德国 90 有一个历史学家团队编辑了一套多卷本的辞典,来追溯这些语词和概念(可惜只在德语里)在若干世纪中的意义变迁。<sup>①</sup> 但这样的工作仍然是一种诠释。如果不同的历史学家以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式翻译用历史语言写成的文本,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哪一种是“正确的”呢?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些语词在其当时的意义,转达给今天的读者呢?这几个问题究竟有意义吗?有些学者提出,这些问题没有意义,我们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来决定两种翻译的对错,因而也无法准确地重建语言在过去的意义,无法重建那个过去。<sup>②</sup> 但是,要重建一种过去的语言在当时使用者心中的意义,确实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所接触到的个别语词和概念,都是一个意义系统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参考这个系统里其他的语词和概念,来确定它们的意义。在进行一个研究的过程中,比如说研究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我们并不是仅仅阅读一份文献,而是成千上万份,所以当我们检视了同样的语词和概念与别的许许多多语词一同使用的情境后,我们就能够在整体的语言和概念体系下,分解出个别语词和概念的意义。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研究与我们(英国)完全不同的一个社会,并且这个社会使用完全不同的语言——德语,我当然也在这方面迎

---

① Otto Brunner et al. (eds.),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c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Stuttgart, 1972 - 1994).

② Jenkins, *Re-thinking* (London, 1991), pp. 40 - 41. 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Oxford, 1975), p. 18.

接着双重挑战。但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就无法克服的,这多少是因为我所运用的大多数材料——比如柏林司法部门的文官记录,或者汉堡警局档案中的监视报告——使用的都是一种陈词滥调和一成不变的语言,相同的语词与概念反复地出现。这些警察和公务员写成的材料,相比同时代的那些诗人和哲学家的著作,在语言上当然要贫乏许多。历史学家所从事的翻译工作,和那些翻译海涅或者康德的人所做的,实在是大相径庭。历史学家通常所关心的,是在一个最基本层面上的语言和思想,除非他研究的是诗史或者哲学史。相应的,很少有历史学家对某个特定的语词、概念,甚至是单个文献进行争吵。尽管历史学家的争论往往包括了对如何诠释原始材料的不同意见,学者更愿意将争论集中于哪些材料与该问题相关,而不是材料本身的意涵究竟是什么。有的时候,某个材料确实只有一种可以让大家接受的诠释,那么我们在争论中就完全可以判断,哪个历史学家的解读是正确的,哪个是错的。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如此,但那也不意味着“翻译”就必然是开放的,永远无法穷尽的。

提出以上的观点,可能会对某种论断构成否定性的冲击,这种论断最早由柯林武德提出,接着由卡尔进行了阐释,那就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按照卡尔的说法,“说到底,没有一个文献告诉我们的东西,能超出其作者所设想的”,当我们阅读一个材料的时候,我们是在心中重演这个材料之作者的思想。<sup>①</sup>然而,这个说法并不一定正确。历史学家已经习惯于把文献与其他文献进行比较,从而发掘其意义,在这个情况下,一个文献确实可以被揭示出比它的原作者所设想到的更多的意味。某一个文献所没有提到的空白部分,往往和它已经包含的内容同样地有趣。当我们把一个文献里的统

---

① Carr, *What is History?*, p. 16.



计数据,和该文献作者不知道的其余数据放在一起考察的时候,这些数据的意义看起来就会和其作者之意大不相同了。我们把自己的想法加诸文献之上,而这会对如何解读文献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许多所谓“材料”根本没有被保留下来。要进入一个将财宝埋进墓穴里的4世纪之人的头脑,或进入一个20世纪新闻摄影师的头脑,实在是太难了。柯林武德关于历史解释的观点,实际上太局限于对政治事件的解释。比如说,如果我们希望考察16世纪西班牙物价上涨的原因,那么说什么我们要去重演那些资料(我们从中获得数据)编辑者的想法,实在没有什么意义。<sup>①</sup>而且,就像两位美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

我们不能把文献仅仅视为其创作者意图的简单显现,文献产生时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物质条件,也深深地影响了它说些什么,如何去说。因此,历史学家对论据的细心解读,可能和文献作者所希望说的,或是当时的读者所理解的,大不相同。<sup>②</sup>

当然,历史学家必须了解这里说的社会制度和物质条件,他们也必须把这些“语境”(context)牢记于心,即便在他们把某个文献从语境中抽离出来时。否则的话,他们就会冒犯下错误的风险,即为了服从他们自己特定的诠释,而越出了文献可能具有的意义边界。总

93

---

<sup>①</sup> Peter Burke, 'Overture: The New History', in idem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Oxford, 1991), pp. 1-23, 此处引自 p. 5。

<sup>②</sup> Somekawn and Smith, 'Theorizing', p. 153.

的目的或者想法完全不相关,尽管我们通常需要把后者列入考虑范围。<sup>①</sup> 历史学家所书写的,与文献所讲述的,是两样不同的东西,至少今天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同这一点。可是,就像我们以下要看到的,那些历史研究方法的批评者,也对这种区分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 四

我们如何从历史材料中找出历史事实? 伟大的意大利古代史学者阿诺德·莫米吉里诺(Arnaldo Momigliano)曾经这样描述现代历史学的基础:

整个现代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是建立在对原始(original)权威和派生(derivative)权威的区分之上的。所谓原始权威,指的是事件目击者的陈述,或者是当时记录事件的文献和材料。所谓派生权威,指的是那些没有亲眼目击他们所讨论事件的历史学家和编年史作者,他们直接或者间接地从原始权威那里听到或者推知某些事件。<sup>②</sup>

这种区分,我们通常称之为“一手材料”和“二手材料”,首先是由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提出的。这些学者在史学实践中始终专注于第一手的、原始的材料,区别于主要依靠(虽然不是全然依靠)编年史大事记以及其他二手的、派生材料的启蒙运动史家。这使得后来

---

① Carr, *What is History?*, p. 52.

② 转引自 Kenyon, *The History Men*, pp. 8-9, 也可参看 Marwick, *The Nature of History*, pp. 198-200。其中包括对那些没有亲身经历其证实的事件发生,却做出目击证明的自传之不确定性,进行讨论。

许多史家(就算不是大部分)把 19 世纪,而不是 19 世纪之前,视为这门学科专业的、科学的基础得以奠立的时期。而现在,那些对这个历史传统进行批评的后现代主义者,也对这种“一二手材料”之区分进行了强烈的质疑。

或许对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学最深入、最详尽和最明确的挑战来自法国的语言学理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以及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早在 1968 年,巴特就指责道,历史学家声称能够重建过去的真实,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幌子(a pretence)之上。他说,由职业史家(或由任何人)写成的历史,其实只是“对过去的一种刻画(inscription),却要假装成过去的实像;是一些意义符号的排列,却把自己化妆成一组事实”。客观性,其实只是“我们或许能称之为指涉性幻觉的产物”。这种幻觉就是,把过去想象成其就在于某个地方,等着我们去发现,从实践上讲,就是一个空白的空间,等着历史学家去填满它。逐字逐句的引用、注释的说明,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仅仅只是为了设计出来制造一种巴特所谓的“真实效果”(reality effect),哄骗读者,让他们相信历史学家对过去未经证实的再现和直接坦诚的报道之间,没什么区别。而历史学家对其自身工作的理解,在德里达看来,则是一种顽固的“逻各斯中心”(logocentric),亦即他们想象自己在一个发现的过程中是完全理性的主体,而这也是一种幻觉,就和别的各种各样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相似。

这些观念实际上源于——当然并不是很直接——最早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提出的理论。他在 20 世纪初的时候就指出,语词和它们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很独断的。95 比如说,“dog”这个词,就其自身来说并不比法语里的“chien”,德语中的“Hund”更能反映一种肉食性的、会吠叫的四足动物。因此索绪尔说道,语词——或者他所谓的“能指”(signifiers)——并不是由它

和它意味的那个东西(也就是“所指”[the signified])之间的关系来界定的,而是由语词互相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的(比如“狗”是相对于“猫”而确定的)。然而,当索绪尔认为语言就是这样一个对符号的区分而构建起来的系统,其中的那些“能指”,总是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方式相互联系,后来的理论家,比如德里达,则走得更远,认为当我们每一次说出某个词,这种联系就发生了变化。语言因是就成了一个“无止境的意义游戏”。没有任何可以决定它自身意义的“先验所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存在,所有事物都只是语词的组合,所有事物都只是“话语”或者“文本”。语言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存在。因为我们只通过语言,而不是其他东西,来理解这个世界,万物皆文本。<sup>①</sup>

无论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认为,它对文学和历史学都产生了很激烈的影响。那意味着,人们已经不再认为作者能控制其书写的意义。在构成语言的这个无止境的意义游戏里,一个文本的意义在它每一次被阅读时都发生变化。意义是由读者赋予的,而且在理论上,所有这些意义都同等有效。在历史学中,意义并不能在过去被发现,它只是由不同的历史学家赋予的,每一次都不同,但都具备同等的有效性。在历史的文本和历史学家的文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一以贯之的联系,过去所存留下来的文本,和其他文本一样,其意义是被专断地决定的,使用这些文本的历史学家,其所生产出之文本同样如此。长期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英国史家劳伦

---

<sup>①</sup> 相当有用的概述,可以参看 David Lehman, *Signs of the Times: Deconstruction and the Fall of Paul de Man* (London, 1991), pp. 28 - 37, 106 - 109。在卷帙浩繁的著作里,可主要参看 Roland Barthes, *Image, Music, Text* (New York, 1977);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1976),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1978), *Positions* (Chicago, 1981), *Dissemination* (Chicago, 1983)。

斯·斯通曾经评论道：“如果文本之外无他物，那么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就会整个塌垮，事实和虚构之间，就会变得无法区分。”<sup>①</sup>中世纪史学者加布瑞利·斯皮格(Gabrielle Spiegel)则说：“如果文本——包括文献、文学作品以及其他——不能清晰地反映真实，而只能反映别的文本的话，那么历史学研究就根本无法和文学研究区别开来，而‘过去’就会消融在文学作品之中。”<sup>②</sup>这不仅仅是保守派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警示性结论，后现代主义者自己也有类似的看法。比如帕特里克·乔伊斯就曾经说，由于“过去的事件、结构和进程，统统只能被当作是由文献建构的重现形式，概念性的和政治性的占有，根本上只是历史学的话语而已”，那么“社会”就没法和一种散乱无章之物区分开来，而社会史就将消失。<sup>③</sup> 在实践层面，很大程度上，他的观点可能会破坏一般意义上大家所认知到的历史学研究事业。

对于当下的真实，我们可以凭借感官系统去感觉和体验。但是过去已经不复存在，它不像此刻环绕在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那样的“真实”，它也已经成为一个文本。文献是一些文本，经由它们我们能了解过去，在文献之外，除了其他的文本，并没有“真实”存在。哲学家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抱怨说：“历史学家一贯装模作样，好像他们的研究是在深入过去，好像他们的著作是‘关于’过去的，好像‘过去’就同他们所研究的文本一样真实”，他称这为一种

---

① 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II’, 还可以参看他的 ‘Dry Heat, Cool Reason: Historians under Siege in England and Franc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1 January 1992。

② Spiege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 197; ‘History, Historicism, and the Social Logic of the Text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Vol. 65 (1990), pp. 59 - 96.

③ Joyc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 208.

“天真的唯实主义”(naïve realism)。<sup>①</sup>而且,在原则上可以说,历史文献和历史学家自己写下的著作是没有区别的。读者和历史学家,对文献和历史学著作以差不多的方式注入了意义,否则意义就不存在了。所以,对一手材料和二手材料所做的区分就应该废止。而莫米里阿诺提出的,大部分的现代历史学研究所仰仗之一二手材料区分的原则,也应被抛弃。詹京斯曾经指责道,一手材料和二手材料的区分,“把原始材料的地位抬得太高了,把文献本身神圣化了,歪曲了研究历史的整个过程”<sup>②</sup>。所以,现在到了把它们丢弃的时候。

由此,詹京斯陈述道:“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我们不是在研究过去,而是在研究历史学家关于过去的建构,”他接着说,“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在过去的人们是否和我们拥有一样的本性,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而且也不值得争论。从这个角度说,过去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确定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时所抱持的那些预设。”因之,在他看来,“更有建设性的行动是深入到史家的内心之中,而不是深入到生活于过去的那些人之内心,严格说来,那些人只有通过历史学家的心灵才得以呈现”。<sup>③</sup>这个观点也得到了荷兰哲学家安克斯密特的响应,安克斯密特认为,史学观点的差异,并不能从研究的角度得到圆满的解释,实际上还不如说是一个风格的问题。历史学家之间观点的差异,在他看来根本上是基于美学的问题。他说:“内容是风格的一种派生物。”因此历史学家应该做的就是停止对过去的考察,而代之以思考过去在当下是以何种方式被塑造出来的。“历史学,”他又说,应该“再也不是对已经发生事情的重

---

① Hans Kellner, 'Introduction: Describing Redescriptions', in 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eds.),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pp. 2-30, 此处引自 p. 10。

② Jenkins, *Re-thinking*, pp. 47-48.

③ Jenkins, *Re-thinking*, p. 47.

建……而是对有关过去记忆的一场持续游戏。”<sup>①</sup>同样，詹京斯也说，如果坚持要求研习历史的学生更多地去关注历史本身，而不是史家研究历史的著作，那是错误的。“如果历史学就是诠释，如果历史学就是史家的著述，那么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才是对历史学究竟在做些什么的最合适的研究”，因为历史学本身只是一种话语，一种“凝固了的诠释”。<sup>②</sup> 历史学和历史编纂学是同一个东西，历史学的要点在于研究历史学家，而不是研究过去。

那么，一如某评论家马上指出的，史家惯常的对过去的关注，应该被一种更关注自我反观性(self-reflexivity)和文学性建构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学所取代。后现代历史学更关心的是，作为作者的历史学家如何建构他(她)的文本？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幻象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会如何对事实产生“可信的”感觉，对过去的实在产生逐步接近的感觉(也就是所谓的“真理效果”[truth-effect])？那就是说，历史学家并不是以很可靠的方式来获取过去，他们只是像小说家一样，仅做出样子而已。在文学研究里，我们并不会把简·奥斯汀(Jane Austen)在她小说里写到的人物和情节，当成是外在于她心灵的实际存在来研究，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对历史学家和他们写到的人物和情节，进行区别对待呢？

这种取向，遵循的是后现代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理路，在此理路中，相对一手(资料)而言，二手材料变得更加重要：人们常说，较之于研究莎士比亚本人，我们更应该研究的是对他的那些评论，因为某种对莎士比亚的解读和其他种的解读一样有用，莎士比亚的文本并不比那些对它的诠释更具有特定的优先性，所有这些都只是各种形式的话语，我们不能赋予其中某个话语以“特权”。在史学实

---

① Ankersmit,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p. 152, 144.

② Jenkins, *Re-thinking*, p. 34.

99 践中,反映以上问题的一个例证是女权主义史家戴内·帕基丝(Diane Purkiss)最近写成的著作《历史上的女巫》(*The Witch in History*),帕基丝明显打算拒绝回答那些“时人心中存有的那些经验性的问题”,因为“要界定女巫究竟是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她的目的在于,去“讲述,或者说重新讲述那些形形色色的关于女巫的故事”。资料太过零散,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法确切地说,为什么人们会相信有女巫。以往的学院派史家研究女巫的材料,是在一种幻觉的指引下,即他们能够说出关于女巫的有意义的或确定性的东西;帕基丝关注这些过往的研究,则希望去描绘女巫在他们这种“学术的自我时尚化”(academic self-fashioning)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她并不希望根据历史学家对巫术这种历史现象所做的经验性阐述和诠释,就来评估他们的优劣得失。

至此,在实践上,帕基丝确实持有关于所有这些东西被“组合起来的证据”(assembled evidence),就像她自己承认的。况且,在这种研究中,她不仅是执行那些和她所嘲弄的人一样的程序,她这么做也为了达到一种“完全经验性的目的”,而她在别的地方则指责这种概念。尽管她把有关经验性论断的历史怀疑论视为“雄性的”(masculine),把“经验的历史”之中“事实”的概念视作“男性的”(male),可这并不妨碍她批评某些女权主义史家关于女巫之本来就“未必确实存在的”(improbable)断语。在这里,她为自己僭取了一种怀疑论的权利,这种怀疑论权利是她否认男性能够拥有的——她所谓的一种性别的双重标准,如果存在的话,也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真相”的确是一种男性的概念,那么帕基丝从一开端就没法断定她自己所说的任何东西是“真”的。但我们暂时把这种矛盾抛开,帕基丝对女巫的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它拒绝把巫术的说法进行历史的、小说的和诗学的区分,较之关注女巫本身,它更关注诗歌、戏剧、历史文本和其他形式的二手材料中对女巫的描述。在帕基丝的著



作中,所有的这些文本,从莎士比亚到凯斯·托马斯,都被等量齐观。<sup>①</sup>

因此,循此路径,历史和小说之间就没有真正的差别。对海登·怀特来说,研究和写作一本历史著作,同写作一本小说没有什么差别。它们都包含了实际人类经验的各种要素,两者都需要与这种经验相符合,并且其呈现人类经验的方式也要满足相一致的要求。它们都需要运用语言作为呈现真实的工具。和小说家一样,怀特说,历史学家首先预想他们的考察领域,借助一些非常语言化和想象性的工具,来选择和估量其所使用的证据,这些工具同样也被用来构建结论性的叙述。<sup>②</sup> 这里我们必须提到怀特的一项敏锐观察,即在他的首部重要的著作《后设史学》里<sup>③</sup>,他考察了19世纪的一些伟大历史学家——诸如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发现他们的写作和同时代的许多小说家,比如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若是我们了解19世纪上半叶文学界所弥漫的现实主义之风,这种情形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怀特又进一步指出,不同的史家和小说家用以建构他们作品的文学和语言的形式,皆为同等有效的再现过去的方式。

故而,他继续说,对任何事件或过程,不会只有一个观点是正确的,应该有很多个正确的观点:

所有观点都在寻找自身的表现风格……当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历史视野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唯一能让我们选

① Diane Purkiss, *The Witch in History*, pp. 2-4, 59-63.

② White, *Metahistory*, pp. xi-xii, 5-7.

③ 该书有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陈新所译之中文本,唯书名改译为《元史学》。——译者注

择某一个,而不是别的,是道德的,或者美学的理由……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我们面对历史记录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记录本身中,是无法找到选取某种意义建构方式的理由……我们可以在不违背论据的规则和批判的标准前提下,来说出很多同样看似合理的、也可供选择的,甚至是相互龃龉的故事……我们可以想象出不止一种或是两种,而是任意多种……有关任何具有文化意义事件的故事,所有的都同样看似合理,同样地具有权威,只要它们符合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历史建构原则。

在此,怀特不仅否认了存在关于过去的客观性知识之可能性,他进一步认为,甚至连讨论这个话题都没有意义。因为作为历史表现的形式,每一个版本和别的版本,都是同样有效的封闭思想体系(尽管它有可能被以其他的方式判分)。两个描写同一主题的虚构叙述之间,并不能相互取代。我们没法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海登·怀特和他的追随者说,这同样适用于历史叙述。<sup>①</sup> 海登·怀特声称:“没有任何已经设定好的或按顺序发生的真实事件,在本质上就是悲剧的、喜剧的、闹剧的或是别的什么”,事件只能由历史学家“如此建构”。<sup>②</sup> 而历史学家是受到文学表现的有限可能之制约的,史家只能依照这个或者那个模式去建构事件,且循照极为短暂的一些隐喻和情节的形式。换句话说,文学性的模式建构了我们的诠释,而不是从材料之中冒出诠释,再发现一个契合论证的真实和材料的真实之文学表现形式。

在所有这些理论化的研究里,历史事实或多或少已经从我们的

---

① Somekawa and Smith, 'Theorizing', p. 50.

②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pp. 44 - 47.

视野里消失了。历史研究仰赖的一手和二手材料的区分,亦被抛弃。历史学家成为和撒谎者一样的作家,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分析的对象。历史与小说之间的鸿沟消失了。历史学和历史编纂学、历史书写与历史理论之间的分界线,也被擦去了。尽管这种思想能够带给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非常有益的机遇,但毫无疑问,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对历史论断的传统形式带有敌意。我们现在将要说明的问题是,他们的观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经得起严格的检验。

## 第四章 材料和话语

—

103 相信历史学家在解释历史时具有不可限制的权力,这是来自后现代理论的观点,诚如思想史家大卫·哈兰所认为的,一个历史文本,不再被认为彻底是由作者预设的那样,具有固定的、不可更改的意义。可值得怀疑的是,在实践上,是否真有人会相信文本之意义可以以这种方式固定。任何一个出版过书的和读过对该书书评的人,都会意识到对一个文本,完全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诠释。就评论者而言,其中一些评论——其动机或是出自预谋、粗心,或是仅因愚蠢——难免会同作者预设的诠释离题万里。认识到文本所具有的多重意义,以及它们之于作者意图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这在历史学家那里早已司空见惯。历史专业中最为传统的分支——外交史,极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对外交文献模棱两可之分析上——并非

104 所有的模棱两可都是刻意为之——而且,因一个条约或一份协议中能够,且往往可以,被不同国家以不同方式加以诠释,对这种可能性甚至是可行性的认识,已经成为了外交史分析中的重头戏。研究政治史的史家一直知道,一个政治家所做的演讲,经常会带来与其本意相悖的效果。史家也经常清楚意识到,政治家常常不能将其意思

清楚地传达给听众,结果会造成如大卫·哈兰描述的,所谓后结构主义典范(post-structuralist paradigm)——“不受制约的文本,喷发出多面向的符指(significations)、言外之意(connotations)、暗喻(implications)。”<sup>①</sup>

历史文献使用的语言从来不是透明的,历史学家早就意识到,不可能仅靠语言,就能洞察其背后的历史真实。历史学家知道,他们也总是知道,我们只能“通过一个灰暗的望远镜”(through a glass, darkly)来察看过去,这点无待后现代主义的提醒。后现代主义所做的,就是将这些关于历史文本及材料的透明性或模糊性之类我们熟知的见解,置于一种二元对立和非此即彼的极端局面之下。就一个具有想象力的历史学家而言,他相信文本所使用之语言是通向作者心灵的透明之窗,但会反对这个同样是不真实的说法——文本作者与一个文本的内容根本无涉。例如法国理论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即认为,由于“读者从写作行动中缺席,而作者从阅读行动中缺席……文本因是制造出对读者和作者的一个双重遮蔽”<sup>②</sup>。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文本总是为某个读者群而写,文本要受到这样的掣肘,即作者怀有他所期待的读者会如何接受文本这样的设想,作者是据此来书写文本的。不约而同,读者在阅读行动中也总是会留心作者在文本中设定的用意与目的。甚或当人们阅读一个并非为他们——比如像历史学家这样的人——量身定做的文本之时,这种情形在事实上也是千真万确的。

例如,当我们阅读一个来自1860年代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

① Harl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 585.

② 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1981), p. 146, 转引自 Harl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 587。关于保罗·利科对海德·怀特的批判,参看氏著 *The Reality of the Historical Past* (Milwaukee, 1984), pp. 33-34。

erston)致普鲁士外相的外交公文之时,我们会对作者和读者了然于胸,否则便是不明智的。我们意识到这个事实,普鲁士外相对此份外交公文的理解,与帕默斯顿勋爵在文本中所设想的意思,会略有出入。所以要去理解这个文本,我们必须知道这两位作者暨读者之间往还的其余文本,还需要了解文本赖以运作的政治与外交语境,这就得阅读更多的文本,才能获得相关知识。进而,我们已经了解了1860—1870年代德国统一过程中,发生在英普之间的事情(英普关系在恶化),在一个更广阔的意义上,我们也知道从德国统一到20世纪中叶英德之间发生的事情(两次世界大战是顶峰)。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根据以上这些认知来阅读这份公文,尽管该公文被撰写时,其作者不仅没有通晓这些后续事件的知识,也完全没有意识到在文本写成后几周内、几月内要发生之事,即或帕默斯顿明显有一些预期,他希望这个公文写成之后将导致某些事情发生。在这个意义上,事情并无什么不同,就算我们能把这两位绅士通过魔法带到我们面前,严刑拷打逼问他们对公文确切意涵的看法:我们仍然会去阅读相关的文献,以了解这个公文,并做好充足准备去提出敏锐的问题。即便他们两人亦洞悉后来的事态发展,我们仍旧不能轻信他们给出的答案,因为,谁会对外交家和政治家的言辞深信不疑呢?

106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很清楚知道不可能仅靠阅读它,就能复原关于这个公文的一个简单的、不可更改的“真”(true)意思。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将我们所期待的意义强加于一个文本。我们受其所用词汇的杯葛,与后现代主义者的意见相反,词汇并不具有无限多的意指。而且,文本语言对诠释可能性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是由文本的原作者设定好的。这里,后现代理论家非常不切实际。犹似多梅内克·拉卡普拉的尖锐评论,他认为事实是,历史研究乃两种符指之间的对话——历史学家的与文献的,“历史学家进入了一种同过去及其他正试图理解过去的询问者之间进行‘协商’(conversa-

tional) 交流的场景”。历史学家不得不“仔细聆听关于过去的那些可能是令人尴尬的‘声音’(voices),而非将自以为是的或有利于己的要求加诸其上”。故此,在任何历史著作里,事实上都存在着多元的声音,历史学家可能也在利用其中一些。<sup>①</sup> 此种情况在罗依·波特(Roy Porter)对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描述中亦可见一斑:

吉本通过揭示偏见的方式来处理它,通过展现他所用材料中的成见,表现而非压制这位“罗马帝国的御用史家”(the historian of the Roman Empire)之个性<sup>②</sup>。不偏不倚并非来自于对事实的崇拜,而是来自思想的运作,来自吉本的分析、想象、睿智,以及他判断悬而未决问题的能力。吉本之“杰作”读起来像万籁俱响。让当时之人说话,吉本在资料里对之评头论足,再补充以注释,还经常会在注释中对其进行谴责。于是读者乃能被邀请去聆听和参与这场思想盛宴。<sup>③</sup>

阅读任何一本历史著作,都需要介入这样的行动——聆听透过文本发出的万籁之音。 107

后现代评论家已然公开宣称,和其自身形成悬殊差别的是,历史学家采取了一种全知者的(omniscient)立场,用学术语言向读者暗示其所传达的知识是中性的、客观的,且是来自一种先验的材料,而非与史家个人之目的相关。因此,他们声称他们已经成功警告了

---

① Dominick LaCapra,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Texts, Contexts, Language*, pp. 34–36, 40.

② 此“御用史家”即指吉本,他对罗马帝国史情有独钟,且《罗马帝国衰亡史》取得的成就斐然。——译者注

③ 转引自 Roy Porter, *Gibbon: Making History* (London, 1988), p. 163.

“容易受骗上当的大众及同类读者，提醒他们认识到历史学家的不同立场是如何呈现在他们的著作中的”<sup>①</sup>。可这些历史书籍的读者——不管他们是否为专业人士，总是这么“容易受骗上当”吗？事实并非如此，读者不是那么容易受骗，以致对历史学家所写作的任何东西都囫圇吞枣，好像它们就是绝对真理。太多的评论家——后现代主义者与其同侪，对那些阅读历史著作人的世故程度和其挑剔的鉴别力，似乎太闭目塞听而致估计不足。正像罗依·波特的评论，“在当今如此之多的历史书写中，读者像是失踪者，很可能是因为学院派史家大都失去了为大众写作的意识”<sup>②</sup>。更不必说历史编纂学的研究者，他们很少停下来思考他们的工作是如何进行的，或者更甚的是，他们很少停下来去思考历史学家正在书写的著作在实际上是怎么为读者阅读的。

事实上，没有一个读者在阅读历史书籍时，会天真地相信书中所言的一切。后现代主义这样说是对的，读者会把他们自己的预判、信仰和目标带入读史之中。然而，关键在于这些因素没有彻底地左右读者之阅读，更大程度上其阅读活动还是囿于作者预设之目的。阅读是一个读者和作者之间互动的过程，其中任何一方都非必然或必须处于宰制地位。进一步说，大体上，历史学家没有担保他们所说的每件事都是**绝对地**真实；相反，历史学家使用的常规语言，一直是非常准确地描述关于他们所说事实之不同程度的确定性与可能性。不仅是“或许”（probably）和“多半”（perhaps）会相当经常地出现在历史著作中，现实中小心翼翼的历史学家也利用大量文体上的设计，去暗示其论证力量之相对强弱程度，去暗示其所得出的结论是临时性的或是确定性的。也有例外，当一位像泰勒（A. J. P.

① Appleby, Hunt and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pp. 245 - 246.

② 转引自 Porter, *Gibbon*, p. 163。



Taylor)这样的历史学家,对于复杂的历史问题,做出一些他喜欢称之为“快刀斩乱麻似的判断”(snap judgments),提出一些看起来是武断的结论,不言而喻,这是泰勒想刺激读者去深入思考相关主题,而不是威吓他们,让他们相信他正在讲述关于那个主题的绝对真理。

通过清楚地表述他们自己的先入之见与意旨,历史学家常常试图向读者提供逆作者之志阅读他们著作的知识。再者,在教大学生和研究生时,大学中的历史学家之首要目标是让学生在对待其所读的书与文章(包括这些历史学家自己的)时,采取一个严格的和质疑的态度。(否则,对一个历史学家而言,教书又有什么价值?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历史学家会在其书前言中承认,他们的学生在迫使他们再思考及再形成其论断上所发挥的关键性贡献?)一个后现代主义作家伯韦利·索斯盖特(Beverley Southgate)声言,作为探求过去真相的“传统”历史研究模式,意味着“历史系的学生将会被这样教育,不要去质疑太多既有的信条,而是要去遵守之”。这与事实大相逕隔,我们可能会疑惑,索斯盖特在其任教的希佛谢尔(Hertfordshire)大学历史系的同事们,是否会认为他们的教学方法符合这个描述?当然不是的。<sup>①</sup>

历史书写,还有历史教学,重视传达阐释的暂时性与不确定性,以及需要对方便用作阐释证据的材料,不断进行检验。这就是为什么这样做是重要的:即不要将所发生之事与我们如何发现它混为一谈。帕特里克·乔伊斯可能断言“过去的事件、结构与过程,与文献再现这些情况的形式、概念与政治挪用的形式、建构它们的历史话语不可区分”<sup>②</sup>。但这明显不是真相。话语并不建构过去本身,最多

---

① Southgate, *History*, p. 8.

② Joyc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 208.

可以说话语建构了我们想要表现过去的试图。乔伊斯在一本书里作茧自缚,使他自己的一些理论声明陷入尴尬,这本书正出版于他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与劳伦斯·斯通展开论战的时候。尽管在其著作里,他赞成一个“社会秩序的符号学”(semiology of the social order),乔伊斯仍注意到“社会秩序的概念与这样的一些企图有关,把秩序与舒适带给有贫穷、危险和劳苦经历的人们”<sup>①</sup>。可是,无论乔伊斯这里如何诠释“经历”这个概念,贫穷在物质上都是真实存在的,其意涵是足够清楚明白的。乔伊斯的确强调他的信仰,恰如他在书中表达的,处于过去之中的话语建构了认知,“仅因为他们表达了听众的需要与渴望”<sup>②</sup>。

110 正像乔伊斯本人的历史著述所揭示的,历史学家的声音是重要的,但历史学家正在试图传达的过去之声音同样重要。如凯斯·詹京斯所言,毋庸置疑,大多数中学生与大学生,几乎毫无例外,都是通过阅读二手文献来学习历史的。<sup>③</sup>这是无关历史知识之性质的意见,其相关之处在于,首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从过去留下的断编残简中重建过去,或者换言之,历史研究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第一

---

① Patrick Joyce, *Visions of the People: Industrial England and the Question of Class, 1848 - 1914* (Cambridge, 1991), pp. 17, 330, 338, 转引自 Spiege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 202。

② Joyce, *Visions*, p. 338, 转引自 Joyce, 'The imaginary discontents of social history', p. 81。乔伊斯后来批评他自己的书“对社会大众与下层‘经验’患有乡愁”,故此,其著采用了比较僵化的话语决定论立场。参看氏著 *Democratic Subjects: The Self and the Social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1994), pp. 11 - 12。又可参看 Joan W. Scott, 'The evidence of experience', *Critical Inquiry*, Vol. 17 (1991), pp. 773 - 797, 以及 David Mayfield and Susan Thorne, 'Reply to "The poverty of protest" and "The imaginary discontents"', p. 221。

③ Jenkins, *Re-thinking*, p. 42。然而,近些年,各个层次的历史教学中,在引用或摘录中,使用原始文献变得更重要了,此种进步让人称许。

手材料。在很大程度上,这确定是真的,我们在用同一种程序来阅读第二手材料,正像我们在阅读第一手资料时所采取的程序:我们会追问是谁写下的文献?他(她)为什么写?文献是写给谁的?为什么要写给此人?我们会核查该文献内部的连贯性,以及它与有关同样主题的文献之连贯性,若是它包含了来自别处材料的信息,我们会探查此信息出自哪里,我们也会倾尽所能去刨根问底。但这并不意味着使用同一程序处理的**客体**——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在性质上亦是相同。

将过去称之为“文本”,这当然是在用一个隐喻,不是在试图描述。<sup>①</sup>过去远非是一个文本,试图将之作为文本来解读,只能是瞎子摸象,仅能感受一小部分真实。社会与政治事件也不雷同于文学文本,加布瑞利·斯皮格曾声言:“没有一个历史学家,甚至是最讲实证的史家,会认为历史不可能以文本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sup>②</sup>在别处,她也曾谈到“所有历史文献的文学性质”<sup>③</sup>。历史学家的材料与一个文学文本并不相同,它不必,事实上也不是对一个事件的描述,或对一个思想状态的描述,或对一个故事的描述。从蒙森使用古罗马留下的碑文,到兰克学派对外交文献的解析,从历史计量学学者大量利用教会的出生、婚姻和死亡记录,到研究中世纪的专家对土地制度、建筑与考古遗迹的调查,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就被训练去处

111

① Hayden White, 'New Historicism: A Comment', in H. A. Veenser (ed.), *The New Historicism* (London, 1989), pp. 293 - 302, 此处见 p. 297。但怀特这里把“历史是个文本”(History is a text)当作一个修辞用时,他在清楚地说历史是作为一种关于过去的书面再现(a written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而非指过去自身。这与再现是否真实,完全是两码事。

② Spiegel, 'History, Historicism, and the Social Logic of the Text in the Middle Ages', p. 76.

③ Spiege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 207, n. 31.

理材料,他们并不直接讲述一个关于其自身的故事,或报告一个甚至到最近才发生的事件。进而,广播、电影、录像放映机、摄像机、电脑、影印机、缩微胶卷、传真机、电子数据库(electronic databases)、因特网和全球宽带联网(World-Wide Web),对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都是一种新形式的资料来源,尽管其中大部分资料会遗失。如约翰·文森特所认为的,因为作为一种联系形式的书写文字正处在衰落中,历史也会与之俱亡,这是很愚蠢的臆测。<sup>①</sup>

通过显示历史研究像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一样,要依赖于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和编排,这样的文本隐喻对历史学的讨论没有什么帮助。即或历史学家的材料是用文字写成的,它们与任何形式的文学在样貌上也都相去甚远。它们可能是一系列统计数字组成的谷物价格,或犯罪案件;它们可能是一长串属于这个或那个组织的名单;它们可能是雕刻在古罗马墙壁上简单的碑文或涂鸦。文学分析中的惯用工具在处理这些材料时没有多少用处。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不会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材料就是过去真实的直接反映。就像马克·孟莫尼尔(Mark Monmonier)在他那本有趣的小册子《如何用地图撒谎》(*How to Lie with Maps*)里点出的,地图可以骗人。<sup>②</sup> 数字与

---

① Vincent,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p. 8. 然而,文森特也批评他自己有“文献拜物化”症。他赞同地引用泰勒(A. J. P. Taylor)的信念,认为在一些未出版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不了新秘密。文森特本人又提倡要比以往更关注报刊,声称这些新闻纸会是“明日的威尼斯档案”(the Venetian archive of tomorrow)。然而,泰勒讨厌使用手稿资料,太过依赖印刷材料,其实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他最大弱点之一。文森特钟情于报纸作为获取信息的公正来源,大概是颇具个人色彩的论述,因为他曾多年为《太阳报》撰写专栏,直到他所在大学的学生以示威的方式迫使他搁笔为止——这一事件本身无论多么可悲(deplorable),但可以说,如果该专栏真是公正的典范的话,这样的抗议事件多半不会发生的(Vincent,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pp. 9-10)。

② Mark Monmonier, *How to Lie with Maps* (Chicago, 1991).

图表也会。好似图像材料、统计数字与人名清单是由怀有特别目的的人们制作出来的,用来收集过去这些数据的方法,往往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的和不确定的。但这只是在说,史家必须以其抱持的习惯性的怀疑主义态度对待它们——这种怀疑主义态度也是史家在对待常规文字材料时所具有的,此外,同类的材料鉴别方法亦适用于它们。

## 二

一些后现代作者声言,对历史学家来说,他们不可能让过去“代表自己发言”(speak for itself),因为假如过去要自己表达自己,它将不得不重演一次(re-enact)。<sup>①</sup> 此断言貌似建立在这个信仰上:当你和我都在设想我们能在演讲或书写中表达自己之时,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做,只是生产出一套武断的词汇,而这与我们自己全然无决定性的关系。然而,即便我们在人生路上一直都在发展,甚或可能“再造”(re-invent)我们的身份;即便我们不是一个单一的(unitary)自我,而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自我;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依然可能在我们的表达中发现某些一致性。的确,大多数人,除非他们是政治家,都会花费心力去确定他们是在以一种合理的一致性而非矛盾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我们的确会将一些意义赋予我们的言词中,而这个意义与我们的生活和经历有着真实的关系,若是我们不能在现实中做到这点,生活将会举步维艰。

语言和语法在实际中并非完全是任意的符指,在人们试图为真实之物命名之时,它们与真实世界才发生联系。相似地,历史话语或诠释也是在人们试图重建真实的历史世界时,他们与真实的历史

<sup>①</sup>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p. 30.

世界才发生联系。不同之处在于,这个联系是不直接的,因为真实的历史世界已经不可挽回地消失在过去的时空之中,它只有借助我们阅读过去存留下的文献及断编残简才能得以被重建。然而,这些重建绝非任意编配的话语,而是在一个相当直接的与过去之现实发生联系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总言之,语言绝非纯粹自给自足的。经验告诉我们,它可以在人类意识与其所占据的世界之间折冲樽俎,恰如海登·怀特在1975年就注意到的那样。<sup>①</sup> 假若语言不能为我们描述和传达过去的信息,那么我们根本就不能知道过去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因之,承认过去的存在不依赖于文本,这意味着我们认可语言能够描述外在于其自身的东西。内容不是风格的派生物:它能用许多不同的风格来精确描述同一个事情,正如我们同样做出一个周到和公正的描述,而根本无需误入歧途地模仿吉本分析基督教崛起原因时,采用的文学风格。<sup>②</sup>

进一步说,诸如詹京斯或安克斯密特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大约都希望让人相信,他在著作中是在用协调的与理性的方式表达他自己的信念,即或在实际上并不总是如此。如今,于原则上,以下两种情况并无真正差别:我1997年读到詹京斯1995年在他的一本书里写的东西,和我1997年读到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1532年在一封信中所写的东西。他们都是在过去书写了这两个文本,即便亨利八世的过去比詹京斯的过去在时间上更为遥远。他们都希望以某种方式表达出关系到自身生活的一个或一些意义。当亨利八世用“我对你的至爱”这样的话写信给安·波琳(Ann Boleyn)之时<sup>③</sup>,他不必为

---

① Hayden White, 'The Problem of Change in Literary History',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7 (1975), p. 109.

② Zagorin, 'Reconsiderations', p. 171.

③ Henry VIII to Ann Boleyn, Letter No. 2, in C. H. Williams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785 - 1558* (London, 1971), p. 700.

了表达自己,而亲自再来表现一次这种至爱,尽管他很可能非常想这么做。与之类似,詹京斯说“他的新书主要是为研究生、大学生及他们的老师(尽管很明显也不排斥别的群体)提供的”,但他不必将这些人的召集在一起,向他们高谈阔论,以给机会让他们理解其所谓的事实。换言之,若是把詹京斯的《论“历史是什么?”》(*On 'What is History?'*)一书当作一个历史文本,像詹京斯所言,因为过去——在该书问世的1995年——不能表达它自己,所以我们便不能理解他在书中的意思,这显然不是事实。

114

这里,后现代主义者遇到一个理论上的吊诡。他们原认为所有的文本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比方,在第一手和第二手材料之间,不存在差别;在亨利八世的信或詹京斯的那本书,以及后来别人关于这两个文献的评述之间,例如,斯卡里布瑞克(J. J. Scarisbrick)关于亨利八世的经典传记,或者在你所读到的这几页里我自己对詹京斯的描述,亦没有差别。然而,在某人所书写的和别人对其书写所做的评述之间,存在一个真实的差别。我很愿意别人认为我在这些页里充分和公正地引述了詹京斯的观点,并且严谨地再现了他的看法。可是,如果他想去核查这在实际上是否属实,那么他确定是要返回到詹京斯的著作本身,而非别人关于它的描述。此处生效的这个原则,在面对亨利八世的信函以及后来某个传记里对它之评述的个案时,一样行之有效。

同一种矛盾亦见之詹京斯对加布瑞利·斯皮格的这个观点进行的评析当中,斯皮格的观点是:“那些文字符号之物质性的消失,意味着历史学的消失。”<sup>①</sup>根据詹京斯的意见,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学从来没有依赖过任何一个文字符号,其物质性也并没有消失,因为所有的符号根本就是非物质性的。就詹京斯来说,借称之为“意

---

① Spiege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 195.

识形态与神秘化”的产物来抨击斯皮格的立场,此种做法是不真诚的,因为詹京斯自己曾公开宣布,所有的东西(*everything*)都是意识形态,这意味着他自己的立场同样也是意识形态的。<sup>①</sup> 故而,为什么我们应该接受其劝诱,“质疑”那些与他不一致的人之“动机”? 而不是同样也去质疑他自己的动机? 这里的关键之处不仅在于诸如詹京斯这样的后现代作者之失败,他们未能遵循他们一直在热切提倡的要别人信奉的论断。他们在方式上也存在问题,后现代主义者从其信条(在此是指非物质性的符号)库中拿出一个未经证实的判断,并严厉斥责其对手没有将后现代主义者所接受的这个判断作为立论之基础。如果我们相信这些符号——字词、语言、概念、观点、书籍——它们与物质的现实确实存有关系,那么斯皮格的担心就不是杞人忧天了。

由于过去不断在制造它自己的物质遗存,一些人认为:“过去能而且确实可以束缚那些试图想发现其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人”,尽管那些遗存从来不能真正代表自己发言。阿普尔比、亨特和雅各布等教授有保留地捍卫了历史学家的信仰——即对过去真实的追求与存在重建它的可能性之信仰,可她们拒绝这样的理念,过去能通过它的遗存将其真实传递给历史学家。她们更愿意相信,制约史家进行可能的多样性之诠释,端赖于“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存在,其“主要任务就是重建、诠释和保存过去留下的遗迹”,继而在如此行动中,使得“一套复杂的规则”得以运作。无疑,过去以一种基本的方式,通过材料来传达过去的真实。在最基本的层次上,人们不能把本不属于文献的意思读到文献中去。此外,将客观性标准奠基于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之上,这是极端危险的。毕竟,1920年代在德国就有一个学术共同体存在,于希特勒第三帝国时期,它在人事与意识

---

① Jenkins, *Re-thinking*, p. 19.



形态上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今日的学者一般都认为,这个学术共同体在研究德国的过去时,其所赖以运作的那套规则,存在严重的问题,它提供的历史诠释极度颠倒黑白。假如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规则本身出了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得承认:好的规则是超越学术共同体的,并不依仗学术共同体对之的认可才存在。<sup>①</sup> 那些好的规则或许包含非常基本的格言,比如,不要去窜改文献,不要遗漏或压制不利于自己论断或意图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文献自身确实有其完整性,他们确实能“代表自己发言”。过去之事实经由文献加给历史学家的羁绊,并非只具有负面意义。犹似 E. P. 汤普逊曾经之言,那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不得不一直在聆听……假若他做到了,那么材料将会借由他说话”<sup>②</sup>。

### 三

这些主题与其他相关主题,很棘手地展现在 1980 年代美国历史学界发生的所谓阿伯拉罕事件(Abraham affair)上。当一个年轻的美国历史学教授大卫·阿伯拉罕(David Abraham)的《魏玛共和国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一书在 1981 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评论者都赞扬其原创性,同时发现它的结构马克思主义方法非常简单。实际上,我想该书的关键论断如此抽象,以致其根本不可能在实践中被验证,因为此书循照的是一套严格说来并非历史的规则与惯例,最好把它看作是一

---

① Appleby, Hunt and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pp. 254 - 256. 同样的观点,参看 Somekawa and Smith, 'Theorizing', pp. 156 - 157.

② Henry Abelove et al. (eds.), *Visions of History* (New York, 1978), p. 14.

117 个政治科学的著作，而非历史学作品。<sup>①</sup> 其他更为专业的评论者则以一种相当不同的方式来严格评价此书。尤其是，那个保守的又公开自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历史学家亨利·阿沙比·特纳(Henry Ashby Turner)，其本人亦曾处理过同样的材料，他公开表达意见，指控阿伯拉罕刻意杜撰和歪曲档案材料，以贬损德国的资本主义，同时抨击阿伯拉罕认为德国资本主义应该为魏玛共和国之崩溃负责的观点。受到这些指控的威慑，阿伯拉罕重新检视他所使用的档案材料，再回复特纳，承认他犯了一些细小的错误，但拒绝接受特纳那些主要的指控。<sup>②</sup>

在这节骨眼上，另一个研究魏玛共和时期大企业史的美国专家杰拉德·弗利德曼(Gerald Feldman)，亦参与了这场更进一步发展的指控。弗利德曼起初还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荐了阿伯拉罕这本书，尽管他曾说该书中的许多错误应该被纠正。在知道了特纳的指控后，弗利德曼也知道了一个研究生尤尔利希·诺肯(Ulrich Nocken)的评论，该研究生已经核对了阿伯拉罕书中的所有引文，他报告说，书中存在大量性质恶劣的错误，包括对好像是直接引自原始文献的那些不准确转述，误注信件与文献出处，以及错译、曲解、虚构和篡改材料。这让弗利德曼相信他原先是错误的——他判定阿伯拉罕的学术忠诚可以信赖，乃是因为其已经被授予博士学位。

---

① Richard J. Evans, 'From Hitler to Bismarck: Third Reich and Kaiserreich in Recent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Journal*, Vol. 26 (1983), pp. 485 - 497 和 pp. 999 - 1020, 重刊于同一作者的, *Rethinking German History: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87), pp. 55 - 92, 引文见 pp. 77 - 79。

② Henry Ashby Turn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7 (1982 - 30), pp. 739 - 741, 以及附有阿伯拉罕回应的一封信, 刊于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8 (1983), pp. 1143 - 1149。

仿佛是为了亡羊补牢——弥补他先前上当推荐此书出版的过错,弗利德曼开始发起一场猛烈的围剿,在围剿中,非常多的德国近现代史专家,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收到通知,通知中展示了阿伯拉罕一书中林林总总的错误,还宣示说阿伯拉罕不适合成为这个学术共同体的一员。阿伯拉罕报以有力的自我捍卫,他游说大西洋两岸的德国史研究同仁支持他。但面对弗利德曼发起的这个战役,包括弗利德曼向那些考虑给阿伯拉罕助理教授职位的大学邮寄谴责信和打电话,最终阿伯拉罕的游说活动没有产生效果。由于弗利德曼始终不懈的反对,阿伯拉罕被驱除出历史学界,转行进入法学院,在这里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并再度受聘于大学中的教职,这次是一个法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因为他身处其间的这个学科,比起历史学来,可能更适合对证据进行操纵和做出别有用心诠释吧。<sup>①</sup>

这个事件除了有关参加者的职业道德之外,引出了三个关键问题。首先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关系。海登·怀特的这个意见是对的吗?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无法借助‘史实’被证明或被证伪。因为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之间的争议恰恰是,什么可以作为证据?什么不被认为是证据?”<sup>②</sup>或者如阿伯拉罕的支持者坚信的,是这样一个图谋:就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政治原因,试图通过贬损阿伯拉罕的学术来无端诽谤阿伯拉罕。在反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对文献的诠释是否必然就是荒诞不经?特纳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确凿无疑,需要注意的是,他那时也将要出版一本大著《大企业希

---

① 有关弗利德曼与阿伯拉罕之间的争论,大量材料最后刊发在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17 (1984), pp. 159 - 293。其中,阿伯拉罕向读者特别展示了过去两年中的许多幕后折冲,某种程度上颇令该杂志主编尴尬。

② White, *Metahistory*, p. 284.

特勒的崛起》(*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该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大资本家促成希特勒上台这个观点,构成极大冲击。另一方面,特纳又公开对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表示敬意,特别是狄姆·梅森(Tim Mason),特纳认为梅森的学术非常正宗。梅森自己也发表文章刻意与阿伯拉罕保持距离,同时公开赞赏在历史研究中史实准确的重要性。<sup>①</sup>而弗利德曼也曾慷慨赞扬“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新马克思主义史学”,他也绝不能被视为反马克思主义者。<sup>②</sup>因之,这场争论不能被缩小为一个政治立场的不一致问题,它是一场有关史实及其用处的争论。

这场争论引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事实与诠释之间的关系。阿伯拉罕的支持者声称阿伯拉罕细枝末节的错误无伤于其整体的诠释。确实,当阿伯拉罕重新查阅档案、核对资料之后,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修订本”,其中只有那些引文、出处、脚注、参考文献,以及别的一些细节被修订,他并没有改变或改进他整个诠释的任何一个方面。<sup>③</sup>第二版的批评者能够重点指出,引文和大量材料在许多要点上面,不能支撑阿伯拉罕所得出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从来就没有支持过。阿伯拉罕的魏玛共和国时代平均地产业与

---

① Tim Mason, 信件刊载于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8 (1983), p. 1146。

② Gerald D. Feldman, 'A Collapse in Weimar Scholarship',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17 (1984), pp. 159 - 177, 引文见 p. 176。又可参看 Ulrich Nocken, 'Weimarer Geschichte(n)',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Wirtschaftsgeschichte*, Vol. 71 (1984), pp. 505 - 527, 但他这里举引了一大批鸡毛蒜皮似的错误,就无法将导致争执的主要问题从中让人满意地区分开来。

③ David Abraham,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2nd edn., New York, 1986). 这一版仍然包含很多错误,因为阿伯拉罕不能重看那些存在于共产主义东德的档案,之前他在那里搜集了大量的文献,所以他重复了在初稿和注释中已经犯下的错误。

工业大亨相互对立的分析框架,是直接袭用自希腊裔的法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尼科斯·勃兰提斯(Nicos Poulantzas),阿伯拉罕好像只搜集符合这一框架的档案,以之当作立论的“证据”。当它与阿伯拉罕自己坦白的其拙劣的研究技巧及过度的草率相结合时,这便在许多例子上,导致了支持他之论断的误读产生;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做法实际是超越了原来的框架,而归顺了那个旧的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大资本家是纳粹的直接支持者,而非仅是间接的支持者。吊诡的是,这个理论,正是他声言要去超越的。

这又导致了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证据是否重要,以及借助证据,历史诠释所具有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问题。在他书中的一个关键点上,阿伯拉罕引用了一个德国大工业家在1930年代早期写的一封私人信函,他希望用此信“去具体而微地表明资产阶级右派和纳粹党已经沆瀣一气”,这是一个支撑他整个诠释的完美陈述。然而,阿伯拉罕引用的那个原始文献被弗利德曼细心核对了,它包含有那个关键词“不”(not),所以那个文献实际说的与阿伯拉罕认定它所说的,恰恰是相反的意思,这样的话,当然有悖于阿伯拉罕的这个一般性论断。<sup>①</sup> 有无数的例子,像弗利德曼明示的那样,阿伯拉罕借以下手段来虚构证据,即通过从其研究笔记里提供补充或注释,将之作为实际证据的一部分。阿伯拉罕确实承认在阅读档案时,他在笔记里没有明确将抄自原始文献里的引文加上引号,以至于他常常不能将这些引文从他自己对同样文献所做的概要(像以后所证明的,往往非常具有倾向性)中区分开。所以,他经常引用后者,好似后者就是前者那些原始引文。这本书破绽如此百出,以致阿伯拉罕自己也很快指出,其中一些已经与其提出的

---

<sup>①</sup> Feldman, 'A Collapse', p. 165.

论断大异其趣。<sup>①</sup> 阿伯拉罕很难去和弗利德曼的这个结论抗辩,这些错误的一般趋势,是“夸大了工业所扮演的罪恶角色,也过度戏剧化了它的权力与自我承诺,而且还做出了一些远远超过证据所能允许的论断”<sup>②</sup>。

阿伯拉罕在自我辩护中写道,当他完成他的研究后,他发现在其最初的假设与他找到的证据之间,仿佛有“一个恰到好处的匹配”(an exemplary fit)。<sup>③</sup> 但每一个实证史家都知道它是多么地不般配。一个严肃的历史研究者的首要前提在于,在面对史实之反对时,他必须有能力舍弃那些他曾热情抱有的诠释。若是一个来自工业家的信函说他不想让资产阶级右派与纳粹分子同流合污,那么将没有任何理论性的描述可以更改这一事实,而且根本没有转圜的空间。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历史学家正在绞尽脑汁想出一些理念施加给证据,而当这些理念并不契合证据之时,史家便会对之弃若敝屣。与论断相反的证据不能被忽略或歪曲,而是应该对其加以解释,即便其代价是要修正原有的论断,或彻底放弃它。许多历史学家和评论家都高度评价这一点。故而,当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克里斯多弗·希尔在他一本书的前言里声明:“我正在提出一个有争论性的命题……我挑选的看起来是支持我论点的证据。”他的批评者赫克斯特(J. H. Hexter)恰如其分地评论道:“远非仅是找寻支持他所提出命题的证据那样简单,他(也就是那个史家赫克斯特)需要找寻那个命题中的弱点,并设计出一些检测它们的手段。然后,依靠发现的证据,他可以支持这个主题,加强其瘦弱之处,或更改它以消除其

---

① David Abraham, 'A Reply to Gerald Feldma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17 (1984), pp. 178-245, 引文见 p. 184。

② Feldman, 'A Collapse', p. 169.

③ Abraham, 'A Reply', p. 186.

弱点。”<sup>①</sup>很明显,阿伯拉罕没有服从这个基本的程序。

我本人的看法是,虽然阿伯拉罕不是有意伪造证据,但他对证据的态度非常漫不经心,其程度远非严肃的历史研究工作所能容忍,或者,实际上超过任何一种历史研究工作所能容忍的范围。而且,他还潜意识地(*subconsciously*)加工其在研究笔记中收集到的证据,以迎合他之前设计出的那个诠释框架。这并不是一个中年的“事实崇拜者”(fact fetishists)对抗年轻的“历史想象力”的拥护者之问题,犹如阿伯拉罕的强硬支持者所声称的那样。在他的书里,以及在他对弗利德曼的回应中,阿伯拉罕令人苦恼地证明,他没有能力在事实与虚构之间进行区隔。故此,恰如阿伯拉罕和像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这样的支持者所暗示的,这不是一个理论史家与实证史家之间关于方法论的争吵,在争吵中,那些“客观主义者”证明了他们持续地和暗含怨毒地,以及愚蠢地对美国历史学职业的操控。<sup>②</sup>阿伯拉罕与其支持者坚称,任何一本历史著作,假若也经历一番像阿伯拉罕此著那样严密的核查,那么该书中被发现的错误,将会与阿书中的问题不相上下。比如,劳伦斯·斯通即曾说:

---

① Hexter, *On Historians*, pp. 243, 250 - 251, 转引自 Christopher Hill,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xford, 1965), p. vii. 赫克斯特为了使他自己对希尔的批评在证据上有说服力,却在论证上重蹈了希尔的覆辙。赫克斯特批评希尔把多样化的历史族群,“聚合”(lumping)为一小批粗糙的且过于简单化的分类,但接着,赫克斯特却把所有的历史学家“聚合”为两个相当粗率的分类中:可想而知的有像希尔这样的“聚合者”(lumpers),与像赫克斯特这样的“拆解者”(splitters)——他们这批人可以公开声称在关于过去的看法上,他们比希尔那类史家更能洞幽察微(differentiated),因而也更精确。有关情况,参看 William G. Palmer, 'The Burden of Proof: J. H. Hexter and Christopher Hill',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19 (1979), pp. 121 - 129.

②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pp. 612 - 621. 诺维克很老实地承认阿伯拉罕“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好友”,由此乃意味着,他自己对该事件的看法不可避免存在门户之见。

当你爬梳筛选档案之时，你正远离住宅，你正处于百无聊赖之中，你正非常匆遽，你正潦草地摘录，犹似疯狂。这样，你就注定会犯错。我不相信任何一个西方世界中的学者可以把注释做得没有瑕疵。档案研究是一个特别的流行性的凌乱生活状态。<sup>①</sup>

这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意见。因为，斯通在这一问题上，远不能作为一个无可指摘的旁观者。1951年，也是在阿伯拉罕那个年龄，他自己的著作遭受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和刻薄的攻击，这攻击来自他在牛津的同事休·久佛-罗帕(Hugh Trevor-Roper)和库帕(J. P. Cooper)，他们在《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中发表文章，指出了类似后来在阿伯拉罕一书中发现的斯通犯下的粗率错误。斯通在此之前曾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英国17世纪早期的土地贵族，生活奢侈、拙于理财，在经济地位上正江河日下。他的结论是：此种情况加速了“绅士阶级的崛起”，而该现象被托尼(R. H. Tawney)这样的左派史家看作是英格兰内战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休·久佛-罗帕点明，斯通把不同时代的贵族混淆在同一标题之下，将大部分的数字都弄错了，完全误解了当时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例如，在论述贵族的采邑所有权已经解体之时，斯通拿郡作实例，没有意识到在许多郡拥有土地的贵族，他们很乐意卖掉他们在一个郡的田产，而在别的郡另外置业；况且，采邑在尺寸上明显不同。这是斯通彻底忽略的一个因素，致使他的数字显示土地贵族拥有的采邑数量锐减，不过，在一些隐藏的实例中，大体上说来，贵族拥有的土地在面积与质量上，还是有一个实质上的增长。

---

① 转引自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p. 620。



休·久佛-罗帕的酷评被形容得五花八门，“可怕的”、“粗暴的”和“一个史家对另一个史家所能做的最尖酸刻薄的抨击之一”。斯通被迫承认在他的文章里存在一些“非常严重的错误”，并坦白他在证据上的许多“非学术做派”。<sup>①</sup> 实际上，当我还是牛津的大学生时，牛津的堂们(the dons)还对美国的大学不屑一顾<sup>②</sup>，即便是对普林斯顿也是如此，而这就是斯通教书的地方，堂们讥笑斯通，说他之所以被迫在美国寻找教职，乃是因为那场争论的结果，使得他在牛津的位置不保。虽然事实上是，斯通后来于学术上出类拔萃，在学术生涯中出版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尽管不乏争议)，可惜他却曾栽在休·久佛-罗帕手上，三十年过去，显然积怨更甚。他之为阿伯拉罕背书，实深深怀有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之情，这便使其辩护，颇有暧昧之处(seem to suggest)。不止于此，斯通业已从这个早年的溃败(débâcle)中复原，而且在其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对近代早期英国史的研究有一个重大的又无可辩驳的关键影响，加之他的敏锐及可读性极强的评论文章，他对一般的历史研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弗利德曼那样过犹不及，拒绝给予阿伯拉罕同样一个痛改前非的机会，这无疑是错误的。

---

① Lawrence Stone, 'The Anatomy of the Elizabethan Aristocrac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18 (1948), pp. 1-53; Hugh Trevor-Roper, 'The Elizabethan Aristocracy: An Anatomy Anatomize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Vol. 3 (1951), pp. 279-298; Lawrence Stone, 'The Elizabethan Aristocracy-A Restatemen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Vol. 4 (1952), pp. 302-321; J. P. Cooper, 'The Counting of Manor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Vol. 8 (1956), pp. 377-389; J. H. 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London, 1961), pp. 117-162 ('Storm over the Gentry'), 尤其是 p. 138; Kenyon, *The History Men*, p. 258.

② 堂(the don), 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的教师, 主要包括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学监、指导教师或研究员、两校的教授。——译者注

## 四

124

阿伯拉罕事件被当作是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争执,多少由于其涉及这个主题:即对历史不能建立在过去真实之上这个声明,进行关键性评测。就后现代评论家来说,德国好像是一个关键点,在该点上过度的相对主义被紧急叫停,后现代主义者意识到这个情况。为回应批评,海登·怀特指出(在其《形式的内容》[*The Content of the form*]书中一篇文章的注脚里),犹太人历史学家露西·达维斗维兹(Lucy Dawidowicz)抨击以前所有讨论纳粹主义的作者,说他们不实地叙述、忽略或淡化了大屠杀,因此暗示他们更多是在以文学性的术语来书写,而不是以事实性的术语来展现,而且在这方面,第三帝国与其他任何一个历史研究课题并无差别。但达维斗维兹关于现代德国及国际历史学界的看法,已经被普遍认为是歪曲性的、夸大其词的、过分好辩的无根之谈。实际上,存在大量和细致的以事实为基础的有关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描述的文学作品。显而易见,将这些东西作为虚构的、不真实的,或认为其比“修正主义者”——他们根本否认奥斯维辛大屠杀曾经发生过——的作品更远离历史真相,这是大错特错。这作为一个证据确实有其重要性的主题,那些基本的事实可以坐实。奥斯维辛不是一个话语,将集体屠杀看作文本,太轻描淡写了;毒气室不是一种修辞,奥斯维辛本质上就是一场悲剧,不能被当作喜剧或闹剧。假使这就是真实的奥斯维辛,那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过去的意外之事、事件、机构和人们,同样一定也是真实存在的。既然如此,这对于后现代主义有什么含义呢?

125

关于大屠杀主题的一系列讨论会的论文,业已由索尔·弗瑞兰德(Saul Friedländer)编辑,以《试探再现的边界》(*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书名出版,书中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及其批评者试图处理此主题。海登·怀特尤其从其早期的立场退却,就是为了在面对这个指控时捍卫自己,此指控是怀特的极端相对主义支持了“否认大屠杀”的“修正主义者”之活动。怀特勉强承认,有关大屠杀的事实封锁了用某些类型的情节设置来描述它之可能。在做出此种让步的同时,他坦率承认,过去的事实在形塑历史学家书写它的方式上,具有优先性,所以他放弃了其理论中的关键点。毕竟,过去表明它自己并没有彻底被历史叙述与情节设置玩弄于股掌之间。<sup>①</sup>

怀特总结他立场的转变,说在他早年的著作中,他更在意指出历史学家在其著述中使用文学手段的方式,但这么做不可避免会把“虚构的”元素夹杂进去,因为他们的书写风格不是在简单报告他们的发现,实际上也建构了他们书写的主题。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开始在虚构一边与历史的一边之间划分出明确的此疆彼界了。首先,我们并不是在想象过去那个客体,然后用非常主观的方式来书写它,历史仅存在于书写的行动之中,伴随一种同时出现的产品或认证。这个产品或认证是关于话语的作者和该作者正在书写的目标或事务。怀特之所以转变立场,在本质上乃是为了回应关于大屠杀的争论。在我看来,较之他以前的见解,怀特更加现实地总结了历史学家在实际上从事他们研究的方式。他说,历史想象力要求

126

---

① Hayden White, 'Historical Emplotment and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Saul Friedländer (ed.),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92), pp. 37 - 53. 海登·怀特援引了一本描绘奥斯维辛的漫画书,即史皮格曼(Art Spiegelman)的 *Maus: A Survivor's Tale* (2 vols., London 1989 - 1991)。在该书中,主角被描画成各种类型的动物,但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宣示奥斯维辛可以作为一个戏剧来编排(emplotted): 在史皮格曼的喜剧外衣下,他无疑是在用悲剧方式来展开汇演。

的客体世界”进行想象。<sup>①</sup>对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加以反对的观点。

那么,总起来看,这整个的争执在实际的术语运用中意味着什么呢?根据罗素·雅各比的意见,当诸如怀特和拉卡普拉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降尊纡贵,想从高高在上的玄学层面抽身而下,以对实证的历史著作提出一些具体的批评,“在历史思想上呼唤一个激进的脱离,这结果听起来非常熟悉:文本的重要性、复杂性与模糊性被不断地重申”<sup>②</sup>。这可能是一个太过否定的观点。虽然劳伦斯·斯通也承认,“语言学转向”已经“教会我们,让我们远比以前更细心和更谨慎地检查文本,使用新的工具去揭示隐藏在公开信息之下的秘密,并解读细小的语法转换之意义等类似情形”<sup>③</sup>。所有这些都是对的。而且假如海登·怀特只有为数很少的模仿者,他的影响依然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他的著作已经传播开来。其影响的痕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过其他历史学家使用的诸如“情节设置”(emplotment)这样的词汇来管中窥豹,这些都是怀特率先使用的术语。就历史学家而言,其影响更为广泛地表现在,历史学家愈来愈明确地意识到在他们工作中——包括研究和书写——的文学与叙述成分。的确的确,这并非坏事。然而,怀特早期的许多观点站不住脚。总体上,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之间的区别,在经历后现代主义于理论上的摧枯拉朽攻势后,已经劫后重生。过去确实要仰赖于材料才能说话,而且也可以借助材料而重新获致。在过去被书写下的文献与当今之人为一己目的所书写的文献,同历史学家提出的关于过去之诠释,其间有天壤之别。

---

① White, 'Response', p. 241.

② Jacoby, 'A New Intellectual History?', p. 418.

③ 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 190.

凯斯·詹京斯认为历史的方法并不能直接通往历史真相。但这样说,他就把理论与方法混淆了。历史的方法不是他所言的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年鉴学派、韦伯学派或其他类似东西。<sup>①</sup> 这些东西都是理论。历史的方法是建立在实证规则的基础上,这些规则由兰克首创,并为之后的史家在许多方面对之精雕细琢而确立。就所有在这些五花八门的理论模式中进行工作的历史学家来说,历史的方法是大家共有的,只要瞥一下他们那些充斥大量注释的著述,就一目了然。比如,尽管他们的主要方法论存在不同:计量经济史学家通过计算机处理数据材料、思想史家致力于精读少数文本、中世纪史家解读考古发现,较之他们共同的义务——“准确再现”(getting it right):计量经济史学家要把数据精确地抄写和输入到计算机,思想史家探寻词汇的含义及文本的思想来源,中世纪史家则要报告每一个发现在挖掘现场中的正确位置,所有方法论上的差别都将无足轻重。说历史学家“并不关心那些互不关联的事实”<sup>②</sup>,这是不真实的。正好相反,不管挑选事实的标准是什么,历史学家的绝大多数努力都花在弄清那些互不关联的事实上,并且要尽可能严格地根据史实重建它们。即便是詹京斯,他也使用注释。注释与参考文献本就是旨在让读者核对那些历史学家之观点所仰仗的材料,看看那些材料是否支持其观点。它们并非只是修辞工具,意在制造一种虚假的“真实效果”。后现代主义声言:

尽管历史学家经常依照证据对他们同行的著作表达批评——材料被忽略了、重点颠倒了、分类不当了,但这样的批评不可能被证明某一个诠释或某种讲故事的风格

---

① Jenkins, *Re-thinking*, p. 15.

② Jenkins, *Re-thinking*, p. 32.

(story-type) 优于另外的。这种关于证据的争执是误入歧途的 (diversionary), 它们之被展开, 仿佛关于证据的选择与使用将决定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 而不是历史学家的观点决定什么可以作为证据。<sup>①</sup>

这一声明是个误解。犹如关于阿伯拉罕的争论及其他类似争论, 如发生在 1950 年代的“罗帕与斯通之争”所展示的, 借由证据, 诠释实际上可以被检测和证实, 或被证伪, 而且至少在一些时间, 是可以实实在在证明何方为错, 何方为对。能作为证据的东西并非完全要依赖历史学家的观点, 它取决于超越个体的大多数人之共识。尽管如此, 它无疑还是一个经常导致发生争执的原因, 首先, 就是在历史学家处理因果关系问题时, 可能恰像我们下章将要看到的。

---

① Somekawa and Smith, 'Theorizing', p. 153.

## 第五章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在他的《历史是什么?》一书中,卡尔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 129  
“历史研究就是对原因的研究。”<sup>①</sup>历史学家必须寻找关于任何一个既定事件的林林总总的原因,探明这些原因彼此之间的关系(如果存在的话),而且根据其重要程度,安排它们。这些原因必须被编排有序,列举规整。卡尔非常鄙视以赛亚·伯林爵士及其他人士在冷战思维下攻击苏联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因这些人认为历史是由机遇、意外和不确定性操控,而且作为个体的人是独立自主的,天生即被赋予无拘无束的自由意志,故此在道德上可以替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其行动由是可以被解释为他们之自由意志的结果,而非一些较大的非个人“原因”。卡尔强调,公平地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并没有遵照这些极端的预设。去列举原因,并非否定道德责任,“理解它就是去原谅它”这个格言,没有什么真实性。道德与因果关系是 130  
两个判然有别的范畴,不应被混淆。

卡尔也明白地承认,历史中的意外与偶然性是真实存在的,比

---

<sup>①</sup>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p. 87.

如,若认为列宁在 54 岁的暴卒对接下来的俄国历史进程根本没有产生影响,这样的说法将是荒诞不经的。但卡尔坚持,范围更大的趋势更为重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质工作,就是形成普遍性的概念或结论,但此类突发意外并不能被普遍化为一般性的概念或结论,那么在实践中,此类事件就不具备太多重要性;它们只属于历史学家有义务要秉笔直书的“事实”(facts),而不是历史学家真正想要提出的解释。又比如,这或许是个恰当的例子,若是克利奥巴特拉(Cleopatra)有一个大鼻子,就无法诱惑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那么安东尼将不会发动阿克提乌姆一役(the battle of Actium),也不会输掉战斗(此例乃 J. B. 伯利引自帕斯卡尔(Pascal)的《思想录》[*Pensées*])<sup>①</sup>。同样,若是克利奥巴特拉不漂亮,屋大维(Octavius)将不能建立罗马帝国。卡尔说道:“的确不错,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导致了一些结果。但无意识地将之作为一个普遍性的陈述,说将军们打败仗是因为他们迷恋美丽的女王……意外之原因不能被普遍化为一般性之结论……它们不能给人以教训,也不能导致那些想要的结论。”<sup>②</sup>

卡尔认为,历史学家之间是在以一种获得共识的取径来解释历史,这可能不会使哲学家满意,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可以完美运转。假如琼斯先生(Mr Jones)驾驶一辆刹车有毛病的汽车,在一个黑暗角落里碾过罗宾逊先生(Mr Robinson),卡尔会说,我们会根据以下这些方面来解释此意外,即那个黑暗角落或者那些有毛病的刹车,或者琼斯先生从他饮了过多酒的宴会上返回。然而,假如我们认为

---

① 《思想录》原文为:“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如果它生得短一些,那么整个大地的面貌都会改观。”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79 页。——译者注

②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pp. 86 - 104.



车祸原因在于罗宾逊先生的抽烟习惯,致使他穿过马路到拐角的商店买烟,这样的意见不会取信于人。对卡尔来说,这个最后的原因也处于机遇和偶然性的范围之内,因而必须被排除在判决之外。你可以说,黑暗的角落、有毛病的刹车或醉酒驾驶更易导致车祸,但你不可以说步行者的抽烟导致了车祸。<sup>①</sup> 131

卡尔举引的这个关于琼斯先生与罗宾逊先生的例证,近来被阿普尔比、亨特、雅各布教授重新回顾了一下,她们质问:“难道没有这样的分析——就是关心琼斯先生与罗宾逊先生是黑人或是白人?是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或许其中之一正全神贯注地在去同性恋酒吧的路上),甚至是爱挑衅者或作风稳健者?”<sup>②</sup>这是对卡尔分析的一个非常美国化的质疑,反对的一个原因在于,卡尔的分析在1990年代不是研究历史的政治正确方式,但三人的意见也受到公开反对,这表明了其局限性,即从任何一个特定的政治立场来重新看待历史。首先,可能确实很重要,这两人中之一人正在想他要去的酒吧而非即将面临的交通状况,若他确实是这样想——这还有待于验证,那为什么他要去的酒吧——不管是一般的或是同性恋的——会与车祸扯上千系,这也并不很清楚。但无论怎样,我们知道琼斯先生在他回家路上,而罗宾逊先生恰巧赶上买烟,所以阿普尔比、亨特、雅各布没有正确对待这个证据,我们可以认为其臆测缺乏佐证而无足道。就这两位种族特征而言,也同对此意外的解释无关,除非我们能显示琼斯先生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且有意想撞向罗宾逊先生,因为罗宾逊先生属于不同的一个族群。但在卡尔的描述里,没有显示这些情况,因为当琼斯看到罗宾逊横穿马路时,明显踩了刹车(否则,说刹车出毛病就无足轻重了,因为琼斯将不会试图使用刹 132

①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pp. 104 - 105.

② Appleby, Hunt and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p. 304.

车)。因之,此因素也不符合事实,且与事实无关,可以被排除在外。

英国历史学家泰勒惯用一些小原因来解释大事件,以此向较为慎重的历史学家挑衅。举例来说,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铁路时刻表引起的,时刻表把交战国置于一系列的军队动员和他们无法逃避的宣战声明中。<sup>①</sup>即便在其自传中,他也喜欢强调他生活中的意外因素之作用。<sup>②</sup>他无疑将会非常愿意表达这样的观点,罗宾逊先生之被杀是因为其抽烟。不能确定泰勒是否打算让人们严肃对待他在这样事情上的做法,更可能是他只打算激怒更多陈腐的同侪,这是一个他通常都会获得成功的举措。

显示历史中的意外(在理论上更倾向于称之为偶然性)的重要性及其局限的更有成效的方法,是去想象容或事情稍有不同,那什么将会发生。例如,假设希特勒在1928年死了,或纳粹党根本没有执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发生吗?许多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战争无论如何已经爆发了。在1929年起始的大萧条之后,魏玛共和国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像弗兰兹·巴本(Franz von Papen)那样的极右独裁者(他在1933年成为希特勒首要的守旧派合作者),或者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君主复辟——1930到1932年的布鲁宁(Heinrich Brüning)首相似乎想要的,将几乎确定也导致一系列相似的事件发生:重整军备、修订《凡尔赛和约》、合并奥地利,恢复1914—1918年战争期间德国的征服欲,而且比这时更有能力与信心。但这些情况将不可能再按同样的方式发生,尤其是,尽管所有的守旧派都是反犹太主义者<sup>③</sup>,可能会对犹太人的人权加以限制,犹

---

① A. J. P. Taylor, *War by Timetable* (London, 1976).

② A. J. P. Taylor, *A Personal History* (London, 1985).

③ 本书用 *antisemitism* 拼写的反犹太主义,而非传统 *anti-semitism* 拼写的反犹太主义。后者自身是一个反犹的简洁陈述,不能当作闪语的词,除了在那些反犹者心里。

如纳粹分子在和平时期之所为,以及波兰保守政权与法国维希政权之所为,我们也不能确信他们会制订那个有秩序、有步骤执行的方案,即由希特勒制订的对“犹太人问题”(Jewish problem)进行“斩草除根”(Final Solution)的种族灭绝计划。对这些人来说,其反犹世界观是相当中庸的。即便此处,我们接受种族大屠杀是“自下”(from below)形成的观点,体现于德国军人、警察、党卫军 1941 年在东欧占领区内遭到大量犹太人反抗的经历中,然而至少存在争议的是,这里仍将出现大规模的杀戮,尽管不是在“斩草除根”的名义下,由纳粹分子执行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在全欧洲范围内实施的破坏计划。

当然,我们永远不能确保什么事会发生。这儿的相关之处在于,假如希特勒死于 1928 年,尽管会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别,但事件的整个形貌将不可能完全偏离其实际已经发生的。意外、机遇和偶然性确信会有一个真实效果,可在实践上,这个真实效果几乎总是受到很大限制的。是故,就此而言,卡尔的观点虽表现得相当极端,然的确惠人不浅,值得推荐。不过卡尔的观点也存在问题。首先,卡尔认为因果关系大概是关于阐释的问题,所以不可避免与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历史必须服务于当下,我们关于历史事件原因的看法也必须服务于当下。举例而言,在关于琼斯先生与罗宾逊先生的例子中,我们列举了那个黑暗的角落、那些有毛病的刹车或者司机饮用的过多酒精,因为我们能对这些情况做点什么——例如,修饰那个角落、引入一些有关汽车保养标准与汽车修理的更严格法令,或关于司机驾车被允许的饮酒程度的更严格法令。尽管我们可以禁止抽烟,因而能阻止罗宾逊先生以另外一种方式杀死自己,但这对琼斯先生碾向他这样一种交通意外,根本毫无效果。故此,卡尔总结说,罗列一些突发原因,“在历史学家看来,是乏味和无聊的”,它

134

无助于我们规划未来的能力。<sup>①</sup> 我们对于罗宾逊先生死因的追探，是受我们想减少马路上的车祸之目标的影响。<sup>②</sup>

虽然在政治家或社会改革家看来，罗列一些意外的原因可能是乏味和无聊的，但从历史学家——其首要目标是理解过去——的眼光来看，他们就很难苟同其是乏味和无聊的这样的观点。假使你的主要目标是去规划未来，那么，穷毕生于历史研究中未必是个好想法，较好的是完全远离学术或思想生活，而去投身于政治或商业或行政事务，或别的应用性职业。若是材料显示一个意外的因素在起作用，仅因为其不能服务于我们当下的目的，就将之弃若敝屣，这是错误的做法。实际上，一个更大的危险潜藏在这里：猜想一个意外的或别的什么原因，从文献中强烈地显示出来，与我们关于当下和未来的理念相违背，卡尔会真的认为我们应该为了当下的意识形态压制它吗？

很难摆脱这样的结论，卡尔的确没有深思熟虑其论断。最终，就是关于琼斯先生与罗宾逊先生的例子也欠妥当。因为，历史解释并不只是发现诸如撞车或世界大战这样的个别事件之起因，历史学家同样也对事件过程造成的结果、其意味什么感兴趣，就如对这些事件之起因感兴趣一样。结果往往比起因更为重要。<sup>③</sup> “为什么”远不是历史学家要问的唯一问题。对过去的社会或政治体制或信仰结构进行分门别类，其合法性一点也不比追寻过去事件的起因逊色。将一些东西置于其语境之中（也就是认为它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而非另一个，属于这个时期或趋势而非另一个，诸如此类），历史学家就能对之进行解释。所有的历史并非都是解释。艾兰·梅吉尔的观点很典型：“在职业历史学家那里，这是一个相当流行的共

---

① Carr, *What is History?*, p. 108.

② Carr, *What is History?*, p. 120.

③ Martin, 'Objectivity and Meaning', pp. 48 - 49.

识,历史学真正严肃的任务——使它对知识有所贡献而非无足轻重的任务,就是解释的任务。”<sup>①</sup>但对经验事实进行描述和重建确实无足轻重吗?在实践中,很少历史学家会认同这个观点,因为他们在这些事情上已经花费了大量时间。况且,近年来,至少有一些历史学家业已放弃探寻事情的起因。杰夫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一个研究德国中世纪史的专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使他皈依这样的理念,历史研究不得不与当下有关,而且要适应当下。他在1967年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停止教导他们的学生去探究历史事件之原因,原因只是被推测出来的,与当下无关,相反,应该教导学生去关注事件导致的结果。<sup>②</sup>更近的,约翰·文森特也声言,追寻事件之原因乃雕虫小技,按他的观点,最好是寻求解释,尽管他从来没有在这两个词之间进行区分。他说:“追寻原因是对历史思想的羁绊,让其从此羁绊中解脱吧。”<sup>③</sup>泽尔丁在1976年的著作里亦拒绝叙述史学和对事件原因的探求,以支持他称之为点画法(*pointilliste*)的方法,此方法是用不连续的点构成一幅图画,在其间,读者能够判断出“他想会适合他自己的那些联系”<sup>④</sup>。他观察说:“因果关系如编年纪一样,对历史学家之无情犹似暴君之无道。”<sup>⑤</sup>他也认为,对历史学家来说,到摆脱其羁绊的时候了。

136

他自己的杰作《法国人之激情史》(*A History of French Pas-*

① Megill, 'Recounting the Past', p. 627.

②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and the Common Man* (London, 1967), pp. 3 - 15.

③ Vincent,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pp. 45 - 49.

④ Zeldin, 'Social History and Total History', p. 243. 好笑的是,在格特德·希摩法的书中,无疑是因为她的粗心大意,“联系”(links)一词被错引为“线”(lines)。参看 Gertrude Himmelfarb, *On Looking into the Abyss: Untimely Thoughts on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1995), p. 138.

⑤ Zeldin, 'Social History and Total History', p. 243.

sions),最初作为《牛津近代欧洲史》中的一部分《1848—1945年的法兰西》(*France 1848 - 1945*)出版,在这部杰作中,狄奥多·泽尔丁以众多新鲜视角透视近一百年的法国社会,如野心、爱情、政治、思想、品味、焦虑,还包括对几乎每一个法国生活层面的概览,用生动且经常是有趣的、独特的法国男性与女性——其生活似乎契合正在讨论的层面——的例子来说明。这本书确实是出类拔萃,因为它拒绝致力于大规模的理论或解释,还严谨地避免叙述与编年纪。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它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富有创新性。举例来说,往往那些听起来新颖的题目都隐藏着一些相当陈旧的主题,比如“野心”这个主题,提供给读者的是近来关于法国社会结构研究的精心综合,用论农民、论资产阶级和论工人阶级这样的章节贯穿在一起。论“虚伪”那章结果只讨论激进党。类此,不一而足。书中关于政治的部分,其主题取径下不仅潜藏着类似编年纪的做法——从正统主义(Legitimism)和奥尔良主义(Orleanism),运转到政治独裁的拿破仑主义(Bonapartism)、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等等,而且在实际上,还传达了许多相当让人信服与接受的对法国政治史的解释,例如,第三共和国为什么能成功维持那么久的原因。既然泽尔丁有以前身为标准的第二帝国政治史研究专家的经验,难怪该书论政治的部分是最为条理分明的。然而,余下的内容,不但包含对历史正统信条的抨击,也包含有许多对其处理主题的解释。<sup>①</sup>的确可以不必提出一个高高在上的论题,来把书中不同的部分统摄在一起。可就一个旨在对法国一百年的历史概览所涉及之内容提供一个整体理解的著作来说,这样的做法却是必需的。

在问题截然相反的一边,其他历史学家继续强调因果关系的重

---

<sup>①</sup> Theodore Zeldin, *France 1848 - 1945*, Vol. I: *Ambition, Love and Politics* (Oxford, 1973), Vol. II: *Intellect, Taste and Anxiety* (Oxford, 1977).

要性和历史中的意外事件及个性所扮演的显眼角色。一个苏俄史专家——杰夫里·罗伯斯(Geoffrey Roberts)要求：

研究历史的人类行动取径，强调个体行动的自由，强调从行动者的视角重建过去发生之事的重要性，以及强调意外因素、估错形势及预期不到的结果在规划历史结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以下这样的理念都是普通的共识，即：人们都是为一个理由而做事情；人们个体与集体的行动是历史的边角料；我们可以建构一个以证据为基础的描述，以说明为什么过去历史中的行动者会有那样的做法。

但这根本不是真的。大体上，历史学家并未聚焦于那些意外因素，并不认为个体有不守限制的选择自由，也没有将自己局限于按过去的行动者之观点来重建历史。进言之，虽然“共识”未必恰恰与“偏见”掺和在一起，未必被“一个潜在的受压抑的顽固”所侵染，犹如克里斯多弗·劳艾德(Christopher Lloyd)之指控，然它实在是随时代、随文化之改变而改变。<sup>①</sup> 举例证之，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共识”包括这一观念：人类行动被神圣的(或恶魔的)启示指引，疾病则往往由黑暗的魔力或巫术引起，对于圣迹的叙述是中世纪历史编纂学的“共识”。当然，这里泄露出来的，是罗伯斯的短语——“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暗暗将那些不书写政治史或外交史的史家从历史学家社群里驱除出境，他们因之成为“非我族类”。对于今日历史学界海

<sup>①</sup> Christopher Lloyd, 'For Realism and Against the Inadequacies of Common Sense: A 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1 (1996), pp. 191 - 207, 引文见 p. 192.

纳百川与万壑争流的情况来说,这着实有欠公正。

## 二

然而,罗伯斯要我们根据历史事件和参与事件的人们之目的及设想之间的关系,全神贯注于解释历史事件。卡尔的因果概念经常被贴上“决定论”的标签,也就是说,其仰仗这样一个判断:事件一般由独立于当事者意志之外的因素引起,譬如,在较早的写于1966年的文章里,海登·怀特宣告,历史学声称可以发现过去的真实模样,这误导了人们,使之陷入一个无可逃遁的因果之网,也剥夺了他们139 当下的行动自由;如果放弃这样的宣示,那么人们将可以用历史来维护他们对未来的控制,而这实际也应该是历史研究的首要悬鹄。<sup>①</sup>怀特的观点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之上:我们用以改善我们当前关怀的历史,其真实与否无足轻重,除了纯粹的考古癖之外,任何形式的历史在定义上都是一种“后设史学”(metahistory),其真实与否无从判定,因为它本质上是历史学家个人的创造。<sup>②</sup>历史中的“解释”十足仅是由理论构成,这些理论是历史学家在没有求助于一手材料的情况下编织出来的,从外部强行加入历史。这种“解释”需要信赖一系

---

① Hayden White, 'The Burden of History', 同前作者, *Tropics of Discourse* (Baltimore, 1978), pp. 27 - 50; 亦可参看 Hans Kellner, 'White's Linguistic Humanism', *History and Theory*, Supplement 19 (1980), pp. 1 - 29。怀特的著作无甚足观,尤其是他的《后设史学》一书,可以清楚看出他是结构主义者,并非后结构主义者,换言之,是现代主义者,而非后现代主义者。饶是如此,怀特的许多观念还是为后现代主义者热情使用,尽管其取径中的诸多结构主义面向已经步入死胡同,可它们对于历史的相对主义隐喻却不是如此。

② White,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Discipline and Sublimation', 同前作者,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pp. 58 - 82。



列诗学领悟(poetic insights),以探查事情如何发生,这种“解释”还形成一套历史哲学,影影绰绰地呈现在每一个历史作品及其变体中。<sup>①</sup>

这个意见让许多明显互相连缀在一起的现象解体了,泯灭了其间的差别,在根本上将它们简化为一种诗学领悟的现象。虽然我们公认,历史学家首先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基础理论:关于事情怎么发生和为什么发生,以及某个关于人类动机和行为的基本理念,可是,探索特殊事件起因的实证研究还是存在争议的,远超过某种历史哲学之表现。进一步言,怀特并没有说历史学家对事件起因的解释为什么居然是“诗学的”(poetic),而非理性的。让他见识一下许多历史学家枯燥、呆板的写作方式,“诗学的”形容似乎有些喻非其类。不过,怀特的观点还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把证据问题大题小作,在历史专业中把解释超擢到几乎是独占鳌头的地位。依据怀特的见解,历史学家比较不太愿意确证某些已然发生的事件,更愿意判断某些事件有何可能的意味。然而,确证已经发生的事实是历史学家职业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不可能作为一个次等问题或附带主题,而被置若罔闻。

140

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怀特的观点可以转化为对整体历史学家之志业的一个全面性批评。比如,詹金斯因此倡言:

历史学家不很注意不连续的事实……不,历史学家是野心勃勃的人,他们不仅想要发现过去发生了什么,也想了解这些事情是如何与为何发生的,以及这些事情意味什么、意义在何。这是历史学家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我的意思是他们本不必悬鹤如此之高)。故而,事实本身从来就

---

① White, *Metahistory*, pp. xi - xii.

不是争执的关键所在,存在争执的是,在建构解释之时,伴随事实而来的权势、地位、共谋和重要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詹金斯继续严厉谴责历史学家的这种愚蠢。他反复说,实证史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解释不只来自于事实,而是被历史学家强加于事实之上的,这些解释在被其他解释取代前,只限于在某时、某地有效。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概念,自身仅是这样一个东西:在职业历史编纂学上由史家武断地建构出的话语形构。<sup>①</sup>

141 对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概念,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甚至发起更激烈的批评。关于起因的认知很明显依赖于连续性的时间概念,引起此事发生的彼事,在时间上一般都先于此事,而非后于此事。因之,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应该在1788年及之前找,而不是在1790年及之后找。若是连续性的时间仅被当作一个思想上的建构,那么对历史研究来说,这种认识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犹如许多作者已经认知到的那样。当弗兰克·安克斯密特这样说的时侯:“历史的线性时间(historical time)是西方文明近来的和高度人为化的一个发明”,此语表达了一个普遍流行的观点。安克斯密特声言,依仗时间概念的书面历史叙述,完全是“根基不稳”<sup>②</sup>。援引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质疑时间观念的连贯与协调性;利用政治术语,后现代主义者把这样一个时间观念视为压迫性和束缚性的,它使霸权话语得到了合法化,并赋予西方看待世界的方式以优越性,胜于非西方看待世界的方式。<sup>③</sup> 正似一个后现代主义作者曾经高度

---

① Jenkins, *Re-thinking*, pp. 32 - 33.

② Frank Ankersmit,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Berkeley, 1994), pp. 33 - 34. (该书有文津出版社的中译本。——译者注)

③ Rosenau, *Post-Modernism*, pp. 67 - 68.

认同的,一部依据放弃连续性时间观念的警示而写出的民主史,将会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冗长样本”(interminable pattern without meaning),更像某种形式的当代音乐,或某些当代体验小说。这将导致一种新形式的历史出现,它会放弃“钟表与资本的时间观念”。<sup>①</sup>

然而,认同这种观点的人将会陷入吊诡,这个“后现代”概念的使用同他们主张不应存在划分历史时期的观念,正相颞颥。像一个敏锐的评论家观察到的,当一个后现代作者提出这个声明——“历史的线性时间乃是过去的东西”,她似乎没有意识到在这个描述中存在的反讽,因为声称某个东西是过去的产物,其自身就是在用时间的历史概念——即这一声称打算抛弃的东西。<sup>②</sup>除此之外,一个基本的线性时间概念继续在为全世界的人们使用,既用来指导他们的日常生活,又用在他们的嗜好上,如喜欢按线性时间叙述故事的小说,像约翰·杰瑞桑姆(John Grisham)的小说,不喜欢像艾兰·罗比-杰瑞雷德(Alain Robbe-Grillet)那样没有按线性时间叙述故事的小说。囿是,历史的线性时间观念绝不是像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仅是“由于宰制体制安排形成的,为特权者”所遵守的一个观念。<sup>③</sup>在根本上,这种时间观念是一个太过强大的原则,不可能被排除,甚至就是那些拒绝它的人也不能祛除它。实际上,任何试图否定历史的线性时间观念的人,都必然预设了他恰巧否认的东西。我

142

---

① Elizabeth Deeds Ermarth, *Sequel to Histo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al Time* (Princeton, 1992), pp. 22, 212; Appleby, Hunt and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pp. 205, 211, 235; 也可参看 Robert Young, *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London, 1990)。在这里,历史学被简单地视为“殖民主义”。

② David Carr, review of Ermarth, *Sequel to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2 (1993), pp. 179-187, 引自 pp. xi, 14, 29, 25。

③ David Carr, review of Ermarth, *Sequel to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2 (1993), p. 184, 引文见 p. 191。

们怎么纪年——不管用西历或犹太历或中国的农历,或不管任何一种——同这个线性时间观念全然无关,都很难摆脱这样一个结论:后现代主义者这里把隐藏在全世界广用西历后的西方霸权,同文化上中立的、普遍的计算连续性时间的历法混为一谈了。

### 三

时间流逝,但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企图保存每一个正在消失的瞬间。当我写书至此,我能听到键盘上手指敲打的声音,背景里计算机微弱的响声,大路上通过花园传来的隐约的、不断变化的汽车嘈杂声,外面的鸟鸣声,我桌子上闹钟轻微的踏踏声,我家猫咪柔和的上楼声,我自己的呼吸声,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在几秒内消失,我们已不再有对之加以彻底或精确重建的可能性,更不必说遵照所有这些声音传入我耳旁的确切顺序来重建。因此,我们只能从过去事件所形成之天衣无缝的网中,选择一个细小部分,然后将之呈现在我们的历史描述中。没人对此怀有异议。当一些理论家相信,在极大程度上,这个选择是由关于发生在过去之事的叙述与结构决定时,争执就产生了;另外,当那些人相信这个选择是由历史学家在上下其手时,争执也会产生。

143 海登·怀特坚持的以下论断是否的确如此?有许多职业历史学家相信他们正在建构这样的叙述,这叙述是过去真实事件之结构与过程的虚假反映,而不是他们自己审美感觉与主观意图的产物。<sup>①</sup>好像不是如此。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意识到事实的复杂性,不能将之化约为一个单一的线性叙述。每一个写历史书的人或撰写博士论

---

<sup>①</sup>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p. 27.

文的人,都面临这个问题:在进入一系列或多或少有些清晰的叙述与结构线索之研究中时,如何析分已经收集到的仍然不完整的资料或将要去收集的资料,接着如何将这些线索编织到一个多少有些清晰的整体之中。我们所做的决定经常会有效地影响到阐释自身。看起来像是传统的历史叙述,其实不然,它经常是作者在进行一系列美学和阐释选择后的结果。譬如,拉卡普拉就傲慢地把加瑞特·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所著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之毁灭》(*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描述为一本相当“可爱的老掉牙故事”,把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视为用“高度传统的叙述”呈现了一个“传统的故事”。<sup>①</sup> 但在这两个例证中,他都不得要领。首先,诚如我们所知,拉杜里之书所依仗的审判报告,采用传统叙述性的陈述,同样也会被用来描述在蒙塔尤的审判过程。该书整个的问题在于它读起来与材料表达的意思格格不入,特别是在对这个村庄里的日常生活与相互关系的结构分析中,完全把一些现代人类学理论强加给当时当地的日常生活。<sup>②</sup> 不约而同,加瑞特·马丁利的书是一个高度复杂且老练的叙述文本,用一个立体的风格,从一个地理中心转向下一个(伦敦、马德里、安特卫普等等地方),试图给予我们多样化的观察位置,并能把许多不同的叙述连缀为一体。对我来说,这样的叙述是非常洞彻现代小说的叙述技巧的,尽管拉卡普拉对此不屑一顾,因为他认为这属于未受到现代小说影响的“传统叙述”文类。马丁利用这种多线的叙述模式来书写他这本经典的著作,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想摆脱英国史学家一个共有的坏习惯,就是他们老站在英国的立场上,来叙述西班牙无敌舰队毁灭的整个事情。因

144

---

① LaCapra, *History and Criticism*, p. 119.

② 拉卡普拉可能仅惠顾了该书的英文节译本,在此节本中,法文原版中的众多人类学分析被省略了。

而,历史叙述很少是仅由一个单一和暂时的线性线索构成。

或者我可以拿我本人的研究来证明把叙述与因果论断连缀在一起的难度。在1980年代早期,我开始研究1892年发生在汉堡的霍乱时疫,是由于我受到这个大灾难产生的大量一手材料的吸引,它们揭示了一个欧洲主要城市中日常生活的结构和动态、社会不平等、政治决策与行政运作、心态和行为。它们恰恰是非常好的细节记载,是历史学家在更多正常时期的情况中没有揭示的。在我通读了这些材料后,就可以很清楚地解释为什么这场大的时疫会发生在1892年的汉堡,而非西欧别的地方,甚至更能清楚揭示19世纪自由主义的社会与政治设计及实践,超过仅仅揭示时疫本身。就牵涉进来的整个情况而言,从城市行政管理的业余,到城市里诸多贫民窟的人满为患,再到该市医疗界信持的关于疾病传播的特殊理论。主要的原因似乎是没有将汉堡供水系统现代化,当然,这需要长篇大论的解释。

145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延伸至1830年代到1892年时疫爆发前这段时间,所有的这些原因都表现出来呢?最后,经过大量实践和撰写时在大量资料中的游移,我提出一个混合的叙述和分析,我希望当我们在书的第二部分越来越逼近关于这个时疫的叙述之时,读者也能产生逐渐增长的悬念感与兴奋感。故此,我把那些原因分割成十二类,每一个都在时疫的兴起与传播中扮演主要的角色,至于这个角色究竟为何,我将某些信息引而不发,直到我们触及时疫本身,叙述的悬念由是产生。该书叙述了从大约1830年到1892年春季或夏季(时疫始于8月)这段时间内每一个原因类,所以在实际上它是呈现了十二个不同的叙述,每一个都建基于一个原因层之上,这个原因层又是奠基于以前的,并且在叙述过程中不断修正它们。始于那个最一般的——城市行政管理的业余性——通过分析政治不平等、贫穷以及掌控城市行政优先花费的诸多因素,到

分析环境污染的加重与公共卫生的缺乏,再到分析没能建立一个正确的水供给净化制度及大众营养的缺乏,所有这些因素没有被明确表达出来,只在书中进行了暗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加深了1892年这场霍乱的恶果,短短六周时间内,汉堡一市居然有一万人死于这场疫病。接下来的六个叙述,每个再次初始于19世纪早期,延伸至霍乱爆发前夕,讨论了汉堡即使在正常时期的那些非正常的死亡与疾病形态,这种对非正常死亡与疾病的不闻不问,阻止了当地医护人员早早干预疫病防治,导致了汉堡对早先死亡较少的时疫反应迟钝,1830年霍乱终于现身德国,之后隔断时间就重复发作一次,医学理论开始去说明它,但霍乱在1892年期间重现,这些都为叙述这场霍乱设置了场景。

146

我心里从来没有怀疑,伊始之际,我就是在书中建构一个整体性的叙述,这意味着一套因果解释,即关于霍乱为何会在1892年的汉堡爆发,而非别处(与像不来梅这样的城市比较而言)。这套因果解释在书的结尾,被我用相当简单和概括的形式进行了重申和强调。在此处我认为,时疫之发生在于导致其发生的霍乱弧菌病原,此病原由俄罗斯迁往美国的移民携带,透过一系列的安全网传播,霍乱弧菌所导致的症状不同程度上都在其他一些城市发现,可没有在汉堡发现;对这个疾病的传染性,汉堡医疗界持有怀疑立场,这阻止了他们采取正确的隔离措施隔离这些移民,耽误了通告突然发生的疫病;又没有能净化供水系统,反而把病原输送到每家的水龙头;拥挤、不完备的卫生设施,不洁净的住宅,都加强了人与人直接接触的传染性;颞顽无能的行政机构难以遏制一发不可收拾的瘟疫。将这个问题用彻底不同的一种方式表达出来,也是相当可能的。我列出十二种并列的因果式叙述的原因,主要是出于美学上的考虑:它仅意味着最简洁的、最经济的,首先是最令人兴奋的和最让人感兴趣的组织与表现历史事实的方式。尤其是,它貌似是最好的方式,

147 通过运用这场时疫所导致的有意思的、丰富的材料，来寻找一个城市的日常生活、社会结构和政治处置的方方面面，这也是本书全部的主旨所在——证明自由主义的放任政策无力解决大规模的城市工业化增长所带来的问题，进而由于接下来的灾难，自由主义被迫为“普鲁士式的”（Prussian）国家干预让路。<sup>①</sup> 在此个案上，提供一个“单一的”编年纪叙述毫无问题——甚至不去叙述时疫本身——因为期间有太多事情与过程同时发生。纯粹依据编年纪的方式来安排之，也能提供一个详尽的叙述记录，而根本不管解释的力量。对我来说，该书的结构似乎是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可以将许许多多的实证材料圆满组合起来，以支持一系列因果论证与假设。

许多历史叙述都是由被揭秘的（revealed）、被重塑的（reworked）、被建构的（constructed）和遭到解构的（deconstructed）叙述混合构成，这些叙述来自于历史的过去和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我们始于一块天然的石头，对之进行精雕细琢，直到其成为雕像。雕像并非如守株待兔，坐等我们发现之，而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而且完全可能雕琢出一个与我们雕成的这个不同的塑像。另外一方面，我们不仅受到那块石头天然的形状与尺寸的限制，也受到石头石质的束缚；一个不熟练的雕刻家不仅要冒制造一个难成形的、不能让人接受的雕像的风险，还要冒操作不当如敲打太猛或斧凿太深，乃至毁坏石头的风险。

148 我们不得不在物质的界限内工作。这些界限是精确和严格的。在一些个案上，叙述就在我们正在书写的过去的人之生活与思想当中，比如，19世纪德国与意大利的统一，或18世纪美国的形成。在另外的个案上则又不是如此。尽管历史学家意识到以下这个事实：

---

<sup>①</sup> Richard J. Evans, *Death in Hambur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Cholera Years 1830 - 1910* (Oxford, 1987).



即生活在过去的人们正自觉地活在一个为历史学家所相信并打算将之形塑出来的故事中,但历史学家从来也不会只满足于生产出这个故事,它必须与其他故事相提并论,其潜存的意义务必要被发掘,故事中的缺陷与毛病必须被揭露。历史学家不光要解构别的历史学家的叙述,他们同样也要解构关于过去的叙述。

海登·怀特某种程度上有些自鸣得意地指出,历史已经变为想去“在复杂中发现简单、在陌生中发现熟悉”的人的“一个庇护所”。<sup>①</sup>假使这话适用于过去的历史学家,它也肯定不适于今日。它可能是历史研究中的后现代转向之一部分,因为有那么多的关于过去的非理性、稀奇古怪和出格事物的工作在做。然而在实际上,甚至从19世纪早期起,历史学家的一个主要目的始终是在陌生中发现熟悉,减少我们自己与过去之间的距离。实证史家不断告诫我们,过去之复杂远迈那些伟大的、超历史的宏大叙述之所承认的。返回1950年代,自由主义的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甚或担心历史学家致力于“重新发现社会利益集团的复杂性……不仅使我们对过去社会在结构上的复杂性有较为敏锐的认识,还能意识到导致政治稳定的社会行动之复杂性”<sup>②</sup>。这种政治上的重要性正是如艾尔顿爵士之类的保守主义者所欢迎的。职业史家往往会反对这样“过度简单化”(oversimplification)的做法,而非从中不能自拔。

后现代主义评论家桑迪·柯文比霍夫斯塔特走得更远,他认为,就其自身而言,历史叙述在本质上是反智的(anti-intellectual)。他说,历史学家“使用叙述法,就是为了让思想走上旁门左道”,柯文

①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Baltimore, 1978), p. 50.

②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1968), pp. 463 - 466.

谴责他们“监护式的叙述法所带来的粗暴娱乐”，期间“读者甚至不被允许去思考”。他认为，由此可以说，历史是“资产阶级社会话语”的一部分。通过将注意力聚焦于过去，历史学家开始“攻击当下”，认为“这种思考方式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把当下视为某种关乎一切而又不能达到”之一部分。基于这些立论，柯文接着谴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E. P. 汤普逊，认为汤普逊之驳斥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一种“对于非叙述性的一种野蛮的排斥”，显现出对“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一种“可悲”屈从，以及对“批判思维”的一种最为反马克思主义式的拒绝。尽管海登·怀特对历史作品的分析会被看作“对历史学科的防御性保护”而被拒绝接受，但这会让像艾尔顿、马威克这样的许多历史学家吃惊，因为他们对此别有幽怀。<sup>①</sup>如同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那样，柯文大大低估了历史阅读者的批判能力，而过高估计了历史学家左右读者思想的能力，即便他们使用“监护性的叙述”（tutelary narration）。相反，一些别的后现代主义观点，在另一个极端，声称读者把意义加诸叙述之上的能力不受局限。然而，无论把读者当作彻底的被动，还是视其为积极能动，两种观点都有乖事实。

150 许多历史叙述已经能为当下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提供历史根据或灵感。阅读或书写有关女权主义者在 19 世纪为妇女赢得平等权利和人类尊严而战的历史，绝不会让我们停止思考目前妇女的境况。事实上，正相反，这也是当今的女权主义者花费如此之多心力在此的原因。把叙述视为狭隘的与反动的神话，认为其与历史真相毫不相关，这是非常错误的。按照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这种特别的批判观点在法国的始作俑者看来，苏联和华约

---

<sup>①</sup> Sande Cohen, *Historical Culture: On the Recoding of an Academic Discipline* (Berkeley, 1986), pp. 19 - 21, 171, 174, 228, 326.

集团的官方历史编纂学是一个“宰制叙述”(master-narrative),由国家强加并将之神圣化。相形之下,利奥塔所谓的“地方叙述”(local narratives)是一些反抗形式,由囚犯、学生、农民,以及各种持不同政见者所讲述的个人故事,它们不可能被整合进官方的事件版本,并且还会直接颠覆这些官方版本。不像宰制叙述,地方叙述并不宣称其全知全能或者具有普世的有效性,它们并不声言可以得到客观的历史真相,而是坦诚其主观性。<sup>①</sup> 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而论,历史包含着、也应该包含着大量的地方性故事。毫无疑问,利奥塔定义“后现代主义”仅是“对宰制叙述的狐疑”<sup>②</sup>。然以下的说法就为不真了:如利奥塔打算说的,他认为宰制叙述就是由掌权者所讲述的霸权故事。马克思主义的宰制叙述本身,数十年来,在其许多不同的变体里,都是由一些被压迫的少数人发展的;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关于女权主义史或同性恋史或黑人史的宰制叙述中,宰制叙述并非必定有压迫性。

一般说来,历史学家不仅在积极地构建地方叙述或反叙述(counter-narratives),而且他们也乐此不疲地攻击每一种宰制叙述,杰夫里·艾尔顿爵士对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责任特别地坚持。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他们的任务与其说是在创造叙述,倒不如说是在破坏它们。艾尔顿在将近晚年时,就曾宣示:“自历史研究变得专业化以来——也就是说,变得系统化、精确性和以材料为本以来,历史研究就再三地破坏那些为某些特殊利益服务的阐释,尤其是那些为

151

---

① 参看 Geoff Bennington, *Lyotard: Writing the Event* (Manchester, 1988) 和 Jean-François Lyotard, *Dérive à partir de Marx et Freud* (Paris, 1973), 以及 *Instructions païennes* (Paris, 1977)。

②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1984), pp. xxiii - xxiv.

国族的自夸和自信服务的阐释。”<sup>①</sup>对艾尔顿来说,那些不断流行在第三世界的国族历史神话,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他抱怨道:“如今的世界在一些不可靠的青年人掌握之中。”<sup>②</sup>泽尔丁以他自己较少夸张的方式回应艾尔顿,声称:“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都是半斤八两;他们说一些不能去做的事,而不是应该被做的事。他们还没有预言者有魅力,只不过是宫廷弄臣。”<sup>③</sup>当然,中世纪时代的宫廷弄臣并不只会娱乐和搞笑,还在告诉他们的观众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历史学家往往把历史看作是神话的一个破坏者,而非制造者。

在解构神话时,历史学家经常要找到足以取代神话的叙述,这些叙述要更紧密地建立在资料基础之上。但在当代的历史学家中,叙述绝不是历史再现的宰制模式,如眼光依恋在关于19世纪史之宏大叙述上的后现代主义者喜欢宣告的那样。实际上,在社会科学的影响下,近代的历史学家已经彻底放弃了将历史资料按时序呈现的做法。也许,除了在过去三四十年里导论性的教科书以外,绝大多数的历史著作都尽力避免让书之结构受到时序的影响,这种情况尤其见诸学术论文(articles)和学位论文(theses)中。进言之,本世纪早期最著名的历史著作也已经避免使用叙述的方式:纳米尔的《乔治三世时期的政治结构》一书,试图去揭示隐藏在事情表象之下的那个深层而且相对稳定的结构。杰诺维斯(Eugene Genovese)的《滚动吧,低速磨浆机,滚动吧》(*Roll, Jordan, Roll*),甚或是威勒(Wehler)的《德意志帝国》(*Kaiserreich*),都是结构主义的历史著作,它们的时序,要么是被冻结,变成所研究那个时期之前和之后;要么在他们有意设好的关于大的连续性声明中被完全抛弃。历史老师首先警告学生的就是“避免叙述”,只有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才能

---

① Elton, *Return*, p. 44.

② Elton, *Return*, p. 45.

③ Zeldin, 'Social History and Total History', p. 245.

获得高分,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反映了以下这样一个比较广泛的意见:即在 20 世纪历史专业内的各个层次,对历史研究和历史学界的现状与交流情况的看法。<sup>①</sup>

#### 四

历史叙述不必一定要沿着时间之箭而前行。近代最为著名的一些历史作品反而是倒序的。英国的法律史家麦特兰(F. W. Maitland),在其著作《英国土地清量书册及其超越》(*Domesday Book and Beyond*)里<sup>②</sup>,就用倒序,回溯到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在 1086 年大规模的丈量领土、制订土地清量书册之时,探究经年累月形成的关于习俗和法律的报告册。当他回顾这几个世纪时,也揭示了越来越早之前的土地所有权和留居地的类型。在这个意义上,“超越”(Beyond)是指回顾到越来越远的过去,从 11 世纪晚期的观点来看。德国民族主义史家休尔穆·狄华特(Hellmut Diwald)也依倒序的方式,撰写了一部德国史,他开始于当下(在其写书时的 1970 年代),从他之所见其国家在 1945 年后经历的羞辱、分裂和无能为力写起,上溯至越来越光彩的过去——一个他明显希望此书将刺激他的读者缅怀的过去。<sup>③</sup> 无论其目的何在,倒着写历史的方法长时

153

① Namier, *Structure*; Eugene D. 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New York, 1974); Hans-Ulrich Wehl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 - 1918* (Göttingen, 1973).

② 此处原作者漏掉该书标题中的“Book”,笔者根据下个注释及《捍卫历史》的英文旧版进行了补加。——译者注

③ F. W. Maitland, *Domesday Book and Beyond: Three Essays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England* (Cambridge, 1897); Hellmut Diwald,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rankfurt am Main, 1978).

间都是历史学家的惯用手段(虽然是有点过时的手段),这也是历史学家用来成功摧毁法国历史学家富兰索瓦·西米昂(François Simiand)于20世纪初所说的“时序崇拜”(the chronological idol)的诸多手段之一。<sup>①</sup>

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线性时间观的同时,却忽视了这个事实:即历史学家长久以来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习惯采用多种的变动时间概念。的确,我们可以说,正是这类的线性概念让他们明显有别于编年纪者(chroniclers),这些编年纪者的时间观念在根本上被限制在按年月日纪事上。<sup>②</sup>即使在最为传统的各种政治史中,当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时,历史学家会迅速跳跃数年,甚至几十年,进而聚焦于像法国1789—1794的革命时期,当时在一个月内发生的重要性事件就抵得上旧制度(*ancien régime*)下一年内所发生的重要事情数量。有些时期,政治史似乎在加速演进,例如在1917年的俄国;有些时期,则步履蹒跚,比方在佛朗哥将军(General Franco)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历史学家对这样一种观念屡见不鲜,即某种相似的历史进程会在不同时间中于不同的国家内发生。比如,工业化在1780年代的英国肇兴,然而直到1840年代才在德国、1890年代才在俄国发生。一个社会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走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这样的“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始自18世纪的法国,却在大约一个多世纪后,才出现在意大利。

154 对于不同种类的历史,存在不同种类的分期法,实证史家对此观念司空见惯。最明显的是,经济变化与政治变革有相当不同的步

---

① 转引自 Peter Burke, 'Preface' to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Manchester, 1992), p. xvi.

② 有关这类无知的例子,可参看 Somekawa and Smith, 'Theorizing', pp. 155 - 156。

调。比如说,军事技术的历史变化也有自身独特的步调,文化和艺术也是如此。近来人们也认为,妇女史的分期与男性史的分期应该迥乎不同。这些课题内的任何一种领域的改变显然会影响到其余领域。而把所有这些领域的变化都纳入传统的时间单元内——其主要依据一些重大政治转折点而划分,尽管在有关国族历史的教科书中,如此做法是习以为常,可这一做法乃人为造成,无所助益。就此而言,后现代主义对于线性时间观的质疑有助于提升对此的认知,因此它是受到欢迎的。<sup>①</sup>但在传统意义上,以政治作为分期根据的做法总是为历史时间的不平衡性(unevenness)提供证据,同时也为掌控在历史学家手上的时间之可伸缩性提供了证明:比如,在现代欧洲政治史中,19世纪在传统上是指1815—1914年,而别的一些观点则是指从1789—1914年;“短暂的20世纪”是从1914—1989年。

有些历史学家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也建立不同种类的历史时间观,最著名的当属费尔南多·布罗代尔,他说在他撰写《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去“显示时间是在以不同的速度前进”<sup>②</sup>。最快速发生的是政治事件,布罗代尔在其书中第三部分进行了详述。在此,事件尽管不太均衡,但是频繁发生,战争、谈判、宫廷阴谋、政争为“历史的大潮在其强大的背上兴起的表面扰攘和涌起的水花”<sup>③</sup>。在布罗代尔大著的第二个部分,这些历史大潮被讨论:缓慢移动的社会、经济趋势,常常不为时

① Southgate, *History*, p. 114.

② 转引自 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 - 1989* (Oxford, 1990), p. 39.

③ 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 - 1989*, p. 35.

人察觉,还有改变中的军事技术、社会结构和政权体制。最后,在时间海洋的最底部,则是寂静不动的深水,“在其中,所有的变化都很迟缓,是一种不断重复、永远循环的历史”。在《地中海》一书的开场中,他以冗长的篇幅,描述了这一层“不动的历史”——“长时段”(longue durée),前工业社会变化的可能性,受到几乎不变的自然环境力量的制约。<sup>①</sup>

接着,这一缓慢进行的深层历史派生出持久稳固的信仰或“心态”系统,别的历史学家,像让·戴路米奥(Jean Delumeau),在他的《西方恐惧史》(*History of Fear in the West*)一书中,即在以数百年为期的一个时段内展开,这段时间里,人们的信仰或“心态”似乎没有多大改变,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变化。<sup>②</sup> 回顾起来,法国的历史学家似乎常常会夸大此类事物之不易变化的程度:布罗代尔因为将地中海沿岸的自然环境视为一个既成不变的环境,不去探究它被人类活动改造的方式,而遭受强烈的批评。例如,为了造船、建筑、燃料所需要的木材,对森林进行的大规模砍伐。他也没有很清楚向人们显

---

①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2 vols., London, 1972 - 1973). 有怀疑论倾向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不管如何,都给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一书贴上了“叙述史学”的标签,因为后现代批评家认为该书并不依赖这样一个简单化的理解,即把叙述当作是按序列描述事件。有鉴于还有一种更深刻玄妙的看法,它会把行动、事件、人物和背景等联合起来,最后提到的背景,当然在布罗代尔的这部杰作中俯拾皆是。有一些人实际上已经试图定义叙述,而不是仅仅预设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对此至少我们是欢迎的。但他们对叙述下的定义太包罗万象,以致这样的定义没有多少实际的效用,而且他们完全没有顾及历史学家对此概念的常识性用法,也完全违背了布罗代尔使用“事件史”(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以事件为基础的历史——之初衷。(布罗代尔该书有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译者注)

② Jean Delumeau, *La Peur en Occident (XIVe—XVIIIe siècles), une cité assiégée* (Paris, 1978); *La péché et la peur: la culpabilisation en Occident (XIIIe - XVIIIe siècles)* (Paris, 1983).



示,他这三种不同的时间层次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年鉴学派的典范从不擅长解释任何一种层次上的历史变化:其在因果关系上的兴趣经常是相当有限的。虽然如此,对这些无可置疑的问题,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在某种程度上,它显示了一种前人甚少使用的撰写手法,其所使用的记录历史时间的方式不同于线性时间。在许多方面,它都与线性时间截然相反:不是一成不变、理所当然的时序,而是一种历史学家必须予以讨论的建构。

后现代主义的新时间观之最具体的形式,可以于建筑设计上窥豹一斑。后现代建筑把好几个世纪的建筑风格混杂在一起,达到一个新的结合体;后现代小说把不同时期流行的文类掺杂在一起,或者,甚至把不同时代的活动场景交汇在一起。<sup>①</sup> 但是,这并非真的只是在排斥时间的历史概念,只不过是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使用之,就像现在的音乐界喜欢以 18 世纪的乐器来演奏,力求原汁原味的 (authentic) 表演,或者至少以一些复制品(在一个更精细的层次上,复制品会引发是否还原汁原味这样的关键问题)来演奏,而不用现代的乐器代替。后现代主义的这个方面也许能够当作对历史学家所提的一个建议。我们为何不采用过去两个世纪发展出来的那些千奇百怪的历史书写类型,以丰富我们今日的历史实践呢? 例如,为何我们要故步自封死抱一个特定的书写模式呢? 为何我们不能从麦考莱、布罗代尔、结构式的历史学,以及事件史、外交史、经济史、文化与社会史等等的种类中汲取营养,并将它们编排成一种新的结合体? 很大程度上,历史分期是大学里教学大纲的一项功能,通过分期让历史化为简明的按照时序排列的部分,分出来的每一期,都可

156

---

① 或许让人糊涂的是,伊丽莎白·戴兹·艾玛斯 (Elizabeth Deeds Ermarth) 把后现代主义的起源回溯至 20 世纪之初,因此,便把现代主义的艺术、音乐和建筑从现代中排除了。

以用多卷教科书系列之一本来讲授,继而进一步强化各个时期之间的界域。如果后现代主义能够帮助我们摆脱这种尴尬的掣肘——即强加给我们的关于过去时间的分期方式,那将只有好处。<sup>①</sup> 广而言之,如果后现代主义使我们在历史的书写和研究中更能意识到一些方便可得的书写模式,这就会极大丰富当下作为历史学家的我们的实践。

## 五

因此,在根本上,逝者如斯夫,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太多苦痛,我们不得不面对此事实,我们不能仅通过这样的宣言就放弃它,157 此宣言如安克斯密特之言,在 14 世纪与 20 世纪之间,并不存在差别,或者认为时间只不过是一些不相关联的当下之点的一种集合;或宣称这个世界的文本性(textuality)放弃了前因后果这样的原则。像有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的,我们仅能从事物的结果来推知事情的起因,因此结果是起因的来源,这就颠倒是非对客体的探究序列。历史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信仰之上:当下区别于过去,并来源于它;现在也指向有异于现在的未来。根本上,每个人都会知道,当下乃是因过去之影响所致,今天所发生的能够影响或者引起明天或后天所发生的;我们今天制造的文本与其他物质客体,为人们试图在未来认识我们提供了基础。诚如佩瑞·查哥林之总结:“……认定历史编纂学能够摈弃因果关系的概念,这是一种错误的幻想。”<sup>②</sup>

如果时间必然按其铁面无私的序列推进,它仍然不能解决基本的历史中的因果关系问题,只是让人们有可能去思考它。其原因是

---

① Kenyon, *The History Men*, pp. 195 - 196.

② Zagorin, 'Reconsiderations', pp. 269 - 270.

什么,再明显不过了;我们可以有**必要的原因**(若 A 不会发生,那么 B 也不会),和**充分的原因**(A 发生,足以让 B 发生)。至少在第一个分类里,我们可以有一些重要性不等的原因,即**绝对原因**(若 A 不会发生,那么 B **必定**不会发生)和**相对原因**(若 A 没发生,那么 B **可能**不会发生)。当在陈述他们的意见时,历史学家习惯按照严格的三六九等分类来评估事情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在实践中,面对具体的历史个案研究时,他们对因果关系的讨论并不会采用概要式的做法。许多历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都会避免用一种“单一因果关系的解释”(monocausal explanation)。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习惯于这样一个观念:历史事件常常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即它们也许拥有数个充分原因和必要原因,其中任何一个原因或许都足以引起该事件以自身的逻辑发生。但是,一般而言,历史学家把确定原因的**轻重缓急**视为他们的职责,并且,还要去解释一个原因与另一原因之间的相关性。一位这一程序的辩护者指出:“如果反对把原因严格地加以轻重缓急这样的区分,这可能会导致人们拒绝承认任何一种原因之优先性,让人们只会去描述那些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相对有效的和难分轩轻的各种动力。”<sup>①</sup>大部分历史学家通常都会试图避免这样的事发生。

历史解释的程序一般是把一个事件,或一个过程,或一个结构与更为广泛的历史语境联系起来进行,例如,把一份文本放到制造它的那个社会之中,把一个政治党派的行为与身属这一党派之人的社会认同相联系,或是将正在上升的死亡率与不断加剧的贫困、营养不良、环境恶化和疾病之间联系起来。一些后现代理论不认为存在把文本从语境中识别的可能性,从而拒绝以上这种历史解释的程序。然而,在某种条件下,正如我们先前在本书中看到的,确实存在

---

<sup>①</sup> Kirk, 'History, Language, ideas', *Social History*, p. 227.

159 将一份历史资料从它所指谓(部分指谓)的过去事实中分辨出来的可能性,而且,如果说以下这种做法是有意义的话:即把这份资料及其所指谓的过去之事实,与别的资料及其所指谓的过去之事实进行对比,那么这个程序还是会保持其正当性的。无论如何,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说,语境自身是无限的,这确凿无疑。因为历史学家并不会比别的人更足够的时间和心力,故而他们不得已只能从这种无限中切取一个小片段或者一个小部分来研究,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的预设和意图会是至关重要。要把一份历史材料与其语境联系起来,最重要的是,端赖于人们对这份材料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一旦人们做出决定,提出的是此套问题而非彼套问题,沿此思路,关于此套问题的一些特定语境必须被考察,而非去考察另外一些特定语境。进而,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就会存在历史学家必须要遵循的某些固定路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学家必定要重构他们所阅读到的材料之所处语境,但若是研究的起始径路被确定,这种重构语境的可能性就绝非如天马行空。况且,研究的过程中经常会导致历史学家发轫之际没有意识到的新语境之产生,然而其与研究主题却明显相关。这些新的因素能够削弱或极大地改变这个历史学家关于过去之形貌的初始概念。

尽管如此,这并没有使通过语境来寻求解释的程序彻底失效。历史学家选择的赖以施展身手的语境远远不是随意的,不管这会粗暴地把那天衣无缝的历史之网撕裂成多少碎片。一旦历史学家接触到的领域与他们试图解释的太过偏离,以至于其间之关联变得南辕北辙,他们通常会停止追寻具有说服力的语境。更重要的是,历史解释的性质恰恰就是我们要寻找什么语境的问题。近来向文化史与心态史转移,已经严重削弱了像卡尔之流所理解的历史因果关系概念。对于文化和语言的新强调,破坏了常见之于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和新韦伯主义的社会史中那种优先考察原因的做法,

在其中,经济因素通过社会发挥作用,依次被政治和文化因素表现。但如今,经济决定论被文化决定论取而代之,其中,文化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而缺乏任何一种普世性的解释力。犹似傅柯和德里达业已拒绝追求事情之起源和原因,并将这样的追求行为视作徒劳无功。所以,一般而言,后现代的解释理论挑战了任何有别于按照文化建构模式来解释文化建构的做派,早如我们之所见,恰恰是来自此种观点的作祟——文本之外别无他物。<sup>①</sup> 当文化史、思想史,甚至高层政治史(history of high politics),都已经从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的新理论和新取径中获得了激励,而主要的受害者则是社会史和经济史,它们曾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经历了最大规模的增长和扩张。这些是我们接下来一章所要探讨的内容。

---

<sup>①</sup> Appleby, Hunt and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pp. 223 - 225.

## 第六章 社会与个人

—

161 很长一段时间,政治史主宰了专业史家的关注点。如19世纪后期剑桥大学钦定近现代史教授约翰·西雷爵士(Sir John Seeley)所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而政治则是现在的历史。”<sup>①</sup>对政治史家而言,“历史”往往与探究高层政治相关。因此,当保守的美国史家格特德·希摩法(Gertrude Himmelfarb)坚持,“应该放更多的历史于社会史之中”,不言而喻,她这里的“历史”指的是“更多的政治”。<sup>②</sup>作为一个大学中的科目,在19世纪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中,历史学显著

---

① 斯科特(Joan W. Scott)不指名地责备她的美国同行把这句话归为赫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之言,但她自己把它归为爱德华·弗利曼(Edward Freeman)之语,亦同样有误(Joan Wallach Scott, 'History in Crisis?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p. 680 - 692, 引文在 p. 680)。此语正确的来源是西雷(seeley)爵士的 *The Growth of British Policy* (London, 1895), 参看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3<sup>rd</sup> edn., Oxford, 1979), p. 419。

② Gertrude Himmelfarb,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New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p. 661 - 670, 引文在 p. 663。

地表现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政治史,以及它与其他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史。高层政治史和国际关系史雄踞其上。历史系出自伟人之创造,这些人物在道德上、政治上都被视作独立自主的个体,其决定首先反映的是他们自身的人格特质,而非任何较宽泛之外力。这种研究取径在专业历史学领域内拥有如此强势的地位,导致社会史家与经济史家不得不在大学里设置他们别具一格的系科,以便能在学界分一杯羹,进而宣称他们自身的特殊技能构建了一种完全有别于正确历史学(history proper)的独立学门<sup>①</sup>。两次世界大战,不但没有削弱反倒强化了“国王与战争”(kings and battles)式研究取径的霸权地位。甚至到了1990年代,历史本质上就是政治史的成见,依旧在史学界根深蒂固,与之相关的信念——即相信历史出自一些道德上、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个体所创造,如我们所知,依然没有寿终正寝。

162

为数颇多的杰出史家都宣示他们蔑视过去大多数人的历史,将之视作微不足道、无甚意义,或无法研究。例如,伟大的路韦士·纳米尔爵士在伦敦口试一篇讨论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期间群众运动的博士论文时,即尖刻地质询该博士候选人:“你为什么要殚精竭虑去研究这些匪帮?”<sup>②</sup>他认为,每一时代的历史都是由一小群人擘划的,这些人具有实现这一任务所需的意志和行动自由,而历史无非就是去发现何以使他们如此工作而已。他写道:“不管神学家和哲学家可能发展出哪种有关个人的‘自由意志’(free will)理论,都无法表明群众的思想与行动具备自由意志,也无法表明行星运转有自由意志,飞鸟迁徙有自由意志,北极鼠(lemmings)成群结队跳入大海有自由意志。”历史学的关键乃是去研究“一些举足轻重的人”

① 一般是指主导性的历史学研究,这里是指政治史研究。——译者注

② 转引自 Richard Cobb, *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 (Oxford, 1970), p. 81.

(people who mattered)——用纳米尔的助手兼门生约翰·布鲁克 (John Brooke) 的话来说,“整体而言,工人、农民为鸡毛蒜皮”,因之,“史家无需关注他们”。<sup>①</sup> 在这一相当势利与精英的态度上,较之屈威廉——一个在历史思想的许多方面都与纳米尔格格不入的角色,纳米尔或许是小巫见大巫。屈威廉出身望族,他带着乡愁缅怀18世纪那个天下太平的世界,在其中,他所属的阶级——拥有土地的乡绅阶层,已经随风而逝。他厌恶工业革命和大众获致优势的时代。在历史研究上,他对于较底层社会的那种家长式的、高高在上的姿态,是其著作在今日已不再为人所阅读,亦是其将来会继续遭遇冷落的主要原因。尽管他还获得像其传记作者大卫·坎纳丁之流的拥护。<sup>②</sup>

像杰夫里·艾尔顿爵士和希摩法之流的史家强烈提倡,(历史需要)回归到依靠民族国家之研究的传统政治史。<sup>③</sup> 但这只是螳臂当车。希摩法或许可以在一些思想类杂志上博得右翼作家的喝彩,不过在专业的历史学家那里却收效甚微。历史学已经变得太过纷繁复杂,这类的主张根本没有可能拦阻自卡尔和艾尔顿撰成其著之后数十年内,在历史研究上已出现的浩浩荡荡新潮流:像社会史、计量史、微观史、文化史、妇女史、同性恋史、黑人史、心理分析史,如此等等。现在,只有一小部分人依然在书写政治史。在眼下的英国,事实上,漠视或轻视这些新趋势似乎会被视为荒诞不经,一个例证是当约翰·文森特教授——少数还在从事政治史研究的史家之一,向牛津大学出版社缴出他那本受委托撰写的《历史学导论》(Very Brief

---

① Mehta, *Fly and the Fly-Bottle*, pp. 187 - 189.

② Cannadine, *G. M. Trevelyan*.

③ 参看 Lawrence W. Levine, 'The Unpredictable Past: Reflections on Recent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p. 671 - 679, 引文在 p. 674。



*Introduction to History*)初稿时,出版商即以这一理由给予退稿。<sup>①</sup>

然而,希摩法、文森特与其他对这种精英观点的政治史进行捍卫的人,在他们努力将历史限制在对精英的研究,以及在将过去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和行为视为漠不相关和无足轻重的论战中,却有一些出人意料的盟友。例如,卡尔认为,只是到了晚近的两百余年左右,“人民大众……才完全进入了历史”,因为,只有在此期间,“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意识才传播到如人民大众这样的人群中”。<sup>②</sup>就这段语境中的“历史”而言,根据卡尔之意,指他所谓的“理性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reason)和进步的过程。因此,他清楚地认为,在平常人于政治运动中团结之前,乃至对近代世界的形成有所贡献前,他们的历史并不值得被研究。更为晚近,约翰·文森特宣称,因为历史仰赖于书写材料,而过去的大部分人既不能读,也不能写,“历史只能直接是出自少数人的讲述”。他断言,尚未发明文字或根本无文字社会的历史是“不靠谱的”(unsound)。<sup>③</sup>大致而言,这类意见无法说服当今的历史专业圈。因为历史学家在由政府和社会上层人士编纂的,有关这些群体的各种文字记录的助力下,已发挥了高度技巧去利用一些非文字性的材料,以建构出尚未发明文字社会群体的历史。有诸多理由可以说明近代之前的那些无权力的大众之历史为何值得研究。大众的死亡、疾病、婚姻、性、信仰和感情等的历史,在许多关于人类生存状态方面已经被揭示良多。在过去几十年,历史学家已铁心罔顾纳米尔和卡尔的“忠告”,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注意历史上那些被精英圣贤看作默默无闻从而加

164

① 他接着将书稿给了另一个出版商,挑衅性地重置标题为《一个智者对历史学的擘画》(*An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to History*, London, 1995)。

② Carr, *What is History?*, p. 149.

③ Vincent,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pp. 1-8.

以鄙弃的人民大众。

165 历史学家在方法论意识上也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在20世纪末，历史学家正在书写几乎每一种所能想象得到的过去之人类活动，也同样地涉及有关动物、植物、自然环境，以及被人们建成与构建的机械世界和人类居所。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下，有了恐惧、气味、疯狂、童年的历史研究；在英国激进的新马克思主义冲击下，“来自下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试图采用过去平常男女性的观点，去书写他们的经验，并以他们的眼光来看待国家、政治和社会；在那些相邻的或看起来相隔遥远的学科影响下，有了身体、医疗和科技、健康和疾病、大众文化、过去看似非理性与无法解释的民间信仰的研究；在德国和美国的科学社会的保驾护航下，有了对过去的城市和乡村社群、宗教实践、罪行与罪犯（crime and criminality）的计量化的结构性研究。现在，几乎对当代人类有意义或重要的每一物事，都有写成的历史；当然，这指的是对所有各色人等都重要，而非仅对一小部分有教养、有权力的精英重要的每一物事。不管其是多么渺小、无力，不管其是文盲或是缺乏教育，几乎生活在过去的每一类人，如今都从汤普逊所谓的“后世之谦恭”（the enormous condescension of posterity）——此言给了那些自负的政治史家一记响亮的耳光——态度下，得以被拯救。<sup>①</sup>

## 二

166 以上几十年，在拓宽历史学家关于过去的研究视野方面，影响最大的当属社会史的兴起，这在每一个国家都发生了。首先，它源

---

①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 12.

自 19 世纪的英国,受到了麦考莱《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著名的第三章的影响。这一章探讨的是 17 世纪晚期的英国社会,其后便激发许多仿效者,尤其是在麦考莱学生的研究工作之中,直至约翰·普鲁姆爵士(Sir John Plumb)那本关于罗伯特·华尔波爵士(Sir Robert Walpole)的未完成传记之前两册,都还在以类似手法描述 18 世纪早期的英国社会史。此种研究取径到了麦考莱的外孙屈威廉那部广为流行的《英国社会史》时达到极致,《英国社会史》成为当时最为畅销的英国历史书。屈威廉心安理得地从他认定所有读者都会熟悉的英国文学史中,获得他所需要的线索,并将书中各个章节冠以“乔叟(Chaucer)的英国”、“莎士比亚的英国”、“笛福(Defoe)的英国”、“约翰生博士(Dr. Johnson)的英国”诸如此类的名称。<sup>①</sup> 这种研究取径引发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它太仰赖具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作为第一手资料,因而常误入歧途。它如此借重文学资料,意味着其太专注于那些有识字能力的少数人之历史了。它之于社会理论,或者说真正的社会解释,彻底是不得其门而入。

最要紧的是,它从反面界定自身——用屈威廉的著名术语来说就是“政治罔顾的历史”(history with the politics left out)。这种历史研究取径终极上又可回溯至麦考莱,《英国史》的第三章刻意地为占据此书其余部分叙述的政治史提供一个衬托或背景。此种模式在格林(J. R. Green)出版于 1874 年的《英国人民简史》(*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中首次以整本书的形式呈现。在该书中作者宣称,他“宁愿轻柔地、简略地带过(政治史的)细节”,而着力于要“细说宪政、思想和社会进步的点点滴滴,因为从中,我们能读到这个国家自身的历史”。<sup>②</sup> 然而,这种研究取径很快就被取而代之了。大学

167

① G. M. Trevelyan, *English Social History* (revised edn., London, 1978).

② 转见 Kenyon, *The History Men*, p. 167.

里的社会史是以经济史之附属品的身份出现的,当经济史系科在 20 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中被建立时,其通常就收纳一小部分史家——他们的研究领域是 19、20 世纪的人民生活水平、商会,以及工业界的“劳方”,这些都与工业化相联系的历史(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麦考莱、屈威廉,以及如普鲁姆爵士这样的追随者,某种程度上都怀着乡愁,宁愿致力于乡村世界的历史研究)。

这又点出了社会史的第二种起源,其在欧陆更为普通。在这里,“社会问题”这个术语出现在 19 世纪,用来指一个贫穷的工业工人阶级的出现,自然地派生出“社会运动”的概念——这些工人组织起来解放自己,以及“社会革命”的概念——经由此径,他们认为将有可能达到解放自己的目标,因之而来的“社会史”概念——借之来描绘这些生存状态与憧憬。所以,“社会史”多年以来在实际上指的都是劳工运动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劳工运动。如今,“社会史”这个术语依然被这些杂志转用,如法国的《社会运动》(*Le Mouvement social*)、德国的《社会史文献》(*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以及最重要的以荷兰人为主的《社会史国际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其由在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史国际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cial History)编辑出版,该所珍藏了马克思、恩格斯与许多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早期的一些重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文件。社会史与 19 世纪劳工史合流的情形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较为晚近的期刊如英国的《社会史》杂志上——该期刊尤为关注特定的调查领域,凸显劳工史家大致在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式研究取径的总体框架下,彼此之间的讨论和争议。

168

不过,社会史这个概念,早就被法国和之后的德国及别的地方所发展出的一种更为广泛的研究取径超越了。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我们即可以目睹一个大的转向——即从旧意义上的社会史

(*social history*)到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谓的**社会的历史**(*history of society*)的转变。<sup>①</sup>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而且还有别的社会阶层,从有土地的贵族和富有兼专业的资产阶级,到农民群体与沦落的下层阶级,都浮出水面;社会体制如家庭、俱乐部及不同的社会集团、娱乐组织等,都被淡妆浓抹。还有在小村小镇的社会结构研究、人口统计学研究、人口流动研究、男性与女性的代差研究、童年与老年研究、社会仪式、风俗与信仰研究。不久前,社会史家不惜犯难提出他们已经制造出一个社会史新学门的专业设置,要完全将社会史从“传统的”历史学中切割出来。在1958—1978年间的事实可以表明其成功度,这期间美国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中,主修社会史的人数扩张了四倍,并且在总数上也后来居上,超过了主修政治史的博士学位获得人数。<sup>②</sup>彼得·斯特恩(Peter Stearns)1976年在《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十周年庆上的社评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表明了当时社会史完胜的政治风格。夹带着一些诸如“我们与他们”之类的副标题,又估算了已有多少个社会史史家成功获得英、美各大学历史系的教职。这篇大文还提出了一些野心勃勃的论断,宣示社会史对于剩余历史学分支的宰制地位——“社会史**就是**历史”(social history is history)。<sup>③</sup>这个评论为人们广泛认可。英国的历史学家约翰·布鲁利(John Breuilly)于1980年代中期评论道:“社会史并非某种特殊的历史,它是各种历史

---

① Eric Hobsbawm,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Daedalus*, No. 100 (1971), pp. 20 - 45.

② Appleby, Hunt and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pp. 202, 216.

③ Peter N. Stearns, 'Coming of Ag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10 (1976), pp. 246 - 255. 此文之所以出名,在于这样一个无意的戏谑结果,即作者把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同维多利亚时代研究卖淫与女性性生活的专家威廉·阿克顿博士(Dr. William Acton)混淆不清。参看该文 p. 249。

都应该呈现出的一个维度。”他说,这是因为各种行动和体制都有一个社会的维度。<sup>①</sup>又如他的同事吉欧夫·艾理所观察的,“社会史”不仅仅是历史学的另一个分支或次专业,它有一项“无所不包的”(totalizing)的雄心,“要根据人类的社会制约(social determination),来理解他们生存的所有(all)维度”。<sup>②</sup>

这类的声明已经引发了那些较想存心挑衅的后现代主义者之严厉谴责,他们其中之一近来就斥之为“社会史史家自命不凡的愚蠢本质”<sup>③</sup>。确实一段时间有迹象显示社会史的鼎盛已逝。足够形成讽刺的是,实际上早在1976年,在随斯特恩在《社会史杂志》中那篇社评一起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狄奥多·泽尔丁就宣称,社会史企图成为进入过去的“历史研究中轴”之雄心壮志,化为黄粱美梦,业已“在它各种各样的功绩中迷失了方向”。<sup>④</sup>这多少是由于其日益变得支离破碎——碎裂正反映了整个历史学科的四分五裂。大约二十年后,两位英国的劳工史家乔恩·劳伦斯(Jon Lawrence)和迈尔斯·泰勒(Miles Taylor)英雄所见略同地指出,在1980年代,社会史那种“无所不包的雄心壮志”,已然崩解成许多大体而言互不关涉的次学科,比如人口统计学、城市史等等。<sup>⑤</sup>卡尔在1961年质问“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后,他接着便给出了一个清晰和谐,且适用于各地

---

① John Breuilly, 'What is Social History?', in Juliet Gardiner (ed.), *What is History Today?* (London, 1988), pp. 49-51, 引文在 p. 51。

② Geoff Eley, 'Some Recent Tendencies in Social History', in Georg G. Iggers and Harold T. Parker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 (London, 1980), pp. 55-70。

③ Ankersmit, *History and Tropology*, p. 175。

④ Zeldin, 'Social History and Total History', pp. 240, 242。

⑤ Jon Lawrence and Miles Taylor, 'The poverty of protest: Gareth Stedman Jones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a reply', *Social History*, Vol. 18 (1993), pp. 1-15, 引文在 p. 12。

所有种类历史的回答——而不管它涉及什么样的课题,或研究它的历史学家是谁。四分之一世纪后,《今日历史》(*History Today*)杂志的一个编辑向其投稿人提出了同一个“历史是什么”的问题,这些投稿人都是专业史家,而且其中许多人还是其各自学科领域中卓越的实践者。但这位编辑却发现,根本没有可能获得一个划一的答案,反倒把这个问题分割为一系列不少于十二个的次生问题,覆盖诸如这样的主题:“社会史是什么?”、“妇女史是什么?”、“思想史是什么?”等等。熟知了收集到的回答时,她表达了她的害怕,担心历史学科以这种方式分化,“过去将会如此碎化和繁琐,致使留给我们的仅仅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历史……一种连贯的叙述史学的机会与将过去的故事再连缀在一起的可能,业已永不复存”。

尽管如此,她接着说,这并不是让我们绝望的理由;相反,这是倡导“一个新的多元主义”的契机,这种主义受到这种情况的激励——“从对不偏不倚的‘真相’(truth)毫无保留的信任中后退,也不再有信心认为过去是总有一天可以组合完成的拼图游戏。”<sup>①</sup>但其他评论家对这种现象却不那么乐观。甚或早在1961年,卡尔就痛惜知识的碎化,并归咎于那些“大量而又不断增加的枯燥乏味的事实史,大量而又不断增加的既精密又专业的著述——表明史家对越来越小的问题知道得是越来越多,茫然又盲目地沉溺于事实之海中”,继续承受着19世纪的以下这个理念的影响,即“历史不过就是尽力搜集尽可能多的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sup>②</sup>。这样说是不够公正的。即使是这些最专力于考证的专门著述,它们通常都有此种或彼种形式的主观论断。进言之,专业化的加强导致材料增多的情况,远较卡尔要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复杂,卡尔将之归咎于他们未能成功区辨

---

① Gardiner (ed.), *What is History Today?*, pp. 1-2.

② Carr, *What is History?*, p. 15.

171 过去之事何为重要、何为不重要。然而,他自己关于过去之事何为重要的见解,事实上也非常褊狭,就如我们所知,他把整个见诸历史记载以来的绝大多数人类种族的历史,扫地出门了。故而并不值得奇怪,正当他开始撰写《历史是什么?》时,他视才崭露头角的新一波社会历史的研究(social-historical studies)趋势为无足轻重、不值一提。不管它们的主题—内容(subject-matter)为何,就认为它们是如卡尔称之的那样,仅囿于收罗事实,这大有可质疑之处。一言以蔽之,像安克斯密特已揭示的,历史性的解释过程是不可能的,因此,历史学家应该画地为牢,将自己局限于对微小的“历史之残羹冷炙”(historical scraps)的精密研究中,这无疑是在提倡一种新的考古癖,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有兴趣追随,更没有多少人会有兴趣阅读。<sup>①</sup>

从1960年代早期以来,历史专业,伴随它的历史知识的生产和日趋专门化,已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扩张。在美国,美国历史协会——由大学与学院里的专业史家所构成的专业国家机构,其成员数,在1950年代约有数百人,到1980年代已然攀升至数千人。据统计,在1960年代,在世的历史学家之数量就已比以往各个时代史家的总和还要多。抑有进者,自这时起,历史专业的扩张又以更快的步调进行。在英国,我们从鲁宾报告(Robbins Report)的醒目数字里可以得知<sup>②</sup>,创建于1960年代的新大学几乎都成立了历史学系,其中例如约克(York)大学,又或者如沃威克(Warwick)大学——因其

---

① Zagorin, 'Reconsiderations', p. 273.

② 鲁宾报告(Robbins Report),英国政府在1960年代处曾委任以经济学家鲁宾爵士(Lionel Robbins)为主席的高等教育委员会,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前景进行作的一个评估与规划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将高级技术学院(Colleg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升格为大学。英国政府在1963年10月24日采纳了报告。之后,英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发生了大的扩张,全日制大学的在校学生人数大大增加,诸多平民大学诞生。——译者注



重要而又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迅速获得了佳誉。类似发展也出现在西德与法国。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1960年代后期那样,职业史家可以如此容易地获得有报酬的工作。然而,这也意味着历史知识这么快速的增长,越来越难以在一个单一学科中将之统合了。新的又专业的期刊创刊,从《运输史杂志》(*Journal of Transport History*)到《大屠杀研究杂志》(*Journal of Holocaust Studies*),新的专业化的历史学家社团也应运而生,如德国历史协会(German History Society)、医疗社会史协会(Society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社团中大部分的历史学家都不惜为之奉献整个职业生涯。

172

在1979年,一位美国评论家悲叹,在历史学专业内的细分现象到了他所谓的“真正可怕的”程度:

可将历史学家分为四类:按全球中的某国或某地划分,按时间、时段划分,按课题范畴划分,按个人认知偏好划分……所有能将历史学家联合在一起的东西,仅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对进化的关切——而不管他们研究的是什么……这是一些或许可以确定的东西……但在许多语境下,其作为一个象征,并不具有太大说服力,反而是那些促成史家分裂为亚群体(每个这样的群体都有其受尊敬的权威阶序)的多样化之意见与兴趣,更具有说服力。<sup>①</sup>

如此情形意味着:在什么是关于过去的重要事情时,史家之间愈来愈难以达成共识。比如,以卡尔的说法为例,他认为尽管曾有数百万人渡过卢比孔(Rubicon)河,可历史学家只会对恺撒渡过该河感兴趣,因为该行为影响了历史进程。到了1980年代,卡尔之论显见

---

① Laurence Veysey, 转见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p. 592。

为不确了：社会史史家恰恰会对那数百万渡河的平民更有兴趣，包括他们一再反复渡河的行为所揭示出的交通模式；经济史史家则将会对这数百万人的贸易模式和渡河周期感兴趣；医疗史史家则会对这些渡河人在路上传播和感染的疾病有兴趣，如此等等。<sup>①</sup> 类似兰克学派及其继承人将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当作历史研究的中心对象这样的自信，已消失殆尽。

类此，卡尔的这个判断——何为历史上重要之事，全在于其对社会进步的贡献程度，这类意见早成既陈之刍狗。究竟何为历史上重要之事？历史专业的各个分支都有其各自的判分标准。即或多个史家研究同一对象，查阅同样的文献，其脑海里也会有不同的问题预设，而且可能对别的史家探究的问题没有丁点兴趣。许多人现在都相信，历史不再是一门不可分割的知识体系，它破碎得近乎无法补救。历史的学术研究事业变得比之前更加多样化，在过去三十年里，数以千计史家的工作制造出了卷帙浩繁的历史知识，甚至已无可能让任何一个人有能力掌握任一专门领域的所有文献——比如说19世纪的美国史，或是法国史及俄国革命史。目睹历史知识的急剧繁增，无怪乎有比以往更为强烈的要求历史整合的呼声。对任何一个学术出版商的出版目录进行惊鸿一瞥，都将能发现庞大的多卷本教科书系列，从《牛津近代欧洲史》(*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与其配套书《牛津近代早期欧洲史》(*Oxford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Europe*)、《牛津近代世界简史》(*Shorter Oxford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到《剑桥中世纪史》(*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及其配套书，例如《剑桥印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从新出的《企鹅版英国史》(*Penguin History of Britain*)到《朗文版意大利史》

---

<sup>①</sup> 参看 Jim Sharpe, 'History from Below',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Oxford, 1991), pp. 24-41, 引文在 p. 37.

(*Longman's History of Italy*)、《费士版欧洲史》(*Fischer Europäische Geschichte*),如此之多,不胜枚举。在德国,对于多卷本历史的嗜好似乎不遑多让,好似兰克的幽灵潜游于学院之廊,驱使一些高级学者也想厕身于伟大之列,将自己诸多皇皇大著列于图书馆架子中兰克著作之旁,从而期盼自己能同达不朽之域,拥有兰克那样光彩的声名。除已故托马斯·尼匹代(Thomas Nipperdey)那部论述从1800年至1918年的德国历史的三大卷外,还可以加上汉斯-尤利·威勒(Hans-Ulrich Wehler)那三册篇幅更巨的书。两位作者都雄心勃勃,试图不光要涵盖社会和文化,同样亦要囊括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历史。在法国,史家似乎喜欢写一些总览似的多卷本,用以关注一些宏大的、跨越长时段的主题,这些多卷本往往由历史学家团队合作完成,而非一人独肩大任,其目标是尽可能地包罗万象(to be broadly comprehensive)。<sup>①</sup>

174

虽然这些整合性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是史家自我有意识的选择——根据研究主题来采取相应对策,例如,出版于20世纪初年的《剑桥近现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与大约五十年后出版的其补编《新编剑桥近现代史》(*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两著,

---

①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 - 1866: Bürgerwelt und starker Staat* (Munich, 1983);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 - 1918*, I: *Arbeitswelt und B rgergeist* (Munich, 1990); II: *Machtstaat vor der Demokratie* (Munich, 1992);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 *Vom Feudalismus des Alten-Reiches bis zur Defensiven Modernisierung der Reform ra 1700 - 1815* (Munich, 1987); II: *Von der Reform ra bis zur industriellen und politischen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1815 - 1845/49* (Munich, 1987); III: *Von der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49 - 1914* (Munich, 1995). Philippe Ari s and Georges Duby (eds.),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5 vols., Cambridge, Mass., 1989 - 1992); Georges Duby and Michelle Perrot (eds.),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 (5 vols., Cambridge, Mass., 1993 - 1995).

其间之对比就颇堪玩味。在 1900 年,那些应《剑桥近现代史》系列的编者阿克顿勋爵之邀而参与撰写该书的诸作者,依然采信后兰克学派的有关历史主客体(subject-matter)的那些基本共识,从而编撰出了关于欧洲民族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政治史,这是一本详细的实证叙述,也是一部条理分明让人满意的整体著述。假若你想知道 1895 年的丹麦是哪一党在执政,或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时期奥地利的外交目标何在,你即可稳妥地查阅有关卷册,答案会手到擒来。到了《新编剑桥近现代史》动笔时,所有关于这样的历史主客体共识已荡然无存,其最后交出的则是一部众说纷纭的论文合集,包罗众多随兴所至的庞杂主题,以致你永远无法确认你在其中会找到什么。毋庸讳言,《新编剑桥近现代史》比《剑桥近现代史》提供了更多的可以诠释的空间,但这也确保其会更快落伍。如果我想得到有关欧洲政治史的基本资讯,我会求助那个老版的《剑桥近现代史》系列,而非新版。

撰写一部多卷本且又有“权威性的”整体史(synoptic history)的观念,业已成为明日黄花,无怪乎最近这类的系列大书——六十卷的《费士版欧洲史》,根本没有再标榜要包罗万象,相反却表示只是想提供一系列覆盖欧洲的历史(European history)之诸多面向的比较研究,在其中,作者拥有全权去自由表达他们的个性:的确,这情况就反映在标题上,它不是一个“欧洲史”(a 'history of Europe')<sup>①</sup>,而是“欧洲的历史”(European history)<sup>②</sup>。目前,在其他一些正在出版的系列书中,每卷的涵盖内容因作者的偏好而差别巨大。例如,在新版的《企鹅版英国史》中,关于 17 世纪的那卷,由美国历史学家马

---

① 意指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史或欧洲史中的某一个专史。——译者注

② 意指欧洲的各个国家、地区的历史或欧洲史中的某些专史。——译者注

克·基施兰斯基(Mark Kishlansky)撰写,他就大致坚持一种旧式的高层政治史的叙述模式;关于20世纪的那卷,由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撰写,涉及内容则宽泛多了——尽管该卷依旧重视“来自威斯敏斯特的观点”(view from Westminster)<sup>①</sup>,且忽视了英国的帝国危机及国势衰落这一关键的决定因素。可以十拿九稳地说,出版社的标榜——“这些卷帙将为当今及一代人提供关于英国的盖棺定论式的历史(the definitive history)”,只会是南柯一梦。不可能再有盖棺定论式的历史了!敏锐的读者和教师将会从方便可得的这些大量的多卷本系列书中,挑选出关于特定时代的最好著作。究竟哪一本最好?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端赖于他们关于历史应当如何被研究、如何被教授的看法。<sup>②</sup>

在某一个特定的领域内,对历史知识可以进行彻底综合的观念,已全然消失。那些当今的一些作品,如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这部全景性的《欧洲:一部历史》(*Europe: A History*),趋向于提出该书只是关于此领域之个人见解的表达,既是为了传达信息,亦是为激起讨论。<sup>③</sup>以戴维斯为个案,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所需,他认为欧洲应当被视为一个整体,远远延伸至乌拉尔山脉(the Urals),不仅仅是与“西方”或目前的欧盟(European Union)成员联系在一起——而且他们特有的风格鼓励我们,以比过去更具批判和质疑性

176

---

① 威斯敏斯特为英国议会大厦所在地,人们以威斯敏斯特习称英国国会。——译者注

② Mark Kishlansky, *A Monarchy Transformed: Britain 1603 - 1714* (London, 1996); Peter Clarke, *Hope and Glory: Britain 1900 - 1990* (London, 1996), 这两书都属于David Cannadine编辑的*Penguin History of Britain*丛书,但出版商的声明从书外封套上被拿掉了。

③ Norman Davies, *Europe: A History* (Oxford, 1996). 该书富有想象力的视野因其史实的不准确,而被大大抵消。

的眼光来阅读。那个彻底的和包罗万象的整合理念已经在头脑中亡佚,这就是1988年彼得·诺维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原因:“作为一个广大的话语社群,作为一个由共同目标、共同水准和共同目的联合起来的学者社群,这样的历史学科已不复再有。”<sup>①</sup>

### 三

虽然在近几十年来,很多人已经发现历史专业的专精和破碎与日俱增,但仍然还是有一些理由可以质疑诺维克的悲观论调,因为他认为,在一个单一的历史学科内,作为一个联合起来的学者共同体的未来,非常黯淡。随着信息交流的全球化,较之以前,越来越多国家里的越来越多的史家,正在对别国的观众说得越来越多。例如,可以确定地说,过去的二三十年内,法国和德国史家的书被翻译成英语的数量,比之前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大的增长,而英、美史家也发现,比起一个世代前他们能做的,现在他们在别的语种中的读者多了很多。

177 每个国家的史家都愈来愈受到他们在世界各地同侪的影响。没有什么比约翰·文森特的断言更离谱了,他认为历史书写“在特征上依然明显是民族本位的,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各行其事”<sup>②</sup>。事实上,年鉴学派就已经对英、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样,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作品亦有类似的国际影响,尽管约翰·文森特吹毛求疵地相信,汤普森并未影响到其他史家,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影响到历史学的实践”。<sup>③</sup> 后现代主义理论由法国

---

①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p. 628.

② Vincent,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p. 103.

③ Vincent,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p. 107.

进口到美国,返过头来,由美国回销到欧洲的历史学界。便宜的国际旅行与借助电子邮件而进行的跨洲际联系,已经有效摧毁了不同民族学者之间的楚河汉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和研讨班几乎天天都在召开,并且在随电子手段的发展而与日俱增;互联网目前能使学术研究与讨论的情况在瞬间即能传遍全世界;国际性的学术中心遍地开花,从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到柏林的科学研究讲座(Wissenschaftskolleg),从巴黎的人类科学研究所(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到堪培拉的人文研究中心(Humanities Research Centre);进而,假设历史学家没有在伦敦、纽约、耶路撒冷或旧金山实地做过讲座、主持过研讨班,其学术履历就难言完善。在国际化的思想市场中,闭门造车注定是死路一条。

事实是,诺维克讨论美国历史学行业“客观性问题”的那本杰作,在美国历史学的诸多分支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一状况本身即足以强有力地证伪其观点。即或我们都有不同的关于历史是什么、或其应该是关于什么的观点,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再需要阅读对方的著作。毋庸置疑的是,这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学发展中,历史知识的总卷帙几乎有了指数倍的增加,其原因在于这期间历史学的从业人数史无前例地增加。历史的主题—内容之扩张也可从历史学家地理视野的拓宽方面来展示,在过去,西方的职业史家可只书写欧洲与北美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啊!在一些顽固的、鼠目寸光的欧洲史专家那里,其中可能尤以英国的史家为甚,他们仍然无视这一情况。休·久佛—罗帕以牛津大学钦定近现代史教授的身份曾在1965年撰文,公然宣称非洲没有历史,仅仅是“在独特的但与全球无关的角落里,一些野蛮部落的无价值循环”<sup>①</sup>。迟至1990年代,约翰·文森特依然认为不可能撰写出亚

178

<sup>①</sup> Hugh Trevor-Roper, *The Rise of Christian Europe* (London, 1965), p. 9.

洲史——“我们不理解亚洲，也无需理解”<sup>①</sup>，不必分辩，在这个新亚洲经济圈不可遏止的增长时代——其业已造成全球权力平衡开始偏离于西方，文森特的观点是一个很不明智的论断。所有此类见解，都表明了英国历史学界那些权贵大老居心何在了——他们还在死心塌地坚信：历史根本上就是研究西方一些有教养的少数人，尤其是研究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少数人。

久佛-罗帕之后将近三十年，另一位英国史家，研究17世纪史的专家约翰·凯尼恩(John Kenyon)信心满满地察觉，在“历史系，应急设立的关于印度支那或西非的课程，在这些区域不再是当下的关注焦点时，便昙花一现了”；他补充说，“学生也发现，这些神秘的(arcane)课程<sup>②</sup>，很难找到相应级别的校外评鉴委员，放任讲授这些课程的教师向学生灌输臆想和偏见”。这个观察反映着，当时英国保守派人士之间盛行的对1960年代进行嘲弄的新流行风尚。而且，这种说法又出自一个稳居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功勋讲座”职位的教授，只是展现了发言者的妄自尊大和胸有成见，较之他同样误导视听的陈述——英国的历史学家对欧洲史的贡献，并未“形成重要的或有影响力的著作巨帙(corpus of work)”<sup>③</sup>，甚至更为不着边际。在英国，关于欧洲与世界其他各地的历史研究，远没有衰落。相反，在1990年代，它还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快地发展与繁荣。不止于此，杰出的出版品、有突破的观点、高深的期刊、大学课

---

① Hugh Trevor-Roper, *The Rise of Christian Europe* (London, 1965), p. 104. “我们”大概就是文森特在其书里所要传达的对象，即那些英国历史学家和研习历史学的学生。

② 约翰·凯尼恩用此词(arcane)意指关于印度支那或西非的历史不是真正的历史，仍是类似巫术的、不进步的、不可理解的、不值得研究的现象。——译者注

③ Kenyon, *The History Men*, pp. 297, viii.



程,甚至十足胜任的校外评鉴委员的数量,都比起以往大大多了。早在1961年,卡尔就曾严厉谴责“英国史的妄自尊大在我们的课程中阴魂不散(like a dead hand)”。他要求适度地将课程扩大至欧洲大陆以及非欧洲地区的历史。<sup>①</sup>三十六年过去了<sup>②</sup>,大量证据都表明,卡尔此处的呼吁是“吾道不孤”。

这里,卡尔也遭到了来自杰夫里·艾尔顿爵士的批评,在艾氏担任剑桥大学钦定近现代史教授的就职演说中,他呼吁英国史应该成为大学课程的重心。<sup>③</sup>有别的人回应了他的观点,特别是在英国保守党政府向中小学校推出的英国史课程内容产生争议的那段时间。<sup>④</sup>类似争议亦出现在美国,尽管欧陆几乎没有出现相似反响,但大体而言,在欧陆历史教学依旧表现得顽固与封闭。比如,要求法国人多花点时间去读法国史,或要求德国人多花点时间去读德国史,那根本是多此一举。在法国,其文化优越感足以使其国内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认为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值得研究——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例外——如哈维(Halévy)、贝达瑞达(Bédarida)等法国史家对于英国史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sup>⑤</sup>法国对“西方”的历史所做的某些概要性的研究,往往都花在那些曾发生在法国的特定问题之历史上<sup>⑥</sup>,这些主题不证自明地被作为一个整体,看作是西方人性史的典型——当然,这是相当错误的,而且对于别的国家的处理方式

180

① Carr, *What is History?*, pp. 150 - 152.

② 《捍卫历史》初版于1997年。——译者注

③ Elton, *Return*, pp. 101 - 126.

④ Juliet Gardner (ed.), *The History Debate* (London, 1990).

⑤ Elie Halév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5 vols., London, 1924 - 1932); François Bédarida,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1851 - 1975* (London, 1979).

⑥ 即指法国人研究西方的问题意识导源于法国曾发生过的类似主题。——译者注

一直是非常草率。法国史家撰写出来的那些宣称处理的是“西方”历史一般趋势的书,实际上几乎一直依据的就是法国的证据,完全无视任何一个莱茵河以东国家的经验。<sup>①</sup> 在德国,鉴于之前希特勒第三帝国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伴随着民族的反躬自省带来的可以理解的困扰,致使几乎没有人能通过研究外国史而在历史学界出人头地,尽管在伦敦、巴黎、华盛顿和罗马,分别有德国的历史机构成立,旨在帮助德国学者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但德国历史学家对于其他国家历史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在近这些年来依旧乏善可陈。相形而论,没有一位德国的历史学家胆敢忽视由英、美史家撰写的大批关于德国近现代史的一流著作,英、美历史学界秉持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立场,与欧陆史学界狭隘的民族本位立场(the national narrowness)有天壤之别。

181 在20世纪,卷入主要在欧陆土地上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陷入足以左右欧陆大国敌对均势的枢纽位置,英、美一直以来就很重视欧洲史研究。在英国,非殖民化已经导致英国人的研究视角发生这样一个转变,即从帝国史——也是一个确立已久的传统——转变到非洲和亚洲的历史——以非洲人或亚洲人而非以欧洲人的观点来研究历史,而在美国和澳洲,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偏离欧洲转向环太平洋地区已有一段时间了。即或是在德国,最近的征象显示,关于解释第三帝国前因后果的困扰,变得不再那么举足轻重,史家也借研究别的欧洲国家的历史来扬名立万。人们对欧洲以外地区文明史的兴趣愈来愈增长,像英裔美籍的历史学家史

---

<sup>①</sup> 比如,可以参看上述“其目标是尽可能地包罗万象(to be broadly comprehensive)”语的注释,或者参看 Philippe Ariès, *The Hour of Our Death* (London, 1971)。

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备受读者青睐。<sup>①</sup>历史学界不仅比起以前更加兼容并包,而且在研究范围和研究取径上,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也愈来愈淡。如果这意味着作为一个知识领域的历史越来越浓的碎片化,那么我们已经失去的,可以因越来越多的机会出现而得到弥补——当下的通信技术和历史学界的机构提供了更多机会,让不同领域的专家互相交流,并能与别国的同仁交换思想。

#### 四

那些祸及历史本质的争论发生在不同分支的历史学家之间——经济史家、政治史家、思想史家和社会史家。实际上,这些历史研究的各个分支都有其稍稍别具一格的方法论,况且这些方法论所产生的种种预设,已经被转换为对理论和认识论的不同态度。像艾尔顿和希摩法之流的政治史家早已提倡回归到以民族国家研究为主的传统政治史,并将剩余研究取径视作微不足道、无足轻重,或误导视听。<sup>②</sup>如罗伯特·傅果、摩尔根·库萨(Morgan Kousser)、克里斯多弗·劳艾德之流的经济史家,则要求复归到重点关注结构或量化问题的历史学,更甚者,他们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才是唯一真正科学的、又靠得住的研究过去的方法。像史提恩与马威克之流的社会史家则谴责传统政治史的麻木愚钝,批判后现代主义者的桀骜和无知,宣称社会史是单一一种能将知识上的活力与学术上的坚实

182

①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1990).

② 参看 Lawrence W. Levine, 'The Unpredictable Past: Reflections on Recent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p. 671 - 679, 引文在 p. 674。

联结在一起的研究取径。至于像海登·怀特和弗兰克·安克斯密特这样的思想史家,则断言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文本(all the world's a text),想让我们都成为思想史家——既然文本即是一切,其就可以被有意义地研究。就此而言,历史学已成为一个百花齐放的多元文化区间,其中不同的群体为在思想上独占鳌头,而在理念、课程设置、大学历史教学上互相展开竞争。确信,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以下的做法并不逾矩:呼吁史家要有一点思想上的宽容,还要警示任何一种历史研究取向,都要反对这个傲慢的成见——即自负地坚持本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较其对手高出一筹。

183 当前,这样的警告就思想史和文化史而言,尤其切中肯綮。这里,像美国的劳工史学者大卫·梅费尔德(David Mayfield)和苏珊·肖恩(Susan Thorne)已指出的:事实上,“语言学转向”是在试图颠覆社会和经济作为历史的驱动力,而重新恢复政治和国家对历史的作用,代替社会与经济结构及其过程,思想和制度成为中心,以社会为中心取向的解释被看作“化约主义”(reductionist)而弃若敝屣,因为要不是其公然无视,或其就是把政治化约为社会的一个直接的、无需中介的(unmediated)产物,结果就是一个“典范转移”(paradigmatic shift),导致了“在本世纪大部分与上个世纪许多时间里,那些主导的解释模式,既包括自由主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式,都处在香消玉殒的边缘”。梅费尔德和肖恩点明,这可能仅仅昭示了“穿新鞋走老路”(full circle),重蹈旧式政治史的窠臼,政治史史家将无需感到再有必要去注意那些“社会因素”(social factors),因至少其中的一些,在近几十年来已被迫纳入政治史史家的关注范围。故此,这样的“典范转移”可能是一个退步,而非进步。换言之,近年来,将重心放在社会的史学研究趋势一直很流行,这便可能会被看作是走了无意义的弯路,而非在理解历史方面的一个意

义深远的进步。<sup>①</sup> 但是,如梅费尔德和肖恩所评论的,“像通常的修正主义式的争论中所认为的那样——旧的社会史完全忽略了政治、语言和文化的建构效果,这样的看法就大错特错了”<sup>②</sup>。这是真的,因为即使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劳工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传统中,也曾发生过许多类似的争议。其实,马克思本人清楚地意识到,许多政治团体的行为是不能被化约为由经济或社会单向输出的产品(a one-way product),我们只要一睹他关于19世纪中叶法国政治的经典研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Eighteenth Brumaire*)、《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便能确认。

尽管后现代主义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宣判社会史的穷途末路,然而它并没有日暮途穷。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它已经失去的,或正在放弃的,是它那种统摄性的宣言——宣称它是整个历史理解工作的锁钥。就此而言,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不仅成功了,且具有解放性的作用。经过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转向语言、文化和思想,后现代主义将历史学家从束缚中解脱,从而能发展出更复杂的历史因果解释模式,更严肃地对待在之前他们可能就会忽略掉的主题。让人称许的是,对于语言的形式及意义,较之先前,史家还需要付出更多的注意力去挖掘。尤其好的地方是,那些正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而出现的研究,提供了理解历史的新面向,这大大超越了社会史的局限。大众心态、记忆、纪念、庆典的研究,关于权力和宰制的

184

① David Mayfield and Susan Thorne, 'Social history and its discontents: Gareth Stedman Jones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Social History*, Vol. 17 (1992), pp. 165 - 188, 引文在 pp. 165 - 167。

② David Mayfield and Susan Thorne, 'Social history and its discontents: Gareth Stedman Jones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Social History*, Vol. 17 (1992), p. 179.

文化面向的研究,社会性别和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的研究,以及关于许多类似课题的研究,都已经极大地增加了人们的历史知识。后现代模式下的文化史成就,并非只是锦上添花,它帮助我们改变了对于政治史和社会史中的很多领域——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的理解。

185 可这并不就意味我们应该彻底放弃社会史。例如,没有理由说明历史学家为什么不应该继续使用像阶级这样的概念,作为理解晚近某些人群行为的凭借。<sup>①</sup> 或者认为,他们为什么不应该再继续相信:上天注定,总有过去的某些群体不得受难,其贫困、悲惨和受压迫的经历,与其文化、信仰及其政治忠诚都有联系。我们不应遗忘这个事实,过去的穷人用疾病、苦难和死亡所带来的真实的、肉体上的炼狱来为贫穷埋单。面对的危险是,历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可能会让我们淡忘这个残酷的事实。比如,一位后现代主义作者伊丽莎白·戴兹·艾玛斯即认识到,借将所有事物化约为文本和话语,她便消除了将社会视为某种真实的观念,并进而泯灭了“人们过去习称的社会正义”(what used to be called social justice)。她说,术语“社会的”(social)起源于19世纪,因后现代主义的打击,而变为一个“人老珠黄”的古典观念。意识到这种尴尬的政治涵义,她宣称,所获得的“别的收益”(other gains),足以弥补“如‘真实’(reality)、“真相”(truth)和‘人’(man)等术语的损失”。然而,诚如她的一位批评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地评论道——从她著作中摭拾出相关篇章:

我们并不清楚那些所谓好处为何,或许为以下引述:

---

<sup>①</sup> Eley and Nield, 'Starting over: the present, the post-modern and the moment of social history', pp. 355 - 364.

“恢复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健康,治愈以下这种痼疾,即长期以来、与日俱增地对语言的象征(symbolic)、句法(syntactical)、起承(thetic)东拉西扯地强调,这种强调以语言的符指(semiotic)、排比(paratactic)、韵律(rhythmic)的丧失为代价。”(p. 147)因为艾玛斯是一个那种相信“万物皆是书写”(everything is writing, p. 177)的人,或者这就是我们现在猜想的,用来指代“人们习称的”(what used to be called)贫穷、饥饿、折磨、压迫。<sup>①</sup>

因之,后现代主义者把精力集中在文字(words)上,此举让其远离了真实的苦难和压迫,而转向在物质上舒适的学术圈中所看重的二等思想议题。举例言之,很正常地认为文字与行为同等重要;又如,阅读有关行刑的文字,如同莅临行刑现场,甚或如同亲自执行此刑;又或者,阅读色情图画形同在进行强暴。<sup>②</sup>虽然有关性与暴力的色情图画不应被蔑视,或被轻描淡写,但若将其与真实的肉体攻击、身体暴力乃至死亡等量齐观,实是坐井观天,把一个人的眼光局限在读者和作者所建构的想象世界中,并将其吹嘘得天花乱坠。就多数时间来说,绝大部分人既非读者亦非作者,这样一个局限避免了对历史和社会上的人民之真实世界进行盘点。

186

那不是说“纯粹的文字”(mere words)不会发挥作用,而是说文字不应该君临万有,被当成现代人生活和经验中的至高无上存在。实际上,大部分的人都认识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职业、性别、性取

<sup>①</sup> David Carr, review of Ermarth, *Sequel to History*, p. 185, 引文在 pp. 56, 60, 62, 147, 177。

<sup>②</sup> Wendy Lesser, *Pictures at an Execution: An Enquiry into the Subject of Murder* (Cambridge, Mass., 1994)。

向、种族和社会地位之间存在关系——所有这些都有一种或那种的真实物质指涉——一方面,与其社会、道德、政治的态度及对于生活的一般观点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们表达这些指涉的语言有关。后现代主义帮助我们的,是去强调这种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在对过去进行研究时,所有这些教训都将有所裨益。假如起源于后现代主义的这些理念失之激进,那么其效用会过犹不及,大打折扣,我们也将只能获得另外一种思想上的化约主义——代替社会经济上的化约主义,或者我们会遗弃除政治和思想以外的任何东西,视其为对于理解历史上的人类之动机和行动全然无关的废品。<sup>①</sup>

## 五

至少就一个方面而言,社会史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冲突,绝非如某些参与者期望我们相信的那样激烈。特别地,相形于传统的政治、外交史而言,它们都有淡化个人重要性的趋势。例如,卡尔——  
187 这位特别主张对历史进行社会因素解释的拥护者即曾认为,个人崇拜是一个普遍流行的西方神话,现在是到了这个神话破灭的时候了,大众民主(Mass democracy)已将其摧毁殆尽。<sup>②</sup> 不管是历史学家,或是其所书写的人物,都非与世隔绝的个体,他们都是社会存在。卡尔认为,区分个体与非个体之间的历史力量是荒谬的,因为前者既是后者的产物,实际上又是后者的体现。卡尔的《苏俄史》

---

① 以免这样想不公平,我们可以举乔伊斯的例子,他就明确地拥抱一种语言决定论。在这种决定论中,社会、贫穷之类,都是由语言、文化和想象决定,而非源自经验,或换句话说,即穷人并不穷,他们只是在想象他们穷。参看氏著 *Democratic Subjects*, pp. 12 - 15。

② Carr, *What is History?*, p. 34.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即是这一原则的很好体现,他步武托洛茨基描绘斯大林,将其看作是1920年代新苏维埃官僚体制的产物,而非那个时代一个有任何标志性个人特质的个体。但如果卡尔能继续将其《苏俄史》延伸到1930年代中期,他将会面对这样的斯大林现象——作为大清洗与恐怖统治中的偏执独裁者,斯大林为某些微不足道的理由甚至是毫无理由地屠杀了难以清楚统计的数百万苏联公民。也许卡尔会诉诸1980年代的美国历史学家所提倡的一个观点,认为这些事件是苏维埃统治结构的产物,是“由下往上”发动的,而非斯大林个人之病态所造成的结果。<sup>①</sup>可惜我们不能起卡尔于九泉之下问之了。

其实卡尔在其《苏俄史》第五卷也包括一章——“个体特质”(personalities),该处涉及到1920年代党内权力斗争中的主要玩火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Zinoviev)、加米诺夫(Kamenev)、布哈林(Bukharin)和斯大林,此章之起篇是关于个体在历史中的角色之概括性评论:

历史事件之按部就班地进行有赖于个体意志,但个体意志部分受制于其所处的历史条件,这些历史条件会对个人充分施展其意志进行一些反弹愈来愈大的掣肘。故此,历史学家给出的关于历史事件的解释,不可能仅局限在与个体意志相关的简单评述,而据此竟把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一些“非个体的”(impersonal)力量视作“海市蜃楼”(illusion),尽管历史学家明察秋毫地知晓,经由这些“非个体的”力量而得以体现的行动,仍是个体的行动,其能按部就

188

---

① J. Arch Getty, *Origins of the Great Purges: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Reconsidered, 1933 - 1938* (Cambridge, U. K., 1985).

班进行仍有赖于个体之意志。

换一种类似方式来说,卡尔认为一个“大人物”所以伟大,乃是由于他以远超侪辈的程度体现了其同代人的意愿和希望,或有先见之明地展示了后来者的意愿和希望。因此,托洛斯基代表的是布尔什维克党中的西方化取向,斯大林则代表布尔什维克党中反感西方的恐惧症。卡尔相信,斯大林模糊性格的关键所在——“一个解放者与一个暴君,一个事业的奉献者但又是一个亲力亲为的独裁者”,这就不能于斯大林本人的个体特质上求解,只能在其所处环境中发现,“作为其所处时代及生活环境的产物,很少有哪一个大人物如斯大林这么显明”。<sup>①</sup>

189 卡尔认为:“大人物”表现其时代,经常是一些较为宽广的历史运势之代表。例如希特勒,若非1929—1933年的大萧条和伴随而来的魏玛共和国危机,他将只是当时迹近疯狂的德国政治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然而,这样的角色一旦独揽大权,那么那些和“巨大的非个人力量”几不相关或全然无关的个体特质,就会粉墨登场。而卡尔可能是太过匆遽,以致将此遗忘无余了。在他写出《历史是什么?》的接下来几年,卡尔在事实上即勉强承认,较之他以前的分析,某种程度上,个体在历史上的作用更大一些。比如他认为假使列宁继续在位,或者他会以比斯大林更为人道的方式来掌控俄国的工业化。<sup>②</sup> 饶是如此,卡尔所激赏的社会—历史取径(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无疑会给历史上的特立独行者,留有较少的空间。

表面看来,将作者推下神坛、而把一些非个体的话语提升至历史分析中心的后现代主义,像是呼应了以上的观点。讽刺的是,考

---

① E. H.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Vol. I (London, 1958), p. 151.

② Carr, *What is History?*, pp. 169 - 170.

虑到后现代主义对个体观念的质疑,但它又煞费苦心去重建个体在历史上的地位,虽然此做法与政治史家的“大人物”崇拜传统判然有别。后现代主义怀疑主流,推崇边缘、奇特与含混,已经产生了大量历史作品,这些作品挖掘出许多较少为人所知的个人世界,如曼诺齐奥(Menocchio)——一位出现在卡罗·金兹堡(Carlo Ginzburg)《乳酪与蛆虫》(*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一书中的一个意大利磨坊主<sup>①</sup>。因为其对平均值和统计数据的依赖,通则化之社会科学式的历史一个非常大的缺陷是,为探求一些籍籍无名的群体和趋势,在事实上却消除了个体的存在,将每一个人化约为统计数字、社会类型,或集体话语的传声筒,这是对人性、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活之复杂性的一种粗暴冒犯。另一方面,宣称如斯大林这样的个体仅仅是一个妖怪或一个狂热分子,此类说法无助于我们理解他所作所为之原因,更是极度夸大了人民甚或是独裁者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自由度。<sup>②</sup>一言以蔽之,没有一个人的总结好过马克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sup>③</sup>正是在于个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才使我们能对研究生活在过去的人们满怀兴致。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回到个体,回到各个层次历史中的人的因素,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这也是后现代历史的居功至伟之处。

190

①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Baltimore, 1980). 更详细的,可以参看 Edward Muir and Guido Ruggiero (eds.), *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s of Europe* (Baltimore, 1991)。

② 这种研究取径的一个特别粗率的例子,可参看 Robert Conquest, *Stalin: Breaker of Nations* (London, 1991)。

③ 此处译文采自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译者注

## 第七章 知识和权力

—

191 最近,一个后现代主义作者声称,现在到了该放弃这种历史学的时候了:

假设(Lets us think)我们可以知晓过去<sup>①</sup>,后现代时刻的历史学……要问:谁的历史被讲?以谁之名义?其悬鹤何在?后现代主义是没有被讲出的、以不同方式被讲出的、不能被讲出的历史……是那些被遗忘的、被遮蔽的、被隐而不彰的、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易变的、被擦拭掉的历史。它拒绝把历史视为线性的,以可以被察知的模式直接发展到今天的——所有这些都已被设定好待我们来方便认知。它是关于偶然性的历史,是关于权力的历史。<sup>②</sup>

---

① 后现代主义认为我们不可能真正知道过去,所以这里用了“假设”。——译者注

② Brenda Marshall, *Teaching the Postmodern* (London, 1992), p. 4.

以上部分的引述,或许会引起卡尔的戚戚之情,他认为:“历史学家的功能既不是爱过去,亦非是为了让自己摆脱过去之桎梏,而是将掌控和理解过去作为理解当下的关键。”<sup>①</sup>不消说,此类意见很难缓解杰夫里·艾尔顿爵士那里的敌意。他认为,人们至少能从过去得到一些教训,和知道开放给人类思想与行动的多种可能性,以及知晓“人类思想与行动的极大不可预知性”。<sup>②</sup>从根本上说,无论多么困难,历史学家必须全力以赴,以感觉与行动来理解过去人们的行动、思想和动机,并且还要不直接关涉其当前之个人信仰。

然而,就绝大多数史家而言,实际上这也远远不够。有意无意地,在我们的时代,我们都会基于自身目的,运用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例如,马克思主义史家在研究历史的取径里,总是赋予当代政治以重要地位。此类做法绝非马克思主义史家才有,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家在研究中坚持科学的严谨性,并急于建构一套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另一套思想体系,但这套体系也不能在政治上无偏无党。费尔南多·布罗代尔在德军战俘营里撰写他的那本规模宏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据其夫子自道,其书旨在重新夺回历史与认同中的某些深层结构,这些是他希望和坚信的,也是在1940年法国完败于德国后他生存下来的理由。到了晚年,在其《法兰西的民族特性》(*The Identity of France*)<sup>③</sup>中——在某种程度上该书是一个复杂的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文本,布罗代尔又重拾这一雄心。《法兰西的民族特性》认为自13世纪以来,法国及其各条边界,基本无甚变更,并公然宣称,从史前时代以来,法兰西的血统也未被淡化。这一论断与布罗代尔的这个种族主义信仰

① Carr, *What is History?*, p. 26.

② Elton, *Return to Essentials*, p. 8.

③ 该书有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译者注

并行不悖——在法兰西与其他民族(包含各式各样的移民)之间,“可能有过一些混杂(intermingling),但没有融合(fusion)”。<sup>①</sup> 另一个年鉴史家,皮耶·夏努(Pierre Chaunu)也持有类似的右派主张。夏努把合法化的堕胎描绘成“绝对是谋杀”,这对法国将产生“灾难性的人口统计后果”。<sup>②</sup> 于夏努的著作可以管中窥豹,法国人口史研究上的导夫先路之功,与那些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受困于法国传统上的低出生率情结,其间关系匪浅。由是可知,在这些历史学家看似科学中立的态度背后,潜藏着触目惊心的政治目的。

即便如艾尔顿,有其张扬的客观性坚持,他也会把他秉持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成见,带入到其历史著作中。在其第一本书——《都铎王朝的政府变革》(*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的序言里,他认为:“政府必须要强大,才值得被拥有”,他奉献其大部分职业生涯去建构一种明确的评价——“强大的统治足以避免无政府和保证秩序”,杰夫里·艾尔顿认为,亨利八世与其首相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治下的英国建立了与这种评价若合符节的统治。他抨击道:“我们的历史,许多还是被辉格党——那些政治自由的拥护者来书写”,接着他公然宣示其意图,强调“需要控制那种自由”。<sup>③</sup> 艾尔顿的历史著作绝非纯然涅槃自资料中,相反,其在滥觞之际就被赋予强烈的保守派政治信仰。艾尔顿主张历史学家在处理文献时,要避免所有当下的判断,此种主张无疑与其实际之作为方枘圆凿,艾尔顿在其著作中对这类先人之见所扮演的角色,是明

---

①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Vol. I, pp. 19–21, and Vol. II, pp. 32, 67, 71; idem, *The Identity of France*, Vol. I (London, 1988), p. 15, 19–21.

② Pierre Chaunu, ‘Le fils de la morte’, in Pierre Nora (ed.), *Essais d’ego-histoire* (Paris, 1987), pp. 61–107, 引文在 p. 93。(这里指会大大伤害法兰西民族的“纯种性”。——译者注)

③ 转见 Kenyon, *The History Men*, p. 223。

显认可的。

在其《政策与治安》(*Policy and Police*)一书中,艾尔顿试图为其心目中的英雄托马斯·克伦威尔开脱罪责,由于克伦威尔被指控在他执行亨利八世的改革法令时,实施了“恐怖统治”:解散修道院、剥夺教会土地等等。这本书主要依据寻常公民呈交的对天主教徒及这些政策的反对者的谴责(“没有这样的行动,社会就会崩解”,艾氏如此评论道)。在一次毁灭性的声讨中,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评论道:

194

艾尔顿博士好像全然无视以下事实——当政府积极鼓励邻居之间相互检举之时,由此打开的当地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仇恨、诽谤的潘多拉盒子(Pandora's box),对于一个社会的结构所带来的破坏。如有人了解哪怕一点纳粹铁蹄占据下的欧洲的生活,或者曾看过电影《悲哀与怜悯》(*Le Chagrin et La Pitié*),就不会认同艾尔顿这个洋洋得意的总结,即其心目中的英雄克伦威尔鼓励私人之间的攻讦并非有赖于付酬的特务体制。(附言之,在此问题上,存在严重的欺瞒事实的行为。在讨论及克伦威尔是否在规划或在操作一个警察国家时,艾尔顿博士故意漏掉了首相于1534年留给自己备忘的一个心怀叵测的小便条:“要有大量的人,在每一个淳朴小镇,去发现谁说话或谁在传道布教[也就是‘谁在赞成罗马教皇的权威’<sup>①</sup>]。”)。

斯通指控道,艾尔顿认为如若一项法令通过,则其所认可的惩罚即为正当,并不能算是恐怖或独裁。这包括了1536年的一条法令,此

---

① 即指天主教徒,天主教会总部在罗马梵蒂冈。——译者注

法令规定,只要有一个目击者告发,就可以将散布谣言反对皇家政策的人,在严刑拷打后予以处决。艾尔顿先人为主的对强大政府的偏听偏信,使之不惜曲解文献。<sup>①</sup> 关于这样的争议,值得注意之处在于:不只艾尔顿的观点,即或斯通的观点,都是来自其政治立场,他们这样的研究方式,目前正大行其道。然而,这种情形并不能削弱斯通的批判效力,或让这两位史家之间在观点上的冲突化约为仅是有关政治的意见差别,而这种差别无法靠原始的历史文献就能泯除。基本上,艾尔顿必须回应斯通对其隐瞒证据的指控,正视克伦威尔 1534 年的备忘录,而非空谈纳粹德国的告密政策。

## 二

因而,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有一种当下的意图和灵感来源,或是道德的,或是政治的,或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于,这一意图重要到何种程度? 它就是历史研究最后真正关注的吗? 承认历史学家会为他们当下的道德或政治观点所动摇,是一回事;接受来自历史学的相邻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或语言学的理论——这在研究过去时是有用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但若就此断言以下这个论述成立,就矫枉过正了:不管史家说了什么或相信什么,所有历史著作和历史研究的主要意图,都是为了让历史学家,或他们当下所代表的那些人获取权力。这个广为后现代主义者所坚守的断言,主要来自于法国哲学家兼历史学家米歇尔·傅柯,他不把真相与知识看作认知的产物,而是当成权力的产物。他认为,在每一个时代,在各种科学之间,都存在一种宰制“话语”,在其

---

<sup>①</sup> Lawrence Ston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London, 1981), pp. 109 - 111.



所用的语言与术语中形构和限制了思想及其表达的可能性,这样实际上是排除了异议产生的可能性。依照傅柯的观点,文本——小说、历史等等,并非个体思想的结果,而是宰制话语的“意识形态产物”。历史是一种虚构,这种虚构基于权力操演的利益,将叙述秩序强加给那些无法救赎的混乱事件上。进言之,若是关于过去的某种描述,较之别的描述更广为人们接受,这并非在于它比较接近真相,或者更为契合“证据”,乃是因其拥护者在历史学界,或推而广之在社会上,较其论敌更具权力。

196

傅柯式的关于权力与知识之联系的说法,在 1970 年代,尤其是 1980 年代,同历史书写及研究中出现的明显的政治图谋相匹配。这种情况的典型表现在劳工史。劳工史从 19 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发展而来,其编撰立场明确地是工业工人阶级的观点。劳工史史家试图去恢复劳工及其组织的历史,借此作为工具来强化他们的阶级意识,以及他们当下的政治参与感,乃至未来他们终将胜利的希望。他们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此故事是关于人们对于压迫的反抗,以及有组织的劳工阶级朝向掌握政治权力和实现个人解放的双重目标的行进之旅,这会通过资本主义社会与政权的社会主义转型达成。因此,劳工史研究旨在重建今日的社会主义者和劳工组织之先驱的历史,以及详细描绘劳工运动自崛起以迄于今的情况,于此中,劳工运动的前途可以被清晰预期为一个想象的、大获全胜的未来。

从 1970 年代后期起,这种劳工史模式被另外的利益集团吸收,但其已日渐摆脱了任何一个背负太多的历史进步理论,或者实际上已放弃了有关历史客观性的任何一个宣言。黑人史、妇女史、女权主义史、同性恋史,所有这些历史在 1980 年代的美国方兴未艾,都在开始从事一种初步的重建工作,希望能重建有关他们各自所属之特殊团体的“遗失的”(lost)历史事实,甚或被刻意压抑了的历史事实——这些过去一直是“隐藏的历史”(hidden from history),现在正

197

“露出庐山真面”(becoming visible)。<sup>①</sup> 可到了1980年代后期,这些利益集团与这种极大程度上是经验主义模式的历史分道扬镳,而将其相当多的精力花费在提出一种重新解释上——这是一种充满自知之明、且毫不隐讳其是出自党派之见和特殊利益集团的解释,这种解释涉及更为宽广和更为人们熟知的历史领域。与此同时,他们谴责之前所有的历史书写,视其为党派之见,代表着白人的、男性的、异性恋者的、欧洲中心的观点,传播着在文化上属于宰制精英的话语。他们评述道,历史话语的意义就是要赋予人们以权力——明确地说,就是要赋予人们所代表的某个或某些特殊集团的权力。是什么造成了不同的看待过去的方式?是政治与道德架构,而不是历史观点自身的准确度——这个准确度在根本上是不可能起决定作用的。

198 这种发展部分反映了在高度工业与后工业(post-industrial)的社会,旧劳工阶级的衰落。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的退潮,使得劳工史研究较之1980时代的进步,显得日趋没落。在社会上的其他不平等起源——性别、种族、性取向——变得相对重要,使社会的分裂变得更形复杂。左翼历史学界速变的特质,在极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上这些较为广泛的改变。此外,编撰历史的大学学者所处环境也改变了。卡尔对历史客观性信心满满,认为这是一个准确无误的明智方向,这样的信念在1960与1970年代的历史学家之间风行一时,这不仅因为当时是所有主要西方国家内的大学体制急剧膨胀与扩张的时期,同样也是历史学界急剧膨胀与扩张的时期。这代的史家尤其是社会史家,大都兴趣盎然,充满乐观与思想上的自信——

---

<sup>①</sup> Sheila Rowbotham, *Hidden from History: 300 Years of Women's Oppression and the Fight against It* (London, 1973); Renate Bridenthal and Claudia Koonz (eds.),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Boston, 1977).

这些史家之所以进入历史行业,也多半源自于此。可更多信心来自于受到以下政治家领导的激进政治改革的鼓舞——美国民主党总统肯尼迪与约翰松、英国哈洛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的工党政府、西德威利·勃朗特(Willy Brandt)领导的社会民主联盟等,以及受到导致法国右翼戴高乐将军(General de Gaulle)辞职事件的鼓舞,这些情况诱发了多种可能的愿景,历史似乎提供了通向未来的钥匙,大学仿佛是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发电站”(powerhouses)。那些年社会史的大规模扩张,使得过去人类斗争和生存过程中被遗忘的一些区域整个被重建了,这让一些自由派与左翼的历史学家感到,他们正投入到一场旨在恢复过去被忽略的那些人的尊严的圣战中,借此能让当下和未来的社会更为民主。

然而,到了20世纪末,对一些最激进的人来说,已没有什么可能再去继续坚持一个社会整体改造观点。相反,所能实现的只是,维护与承认特殊的利益而已。在那个过分自大的右翼政府统治时代——里根—布什—撒切尔(Reagan-Bush-Thatcher),英、美的左派学者颇感无助,这种学术界的危机最初始自1970年代,在1980年代达到顶峰。在1980年代,这些保守派政府对大学缺乏足够尊重,通常排斥来自大学的许多优秀的学术智慧,而宁愿私下向“智库”(think-tanks)寻求建议。学术界的扩张戛然而止,新建大学的潮流结束了。学术职位的获得,在1960年代非常容易,今非昔比,当所有新机构都开始生产找不到职位的博士时,今日再获得学术职位已变得千辛万苦。恶果就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所有西方国家的博士获得者数目就急转直下了。学术圈经济地位的相对恶化,其薪酬已落后那些别的群体,如律师、公务员——这些在传统上通常与之不相上下的人。随着专职大学行政人员权力的日渐加强,学术圈的自主性被削弱,诸如大学评议会(senates)之类的民主机构,其影响力趋于式微;大学内部的共治被专业管理取代,至少是在理论上足以

让人思慕的专业权力、地位与声望及由此形成的专业霸权也终结了。政府对大学的监察与控制也加剧了学术界自主性的衰落,这种情况又以英国为甚。<sup>①</sup> 历史不再有任何整体性的方向或具有任何较大的意义。曾为许多左翼史家所认同的工人阶级,已经被证明是不可靠的群体,随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他们不但在人数上下降,甚或有部分工人成为像里根及撒切尔夫人这样的右翼理论家的拥趸。<sup>②</sup>

200 从社会学上说,后现代主义的许多方面都可以被理解为以下这样一种方式,即对学者在世界及作为一个机构的大学之内丧失权力的一种补偿方式。因为后现代主义把大量的,实际上是整个的思想权力放到墨守成规的阐释者、评论家与历史学家手里。<sup>③</sup> 如果一个文本作者的意图与这个文本的意指毫无瓜葛,如果意义是被读者、阐释者放进文本中,如果过去是一个文本——犹如其他文本一样,那么他或她在阅读或书写历史时,即是在有效地重新发明过去,过去便对擅自逾越事实雷池的大胆研究者无能为力,历史学家与评论家就会成为全知全能者了。为强调此,后现代主义者发展出一套深奥的语言与“此中人语”(jargon),它们主要借自文学理论,这致使后现代主义者的作品难觅“友声”,只能于后现代主义者中寻觅知音。因此,这样的志业看起来不仅是孤芳自赏(self-regarding),更具反讽意味的是,根据后现代主义对霸权与轻重缓急式做法(prioritization)的批评,这样的志业还是一种精英论调。后现代主义的自我陶醉和精英论调可以被当作一种变相要求获得补偿的技艺——这种补偿

---

① 有关的普遍性看法,参看 Vernon, 'Who's afraid of the "Linguistic turn"?' , p. 83, n. 8。

② 有关的论断,参看 Mayfield and Thorne, 'Social History' , p. 173。

③ Michel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transl.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Ithaca, New York, 1977), p. 153.

源自过去十至十五年间,由于学术圈内的从业者过多而带来的切实损失、收入的减少和地位的下降。令人不禁想起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一句名言:“任一傻瓜均能创造历史,但它需要一个天才去撰写。”

许多后现代主义著作的孤芳自赏程度,甚至还比这更赤裸地个人化。后现代主义为历史著作中的主观性背书,这鼓动了历史学家不惮冒昧地涉入文本,以至于在某些情况下太突出他们之在场而湮没了历史主体。例如,在后现代历史学家戴内·帕基丝的《历史上的女巫》一书的前四页中,“主格的我”(I)、“宾格的我”(me)、“所有格的我”(my)就出现了不少于八十八次。在其中,女巫自身到哪里去了?帕基丝抨击研究巫术的男性历史学家,说他们为在学术上高人一头而将女巫工具化,她没有静心想一下,原来她自己也正在重蹈覆辙。<sup>①</sup>与此例相比,另一篇由一位自称后现代历史学家的鲁迪·科夏(Rudy Koshar)最近写的论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他在前五页中三十二次举引其著。<sup>②</sup> 优先强调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争议及规范书写(prescriptive writings),而非优先强调研究过去自身,这也教唆了史家的孤芳自赏、买椟还珠式做法,使他们迷恋于对这些议题所持的立场,而无视这些议题自身。如果历史学家认为他们自身比他们正在书写的对象更为重要,如果他们像理论家安克斯密特和詹京斯所希望他们去做的那样,彼此互相征引——超过其指涉过去,那么出现自我吹嘘、唯我独尊、自命不凡的结果将是应有之义。这样实在有必要回归到初学者的谦卑(a return to scholarly humility)。

201

① Purkiss, *The Witch in History*, pp. 1-4, 59.

② Rudy Koshar, 'Playing the Cerebral Savage: Notes on Writing German History before the Linguistic Tur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22 (1989), pp. 343-359.

毕竟,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曾让他的同行牢记:如果他能看得更远,那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所做的研究得以可能,仅因为先人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sup>①</sup>

适当的谦卑将是必要的,多少由于不仅是后现代主义者,还有各个时期流行的量化主义者(quantifiers)、心理史学家(psychohistorians)、女权论者乃至其他诸色人等,在思想的舞台上粉墨登场后,都曾顾盼自雄地宣示:所有既往研究历史的方法都是画蛇添足、充满偏见、无用或虚伪的,这是因为它们都有幼稚的理论或技巧,因为它们忽视了关键的、有机的概念,或者因为它们根本就不科学。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当然是19世纪的兰克们。根据专业化的社会学来看,这样的宣示可以作为这样一种方式:即让那些倡导它们的人之专业地位合法化,让学界其他人确信其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反讽的是,他们正是现代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为了在这个文化中获得发言机会,知识分子不得不宣称他们是在传达非常新颖的东西。<sup>②</sup>

202

可是,这样介入过去的方式在其发端之时就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是其宣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张,此后,这种新的研究取径就会蜕变为仅是另一种次专业(sub-specialism)。比如,当计量史学出现时,其拥护者断言它会之前所有的历史研究取径成为既陈刍狗,未来所有的史家都应该按照计量史学的方法来受培训。大约二十年左右后,在1990年代,争论已经消弭,计量史学希望借使用统计来解决基础历史问题的宣称已经被弃若敝屣,于是计量史学也蜕变

---

① Newton to Robert Hooke, 5 February, 1675/1676,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3<sup>rd</sup> edn., Oxford, 1979), p. 362.

② 参看以下这个声明:“有关启蒙运动以来思想争论的绝对原创性特征,只是一种长期重复出现的炫耀,后现代主义重蹈了这种覆辙。”见 William Reddy, ‘Postmodern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implications for an historical ethnography’,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7 (1992), pp. 135 – 168.

为一种次专业,它有自己的学会、杂志、专业语言,与所有其他次专业和睦相处。不管如何出现新一波的历史理论与实践,同样的情形在不同时代都层出不穷。

社会史就可作为这样一个过程的典型例证,当其首先在1960年代出现时,如我们所知,社会史也提出一些雄心勃勃的宣言,认为其典范应该遍布到整个历史研究领域。在《社会史杂志》于1967年刊发的首篇论文中——其出自主编彼得·斯特恩之手,斯特恩以开风气的口吻(“很少有重大课题已经被深入研究过”)谈及社会史的“进展”,声称社会史有能力“重铸历史学的传统问题”。<sup>①</sup>但在1976年,《社会史杂志》出版十年之后,斯特恩已经在抱怨,“人们用疑惑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史史家,或给其误贴标签,以致一个历史系依旧可以快活地按部就班、墨守成规,只要他们给一些课程描述与研究计划上冠以‘社会的’词汇”。根据斯特恩的观点,“传统史家的僵化”将要为这种难堪的情形负责,另外一面,“株守陈规的历史思想”固化了以下这个认知——“一般的判定认为社会史是另一个研究主题而非一个包罗万象的研究取径”。因而,“传统史家想把社会史置于别具一格的另类洞穴里的夙愿”有效实现了。怀着些许绝望的情绪,斯特恩呼吁建立独立的社会史系,以摆脱“传统历史学”(conventional history)这种“令人厌烦的”性质,且作为一个“为人公认的学科”,社会史可以与同类并驾齐驱。<sup>②</sup>幸运的是,可能根本就没有人

203

<sup>①</sup> Peter N. Stearns, 'Some Comments on Social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I (1967), pp. 3-6.

<sup>②</sup> Stearns, 'Coming of Age', pp. 246-255. 对于一个新产生的次学科(sub-discipline)在长时期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用诞生于1880年代的经济史次学科作为个案。关于经济史的第一个大学讲座职位于1892年在哈佛大学设立。在英国,1926年成立了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Society),到1975年,其会员已达2500人。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经济史学者马丁·董顿(转下页)

注意到他的呼吁。

因而,这里发生了一个关键的后撤,从社会史要统摄整个历史研究的霸权宣言转向更谦虚地要求人们承认其作为一个次专业的合理性。这个过程,复制了历史上的许多别类次专业的遭遇,非常类似爵士歌手乔治·梅利(George Melly)在他研究1950—1960年代流行音乐时面对的状况,犹如滚石(the Rolling Stones)或披头士(the Beatles)音乐始于离经叛道,但在短时间内就化约为一种音乐风格。<sup>①</sup>雷同过程亦发生在日前的后现代史学上。在一种特别的文化和思想史的外观下,后现代主义已经拥有它自己特别的期刊和学会配置。当历史系,尤其是美国的历史系认为,1970年代有必要聘任一两位计量史学者,在1980年代则有必要聘任一两位妇女史史家,所以他们如今想,在1990年代则有必要聘任一两位后现代主义文化史家或思想史家。从长远看,这些举措很可能会增大历史专业内已然存在之令人困惑的后现代差异和碎裂,而不能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理论与实践进行改革。

---

(接上页)(Martin Daunton)声称,虽然独立的经济史系在最初成立时,是为了避免仅褊狭地聚焦于高层政治史和外交史——在20世纪早期,这样的做法是一些主要历史系的特色,“现在,为了去保护一个受忽略的研究领域,就赋予其一个特别身份的做法已不再必须,相反,经济史系变得闭门造车与鼠目寸光”。到1993年,英国经济史学会的成员已经下降到1750人。到1994年,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的经济史组被取消,其成员要么是“移民”到经济学组,要么是“移民”到历史学组中的其他分支中。1996年,在英国科研水平评估报告(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中,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s)把历史学和经济史合并成一个单一的评价单位,这与他们之前的做法判然不同。所有这些都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经济史寿终正寝的标志,从其诞生到现在不过约百年而已。参看M. J. Daunton, ‘What is Economic History?’, in Gardiner (ed.), *What is History Today?*, pp. 37–38, and Vincent,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p. 97。

① George Melly, *Revolt into Style: The Pop Arts in Britain* (London, 1970)。



## 三

像被英国、法国、德国及美国等国的专业史家操作的历史学真的仅是一个宰制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形式吗？专业史家真的仅仅是在为他们所在的阶层代言——包括为维护其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特权地位辩护吗？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事实就是如此，如他们其中之一所言：“最终，历史便是理论，理论就具有意识形态性，而意识形态就是物质利益。”<sup>①</sup>用一个持后现代观的学者詹京斯的话来说：

专业历史学家……并不外在于意识形态的冲突，还处在其中的宰制性地位……专业历史学被作为当前的宰制意识形态之如何形构历史的表现。看起来明显的是，从一种较广的文化和“历史的”观点来说，像国立大学之类数百万镑的公共投资，对于目前进行中的社会建构之复制，不可或缺，因为它们居于文化监护（学术标准）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最前线。如果不具备这些功能，这样的投资便打水漂了。<sup>②</sup>

面对被他们视作壁垒森严的学术建制，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抱怨他们想象中的专业历史学之不宽容性，依照其中一位后现代主义者的看法，在专业圈内，“不守常规者、怀疑者和不愿轻信者一直被当作该上火刑架的异端”<sup>③</sup>。尤有甚者，他们试图摧毁这个观念——“历史学专业以其重要性可以合乎时宜地受到欢迎”，这依赖于它宣称其

① Jenkins, *Re-thinking*, p. 19.

② Jenkins, *Re-thinking*, pp. 20 - 21.

③ Southgate, *History*, p. 24.

205 致力于揭开一个“客观的”历史真相,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专业历史学的这个真相并不比社会上其他任何一个团体揭示出的真相更为真实。在此立场上,后现代主义史家与专业的学院派史家一刀两断,相反却借以下手段来鼓励那些受到压迫的社会团体“加强自己”,即指示他们:“我们自己的历史”是如何能为当前及未来的政治规划,“提供一个有效的基础”。<sup>①</sup> 历史研究的规则与相信人们可以获致历史真相的信念,都将被抛弃,“在宣传与好的历史之间进行区隔,主要是使挑战宰制意识形态的诸多历史失去合法性”。因此,历史书写与教学将会建立在这个信条之上——“历史就是宣传,而且是关于当下的宣传。”<sup>②</sup>

这并非是来自后现代主义本身的声音,如我们所知,后现代主义有许多变体,这只是来自庸俗后现代主义的声音,将斯大林时代粗糙地简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 1990 年代的术语。詹京斯以这种褊狭的方式来看待大学里的历史学家,若是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借用他的论证模式来说,他所以做出这种论断,与其仅是一个较高等的教育机构中的讲师身份有关,故此他感觉受到了来自拥有百万英镑投资的大学机构的排斥——这些大学机构正是他所极力批判的。无疑,这是一个不公平的指控,与詹京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学历史专业的指控半斤八两。不管如何,将诸如大学之类的文化机构的功能,仅视作宰制价值传递者的看法,幼稚到家了。相反,它们是社会内部互相抵牾的许多位所之一,以之为基础,能引发和争辩一些新的、经常是扰人的、具有颠覆性的知识与理念。在

206 我们这个多元而又零碎的后现代社会,存在如自由主义这样的宰制话语或意识形态的观念——这是詹京斯的见解,这见解本身就是一

---

① Southgate, *History*, p. 8.

② Somekawa and Smith, 'Theorizing', p. 157.

个异常简单化的认知。毕竟,许多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自己都处在像剑桥、曼彻斯特、普林斯顿、康奈尔、柏克莱和耶鲁、法兰西学院或索邦(Sorbonne)这样主要的教学与研究机构中。也存在许多历史学家与哲学家,更不必提政治家的例证,他们已经提出和坚持一些与其物质利益相悖反的原则,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就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马克思与工厂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首要之处就是强调思想的独立作用,且一并将其从物质因素那里解救出来。因是,难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詹京斯及那些推广后现代主义的人认为意识形态仅仅是表现物质利益的一种方式,那么詹京斯实际上并不理解后现代主义是什么。无论怎样,总是会有而且一直会有许多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历史学家会选择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或一种解释,而不是另外一种,经常促使他们所以为此的动因都深藏在潜意识里,不能根据任何一种理性因素来加以解释,更不必说经济利益的因素了。

假若历史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它是如何发挥这样的作用?它在社会上有什么重要性?据另一位后现代主义作者之言,历史是“为生产‘历史的过去’(historical past)而需要的学科训练方式,它在关于‘公众的过去’时发挥一种协调的功能”。他继续说,“它在这方面的角色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由专业史家掌控的那些历史争议,“无疑影响着公众长时间以来关于过去的认知”。<sup>①</sup> 一个后现代文化场景的德国观察者伍尔夫·康斯坦纳(Wulf Kansteiner)亦确信,在公共话语里,“传统历史学的重要性日益下降”,这是导致当前历史“玉体欠佳”的主要原因。<sup>②</sup> 不过,这些意见都未能一

207

① Tony Bennett, *Outside Literature* (London, 1991), pp. 16 - 30.

② Wulf Kansteiner, 'Searching for an Audience: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n the Media Age—A Comment on Arthur Marwick and Hayden Whi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1 (1996), pp. 215 - 219.

针见血,公众关于过去的知识——换言之就是公众记忆,往往是被从民歌、神话、传统到通俗小说、小报、流行的出版品之类所建构,而非是来自专业史家的影响。专业史学的鹄的更经常是揭露那些流行的历史神话中之陈词滥调,而非与之同流合污。进言之,发轫之时,专业史家一般就是仅向受过教育的很小的群体现身说法,若将这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史家视作是历史知识的单一生产者——这些历史知识建构了公众关于过去的看法,那么我们就极大高估了历史学家的公共影响力。

即或如此,相当数量的后现代主义作者依然固执此见。詹京斯就认为“资产阶级”相信历史学是一门中立的学科,它不但在政治之上,亦超越于政治;资产阶级不需要一种尚未到达其未来最终之目的地的历史轨道(比如进步),它早已到达它自己的了,也就是资产阶级对社会的宰制与对社会中其他人的剥削。故而,历史学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认为历史学就是为过去护法,这样的见识远非事实,因为“过去没有一个单独的他在(a self)”<sup>①</sup>。像许多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评论家,詹京斯将所有的历史学家一锅煮,以一个单一标签(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命名之,并拒绝承认当下标志专业历史学特征的事实,即历史学家间政治与方法论立场的多歧性。进言之,“资产阶级”同样也没有“一个单独的他在”,“无产阶级”同样如是,以此类推,“妇女”或“同性恋者”或“非裔美国人”,亦是如此。所有这些例子的“一个单独的它在”,恰如过去一样,是被意识形态建构出来的,正如以下各种主义内部的热烈争吵,不同类别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内相互不同的经典解释,女权主义中互相矛盾的概念,如此等等。

有以下这样的猜想是非常错误的,就是猜想专业史家会对历史

---

①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p. 22.

的某些方面全无异议,因为这些方面吻合一个可以有助于他们维系职位与薪酬的“宰制意识形态”。某些历史想象或历史描述并不会因其制造者在专业圈或在大学里位高权重,就会被人甘心接受。以汤普逊 1963 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例,汤普逊几乎不能算是自由主义的追随者,或学院派学者。在撰写该书时,他根本就算不上是大学中的一个史家,主要是在学院外的教学机构和劳工教育协会(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任教,他仅有的一次专职学院派史家的经历是在沃里克大学,而此职务草草结束于他这样的行动——汤普逊领导一个激进的学生团体占领了大学的行政部门,并出版了一本抨击学术界屈膝于资本主义的书——《沃里克大学有限公司》(*Warwick University Limited*)。<sup>①</sup> 然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确定已经成为过去四十年出版的英国史著作中,影响力度最大之一种。

相形而论,杰夫里·艾尔顿爵士认为克伦威尔开创了“都铎王朝的政府变革”的观点,尽管中肯、有学识和能传之久远,可它从来就未为此领域中的学者广泛接受。事实上,它问世不久,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中发生的一个重要争论中,其即遭尖锐抨击。<sup>②</sup> 劳伦斯·斯通在 1980 年注意到,艾尔顿“已经不能说服专业圈内的更多同行,他只能让很少一部分人相信那些发生在当时英国的变化可以被合理描述为一个‘政府变革’”,尽管斯通补充说,“每位严肃的学者”都“绕不过”(grapple)艾尔顿的见解,事实是,这并不能使艾尔顿

209

① E. P. Thompson, *Warwick University Limited: Industry, Management and the Universities* (Harmondsworth, 1970); idem,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直到暮年,汤普逊才获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该荣誉一般是给予比汤普逊这个年纪要年轻许多和声望上要逊色许多的那些历史学家。

② Penry Williams and G. L. Harriss, 'A Revolution in Tudor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25 (1963), pp. 3-58.

的观点成为人们认可的历史研究正统。<sup>①</sup> 尽管艾尔顿一直是几十年间英国学术建制中的栋梁,他是英国皇家历史学会(Royal Historical Society)的会长,又是剑桥大学钦定近现代史教授,在撒切尔政府的推荐下还被授予爵位。征诸以上汤普逊与艾尔顿的两个例子,权力和知识的关联似乎并不太直接。

对于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历史学家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大有异见存在。诚如约翰·文森特之评论:现在的历史学家多是大学里的国家雇员,在20世纪刚过去的几十年,他们都经历了一个收入及地位的明显下降过程:

今日的历史学家并非权力的把持者——不管这个权力是关于人、关于钱或是关于意见。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之中,他们对每况愈下的社会流动(downward social mobility)忧心忡忡。在其生活中,他们几乎抓摸不到什么权力;在别人的生活中也可有可无。他们相当疏远现代形式的生活——商业,他们与日常情事无关,他们缺乏根蒂,他们无心奉献,这些是全世界那些小官吏阶层共有之现象。<sup>②</sup>

换言之,将他们视为拥有霸权的精英,这是无可救药的误会。

210

虽然这可能是真的,但文森特从所有这些情况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他认为因为历史学家现在依靠国家得到工作和退休金,所以他们倾向支持强大的国家、社会改革,当然还有退休金制度,而嘲讽

---

① G. R. Elton, *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hanges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I* (Cambridge, 1953); Ston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p. 107. 艾尔顿的门生与仰慕者往往持不同意见。参看 Kenyon, *The History Men*, pp. 219 - 224。

② Vincent,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p. 53.

历史研究中的“市场力量”(market forces)作用,若是“都留给市场,将没有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了”。<sup>①</sup> 因之,历史学家想再获得“自由跋涉者或孤独的探险家”这样的知识位置<sup>②</sup>,是难上加难了。<sup>③</sup> 当然,可能是文森特自己作为《太阳报》(*Sun*)的专栏作家赚了大钱的经历,使他有赞成自由研究的偏好。实际上,任何一个了解文森特早期历史作品的人都可以证实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作品所采取的研究取径是非常不同于此的。<sup>④</sup> 若是我们果真相信文森特这种化约主义的见解,则我们只能希望靠零工收入为生的史家坚持粗鲁的右翼观点,尽管某种程度上存在一些相符的个人例子,如安德鲁·罗伯斯(Andrew Roberts)——新撒切尔风格(neo-Thatcherite)的文本《卓越的丘吉尔们》(*Eminent Churchillians*)一书的作者,他即与这种模式若合符节,但更多的史家则背道而驰。在大学里,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仍大有市场,大学生对历史课程的荒废程度远不像他们对如物理学那样的学科严重;在大学里,如同人们所在的别的部门一样,在历史学家中间也存在多种多样的政治观点,尤其是因为聘任他们的大学一直被社会特意当作百家争鸣的思想空间。这样的大学角色,并不是只为激进分子珍视。在英国,1989年,当保守党的《教育改革法案》(*Educational Reform Bill*)打算废除大学教师的终身制时,也正是上议院保守党议员的反对(a Conservative revolt),才成功补充上一个条款——学者不能因其信仰而被解聘。

211

① 意指历史学的发展不能靠商业推动,必须要靠政府投入。——译者注

② 意指史学家单枪匹马、不计得失地从事研究。——译者注

③ Vincent,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pp. 52, 54.

④ John Vincent, *The Formation of the Victorian Liberal Party 1857 - 1868* (London, 1966).

## 四

社会中的每一群体都应该有其历史，借之作为建构自己认同的一种手段。这样的意见颇多歧义。像美国历史学家罗拉·李·唐 (Laura Lee Downs) 注意到的：

女权主义及别类的认同政治依赖于一个扰人的认识论基础，其中，植根于作为受欺压的她者 (an oppressed other) 而新形成的认同意识，这个脆弱的团体诉诸坚持个人之经验外人无法获得的局内人立场，来抵抗白人男性的殖民。只有那些分享到这些团体的认同和生活经验——不管这些经验来自生物上的天生或是被社会所建构——的人，才能知道在一个被建构成为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与新教徒的美国，其中的黑人、女性、蓝领或异教徒情况到底如何。<sup>①</sup>

你可能会说据此观点，没有一个受欺压的团体能书写白种男性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历史，因为他们同样没有能让其书写这种历史的经验。此类宣告的终极含义在于，每个人只了解他自己，除此之外一无所知。经验成为真相的唯一仲裁，不再有普世真相，仅仅只有适合某些特定群体的真相。

---

<sup>①</sup> Laura Lee Downs, 'If "Woman" is Just an Empty Category, Then Why Am I Afraid to Walk Alone at Night? Identity Politics Meets the Postmodern Subjec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5 (1993), pp. 414-437, 引文见 p. 416。



故此,白种男性的历史学家仅能书写死去的白人男性的历史,这实际就是根据后现代主义者的意见,专业历史学所传达的关于过去的宰制观点,为何会遮蔽其他群体于历史图画之外。确实,一些专业史家明确要捍卫这种历史研究的实践,坚持认为历史是,也经常应该是研究社会上某个宰制集团或某些宰制集团——这里的宰制,在西方社会指的就是白人男性,因为在历史上他们的“真相”(truth)较之那些附属群体的,更为重要。 212

卡尔也十分夸张地认为,那些在他看来对历史变化的产生所做贡献乏善可陈的人,例如女性和那些没有文字以及在政治上没有组织的群体,并不足以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约翰·文森特在这点上与卡尔所见略同:“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不是失败者的……历史骨子里是男性的历史……历史是富人与名人的历史,而非穷人的。”<sup>①</sup>实际上,这仅是一个只知晓他所书写的19世纪英国高层政治史作者的自供状,表明他对另一些种类的历史研究完全无知。在过去三十年或更多一点时间里,在西欧与美国历史学术的宽广世界中,这种高层政治史研究已经日渐乏人问津,反而是穷人和无名的人的,失败者的和彻底是女性的历史,业已吸引了绝大多数史家的注意力,并成为绝大多数书籍的主题。<sup>②</sup>这在部分程度上是与“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崛起有关,书写游民史的史家确定其本人并非游民,类推之,书写犯罪史的人亦非罪犯。重建被欺压群体的历史的努力,较之其可以鼓励当下政治、社会、种族或性别认同的意图,与其暴露社会中不平等的基本结构的旨趣更有关系。在1990年代中期,当一个后现代史学家还在呼吁“重新发现过去失败者的历史”(rediscovery of history's losers)时,我们忍不住要问:过去这三十年, 213

① Vincent,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pp. 12, 15.

② Vincent,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pp. 40-42.

他一直生活在哪个行星上?①

社会中的每个团体都应书写自己历史的理念,在实践上可以土崩瓦解了。大体上,这并非问题所在,大部分人仍属于男性白人及中产阶级的专业史家,已经花费时间去书写其他中产阶级男性白人的历史,尽管其中的一些像约翰·文森特这样的史家,认为这是他们的分内之事。况且,中产阶级的男性白人也书写妇女史或黑人史、异性恋者也写同性恋史,诸如此类。认为这样做就是在以不合“道”的方式来“挪用”(appropriating)其他群体的历史,因为他们缺乏所以为此的经验。此种见解实在难以服众,这样见解的终极含义将会导致一种极端的局内人立场——宗教史只能有待僧侣书写,战争史只能由将军完成,法西斯的历史只能交给法西斯分子书写。最后,书写历史将成为不可能,我们只能撰写自传了。这样的见解也可能具有右翼的含义,这可以为卡尔·布瑞登巴(Carl Bridenbaugh)在1962年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演说证明。例如,当他指控“我们这行的许多较年轻的同侪和那些实习生,都是有外国源头的产品……他们发现在一个很真实的意义上,他们是我们自己过去的局外人……他们没有作为局内人的经验来协助他们”②,在此意义上,民族主义史家经常坚持他们拥有他们自己国家的过去,外国人不必花费心力挪用它。即便是大师费尔南多·布罗代尔,他的许多著作关注的都是西班牙、意大利的历史,以及其他一些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历史,但吊诡的是,在其最后一部著作《法兰西的民族特性》一书中,布罗代尔认为:历史学家只有在面对其本国的历史时,才能真正一碗水端平,在于他几乎是本能地理解它的曲折和转变,它的

---

① Southgate, *History*, p. 116.

② Carl Bridenbaugh, 'The Great Mut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8 (1963), pp. 322 - 323.

复杂性,它的独创性及其缺陷。<sup>①</sup>

可是,书写法国的历史是太重要的事,不能只留给法国人去做;德国的历史影响别国的历史太大,也不能只留给德国人去写。历史中那些关于明显是他者的东西与那些看上去是熟悉的东西,其数量是难分伯仲的。借助史家使用严格的学术训练锻造出的历史想象力,历史就可以跨越一系列在时间、文化和经验上的断裂。当然,史家也可以借将自己个人的经验投射到关于过去的研究中,而有所获。比如,爱德华·吉本习惯提起,他花在当地军队中服役的那段时间并未虚耗,这段时间的经验在他书写罗马帝国衰亡时期的军事史时,大派用场。相仿,大卫·诺利斯曾作为僧侣的体验明显地有助于他书写英国的宗教秩序史,尽管如我们所知,这在一种特别的方式上使他的解释剑走偏锋。自然,也可能存在疏失,一种狭隘的视角,或一种肤浅的认同感,会一叶障目,让你难以区辨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存在的那些关键性的差别。比如,即便不是最多,也还是有很多被统帅所书写的军事史,这些著作不可避免地是狭隘的,根本无视这个主题所具有的较广阔的社会、政治和外交层面。一个著名作者——弗勒(J. F. C. Fuller)少将所撰写的许多书,即可归为此类。<sup>②</sup> 就某些方面而言,存在于1990年代的女人与1790年代或1590年代乃至1390年代的女人之间的文化鸿沟,比起存在于现在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文化鸿沟,要大得多了。<sup>③</sup>

215

① Fernand Braudel, *The Identity of France*, Vol. I, pp. 15, 19–21.

② J. F. C. Fuller, *The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ir Influence upon History* (3 Vols., London, 1954–1956); idem, *The Conduct of War, 1789–1961: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the French, Industrial and Russian Revolutions on War and its Conduct* (London, 1961).

③ 意指现在的女人与过去的女人之间的差别要远大于当今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差别,实际是说个人经验的不可靠性。——译者注

此外,没有人敢贸然宣称,女人没有资格去书写男人的历史或雄性(masculinity)的历史,同性恋者没有资格写异性恋者的历史,仅仅是因为他们欠缺作为雄性、异性恋者的生活经验——正是这经验使得写作这类历史成为可能。<sup>①</sup>为什么受欺压者不能书写欺压他们的人之历史?这就是此类宣称的含义所在。哲学家保罗·珀胡山(Paul Boghossian)已经观察到:“如果有权力者不能批评受欺压者,在于关键的认识论范畴(epistemological categories)都铁定与某些特定的视角相关联,按此理论,受欺压者也不能批评有权力者。”<sup>②</sup>实际上,这种情形并未出现。近些年,关于雄性历史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是由女历史学家书写的。<sup>③</sup>想象力弥补了经验的缺乏。距离甚至可能导致一个有益的超然立场,历史学家对研究对象的认同,绝非毫无问题。例如,当一个资深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二战老兵宣称,他同情1944到1945年间在东线作战的希特勒军队中的士兵,这在德国会引起人心惶惶的。他的认同感致使他将这些士兵的苦难与那些犹太人的苦难,与战后数百万德国人被集体从东欧国家驱逐的苦难,以及犹太人遭遇的集体屠杀那样的苦难相提并论,这样的认同方式,当然会让人们反感和难以接受。<sup>④</sup>

---

① 对此种状况所做的知识社会学分析,可参看默顿(Robert K. Merton):《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视角》,收入氏著《科学社会学》(上册),鲁旭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5—190页。

② Paul Boghossian, 'What the Sokal hoax ought to teach us: the pernicious consequences and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postmodernist" relativism',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3 December 1996, pp. 14 - 15.

③ Joanna Bourke, *Dismembering the Male: Men's Bodies, Britain and the Great War* (London, 1996); Ute Frevert, *Ehrenmänner: Das Duell i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Munich, 1991).

④ Andreas Hillgruber, *Zweierlei Untergang: Die Zerschlag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und das Ende des europäischen Judentums* (Berlin, 1986).

那些认为经验与认同对于书写历史是必要的宣言,已经引发了许多问题,历史学家也对之有了与时俱增的警醒,这至少让部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发生了转移——从以同情的心态重建他们所认同的受欺压群体的历史转到对概念——这些史家认为正是这些概念构造了压迫——的语言学分析,例如,从对妇女历史的研究转向到对性别(gender)的语言学分析。这样的做法还是有其问题所在。有人拥护后现代主义将性别作为一个概念的做法,根据罗拉·李·唐的观点,美国历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Scott)已经着手一个研究计划,其中,性别认同并非植根于压迫的经验,它来自“主要借由一个区辨的过程,颇类似于索绪尔对意义的语言体系之结构基础(the structural ground of linguistic systems of meaning)的识别”。在此过程中,掌权者——中产阶级的男性白人——通过与陪衬他们的诸如妇女、非白人及穷人这样的群体进行切割,来创建其自身的认同。因此,妇女的性别认同是被男人制造出来的,不是来自于其自身的经验,而且这些认同仅是被中产阶级的男性白人强加于其身的。吊诡的是,斯科特赞成将性别作为一个有用概念,其对于历史学家的含义在于,女权主义者应该停止追求妇女经验史的幻象,相反应该致力于检查以下这种历史及运作——“将一个人置于‘她者’的悲惨处境中之意识形态体系的内在机制”:首先,要把性别作为一个差异化的体制,而不是将妇女作为一个群体、把种族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也不是将非白人作为一个类别,诸如此类。①

---

① Laura Lee Downs, 'If "Woman" is Just an Empty Category, Then Why Am I Afraid to Walk Alone at Night? Identity Politics Meets the Postmodern Subjec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5 (1993), pp. 414-415. (作者这里的意思是不要将概念本质化、化约化,每一个概念背后都有复杂的所指,即所谓存在差异。另外,作者此处注释为:前揭书 pp. 414-415。系误,译者据该书 Norton 2000 年版第 247 页纠正。——译者注)

因为斯科特认为语言建构社会存在,且提供了历史上唯一的力量之源,所以她全然无法解释历史变化,这由于在其分析系统中,并无任何东西告诉我们语言如何改变自身,或为何改变自身。固是,她无法让人看到内化于性别概念中的不平等结构可以被打破的希望。罗拉·李·唐认为,在分析历史上的语言时,我们所需要的,是去考虑社会的,还可以加上政治的与经济的语境,这样我们根据语言的相互影响及在真实世界中它的语境,才能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变化。<sup>①</sup> 斯科特对这些指控的反应煞是强烈,但难以服人,在争论中又不能提出任何到位的反驳。<sup>②</sup> 罗拉·李·唐呼吁要重新将语言和思想置于一个真正的历史语境里,这个号召无疑是强有力的。

男人书写的妇女史,不一定必然就是以男性或雄性的观点写成的;如同女人写的男人史,不一定必然就是以女性或阴性(feminine)的观点写成的。你可以列举出许多女历史学家,她们已经书写出了关于政治史或外交史的重要著作,除了书之署名,我们根本看不出这些著作是女性史家之手笔,我随兴想起的就有:拉甘希尔·哈顿(Ragnhild Hatton)所写的汉诺瓦和英格兰的乔治一世传,又比如,奥利弗·安德森(Olive Anderson)关于维多利亚时代自杀现象的研究,安妮·科瑞格(Annie Kriegel)关于法国共产主义的书,还有本书中

---

<sup>①</sup> Laura Lee Downs, 'If "Woman" is Just an Empty Category, Then Why Am I Afraid to Walk Alone at Night? Identity Politics Meets the Postmodern Subjec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5 (1993), pp. 423 - 424. (作者此处注释为前揭书 pp. 423 - 424。系误,译者据该书 Norton 2000 年版第 248 页纠正。——译者注)

<sup>②</sup> Joan Scott, 'The Tip of the Volcano',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5 (1993), pp. 438 - 443; 又可参看 Laura Lee Downs, 'Reply to Joan Scot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5 (1993), pp. 444 - 451。

许多地方都讨论到的格特德·希摩法的著作。<sup>①</sup> 后现代主义者可能会认为每个历史作品不可避免会体现一种主观阐释与一套历史哲学,这就会使得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可比较的(incommensurable),因此也不能产生任何一种可以被有意义地解决的争执。尽管如此,这并不能使后现代主义宽容别的不同于己的观点。当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帕基丝攻击凯斯·托马斯那本经典著作中有关 17 世纪巫术的描述时<sup>②</sup>,她不是认为这些描述在实证上存在欠缺,而是认为托马斯将女巫刻画为软弱无力的老乞妇,主要意图是在传达一个“便捷的神话”(enabling myth)——男人的“历史认同植根于女人的软弱无力和沉默失语之上”。与此同时,帕基丝严厉批评托马斯特意回避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巫师是女人?帕基丝认为这正是一个绝佳范例——表明男性对妇女史的傲慢自大与漠不关心。<sup>③</sup> 顺理成章,托马斯的巨著因政治立场而遭鄙夷,而女巫是否主要为乞妇的问题,在帕基丝看来根本无关紧要,因为如同历史一样,这个问题永不会有最终的答案。

218

实际上,帕基丝的见解既矛盾,而且在实证上也存在缺陷。托马斯的观点为大量在当代有效的证据所支持,那些贫穷的单身老嫗之所以经常被指控为女巫,绝非因为她们是沉默失语者,乃是因为她们下咒给那些不愿救济她们的人。后者一旦遭受罪愆,他们就会

① Ragnhild Hatton, *George I, Elector and King* (London, 1978); Olive Anderson, *Suicide in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England* (Oxford, 1987); Annie Kriegel, *Aux Origines du Communisme français 1914 - 1920* (2 vols., Paris, 1964). 这是从一个可以包括无数人的名单中,在数量上随意选择的三个例证。

② 此处指托马斯那本经典著作《宗教与巫术的衰落》(*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Studies 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1)。该书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文节译本。——译者注

③ Purkiss, *The Witch in History*, pp. 66 - 68.

把其后发生的任何一个意外或不幸与这种诅咒联系起来,并以施巫之罪指控这些被怀疑的女人。这是托马斯在试图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巫师是女人,而非打算回避问题。至于说到这些女人在面对施巫指控时软弱无力,或者说她们在当地社群中几无地位和影响力,这需要在—一个严格限定的历史领域里做实证的观察。根本就没有证据坐实帕基丝对托马斯这个指控——托马斯之所为此是在替当前的男性认同护法,唯一能坐实这一指控的只能是大男子主义(sexist),因大男子主义本就这样预设:他是个男人,所以他必须这样做。别的后现代主义者习惯声称,后现代主义已经用一些“短暂的”(tentative)和“谨慎的”(circumspect)、且被“不断完善”的假定,取代了历史学家早已认可的确定性的客观知识。<sup>①</sup> 诸如帕基丝这样的历史学家,带着清楚的想获得当下政治权力的意图来书写历史,这绝非是“短暂的”和“谨慎的”,更不必说她们是将论点建筑在处理了她们所掌握的史实之基础上。类同于其他任何一种历史,女权主义史学如果想要以理服人,就必须以事实为基础。

后现代主义或许会宣称,“没有真正的客观‘历史’,只有历史哲学,历史学家的工作均可化约为某些意识形态立场”<sup>②</sup>,这些说法都不真实。根本上,假若政治或道德目标成为历史书写中的至高准则,那么学术事业就受害不浅了:事实被滥用去证明特例,为政治目的去扭曲证据,忽略不利于己的文献,刻意武断和误解材料。若是历史学家不愿意追求真相,若是客观性的观念仅是旨在压制那些另类视角的一个概念,那么在评估某一特定历史主张的优点时,学术

---

① Southgate, *History*, p. 9.

② Ann Wordsworth, ‘Derrida and Foucault: Writing the History of Historicity’, in D. Attridge et al. (eds.),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Question of History* (Cambridge, 1987), p. 116.



准绳就会无关紧要。这实际是如艾兰·索姆科娃(Ellen Somekawa)与伊丽莎白·史密斯(Elizabeth Smith)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之终极目的。她们认为,由于“在历史学家所能制订出的任何规范中,所有的阐释都同样有效”,所以历史学家很有必要“改变整个的评判基础,从侧重绝对的或客观的真相,转向强调那些道德或政治的标准。也就是,”她们接着说,“远非相信我们正在书写的东西就是绝对的真相,必须要相信我们是带着道德或政治立场在书写它。”她们补充说,她们“拒绝这个判断,在于这个判断认为假如我们放弃对于客观真相的效忠,我们一定是在心怀叵测地书写历史(往最恶劣的方面说,是在做政治宣传)”。<sup>①</sup> 她们缺乏理由去设想为什么这不会成为现实。其实,按照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方式,他们正在以走极端的方式来讥讽他们正在攻击的这种立场。没有历史学家会完全相信他们正在书写的就是**绝对的真相**,这仅是其中**可能的真相**,是他们遵照通常的证据法则而费尽心力使人们接受的真相。最后,以下这样的认识是很有问题的,就是认为两个互相龃龉的历史论断同样有效,或者认为没有办法确定它们两个谁更符合历史——因其是建立在不同的政治与历史哲学的基础之上。不同的历史学家使用相同的材料去追问不同的问题<sup>②</sup>,是一回事;说他们用相同的材料去追问同样的问题,却得出大相径庭的答案,这又是相当不同的另一回事了。如果一个历史学家认为大企业促成了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另外一个史家则认为大企业并没有促使纳粹上台,那么这两个认识不可能都正确。根据其被书写时的立场,声称每个观点都是对的(可以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为例),这是个无意义的表述。

220

---

① Somekawa and Smith, 'Theorizing', p. 154.

② Somekawa and Smith, 'Theorizing', p. 153.

诚如保罗·珀胡山曾经观察到的：“根据其立场，就说某些声明是对的，这听起来简单得有些像痴人说梦，大概只有说它的人或群体相信它是对的吧。”他接着说，若是我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假设一个声明与其对立方同样是对的，假设一个立场和另外一个相反的立场也都是对的，那么，因为有一个立场——实在主义 (realism)——认为两个互相对立的声明不可能都是对的，后现代主义将不得不承认其自身同其论敌——实在主义，一样都是对的。但后现代主义是不愿意承认此的，大概因为后现代主义的整个核心所在，就是认为实在主义是错误的。故而，我们再看后现代主义的那个表述，它是被作为一种真理观来建构的，但现在它却自相矛盾。实际上，这个观点自身早就预先设定好了关于真相的事实，是独立于特定的立场之外的。

221 相似地，如果认为这些声明都在使用不同的、在本质上又是彼此互相不可比较的证据规则，所以在可能建构一种或可判分对错的证据方面，就没有共识。那么，任何声明之所以能被坐实，仅只能靠专为其量身打造的证据规则。以此类推，像保罗·珀胡山的观察：

并非每个证据规则都同样好用，我们能证实这个声明，因此，强迫后现代主义者让步，承认他关于真相和正当性的观点恰如他的对手的观点一样，可以被坐实。即便如此，推测起来，后现代主义者需要坚持认为他的观点优越于其对手的，否则把它们推荐给谁呢？在另一方面说，假设某些证据规则比别的更好，那么就必须有独立于立场之外的事实，能使这些规则的确更好，对正当性采取彻头彻

尾的相对主义态度,这是错误的。<sup>①</sup>

一旦后现代主义的那些原则被反施于它本身,它的许多论断将会被其自相矛盾的观念解构。

在一些例子中,正常情况下束缚历史学家于事实雷池之中的戒条,已被后现代主义者的相对主义论打掉了,这使史家对介入政治再无顾虑,为了服务于当下的意识形态,他们肆无忌惮地歪曲或误解原始材料,此种情况造就了一些大有问题的历史作品,一个例子就是《黑色的雅典娜》(*Black Athena*)<sup>②</sup>。反讽的是,该书出自一位激进的欧洲白种男性学者——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之手,他的高见是欧洲的白种男性学者掩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真相,这个真相是古希腊文明实际源自埃及。为了取代他所谓的旧的欧洲中心观,伯纳尔提出了一个非洲中心观的立场,根据这个立场,古埃及是一个黑非洲文化<sup>③</sup>。因为整个美国大学里使用的“西方文明史”教科书,一般都把欧洲与美洲文明描述为发源于古希腊,这就意味着在文明起源的“血统”上,欧美文明还是由黑人创造的。但这个高见的画皮很快被揭穿,因为其与事实不符。古埃及人与古迦太基人在外观上很类似现代的埃及人,根本不像黑人(Negroid)或非裔加勒比海人(Afro-Caribbean)。伯纳尔举引的语言学及考古学上的古埃及人对希腊影响的证据,无法维系他的高论:埃及文化经过一系列的军事入侵,传播到东地中海地区。况且,就算白种人的思想源自黑

① Boghossian, 'What the Sokal hoax ought to teach us', p. 15.

② 该书在当时中国学界产生的一些影响,可参看刘禾:《黑色的雅典——最近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读书》1992年第10期;陈恒:《雅典娜——东方还是西方?》,《历史与当下》,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4—118页。——译者注

③ 即黑人创造的非洲文化。——译者注

人,这也与伯纳尔的另一个平行高论难以兼容,此高论乃是——白种人的思想是非裔美国人受压迫的根源。总言之,问题之关键不在于历史书写中的政治动机本身即为错误,而是黑人的历史应该如同白人的历史一样在学术上被严格和认真地对待,显而易见,这是伯纳尔的表述里所缺乏的。<sup>①</sup> 类似情况还有发生,一个男同性恋史家约翰·鲍斯威尔(John Boswell)误入歧途,曾试图证明在整个欧洲历史中,人们明显自认为是同性恋者,而且这个观点在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社会中被广泛接受。当面对一个相当确凿的历史文学证据时——这个证据锁定同性恋认同出现的时间是在19世纪末,于是,鲍斯威尔的这个观点就完蛋了。<sup>②</sup>

223 介入政治一直是许多良好历史作品的源泉,在未来还会继续对历史学家施加强大的影响力。可历史只能对追求当下的社会与政治权力提供可靠的支持,前提是它能斩钉截铁地宣称它是真实的,这就反过来要求史家用一种严格和具有自我批判性的研究取径去面对证据,史家必须勇于抛弃那些已被证明是无效的政治理念,同时不得歪曲和操弄过去的事实。尽管历史学家在展开工作之时,他们不可避免会出现动摇,有意无意会受当前一些道德或政治意图的影响,关键不在于这些道德或政治目的是否正当或能否实现,而在

---

①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2 vols., London, 1987 and 1991); Mary R. Lefkowitz and Guy Mclean Rogers (eds.), *Black Athena Revisited* (Chapel Hill, 1996); and Mary R. Lefkowitz, *Not Out of Africa* (New York, 1996).

② John Boswell, *Christianity, Social Tolerance, and Homosexuality: Gay Peopl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hristian Era to the 19th Century* (Chicago, 1980); idem, *The Marriage of Likeness: Same-Sex Unions in Pre-Modern Europe* (New York, 1994); Jeffrey Weeks,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since 1800* (London, 1981), 尤其是第六章; Richard Davenport-Hines, *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Attitudes to Sex and Sexuality in Britain since the Renaissance* (London, 1990)。

于历史论断与证据规则的切合程度,以及它们所依赖的事实为何。正是这些基础,最后决定了历史学家的兴衰成败。换言之,他们不得不保持客观,现在到了我们转向这个充满歧见的概念之意义与有效性的时候了。

## 第八章 客观性及其局限

### —

224 虽然卡尔偏爱相对主义,可他并不认为所有关于过去的观点都同样真确。他说:“不能因为一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就说该山实际上根本无外形可言,或者说它有无穷的外形。”卡尔与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走得很近,反对这样的观点——“历史事实无关紧要,一切都要依赖诠释”。他认为真正的危险在于“过度诠释”(extravagant interpretations)——比如,极端的苏维埃主义者与反苏维埃主义者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所作的那些表述,就“蹂躏了事实”(ran roughshod over the facts)。卡尔平等看待历史研究的过程与阐释的过程:

225 历史学家在开始入手时只拥有临时被选择过的事实,以及根据这些被选择过的事实——不管这选择是被别人或是其自身所为——所做出的临时诠释。当研究工作进展时,历史学家的诠释和对事实的选择以及对事实的组合,通过互相之间的作用,都会发生微小甚至可能是不为人察觉的改变。

卡尔总结道：囿是，“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一场永不休止的对话”。<sup>①</sup>

这便将卡尔领到另一个关键点上。一个客观的历史学家不是像这样一个只能找到事实的人，那仅是嗜古癖，年鉴编者即可做到。想成为一个客观的史家，你不得不放宽视界：

当我们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客观的时候，意味着两样东西。首先，意味着他不为其所处的社会及历史情势所加之其身的限制所囿……第二，意味着他能视通万里、思接千载、明察过去，远超其视野与思考完全受制于当下情势的那些历史学家。

像兰克一样，卡尔认为历史有别于史事编年，因为历史试图掌握互不相连的历史事实是如何联系起来的。但又不像兰克，卡尔认为，由此可说所有的历史都是目的论的 (teleological)，换言之，用更当令的术语说，历史之为历史仅在于它依赖后设叙述 (meta-narrative)。历史学家不得不找到客观性，这不能透过外在于历史的一些道德或宗教标准得到，也非借回避一个更广阔的归纳和仅坚持详述事实就能获致，只能靠在一个变动中的从过去至现在以迄未来的历史内部，发现更大的意义，以获取客观性。<sup>②</sup>

在《历史是什么？》中，卡尔告诫读者：“在你研究事实之前，先要研究撰写这些事实的历史学家。”我们依其告诫，在对卡尔的历史观进行评估之前，就先研究卡尔自己。爱德华·哈雷特·卡尔 (Edward Hallett Carr) 1892 年出生，大约在九十年后卡尔去世前不

① Carr, *What is History?*, p. 30.

② 参看 Carr, *What is History?*, 第五章。

久,卡尔写道:“我一定是一个仍然在写历史的非常少的那类知识分子,因为我生长在自信与乐观的大维多利亚时代之盛世晚景中,尽管此时并非维多利亚时代的如日中天之际,但这也让我很难去想象一个世界居然衰落得如此之快,且无可逆转。”<sup>①</sup>这只是卡尔对一个非常重要状态的轻描淡写,他相信大写 P 开头的进步(Progress),在外交部兼职过一段时间——其时他正是 1930 年代绥靖政策的支持者,同时亦栖身于学界,在艾伯瑞突斯(Aberystwyth)讲授国际关系,二次大战期间,他成为《泰晤士报》(*The Times*)的社论作者。这时,他对英国的盟友斯大林的俄国产生热情,开始相信计划经济乃是通向未来的唯一之路,这使他以“伦敦证券交易所广场的红色教授”(the Red Professor of Printing House Square)称号知名于当时。

战争结束后,他迁往剑桥,开始撰写《苏俄史》,在随后几年出版了十四卷。该书内容发轫于 1917 年,完篇于 1930 年代前期苏联计划经济的确立。像卡尔晚年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中一个访谈里显示的,他一直怀有苏联是人类进步之体现的信仰。他的十四卷本大著就反映了这个信仰。诚如卡尔之言,其目的“不是书写革命事件的历史……而是书写从中展现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秩序的历史”。他接着说,该书提供的,“并非这一时期内发生的所有事件巨细无遗的记载,而是对那些涉及发展主线的事件之分析”。因之,卡尔提出例证,详细阐释“1917 年之前发生的事件与争论,尽管它们当时发挥的成效看起来很小,却在后来的革命历史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sup>②</sup>。相较之下,他三卷本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The Bolshevik Revolution*)就忽视了以下这些方面:革命自身的过程,反对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人士的失败,内战期间的军事冲突,列宁的秘

① Carr, *What is History?*, p. 6.

②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Vol. I (London, 1950), pp. 5-6.



密警察契卡(Cheka)<sup>①</sup>对反对者实行的残酷镇压、谋杀、虐待和在“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上的囚禁,以及跟此主题相关的所有方面——我们可称之为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未来观下遭受挫败的诸多异类取向。卡尔的目的很明确,仅是想书写苏俄的那些体制和政策——主要是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其起源与发展,这些体制与政策在布尔什维克党大权在手后即付诸实施,卡尔相信这些体制与政策是通向人类未来的关键所在,所以他就有意识地忽略了别的方面。

这里,历史与进步被视为一体,在卡尔看来,不进步的东西都应该被剔除。以赛亚·伯林爵士在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所作的书评中指出:“若是卡尔先生接下来的数卷与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首章一个德性,那么这些卷帙将会构成对我们时代这些深深扎根于欧洲自由主义传统中之理念的最巨大挑战,此理念即是历史书写应该无偏无党、追求客观真相与公义。”<sup>②</sup>伯林爵士认为卡尔的著作很容易使人想起,卡尔是在以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中处理过去的方式重写历史。伯林在这点上的看法也得到了休·久佛-罗帕的回应。久佛-罗帕斥责说:

《苏俄史》一书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作者毫不迟疑地将历史等同于胜利者的事业,就是作者冷酷地罔顾胜者的对手、牺牲者,以及所有这些不站在主流一边或不掌握思想权势的人。那些“本可能成功的人”(might-have-beens)、党内路线的偏离者、列宁的对手与批评者,都被贬

228

① 契卡,即苏俄1917—1922年间存在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契卡”是其缩写的音译。——译者注

② 转见 Mehta, *Fly and the Fly-Bottle*, p. 117。

低得不名一文,受到不公正对待,或不受信任,或不被给予生存空间,因为他们站错队了。历史证明了他们是错误的,历史学家的本质工作就是站在胜利者一边来书写历史……自从最黑暗的教权专制时代过去之后,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像卡尔这样武断、粗暴地对待证据。<sup>①</sup>

这样的辱骂有些极端,可若认为爱德华·哈雷特·卡尔在本质上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不是空穴来风。虽然卡尔曾因为坚持要在书里提及托洛斯基,将之作为苏维埃体制的一个缔造者,并批评了斯大林个人;包括《苏俄史》的其他一些内容,让卡尔终其一生都受到苏联官方史学的谴责。对卡尔而言,历史学并非是过去自身,也不是关于过去是如何发展成当下,而是关于过去如何为历史学家所期许的未来贡献力量。《历史是什么?》中提出的主张正反映了这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从一个苏维埃计划经济中的人类种族的未来视角来看,或可以说,这是在证明历史学家牢记的一个格言——“牢记未来和想象过去”。这样说,尽管并不怎么契合这句普通俏皮话的创造者路韦士·纳米尔爵士之本意。此外,采纳这样的观点后,卡尔不遗余力地宣扬之:因为在他早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曾花费心力去书写那些失败者的历史——后来他力劝历史学家将这些失败者视作托洛斯基所谓的历史之尘埃(the dustheap of history),比如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Bakunin)这样的人,他们几乎在他们所从事的每一项政治事业中,都遭挫败。<sup>②</sup>

---

<sup>①</sup> H. R. Trevor-Roper, reviewing *What is History?*, in *Encounter*, 转引自 Mehta, *Fly and the Fly-Bottle*, p. 117.

<sup>②</sup> E. H. Carr, *Michael Bakunin* (London, 1937); idem, *The Romantic Exiles: A Nineteenth-Century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1933).

现在我们轻而易举就能发现,卡尔对历史中的客观性的界定存在不少问题。历史会朝着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之方向前行,按照这个标准,卡尔要求,如果历史学家认为自己的见解是客观的话,那么他们应该给过去一个公允的说法,但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在1990年以破产而告终。而且,那些像美国政治学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样的人认为,现在历史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制度、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处处凯歌高奏。但这样的观点昙花一现,因为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影响正急剧加大,在像伊朗这样处在现代化中的国家,或像以色列、美国西部这样富裕的地区为尤甚。这种观点其实是另一个目的论,与卡尔所支持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有正好相反的符号特征。<sup>①</sup> 不管它是什么,历史客观性都不会符合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未来。如本书之前所揭示的那样,这或多或少在于,历史学家不会比别的人更有能力精确地想象和预测未来。毕竟,卡尔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失败例子。<sup>②</sup>

早在卡尔关于客观性的观点被证伪之前,它就遭到了不仅来自如伯林这样的哲学家,也受到了来自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最明显的就是艾尔顿爵士,其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使他强烈反对隐藏在卡尔的历史客观性主张背后之进步观念。艾尔顿辛辣评论道:“某人之福,通常即是他人之祸。”他公开宣明:“历史之目的,在于理解过去,若是要理解过去,就必须给予过去以充分的尊重,就过去来论过去。”过去的事情的确发生了,人们生生死死,不管历史学家是否有兴趣书写他们,其都独立存在。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借研究其遗存

---

<sup>①</sup>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1992). (该书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译本。——译者注)

<sup>②</sup> 就是因为这样的理由,卡尔关于苏联史的研究可以被合理地质疑,而不是像诺曼·斯通在1983年对卡尔进行的尖酸刻薄之攻击那样,只仰仗所列举出的纯属猜想性的个人缺陷。参看‘Grim Eminence’, p. 982.

230 下来的蛛丝马迹,找到和分析之。艾尔顿认为,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确证过去发生了什么、在何时发生的、是怎么发生的。历史学家对这个任务的不同看法,反映了不同历史学家对历史材料认识的深度差别,而不是反映一个当代的立场或意见。优秀的史家不会根据其立场来寻找证据,偏好与个人特质会在历史学家的书写中发挥作用,但这只能是在驱使史家去研究某个特定课题,而非另一个方面才能发挥作用。一旦史家选定其研究主题或研究领域,他们就会成为历史材料的仆人,服从它们,在收集材料方面尽可能竭泽而渔,除了处理材料本身呈现的问题外,不再寻求别的问题。<sup>①</sup> 客观性仅是没有偏见地阅读文献,并且如其本来面目地去使用这些文献。

确信无疑,艾尔顿在以下这些方面的要求是对的:公开面对材料,犹似对待胜利者一方一样全面又公平地看待历史上的失败者,避免任何的歪曲和隐匿证据。假若我们都遵照卡尔为客观性所设置的标杆,我们同样也能达到艾尔顿这里的要求。但艾尔顿自己对历史客观性的定义也存在问题,一如我们所知,至少在部分上,艾尔顿的观点受到他自己强烈抱持的政治信仰,以及他对秩序和强大政府之热衷这样情怀的影响,而秩序与强大政府在其少年时的生活地——中欧,是极端缺乏的。艾尔顿认为,当研究过去时,优秀的史家能够拒绝理论并压制其当下的关怀。实际上,这样的见解完全是自欺欺人,包括艾尔顿在内的历史学家,不仅仅服从证据,他们也在与证据对话,积极地质询它,且把形成于当下的一些理论与理念加诸其上。在这个对话过程中,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理论与概念的本质,否则,若是我们放弃这种自知之明,不能成功发展出足以令我们自感一无是处的自我批判艺术,那么偏见与成见将会“润物细无声”,误导我们对证据的解读,就像它们误导艾尔顿解读都铎王朝早

231

---

① Elton, *Practice*, pp. 4-7.

期托马斯·克伦威尔的统治那样。

假如我们在与透过文献传递的过去之音进行对话时,某种关于过去的客观性知识就会呈现吗?卡尔与艾尔顿对客观性的定义,从其产生,就不能令人满意。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向后现代主义者的极端相对主义缴械投降吗?承认最终没有任何一种关于过去的客观知识是可能的,亦即使历史有别于编年纪而能呈现出相互贯通形式的客观知识是可能的吗?如我们所知,这种极端相对主义的最根本问题是,当反求诸己之时,它不可避免地就作茧自缚,与其原则自相矛盾。毕竟,若是所有的理论同样有效,为什么我们就应该相信后现代主义历史理论而不是别的理论?若是所有的知识都是相对的,若是不把自己的解读加诸其上,就不可能对一个话语加以清晰描述,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想要的意义赋予罗兰·巴特,或德里达或詹京斯或安克斯密特或海登·怀特的著作呢?实际上,在后现代主义最为极端的边界,对此问题的意识导致他们居心叵测地对语言进行滥用和断章取义,这些充满隐语和暗喻、模糊和歧异的概念,借助后现代主义者的千奇百怪编排组合在一起,故此,语言符指的无限演出在文本之内得以展开。实际上,即使是最为极端的解构主义者,都不会真心愿意将其理论反施于其著作;相反,他们妄图维系他们作为作者的认同,希望能控制他们自己的文本正在遭受的阐释。确实,如我们所知,在使用他们的专门行话时,他们低调宣称

232

他们已发展出一种分析文本的科学方法,他们明确相信这个方法比另外的方法更为有效。然而,这没多大效用,并不能阻止他人将后现代主义作者的同样概念与方法应用于后现代主义者自身,犹似他们将之用于别人身上一样。一旦思想大门向彻底的相对主义开放,为了某个拥有特权的理论之利益,它就不可能再被关上。

疑性,更宽容。<sup>①</sup> 在美国,后现代主义者的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是并驾齐驱的。(文化多元主义的理念认为,社会中不同的弱势文化群体关于历史真相的看法,都同样有效。而在面对处于统治地位的白人男性精英所把持的关于历史真相的宰制概念时,为了加强这些弱势群体的力量,他们关于历史真相的看法,必须被捍卫。)但,假如我们选择了某种关于过去的观点或诠释,而非另外一种,这种选择的唯一根据是出于美学上的或道德上的或政治上的理由;假如某种历史诠释能流行开来,仅因为其提出者在社会中和在历史学界位高权重,那么就根本得不出这样的认识——认为历史应该是民主的、宽容的或充满质疑性的学术志业,或者认为历史无论如何都会支持这些在政治上或文化上的弱势群体。只有当历史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或斯大林主义者的志业时,它才会同样真实的,它会根据不同种族间适者生存的竞争来描述过去,或根据走向斯大林乌托邦的必然之路来描述过去,就像1930年代发生的情况那样。除了在道德或美学或政治立场上存在差别外,历史学家不用担心观点上的颀颀,因为历史研究中的争论已经彻底沦为道德或政治吵闹。由是言之,后现代主义是否就为那些想压制、歪曲或隐匿过去的人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在后现代主义立场与正当性的再诠释之间,我们该如何分辨?

233

## 二

由于出现保罗·德曼(Paul de Man)事件,以上这些话题与另一些更严肃的话题,在1987年被热议。所谓保罗·德曼事件,是一个

---

<sup>①</sup> 参看 Appleby, Hunt and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Jenkins, *Re-thinking*; Southgate, *History*; 诸如此类。

年轻的比利时学者揭发的；保罗·德曼是一个前卫的后现代主义者、耶鲁大学教授，他在比利时出生、长大，二战后移民美国，1983年去世。在德国占领比利时的1940—1942年，德曼为一个受德国控制的布鲁塞尔报纸写了大约180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关注点在文化方面，但它们包括一些对法国通敌作家的歌颂，最具争议的是，还有对犹太人在20世纪欧洲文化所做贡献的诋毁——德曼认为这些贡献稀松平常、不值识者一晒。某次，当在比利时的犹太人被围捕和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时，德曼写了一篇宏文，声称如果把犹太人放逐到欧洲之外的犹太人定居点，欧洲文化将不会遭受大的损失。移民到美国之后，德曼一直向他的同事与学生讳言此事，而且在实际上还经常否认他在战争期间的比利时曾经通敌卖国。像奥地利总统库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一样<sup>①</sup>，他已经不顾事实，重新编织了他的过去。在此基础上，德曼在美国学术界春风得意，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领导着文学“解构主义者”的“耶鲁学派”，这个学派认为文本作者之意图无关紧要，对文本的解释存在无限且多面向的可能。<sup>②</sup> 德曼战时的作品被揭露之后，立刻成为解构主义批评者的话柄。对德曼来说，文学批评似乎是他否认过去的一种方式。在其早年学术生涯中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t)时期，他认为文本自身书写自己，因而暗中否认了文本作者所应

234

---

① 瓦尔德海姆曾任联合国第四任秘书长、奥地利总统，获得过不计其数的荣誉称号和勋章，但后来因其二战时曾参加德军，与法西斯合作，又拒绝承认这段历史，饱受争议和抨击。——译者注

② 关于德曼一生，有一个可读的和富有思想的描述，参看 Lehman, *Signs of the Times*。几乎所有相关的材料——不管是德曼自己留下的或是别人记述德曼的，已经被很有用地收在 Werner Hamacher, Neil Hertz, and Thomas Keenan (eds.), *Responses: On Paul de Man's Wartime Journalism* (Lincoln, Nebraska, 1989) 以及同一编者所编的 *Wartime Journalism 1939 - 1943, by Paul de Man* (Lincoln, Nebraska, 1988)。

该承担的责任。解构主义也有类似的开脱罪责的含意,正如德曼在他那部最有影响的大著《阅读的寓意》(*Allegories of Reading*)中所写:

总可以面对任何经历(去原谅任何罪行),由于经历总是既作为虚构的话语,又作为经验主义的事件而同时存在,况且没有办法判定上述两者中的哪一个是正确的。这个模棱两可的情形能使最残酷的罪行得到原谅,因为作为一个虚构,它逃离了罪行与无辜的制约。<sup>①</sup>

根据1987年的揭发,我们很难不把上述德曼之言看作是一种否认,否认他在过去战争时期发生在其身上的“经验主义的事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走到这样一个极端,即唾弃德曼整个的文学理论作品,以偏概全地认为这些作品都仅仅是德曼开脱罪责的工具。根本上,德曼发展出的这些文学理论应该被公正对待。

235

但是,在接下来的辩论中令人吃惊的是,德曼的辩护者使用解构主义,不仅瓦解了德曼的通敌卖国与其文学理论间的关系,还为其通敌卖国的事实本身辩护。这种行径自然促发了强调对德曼作品可以进行多种可能性诠释的做法。如其一个朋友所写,不能仅仅因一篇文章,德曼就应该遭受谴责,许多别的欧洲知识分子也做过类似事情,只有德曼受到声讨,这仅因为他是一个解构主义者,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德曼早期的文章都根本与解构主义无关。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也为德曼辩护,认为德曼的那些报刊文章与其文学理论风马牛不相及,就像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其同样与海氏站在纳粹政治立场上的演

---

① 引自 Lehman, *Signs of the Times*, p. 209。



说,以及战后他拒绝谴责希特勒的行为无涉。作者之死与其每一文本都独立存在这类概念,可以用来杯葛罗蒂称之为“立足于早年德曼投机的反犹主张”之上的解构主义之谴责。<sup>①</sup>抑有进者,德曼的其他一些辩护者认为,德曼之受到攻讦,乃是“面对真正威胁时的一个反应,此威胁来自德曼的作品以及这些普遍被称为解构主义的著述,这些著作威胁了一个强大的传统——关于文学、历史以及文学与人生之关系的那些意识形态色彩的论断”<sup>②</sup>。与此同时,德曼的辩护者毫不犹豫地慷慨利用事实的客观性(factual objectivity)修辞,不止一个地公然宣示要“秉笔直书”(set the record straight)这位文学理论家的二战时之事,谴责在论辩过程中出现的那些“误读、歪曲和断章取义”,他们相信这些都是德曼之批评者所采取的做法。<sup>③</sup>

德里达则声言,德曼在他早年的文章中批评“粗鲁的反犹主义”,其本人坚持认为犹太人是庸人,而非危险的和潜在的种族污染源,这实可与对反犹主义之谴责等量齐观,因为反犹主义“总是,在本质上也是粗鲁的”。故此,正如解构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德曼辩护者所论,当德曼在写那篇有问题的文章时,本质上是在从事抵抗纳粹的行为。德里达指控德曼的批评者自身就是纳粹分子,“靠一个简单事件,就去谴责、品评其人其作,就去要求封杀,换言之,就算是象征性地审查或焚毁其著,这样的行为也重蹈了德曼的覆辙,有人

① Richard Rorty, 'Taking Philosophy Seriously', *The New Republic*, 11 April 1988, 转引自 Lehman, *Signs of the Times*, p. 229.

② J. Hillis Miller, 'An Open Letter to Professor Jon Wiener', in Hamacher et al. (eds.), *Responses*, p. 342.

③ 如斯皮泽(Alan B. Spitzer)在其书中指出的, Alan B. Spitzer, *Historical Truth and Lies about the Past* (Chapel Hill, 1996), pp. 68 - 71, 这里引自希尔斯·米勒(Hillis Miller),他在别处曾说,关于任意事情的任何一种阐释,往往不可避免地是站不住脚的。参看 Rosenau, *Post-Modernism*, p. 119.

早怀戒备,先下手为强指控德曼,使他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德里达指控德曼在学院里的批评者,串通大众媒体,激起新闻界的狂热炒作和哗众取宠。德里达表示,只有配备精良的解构主义者才能理解德曼的作品,他称德曼的批评者为“糊涂的、草率的与居心不正的教授—记者结合体”,这些批评者的评论作品是一堆大粪——用来浇灌思想的大粪,其观点是“不诚实的”、“猥亵的”、“恶毒的”、“欠缺教养的”、“没有品味的”、“怪异的”和“可笑的”。<sup>①</sup>

237 像许多后现代主义作品,解构主义者为德曼的背书也充满着矛盾。一方面,德里达及其支持者在理论上坚持文本阐释的无限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他们认为把德曼早期的作品解读为通敌卖国或反犹,这是大错特错的。一方面,在理论上说,作者本人不能控制其作品的意义;另一方面,使用这些最易引起争论的术语,德里达谴责那些他以为是存心误读他在为德曼辩护时之所言的人。一方面,每个物事,包括反犹主义,皆是一个文本,在理论上,所有的文本都是语言符指的无限演出;另一方面,德里达形容反犹主义“在本质上是粗鲁的”。一方面,视精英文化高出大众文化一头是错误的,视一种文本胜于另一种文本也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德曼的辩护者极力憎恶新闻界卷入这个争端,明显希望将争端限制在学院精英的话语范围内。后现代主义者似乎想鱼和熊掌二者兼得。在后现代主义者宣称要科学化的背后——极力使用其专门术语及特殊语言将之符号化,归根结底,存在推崇阅读文本的某一特殊方法之企望,这彻底与其以下设想冲突,即文本在实质上的任意性与开放性。

将一个文学理论家的评论同纳粹的种族灭绝主义相提并论,这是一个太过夸张的修辞,根本就是离谱的无根之谈。毕竟,“象征性地”说,是德曼自己“检查”和“焚毁”了他早期的作品。亦非像德里

---

① 都出自 Lehman, *Signs of the Times*, pp. 214, 216, 323 - 329。

达所认为的那样,德曼撰写文章时的环境“我们不清楚”,它是很容易被查明的。该争执也不是针对单一的文章或段落,而是针对德曼在两年内写就的大量文本,况且更关键的,是针对德曼在战后几十年根本不提及这些文本的做法。把这些文本解释为对纳粹的一次抵抗行动,完全让人难以置信。若是这些文本有这样的目的,德曼为什么要讳莫如深?或许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例证,证明新发现的文献在本质上会改变人们对过去的看法,而不管当下他们的观点如何。就像艾伦·斯皮泽对此争执进行仔细剖析后的评论:“曾经,存在对历史书写‘建构’过去的特别强调,现在我们有一个例证,说明过去事件中留下的不期而遇的证据,如何改变了当下。”<sup>①</sup>亦如另一个历史学家所评论的,结果就是:“虽然解构主义应该从对德曼的抨击中存留下来,但作为历史学家的工具,它不应该从捍卫德曼的辩护中存活下来。”<sup>②</sup>另一个史家注意到,本争执中的真正问题在于,“不是在对德曼的批评中显示出的‘拒斥理论’问题,而是在为德曼的辩护中承担的‘拒斥历史’之危险”<sup>③</sup>。甚至拉卡普拉也总结说:此次争执象征了“解构主义是如何被用来坐实或篡改一些东西的”<sup>④</sup>。言而总之,正像艾伦·斯皮泽的总结,这次争论的真正要义是,包括后现代主义者在内的论争双方,他们是如何诉诸于实在性与证据的一般标准的;他们是如何占据他们为之战斗的共同基础

238

---

① Spitzer, *Historical Truth*, p. 11.

② James T. Kloppenberg, ‘Objectivity and Historicism: A Century of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 1030.

③ Paul Morrison, ‘Paul de Man: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Representations*, Vol. 32 (1990), p. 71, 转见 Spitzer, *Historical Truth*, p. 94。

④ Dominick LaCapra, ‘The Personal, the Political and the Textual: Paul de Man as Object of Transference’, *History and Memory*, Vol. 4 (1992), p. 30, 该文收在这样一个论文集中,这个集子主要是对德里达及其他德曼的捍卫者之行为进行完全令人难以置信的心理描述。

的,这一共同基础即一些推论和诠释,其相应地来源于一系列文献。“那些人之所以颇感愤怒,是因为他们认为别人错误地再现了德曼的过去,他们并不仅仅是择取一套优于别人的惯例,他们是在讲其认为是真的话,在做其认为是对的事。”<sup>①</sup>

### 三

就像克里斯多弗·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提出的警示,极端的相对主义给极右派的历史学家敞开大门,会产生“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虚假共识,这个共识之获得是来自误读或操弄证据,隐匿关键事实,以及在那些可能还有自主记忆的人身上制造一个必然是趋利避害的健忘症”<sup>②</sup>。确切说,在单个事实的层面,海登·怀特接受历史真实可以被证明的可能性,否认修正主义者这个意图的合理性,即修正主义者试图反驳奥斯维辛事件,认为其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sup>③</sup> 依照他的见解,如此情事有失历史之真实性水准,而且他这里的取径使他(或别人,如果他们接受的话)已不可能去说以下这样的话:一个纳粹分子或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关于希特勒“斩草除根”的诠释,只勉强承认其的确发生过,然而这种诠释并不比别的诠释理由更充分。彻底的相对主义不能提供足以证伪法西斯主义者或种族主义分子历史观的客观标准,因此“否认大屠杀”(Holocaust denial)的文学作品<sup>④</sup>,宣称六百万犹太人从来没有被纳粹党屠杀,而且

---

① Spitzer, *Historical Truth*, pp. 95 - 96.

② Christopher Norris, *Deconstruction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ory* (Norman, Oklahoma, 1989), p. 16.

③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pp. 78 - 80.

④ 实际是历史著作,这里作者把这些历史作品视作虚构的文学。——译者注

奥斯维辛及类似的大屠杀集中营,都是被战后反德、支持犹太人的政治游说团杜撰出来的,这类文学作品首先在美国受到推崇——在德国它们是非法的,之所以在美国如此,是因为人们普遍相信“事件双方的声音都应该被听纳”,或者换言之,至少在原则上,双方的立论都同样正当。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艾默瑞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黛博拉·利普塞特(Deborah E. Lipstadt)教授是研究这类文学作品的权威,一贯拒绝和大屠杀的否认者一起参加公众辩论,其依据就是:“这样做会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他们不应拥有的合法性与声望,会促使将其反犹意识形态——这是他们否认大屠杀的原因——抬高到可信赖的历史编纂学水平——它实际上并不可被信赖。”<sup>①</sup>她介绍说,广播、电视的制作者再三表示他们对其立场的吃惊,每次都询问她为什么不想想,他们的听众和观众应该听听“故事中的双方”之声音。类似态度也出现在许多大学校园里,这里一直对大屠杀的否认者的活动存在争议。美国宪法中对言论自由的保障条款,致使众多大学都保护“大屠杀的修正主义者”表达其立场的权利,但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仅仅涉及了政府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力,并不包括诸如大学这样的独立机构。更严重的是,也关系更深的是,就像一个大学校报的广告中显示出来的,许多人深信,“修正主义者正在……重新解释历史,这是一个不断发生的行为,尤其是不断发生在大学校园里”<sup>②</sup>。

240

该大学的历史系虽然出现了这个声明,可历史系的教师们都一致反对这种论断,他们声明:

---

① Deborah E. Lipstadt, *Denying the Holocaust: 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 (New York, 1993), p. 1.

② 那个杜克大学年鉴(*Duke Chronicle*),证明了去刊登大屠杀否认者的一个广告之决定是正当的,转见 Lipstadt, *Denying the Holocaust*, p. 198.

历史学家是在不断从事修正历史的工作,这确实是应该的,但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与该广告中之所言大相径庭。对重大事件进行历史修正,并无关乎这些事件之真实性,而是关乎历史学家对它们已经做出的历史解释——一般说即对其前因后果的解释。<sup>①</sup>

大屠杀的修正主义者看似学术,有一个“历史评论院”(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Review)服务于他们的活动,有遍布注脚的文章和其他学术样貌装饰的杂志。然而在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学术,尽管其信誓旦旦的样貌骗过了一些大学校报的主编,使之误以为他们非常学术。就如利普塞特指出的,此议题处于偏见与宣传的一面以及理性论断与学术的另一面之间。在一所中西部大学,一个历史教员在课堂上认为纳粹死亡集中营系出自反德人士的操弄(他在一节关于拿破仑战争的课上,就一些稍微相关的问题借题发挥,就提出这样一个见解),为此被解雇。此大学中的学生就群起抗议,认为该教员遭遇不公正对待,校方解雇他乃是侵犯了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利普塞特评论道:“这些学生似乎没有理解到教师是有责任忠诚于真相的。”<sup>②</sup>

241 从1970年代中期以来,大屠杀否认者活动的广度与强度日益剧烈,这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思想气候的猖獗,尤其是在美国,这里的学者愈来愈强烈地否认文本有任何固定的意义,认为意义是由读者赋予的,在美国,诘责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做法蔚然成风。伴随着否认真相观念有任何正当性的行为,在利普塞特看来,这些情况“已经产生了一种默许对历史事件的意义进行质疑的氛围”,使得很难“断

---

① Lipstadt, *Denying the Holocaust*, p. 198.

② Lipstadt, *Denying the Holocaust*, pp. 3, 137 - 156, 183 - 208.

言历史研究中存在‘不可擅越的雷区’(off limits)……此种观感一直在社会中产生——不仅是在大学校园——使得以下之言难以启齿：‘这无关乎理念，这是故意寻衅滋事。’”利普塞特认为，此种观感“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在为解构主义的历史学推波助澜。没有事实、没有事件，以及历史之任何面向不会有固定的意义或内容，任何真理都可以被重构，任何事实都可以被重铸，不再存在终极的历史真实”。接着，她警告：

否认大屠杀是此种现象的组成部分，它不是针对某个特殊群体之历史的攻讦，尽管否认大屠杀可以看作是对犹太人种族灭绝史的攻讦，但其核心是，它对所有这些相信知识与记忆是我们文明基石的人造成了威胁，乃至对所有相信理性之终极力量的人造成了威胁。<sup>①</sup>

这个威胁的现实性近来已经被后现代史学者帕基丝证实，她曾论断“许多新纳粹历史学家采用了尽可能最保守的发现、揭示与陈述真相的心机”，以否认二战中死亡集中营的存在。这些新纳粹历史学家在著述中采用注释及参考文献之类学术样貌，并坚信他们正在讲述客观真相，这证明了帕基丝的观点——此种学术样貌的“悲惨结果”，以及关于客观性和真理之信仰的破产。关键是大屠杀否认者的这种学术伪装很容易被揭穿，若是所有的脚注完全只是旨在产生一种虚假的“真实效果”之修辞道具，那么我们将很难区辨真假学术之异同了。然而不是这样，相对主义与“真相的不确定性”(the indeterminacy of truth)，并不能有效削弱像帕基丝所言的——“否认者自称的确定性”(the self-proclaimed certitude of deniers’)，他们仅仅是

① Lipstadt, *Denying the Holocaust*, pp. 19 - 20.

将其抬高到与奥斯维辛的真历史旗鼓相当的程度,并可以用来支持这个声明(也是为帕基丝认可的声明),就是我们永远不知道关于两造的客观真相。帕基丝的因应是只管去讲述奥斯维辛的故事,不必杞人忧天地关心这些故事是否依据事实。虽然,可以确定的是,奥斯维辛的劫后余生者讲述的故事,如帕基丝之言,是“打动人的”,难道这些故事是否真实,确实无关紧要吗?

一言以蔽之,要是持如此看法,就将把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视作无足轻重,会像德国史专家琼·卡普兰(Jane Caplan)认为的,根据“那些把理性降格为一种解释模式的理论,那些抗拒真相指谓的理论,那些使权力相对化和发散化的理论,它们不能清楚地划分责任,也不能赋予(某个)真理或道德优于(多元的)阐释的独尊地位”。她继续说:

243 拥抱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传播权力,将主体非中心化(to decenter subjects),当《荒凉山庄》(*Bleak house*)或文献学,甚至是知识考古学成为争论焦点时,也要让数百种意义之间相互展开竞争,这只是一个事情。但当它是一个问题时,特别是不仅仅为一个大写历史(History)问题,而且还关乎近来人们生老病死的历史问题,我们的争论规则应该不同吧?我们所赖以得出其间有意义之联系的正义观念也应该不同吧?①

---

① Jane Caplan, 'Postmodernism, Poststructuralism, and Deconstruction: Notes for Historians',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22 (1989), pp. 274, 278. 在引述这段评论时, Himmelfarb 认定 Caplan 不能为这些主题盖棺定论, Gertrude Himmelfarb, *On Looking into the Abyss*, p. 143. 但这些问题很明显只是作为加强修辞效果用的。



故此,如同其他研究历史的新取径,后现代主义似乎更适合历史中的某些领域而不是全部领域,认识到这个可能性的第一步,就是将它更积极一些的理念应用到 21 世纪的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中。

#### 四

一群后现代史学的批评者曾控诉,“后现代史学仿佛经常是由对历史学的谴责构成,这是众所周知的,它不是关于当下的新历史,因此也不是关于未来的新历史”<sup>①</sup>。也有许多真正的历史著作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如果不是更强烈的话,这是非常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有许多面孔,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些后现代主义者赞成一种极端的怀疑论,彻底否认历史知识的可能性;也有一些后现代主义者采取了更为中庸的立场,认为历史书写至少是可行的。<sup>②</sup>他们已经开放了历史学科自我新陈代谢的可能性,显示出一条可以摆脱社会决定论困境的路径,这首先从 1990 年代初在马克思主义的变体中开始。这不是说后现代史学一直就是很新鲜的,就像其不断自我宣称的那样,但后现代史学既拓展了历史书写的疆界,又赋予了一些旧的、相当陈腐的课题以新生命,这些课题主要是王公贵族史和精英史,或者关于思想史上“鼎鼎大名的人”(big names)的研究。有关 19、20 世纪的那个大的又问题多多的现象——比如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会从这样的转型中获益——从民族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转向不断变化的民族认同之意识与意义的来源及其决定因素。将社会性别与种族划分视为社会不平等的面向,依赖于认同的话语

244

① Appleby, Hunt and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p. 236.

② 参看 Rosenau 之书中所做的一些有用区分, Pauline Marie Rosenau,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建构,至少与它们依赖真实的和可以确认的身体特征一样多,这样就会丰富因严格聚焦在阶级分层上而灵感渐趋枯竭的社会史研究。

诚如可以预期的那样,后现代史学拒绝了对理性和进步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对现代主义史学关系重大,后现代史学的许多注意力都放在历史中的那些非理性现象、特殊的现象、不循常规的现象和奇幻的现象上。它经常关注象征而舍弃探讨真相;拒绝某个层次的历史优于另一层次的历史;它也拒绝建构一个位于中心的后设叙述,进而把别的物事流放到边缘;它在许多情况下也转向之前历史学家曾认为是无甚足观或不值一提的主题。它经常认同这样的信念,最有趣的动物和植物经常是在小路边或沟渠中发现,而不是在通衢大道上。那么,最好的后现代史学著作看起来像什么呢?其优点与劣处何在?

后现代主义者把历史视作文学的一种形式,这样做是重新认可了好的文笔其实是合理的历史实践,取代1970年代那些令人厌恶的社会科学术语,我们现在转向那些文笔优美的历史叙述,诸如西蒙·夏玛(Simon Schama)的《公民:一个法国大革命的编年史》(*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sup>①</sup>,或奥兰多·费格斯(Orlando Figes)的《一个民族的悲剧:1891—1921年的俄罗斯革命》(*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 - 1921*)<sup>②</sup>。这两本书处理的都是一些大的、“传统的”主题,但它们都把一些偶然发生的小事情与各色人等的历史,以及那些声名卓著的和不引人注意的事情编织在较宽广的叙述中,同时不断转换焦点,与较早流行的平铺直

---

① 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1989).

② Orland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 - 1921* (London, 1996).

叙史实的处理这类主题的方式差别悬殊。两本著作都不伪称自己是盖棺论定的权威,而且通过涵括那些复杂的次情节及各种传记,他们自我坦承此种选择的个人色彩非常浓,亦很随意——尽管只是为了说明论点,两著也都含蓄承认,相同的故事能够用另一个同样合理的方式来讲述。它们都有一个意见,在夏玛该著里,这个意见深藏在表面的详细情节之下;两著亦强调,或许是过分强调了革命的血腥与暴力性质。的确,在《公民:一个法国大革命的编年史》一书中,在更宏大的程度上,1789—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变得几乎毫无意义,蜕变为一出混乱的戏剧。而大众遭受的社会与经济惨状,他们参加革命背后的根本动力,书中几无道及;大革命期间出现过许多政治理论和主张,它们之于现代欧洲及世界历史的深远影响,在书中或多或少都消失了。两著都迫切要求具有可读性,书中的最大努力都用来建构叙述,而非建构诠释。

就所涉事件之程度而言,相反的极端是纳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马丹·盖赫返乡记》(*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sup>①</sup>和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The Great Cat Massacre*)<sup>②</sup>。这两书都是在讲述非常吸引人的故事,它们都建立在那些不被人注意和不为人所知的事物基础上,而不是根据那些重大的、著名的事件。两书都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极为细小的突发事件,将它们作为故事重新讲述,把它们作为进入更大事物的隐喻和象征性线索来分析。借此,它们带领读者领略一个遥远和陌生的精神与物质世界以及其日常生活的结构与情感。1970年代普

246

① 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Cambridge, Mass., 1983). (该书联经有江政宽的中译本。——译者注)

②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London, 1983). (该书在联经与新星出版社有吕健忠的中译本。——译者注)

世化(*generalizing*)的社会历史研究取径对此只能望尘莫及。然而,这两部著作因其被认为是在随意使用证据,遭受了尖锐的批评,这很可能是因为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在其中扮演了遭人质疑的角色。

戴维斯在书中的序言里自白,“我提供给你们们的,部分可算是我的杜撰”。她说,她想在故事里留下一些空间给“可能发生的事”和“可能已经发生的事情”。她赖以成书的这些文献讲述了一个冒名顶替者愚弄了一个无辜的妇人,让她相信他就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她的丈夫马丹·盖赫。直到真正的马丹·盖赫出现后,此骗局才被揭穿。即或如此,马丹·盖赫的妻子仍在接下来的审判中,为这个冒名顶替者辩护。戴维斯重写了这个故事,把它叙述为一个聪明而又纵欲的女人,在其真正的丈夫回来、这个假丈夫被带上法庭之时,还在与这个冒名顶替者狼狈为奸,因为他的床上功夫比那个先天不足的倒霉蛋——真正的马丹·盖赫要好。但是,在批评者看来,做这种分析时,戴维斯就陶醉在纯粹的推测中了。在那些文献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持她解读此故事的主要观点:不支持她所声称的真正的马丹·盖赫性功能不强的观点,不支持她所声称的那个妻子聪明和纵欲的观点,也不支持她所声称的那个冒名顶替者床上功夫好的观点。戴维斯最严厉的批评者罗伯特·芬莱(Robert Finlay)酷评道:

不管是凭借直觉或是根据来自人类学与文学批评的概念,推测都要臣服于材料的权威与文献的裁断,历史学家不应该让过去人们的言和行与既有材料里的有限呈现大相乖违。<sup>①</sup>

---

<sup>①</sup> Robert Finlay, 'The Refashioning of Martin Guer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3 (1988), pp. 553 - 571; 又可参看 Natalie Zemon Davis, 'On the Lame', 前引杂志, pp. 572 - 603。

另外一方面，戴维斯的反击则认为，尽管不是直接依据有关马丹·盖赫妻子本人的材料或来自记录这个事情的文献，但她对马丹·盖赫妻子的刻画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根据我们对当时法国该地农村妇女的了解，她们在不同材料里都一致显示出精明、精力充沛和大胆的形象。确实，诸如此类的间接和推论性的做法，甚至是在最为传统的历史学里，在直接的原始材料匮乏时，也经常使用。问题在于戴维斯的解释能否被坐实？或者是如芬莱暗示的，戴维斯把她当下对女权主义的信仰投射到马丹·盖赫这个个案中？因为戴维斯认可女性之坚强与聪慧必须不受限制的信仰。概言之，对此书所用材料的质疑，以及此书所引发的批评，都增加了此书的重要性与吸引力，而非减损之。

就罗伯特·达恩顿而言，他把其整个对“屠猫”的叙述都建立在写于1762年的一个三页小册子上，这时距达恩顿要描述的这个事件之发生，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显示他讨论的那些学徒曾经对猫执行过大屠杀。同样也不能坐实达恩顿的论点——这是他论述的中心——大屠猫是另一个三十年后——即1790年代——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大屠杀之象征性预演。假设此事确曾发生过，屠猫的象征意谓是直接针对工场主，而非针对贵族和乡下的庄园主——他们是法国大革命中群众骚乱的受害对象；进言之，1762年的这个记录的作者之所以记录它，部分目的在于让当权者放心，学徒向他们的雇主发泄怒火只会采取象征性的方式，而不会采用实际的暴力举动。根据达恩顿的批评者之观点，达恩顿关于屠猫这篇论文，如果根据兰克主义的原则，将不可能通过哪怕是最草率的审查，它自始至终都是系列的推测。这样说就太工诃于它了，我们需要理解伴随和驱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那些暴力行为，而达恩顿的叙述有助于我们做到这点。他循照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提出的

“厚重描述”(thick description)模式,在《屠猫记》的叙述里充满吸引人的细节,且向我们证明了将阐释融合进一个故事的细节中所具有的诸多长处。<sup>①</sup>

在其更具有建设性的方面,后现代主义鼓励历史学家更贴近地阅读文献,更严肃地对待文献之表面呈现,在新的方面来思考文本和叙述;它还有助于我们开辟新的研究课题与研究领域,同时将以前看来许多已难做出新意的旧课题重新提上研究日程;它也迫使历史学家前所未有地质疑他们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在质疑中,让他们更具有自我批判精神,这皆是非常有好处的;它还会促使读者更加强调对历史学家主观性的公开认可,有助于读者更严格地评价历史学家的工作;后现代主义还改变了历史书写的侧重点——虽然并非是改变了整个历史学科的——从侧重社会科学模式的历史书写转向了侧重文学模式的历史书写,此种改变可以让历史作品更易为学院外的大众接受(实际上也包括学院中的大学生);它还使具有独特个性的作为个体存在的人重新恢复了在历史中的位置,而社会科学取径的历史研究则或多或少地把他们排除在外。进而,后现代主义还促使了,或至少刺激了过去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许多杰出的历史作品之产生:这些作品在很多方面是完全符合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所强烈鄙视的诸多传统学术规范的。

## 五

杰夫里·艾尔顿爵士曾不悦地置评,对这些“彻底相对主义的拥护者而言,只有在历史有助于其生活、思想和经验时,它才会至关

---

<sup>①</sup> Harold Mah, 'Suppressing the Text: The Metaphysics of Ethnographic History in Darnton's *Great Cat Massacre*',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Vol. 31 (1991), pp. 1 - 20.

重要……在我看来,我怕”,他补充说,“这是彻底的异端邪说。就历史学家而言,历史学首要应该关注过去的人——关注其经验、思想和行为——而不是关注当下的人,更不是关注历史学家自己。”<sup>①</sup>我们爬梳过去的遗存,只有经历困难,我们才能分辨出它们一度是什么,只有抓住偶然的时机,我们才能拼凑出它们摇曳不定的生命。然而,我们不能因为难以完成已设定的目标而感绝望。每一个人,甚至是最顽固的解构主义者,在实践中都承认存在一个文本之外的现实。历史学是一门经验主义的学科,它更关注知识的内容而非本质。经由我们使用的材料,以及我们处理材料的方法,如果我们足够小心和严格的话,我们离重建过去的事实就不远了,这样的重建可能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而且肯定不会是如实的,但它仍然是真实的。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依据我们要讲的故事择取材料,我们将这些材料组合在一起的方式以及对之进行解释的方式,会受到文学模式、社会科学理论、道德和政治信仰、美学意识的影响,甚至还会受到我们自身无意识的预判和期待的影响。除此之外,别的都是镜花水月。但我们讲述的故事将会是真实的故事,即或故事里讲述的真相是我们自己认可的真相,即或别人也能而且将要以不同方式讲出这些故事。认为关于过去的真相无关紧要的人,可能没有在像苏联或东欧共产主义社会那样的体制下生活的经验,在那些地方,真相是被体制性地歪曲和压制的。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推行苏联开放的过程中,自由、兴奋的感受,以及对正义最终被还给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之认同意识,很明显存在于俄罗斯历史学家中间。<sup>②</sup> 夸张地说,当他们迈入探索过去之旅时,

250

---

① Elton, *Return*, p. 43.

② R. W. Davies, *Soviet History in the Gorbachev Revolution* (London, 1989); Gerd Meyer (ed.), *Wir brauchen die Wahrheit: Geschichtsdiskussion in der Sowjetunion* (2nd edn., Cologne, 1989).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会有这种感情。诚如屈威廉曾经之语：

历史之于我们所有人的吸引力，根本上在于分析其诗学(poetic)。历史之诗意(poetry)非由漫无边际的想象力构成，乃是由追踪事实并维系之的想象力构成。那些促使历史学家“鄙弃欢愉而甘就苦辛”的东西是他自己强烈的好奇心，想知道长久以前，在我们称之为过去的神秘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每天都去凝视那个神秘之镜，每天都看到新的事物，这是他的炽热渴望，此渴望会耗尽他一生，也会让其得到慰藉，像一个热切的恋人，驱使他每早就去图书馆、档案馆。它像一种可怕的潜在力量在困扰着他，因为它是诗学性质的。昔人不再，其所处之所也时过境迁，为后人占据，但其曾经亦如后人一样生活和拥有，昔人之处今日，犹今人之处明日，新陈代谢，走入历史……历史之诗意藏于类似奇迹般的事实之下，亦即：曾经，在这个地球上，曾经，在这个熟悉的地点，红男绿女走过，想其所想，受激情驱迫，真实程度犹如今日我们之所为，然现在都灰飞烟灭，岁岁年年人不同，若白驹过隙，我们自己亦将如是短暂和匆遽。<sup>①</sup>

251 很长时间以来，屈威廉的观点看上去非常不流行、不当令了。但后现代主义者侵入历史的一个结果，使得屈威廉之强调诗意与想象力的观点，似乎再度符合当代的需要了。不过，诗意与想象力必须要接受事实的规训。

彼得·诺维克在他那本关于客观性的几百页大书中的导论里总结说，整个的客观性概念，“在本质上是混乱的”<sup>②</sup>。就客观这个

---

① 转见 Cannadine, *G. M. Trevelyan*, pp. 75, 196.

②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p. 6.



单词最普通的意义来说,诺维克将这个评论冠以开场白的书,是足够客观的,该书没有存心歪曲或操纵证据,它充分而且公平地传达了历史学家在他们的专业活动中所采取的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书没有结论或立场——远不是如此。犹如托马斯·哈斯克爾(Thomas L. Haskell)点出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能像诺维克那样,把客观性同中立性(neutrality)、冷漠(indifference)或缺乏热情(lack of passion)混为一谈。哈斯克爾认为,历史之探寻:

要求实践者尽可能地克制和自律,要能做到这样的事情,诸如放弃想当然的思考,抛却不良信息,放弃不能经受证据和逻辑的基本考验而自己却中意的诠释,最重要的是,要有暂时放弃或搁置本人认知的足够准备,怀着同情的心态进入那个陌生的、可能也是令人厌恶的来自对手的看法。

所有这些都需要“不带偏见”(detachment),需要一种祛除自以为是、妄自尊大心态的能力——这种心态是那些最顾影自恋的后现代主义者所有的,还需要发展哈斯克爾称之为“本人在史学界中的观点……似乎不过是诸多观点之一”的意识。要不然,比如,我们怎么能去理解像纳粹或大屠杀这样的现象?或者理解如斯大林、波尔·布特(Pol Pot)<sup>①</sup>这样的个体?存在这些情况,并不就表示历史的判断不得不是中立的,但它的确意味着历史学家不得不发展出一

252

---

<sup>①</sup> 波尔·布特(1925—1998),曾任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1963—1981)、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1976—1979)等要职,是红色高棉的首领与象征,早年领导过反对法国、美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后在柬埔寨实行恐怖统治,期间杀人如麻,导致大约两百万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1990年代,红色高棉内部发生内乱,波尔布特不得人心,为部下抓获,随后被公审,判处终生监禁。1998年4月,因心脏病发作去世。——译者注

种不带偏见的认识方式、一种自我批判的能力、一种理解别人立场的能力。这适用于同政治相关的历史学,同样亦适用于那些相信其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历史学。与政治相关的历史若是刻意歪曲、操纵或混淆历史事实,以服务于它声言的其所代表的理想之利益,它就会作法自毙,自作自受。<sup>①</sup>

就像诺维克所定义的,客观性的概念包括一个信仰,即相信“关于过去的事实,以及与这种事实相符的真相”<sup>②</sup>。归根到底,关于历史事实的各种样式与互相联系的真相,是被发现的(discovered),不是被虚构的(invented);是被找到的(found),不是被制造出来的(made)。虽然,犹如哈斯克爾的补充,“这也经历了一个想象力建构的过程,其远远超过所用原始材料的内在特性,而且也可以被称之为‘造’的过程”<sup>③</sup>。梳理这些样式及其互相之间的联系,乃至因果关系等,绝非历史学的唯一功能,历史学在目前还有一个责任,就是证实事实并重制过去,这是历史学在根本上区别于编年纪之处。在这点上,屈威廉是对的,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想象力的重要性,同时应该坚持想象力应该严格限制在史料允许的范围之内。

后现代理论家和批评家这样做是对的,也是正当的,就是理应迫使历史学家重新思考他们的工作所要处理的分类和预设,去证明他们在实践其学科时采取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后现代主义自身是许多类理论中的一系(one group of theories)<sup>④</sup>,与其他理论类似,

---

① Thomas L. Haskell, 'Objectivity is not Neutrality: Rhetoric and Practice in Peter Novick's *That Noble Dream*',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9 (1990), pp. 129 - 157, 引文在 p. 132。

②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pp. 1 - 2.

③ Haskell, 'Objectivity', p. 141.

④ 指后现代主义不是同质的一体,其内部包含有如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纷繁多样的立场与主张。——译者注

都是可以争论的。就我而言,我依然很乐观地认为,客观的历史知识既是可以期望的,也是能够得到的。当乔伊斯告诉我们说社会史已死;当艾玛斯声言时间是一种虚拟的建构;当罗兰·巴特宣告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文本;当凯尔纳想让历史学家停止这样的行为——在他看来,历史学家是在佯装他们正在研究那些过去确曾发生之事;当帕基丝说我们仅应该去讲故事而不必计较它们是否为真相;当安克斯密特发誓说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关于过去的任何东西,因此之故,我们最好只限于研究别的历史学家;当詹京斯声明,所有的历史都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让历史学家在资产阶级掌控的大学机构中得到权力和金钱;我则会谦卑地面对过去,不管他们怎么讲,我要说,过去肯定是发生了,而且我们的确能够——若是我们非常谨小慎微且又能自我批判的话——发现它是怎样发生的,并获得一些站得住脚的结论,即便这些结论并非是关于其所有含义的盖棺论定。

## 跋

254 1997年9月,本书问世后,引起的反响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不少人提出了批评,其中一些人还颇有来者不善的架势。最严肃的评论人,针对本书及其观点,提出了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其中一些在我看来是对本书的误读和欲加之罪。批评的角度各有不同,批评者似乎根本不赞同本书的许多核心论题。这些不赞同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即读者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的意义强加到文本中去,而作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限制各种被强加的意义。因此,对本书批评的回应,再度提出了一些涉及广泛的意义、诠释和证据的重要论题。<sup>①</sup>

---

<sup>①</sup> 跋所涉书评及评议有:Michael Burleigh, 'Making History or Making-up History?', *Sunday Telegraph*, 14 September 1997, 书评版, p. 13; Roy Porter, 'Defending History', BBC Radio 3 *Book of the Week*, 15 September 1997; Bernard Crick,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Independent Saturday Magazine*, 20 September 1997, p. 14; Niall Ferguson, *History is Dead. Long Live History!*, *Sunday Times*, 21 September 1997; Ronald Hutton, *What is History Really About?*, *Times Educational Supplement*, 26 September 1997; Samuel (转下页)

《捍卫历史》一书试图采取一种折中的方式,平衡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相对主义(postmodernist hyper-relativism)和传统历史主义的经验论(historicist empiricism),我的主要观点是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相对主义。这不是因为我过去认为,或现在依然认为,现代主义者在

---

(接上页)Brittan, 'The Many Failings of Post-modernism', *Spectator*, 27 September 1997; John Charmley, 'Time to Move Past Postmodernism?', *Daily Telegraph*, 27 September 1997, p. A4; Steven Kassem, 'In Defence of History', *Epigram*, 16 October 1997; Keith Thomas, 'A Good Kicking',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17 October 1997, p. 46; A. C. Grayling, 'Historical Truth Put on the Line', *Financial Times*, Weekend Supplement, 25/26 October 1997, p. vi; Joyce Appleby, 'Does It Really Need Defending?',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1 October 1997, p. 10; Steve Smith, 'Truth in an Age of Challenge', *Times Higher Educational Supplement*, 28 November 1997, p. 26; Stefan Collini, 'The Truth-vandals', *Guardian*, 18 December 1997, p. 15; Daniel Johnson, 'The History Man', *Prospect*, November 1997, pp. 64 - 65; Matthew Trinca, 'History's Impossible Dream', *Australian*, 3 December 1997; Chris Harman, 'Subjects and Objects', *Socialist Review* 215 (January 1998), p. 27; Peter Ghosh, 'Laid Down by Ranke',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19 October 1998 (后续交流亦见 LRB); Lynn Hunt, 'Does History Need Defending?', in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Issue 46, December 1998; Anthony Easthope, in *Textual Practice*, Winter 1998, pp. 563 - 566; Roy Porter, 'The Untrustworthy', in *The New Republic*, 14 December 1998; Steve Weinberg, 'Not All Ways of Recalling the Past are Equal', i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Boston, 21 January 1999; David Gress, 'The "End" of History?', in *Orbis: A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Spring 1999, pp. 314 - 336; Doug Munro, i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32, Summer 1999, pp. 941 - 942; Diane Purkiss, 'Response to Professor Richard Evans', 见以下网址 < reviews-list@ ihr. sas. ac. uk >; Keith Jenkins, *Why History? Ethics and Postmodernity* (London 1999), Chapter 4, 'On Richard Evans', 及该书其他各处; Diane Purkiss, 'Richard Evans, Yet Once More', 见以下网址 < reviews-list@ ihr. sas. ac. uk >。

此外, *Times Higher Educational Supplement* 在 1997 年 9 月 19 日和 26 两日刊登的信件,对该副刊 9 月 12 日(第 18 页)所登拙文'Truth Lost in Vain Views'进行了评论,本回应也涉及到了其中的若干问题。本跋有一个更早且更长的版本,发表在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London)的网站上。其中包含了对本书德文版书评的回应,此处从略。

总体上逐步占领了历史学专业的主导地位。恰恰相反,只有相对来说不多的领域(比如欧洲思想史,或某些女权主义史学)的历史学从业者感受到了他们的存在。我感到有必要来捍卫历史学的理由主要是,从学科和理论角度书写历史编纂学和历史的人,大多对历史学作为一项知识事业的有效性采取了极端相对主义和怀疑论(scepticism)的立场。

1990年代,越来越多的英美大学,把历史编纂学当作历史学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重要内容。在我看来,根据这方面已经出版的和还在源源不断涌现的文献,历史学的知识有效性的确到了需要捍卫的地步。比这更进一步的,至少已经有一些历史学家,尤其是左派的历史学家,对研究历史学的可能性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在更普遍的层面上,近年来,立场各异的历史学家不约而同地感到了这场笼罩整个史学行业的危机,且他们的焦虑与日俱增。在此,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要捍卫历史研究这项知识事业,我们应该坦率地直面那些极端怀疑论者,与之辩论,而不是单纯地视他们为无物或粗暴地遮蔽他们的声音。

256 我想,本书足够清楚地反映了这些意图。但是,有不少批评者误解了这本书,并且认为它应该处理一些别的问题。尤其有相当一部分论者认为,拙著本来应该直接讨论德里达(Derrida)或鲍德里亚(Baudrillard)等主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已故的知名文化批评家和理论家安东尼·伊萨普(Anthony Easthope, 1939—1999)对本书未能对傅柯进行长篇大论,也没有专辟一章讨论海登·怀特,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苏联史专家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则认为,“需要再多做哲学上的基础工作”,才能理清眼下的一些问题。美国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也指责道:“《一个历史学的捍卫》(*A Defence of History*)一书(这反映了她学术标准存在的问题,你看她甚至连书名都引错了)缺乏的是,对后现代主义检视知识生产所

用工具和策略的方式之严肃讨论。”研究维多利亚时代思想史的史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与她所见略同,认为本书着力于他所谓的“庸俗化的(vulgarised)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有意识地对抗等级、霸权的激进观念等各种东西的大杂烩”,而没能“在恰如其分的抽象高度上”抓住法国认识论(epistemology)这一关键点。他指责说,正是如此,本书是一系列“对庸俗观念的庸俗批驳”。

如果他所谓的“庸俗”是指“通俗”(popularized)的话,我将欣然接受指控。这部书不是主要关于米歇尔·傅柯、雅克·德里达、索绪尔或罗兰·巴特的(虽然我在书中确实提到了他们),我花了更多的篇幅来讨论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詹京斯、乔伊斯、拉卡普拉和索斯盖特等类型的学者,我显然没有打算正式讨论近代法国哲学复杂的认识论问题。如果那样的话,那要另写一本书。海登·怀特则是另外一回事,本书有二十六页的篇幅在讨论他的观点,我绝对没有像伊萨普断言的那样忽略他的重要性。可怀特是一个文艺理论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

257

科里尼轻蔑地认为,历史学家没有资格谈法国认识论,并且对于庸俗化的法国认识论的庸俗批驳根本不值得写出来,在我看来这些观点都是极端保守的学院作派(Mandarin)的表现。如果关于后现代主义唯一值得书写的,是一篇在极具(“恰如其分的”)抽象高度上论述傅柯、德里达和别的法国思想家的哲学论文的话,这一领域真的只能向詹京斯、安克斯密特和索斯盖特们开放了。必须有人站出来,在他们讨论问题的层次上与他们辩论,这也是本书的初衷;而且为了历史学本身的良性发展,我仍然坚信这是值得做的工作。

另外,科里尼教历史学家写他们的历史去,把理论建设的工作留给专家来做。在我看来,这一观点有误导之嫌。我们历史学家在着手工作以前,必须首先对自己当下要做什么有一些最基本的判断。历史学科在理论和认识论上的自觉性正不断提高,这完全是好

事。听从科里尼的建议只能是不智之举,而且现在看来也是办不到的事情。我们多少能从他的话里听出,有思想史家在说“别挡我的道儿”的意味。我再次重申:《捍卫历史》从来不是一部哲学著作。本书讨论的是后结构主义和其他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对史学理论及实践的影响,而不是那些认识论本身。这本书是为历史学教学而写,也是为了用于历史学教学而写。这不是一本关于历史哲学或观念史的专著。

258 如果说,有的评论者只是认为本书讨论问题的层次不对,另有论者则觉得,从某种角度说本书没有写的必要。比如,阿普尔比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说,本书“所谓为历史学辩护,针对的只是一些迟早会不攻自破的无关痛痒的攻击”。萨缪尔·布列坦(Samuel Brittan)声称:该书“击溃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即一章又一章、一个例子接一个例子的论述,让人有点生厌”。他说,本来这些“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或者,我们来听听另一种说法,根据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观点,1997年有40 000名英国的高考生选考历史,而大学在读历史学的有15 000名学生,这说明“历史学根本不需要捍卫”。

弗格森的说法,有教人困惑难解之处。因为,他接着又抱怨说,如果历史学的确受到某种威胁以至需要捍卫的话,那种威胁也不是来自后现代主义的,而是“1960年代起该学科在大学里的扩张”。他认为,这种发展的结果,是削弱了该学科的智识门槛。“‘社会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或‘同性恋史’(gay history)等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自留地(cosy enclaves),使那些没有史才的人躲过了严肃的智识审查。”(我们无需过多地和此类武断的偏见较真;如今,一大批极富想象力、锐意突破的一流学者都在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因此,弗格森是在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历史学无需捍卫,因为学习历史的学生越来越多了;相反,大部分历史学的学生的专业水平在下



降,所以,说到底,历史学还是需要捍卫的。

丹尼尔·约翰逊(Daniel Johnson)的论点更精细,且得到了麦克·布雷(Michael Burleigh)、马修·特林卡(Matthew Trinca)和史蒂夫·温博格(Steve Weinberg)的明确支持。他说,“需要捍卫的不是历史学,而是职业历史学家”,这是拙著的出发点。布雷和约翰逊都指出,历史书比以前流行了;但总体上说,那些广为诵读的书,都出自非学院人士之手;而大众的历史观念,不是由牛津、剑桥的专家学者形塑的,而是由电影、电视和安东尼娅·弗雷泽(Antonia Fraser)这样的作家形塑的。罗依·波特则衷心希望我“能放眼学院的高墙之外”,正如约翰逊批评我“没有考虑学院外从事历史学工作的那些人”一样。故而,在约翰逊看来,本书是在捍卫学院里的史学专业——即特林卡所说的“大写的历史学(a capital H History)是职业的,它仅仅包括分割严整的专门领域和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在捍卫历史学本身。他说,“《捍卫历史》只是学院霸权的黄金时代之绝响”。

然而,《捍卫历史》关注的是我们如何定义并获得真实性和客观性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不管我们在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历史研究。在我看来,无论你是为学院外的大众而写作的安东尼娅·弗雷泽,还是仅仅面向学生和其他专业史家的阿普尔比,这些事情该怎样就是怎样。因此,我很高兴地看到,弗雷泽肯定了我的观点,因为她在《观察家》(Observer)1997年的圣诞图书专号上把拙著评为她的年度图书之选。显然,至少一些通俗历史学家的确认为,这本书适用于他们学院里的同行,也适用于他们自己。

对于约翰逊的批评,还有两点意见值得声明。第一,本书的确肯定了一些学院历史学家写作的通俗历史书,并提到了许多这方面的佳作,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打通学院和大众之间的屏障。第二,本书也(简要地)提到了,职业的学院派历史学家,实质上并没有受到

新近来自媒体中的将历史通俗再现引发的严峻挑战。将历史通俗再现,不管是民间歌谣,或是神话传奇,大海报还是小册子,一直是流播广泛的,而且它们总是构成了大多数人的历史理解。两千五百年前,希腊史家修昔底德就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序言中抱怨,诗人和其他人捏造并传播了子虚乌有的报道,而他要如实地记录事实。过去,只有一小部分读书识字的人接触专业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如今,在最发达的工业社会,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在20岁之前就接受了高等教育,而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和半工半读的学生选择接受终生教育,这大大增加了他们接触并受到学院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影响的机会,这是确定无疑且前所未有的。所以,约翰逊可以说,本书捍卫的是作为学院专业的历史学,且我针对的批评者也主要是学院中人;可他说这意味着本书代表了没落精英的绝唱,且不适用于非学院的历史学观念,那就错了。

261 以上讨论提醒我们,英国优秀的日报、周刊和周末杂志的书评版,仍然掌控在一群年轻而保守的历史学家和记者手中,他们的智识养成期正是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梅杰(John Major)的保守内阁执政之时。除了在《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上撰文的约翰·查姆雷(John Charmley)外,他们都为我感到惋惜,就像布雷说的,“艾文斯不幸地一脚踩到了‘进步论的’阵营”。正如其他的保守主义评论者那样,布雷认为这部书对保守主义历史学家的评述是不公正的。

布雷恼怒地说:“安德鲁·罗伯斯受到责备,是因为他的个人收入来源;约翰·文森特的过错是为小报撰稿;阿瑟·马威克么,他的就职演说未免来得太晚了。而围绕休·久佛-罗帕的流言,看来比他本人对欧洲史的主要贡献更引人瞩目。”让我们看看这些受到质疑的段落到底说了什么。第210页,在概括了约翰·文森特的论点,即当今的历史学家都是左翼自由主义者,因他们在为国家工作,本

书接着评述安德鲁·罗伯斯道：

如果我们当真相信了他的多少有点以偏概全的观点，我们就只能指望有自己收入来源的历史学家能提供健全的右翼观点，而且我们知道有些人，如新撒切尔主义(neo-Thatcherite)著作《杰出的丘吉尔主义者》(*Eminent Churchillians*)的作者安德鲁·罗伯斯，的确符合条件，然而更多数的人是没有这份优裕的。

在此我没有批评罗伯斯的意思，只是把他作为一个例子提到而已。

文森特本人的情况又如何呢？本书多处提到了他，不少是褒扬的话，包括上面引述到的话，提到了他最具原创性和突破性的著作 262 是写于他获得大学任命的时期（并且他现在仍在任上），而不是在依靠私人收入过活时写的（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依靠私人收入过活）。不过，推测起来，布雷所针对的段落大概是第 268 页，第四章的第 15 个注释<sup>①</sup>：

文森特……赞同地引用泰勒的信念，认为在一些未出版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不了新秘密。文森特本人又提倡要比以往更关注报刊，声称这些新闻纸会是“明日的威尼斯档案”(the Venetian archive of tomorrow)。然而，泰勒讨厌使用手稿资料，太过依赖印刷材料，其实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他最大弱点之一。文森特钟情于报纸作为获取信息的公正来源，大概是颇具个人色彩的论述，因为他曾多年为《太阳报》撰写专栏，直到他所在大学的学生以示威的方式

① 该注释在新版第 331 页。——译者注

迫使他搁笔为止——这一事件本身无论多么可悲(*deplorable*),但可以说,如果该专栏真可作公正的典范的话,这样的抗议事件多半不会发生的。

这一段话也触怒了丹尼尔·约翰逊,他用了整整一段话来抨击它,并指责本书对文森特有失公允,且“肯定了暴民压制一个学者声音之行为的正当性”。这段话的本意是指出报纸亦存在偏见,不仅是大学教授的业余专栏如此,其他的报道、社论亦如此,不论这份报纸是《太阳报》,还是《电讯》(*Telegraph*)或《卫报》(*Guardian*)。我用了“可悲”这个词,证明约翰逊对我赞同示威行为的猜测是不可靠的。至于布雷对我提出的异议,我只能说,本段并没有任何贬低文森特为《太阳报》所做工作的意思。

263 类似地,在本书第299页提到阿瑟·马威克的地方,我说他的就职演讲“在他担任广播电视大学历史系主任职位几十年后”<sup>①</sup>,并没有透露出多少批评他拖延的意思吧,无论我对讲座本身的别的方面提出了多少批评。再来是休·久佛-罗帕暨戴克勋爵,我很难理解布雷的“流言”一说从何谈起,除非他大概指的是第19页我提到,他在匆忙检查了存放在某瑞士银行金库的希特勒“日记”后“鉴定其为真品”的事情,但这也是确有其事,并非流言,所有内容在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的杰作《出售希特勒》(*Selling Hitler*)里都有案可循。至于《捍卫历史》一书如何通过提及休·久佛-罗帕在欧洲史方面的其他工作,而得以改进,对我来说仍是个未解之谜。

与前述情况相反,布雷发现,本书对“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大卫·阿布拉罕斯(*David Abrahams*)”态度不同(布雷不是唯一一个拼错阿布拉罕[*Abraham*]名字的评论者),在论述围绕阿布拉罕那本错

---

① 在本书2000年新版的第363页。——译者注

误百出、最终砸掉他史学饭碗著作的论战时,显得“宽厚有加”。至少史蒂芬·科里尼认为本书对阿伯拉罕个案的处理还是颇足取法的。如果考虑到,本书宣判了阿伯拉罕不自觉地以论带史,搞不清事实和虚构,违反基本的史学研究规程,加上技术拙劣、态度草率等诸项罪状,我实在很难理解为什么还可以说我给他的待遇是“宽厚有加”。我很难想象阿伯拉罕和他的朋友们(包括彼得·诺维克)会对我的论述感到高兴。布雷在这里又在发挥他的想象力了。

麦克·布雷不是单独一个因本书对右翼杰出人士批评而心生不满的年轻的(和还算年轻的)守旧派。尼尔·弗格森也批评本书对“广义上说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显得“粗鲁无礼”。他在书评中说,“比如,约翰·凯尼恩的罪过是‘妄自尊大和胸有成见’”。这句话,弗格森完全正确地引自本书的第179页,是对凯尼恩在1993年提出的一个观点的评论。他说,大学本科的西非和印度支那半岛史的课程,都是历史系学术赶潮时“应急设立的”,这些课程很快就被取消了,因为很难找到相应级别的校外评鉴委员,所以只是“放任讲授这些课程的教师向学生灌输臆想和偏见”。我必须说,第一,本书的描述只是要反映凯尼恩本身的思想僵化和偏见,这些言论含有对英国大学里教授和研究非洲和印度支那半岛史的许多杰出历史学者的不敬或侮辱,都没有超出凯尼恩原话的意思;第二,在我看来,称凯尼恩的观点为妄自尊大和胸有成见,毫不为过。

264

弗格森接着攻击本书把休·久佛-罗帕描述为“顽固的、鼠目寸光的”。这句话不是单单针对休·久佛-罗帕的,而是指众多“顽固的、鼠目寸光的欧洲史专家”,当然也包括休·久佛-罗帕在内,因为他公然宣称非洲没有历史,非洲只是“在独特的但与全球无关的角落里,一些野蛮部落的无价值循环”。此处,对我来说,用这个词语来称呼休·久佛-罗帕对非洲的奚落,是完全准确的,毫无粗鲁之处,况且休·久佛-罗帕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已经显示了,

他本人是很擅长出言不逊的。

最后,弗格森反对本书所说的,约翰·文森特认为“历史是非常男性的历史……历史是富人与名人的历史,而非穷人的”,这显示了作者“囿于其维多利亚时代高层政治史这一狭小专业,对之外的历史学术天地闭目塞听”,弗格森完全省略了这句话的上下文,甚至我在此引述的这句话本身,只保留了开头的两个词,他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本书宣称文森特在各个方面都“极度无知”,这显然不是真的。265 除此之外,我还是认为本书的论断是恰当的,我对文森特侮辱的程度恰如其分,正如他施加给许多终身研究女性、穷人和小人物历史的优秀历史学家的。与之类似,把弗格森本人对性别史的评述称为极度无知,也没有什么过分的。这样说或许很粗鲁,可事实就是如此。

说到这里,我好像一直在斤斤计较于微不足道的地方。要说迄今为止最严肃的批评,我要再次提到,本书出版之后迅速发表的最睿智的一篇批评文章,即丹尼尔·约翰逊(Daniel Johnson)在《视界》(*Prospect*)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约翰逊说,本书“与其说是捍卫历史,倒不如说是一个学派(左派,民粹主义的,有社会意识的)反对另一个有点过时仍值得尊敬的学派(保守主义的,精英主义的,关于上层政治的)”。可本书主张的是,我们需要守护历史学,使它免于受到狭隘又精英主义的历史学是或应该是什么的概念之影响,而变得畸轻畸重、自相矛盾,并没有主张用任何特定的历史学概念来取代它。本书也没有说,思想史、精英史或上层政治史本身是错误的。本书的目的,正如从罗纳德·胡顿(Ronald Hutton)到罗依·波特等许多评论者所认识到的,在于主张一种宽广的、有包容性的历史学概念,在赞美其多样性的同时,尝试通过不同的途径克服它的碎片化,书里根本没有说左翼版本的历史学天然地就优于右翼历史学家从事的工作。事实上,本书严厉攻击了一些左派历史学家,比如,伦

敦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小组的召集人凯斯·弗烈特(Keith Flett)——他认为本书需要“更强势地回击后现代主义者的挑战”,又如托洛茨基派作家克利斯·哈曼(Chris Harman)——他谴责本书是“向后现代主义的倒退”。

266

## 二

右翼对本书的猛烈攻击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对来自后现代主义及其同情者的口诛笔伐倒是有心理准备的,尽管它们反倒来得更晚一些。出自后者的第一个主要论点是,本书捍卫的是一种已经过时且站不住脚的客观性概念。阿普尔比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写道,本书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以传统英国的历史经验主义的名义,对后现代主义发起的全面攻击。她指责道,本书对后现代主义采取的进攻策略是,通过指责后现代主义中最幼稚可笑和最极端的表现形式,达到总体上否定其价值的效果。不过,在这样论述的时候,她恰好犯了自己在书评中指出的,后现代主义已经教导学者要提防的那种二元对立的(dichotomizing)思维方式。阿普尔比肯定知道,而且本书已经完全指明了,“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包罗了各种不同立场的标签,仅仅因为本书反对了其中的一些立场,并不足以说明本书就反对所有的后现代主义。阿普尔比继续这种非此即彼的(Manichean)误读方式,她指责本书抱持了一种落伍的信念,即历史学家“发出的是一个事实重建者和进程分析者的公正而全能的声音”。事实上,本书花费了相当多的篇幅,一方面试图终结这种对历史学家主观性的简单化否定,另一方面也要否认在历史学中做到无所不知的可能性。

她接着说道:“历史学家更愿意认为自己是在重建过去,而不愿意承认在他们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也创造出了文本,并建构了知

267

识。”然而，与读过其书评的人想的正相反，本书要捍卫的是后一种立场，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去反驳如艾尔顿等持有前一种立场的人。我远非阿普尔比所宣称的那样，忽视了海登·怀特在这一论题上的观点，在本书第125—126页，我认为怀特最近对历史学家如何着手写作和研究所进行的阐述是基本准确的。因此，阿普尔比以一副嘉惠于人的样子总结道，英国历史学家保留着关于真实性和客观性的简单化观念，而这在知识氛围更精深严密的美国早已被抛弃了；她的这一说法，倒是像她在指责本书对付后现代主义时所指出的那样，乃建立在一种肤浅的误读之上。

阿普尔比的同事林·亨特认为，本书频繁提到艾尔顿和卡尔，正好坐实了本书的过时之处。可我提及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正如许多持有不同立场的史学家所承认的那样，因为他们的书到今天仍然是许多（即使不是大多数的）历史认识论教学的基础。在从事实际研究的历史学家所写的有关历史知识性质的论著中，他们的书仍然是可读性最强且最易理解的。林·亨特觉得这是“令人失望的‘权威主义’（daddyism）的极致表现，试图借重某些父辈级人物来保证自己研究取径的合法性”。她宣布，“艾文斯引述的几乎全部都是卡尔和艾尔顿，好像要一再保证自己是他们指定的继承者似的；而他们对他们的批评听上去像是一个恭敬顺从的孙辈”。事实上，《捍卫历史》一书不是要取而代之，而是希望读者能够将本书和他们的著作参照比对。因此，我才沿用了卡尔著作的章节标题，还有本书的最后一段对卡尔著作的最后一段进行了戏仿。三十多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著作能为历史系的学生解答他们所遇到的概念和方法上的问题，因此卡尔和艾尔顿显然堪当导夫先路者的称号。如今，此类文本竞相出现，如果再认为某本著作会享有和他们著作相同的地位，当然是可笑的想法。

将如上批评归结一下，就是认为本书是在为一种过时的历史客



观性辩护。例如,马修·特林卡无视本书最后一章对客观性含义的仔细限定,轻巧地认为,我们只能在艾尔顿等传统主义者所支持的那种绝对主义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因而把本书的核心论点直接归入了艾尔顿主义的阵营。特林卡显然反对他认为的本书的这一观点。而大卫·格莱斯(David Gress),这位提倡学校历史课应该回归军事史和“背诵事实”的学者认为,这肯定了他自己的保守主义研究取径。格莱斯把《捍卫历史》引为同道,声援他对“着眼当下(present-mindedness)和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抵制,他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倾向,社会史、妇女史和近期的其他发展形势,已经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造成了“阻碍我们获得知识的屏障”(barrier to learning)。故而,格莱斯认为,本书对艾尔顿的批评,是作者(指我本人)为了致以“实际上的敬意和赞赏”而布下的“近乎仪式性的”掩护。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格里格·蒙路(Greg Munro)在书评中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他认为本书与其所抗议的完全相反,实质上“真心拥护”了“艾尔顿提倡的历史客观性的核心观念”。

事实是,艾尔顿简单化地认为历史学家在研究文献时可以完全摆脱当下的信念和思想,这是本书反对的。本书也反对,他那狭隘的经验主义,和他坚持只有国族的政治史才是唯一正确的历史学之偏颇观点。他认为诠释是自发地从材料中产生的,这亦是本书反对的。本书同样反对,他对历史学家如何着手研究的所有说法。本书旗帜鲜明地欢迎艾尔顿所讨厌的那些新进展,如妇女史和社会史,而且说到底,这些领域都是我自己研究的重点。在上述问题上,我是赞同卡尔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比如,本书又反对卡尔对客观性和因果关系的说法,因为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是与他持有的人类未来必然系于苏联式计划经济的信念捆绑在一起。

考虑到本书强烈反对卡尔和艾尔顿关于客观性和别的许多方面的核心观念这一事实,我很难理解所谓本书利用他们来保证自己

研究取径合法性的说法。更能充分说明问题的是,本书已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艾尔顿经常蹈入反启蒙的保守主义误区和卡尔著作中根深蒂固的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思想来说,都是不合时宜且令人讨厌的。

对于林·亨特来说,本书似乎是在仿效卡尔而非艾尔顿。她认为,本书对因果关系的论述,只是将卡尔本人的观点“改头换面”(re-hash)而已。她引述了本书的结论,即“卡尔的确没有深思熟虑其论断”,与她强调的正相反,这并不是对于卡尔观点的机械重复,而是对其详尽而有理的评批。卡尔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只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之原因感兴趣,如果它能够帮助我们改变现在并塑造未来的话,而我对此进行了驳斥,这就是我做出上述这番批评的主要根据。

270

卡尔的上述立场的含义是,如果不能满足为现实和未来服务的目的,历史学家就应绝口不提任何过去事件(无论是否属于意外)发生的原因。不过,卡尔自己没有说明他的方法论所含有的这层(极其令人反感的)意思,这就是我觉得应该指出他没有真正彻底思考自己论点的原因。我不同意林·亨特所说的,这只是武断的说法。另外,亨特在自己和阿普尔比、雅各布合著的《讲述有关历史的真相》一书中也批评了卡尔的因果概念(该书有些地方挺有趣,很多说法也有说服力),本书有一个段落对此进行了批评,我认为亨特本人的说法是“在事实上错误且不相干的”。我自觉这个批评并不武断。也许是我对她的书的一部分的批评激怒了她,导致她对我的全部著作都感到强烈不满吧。

有时,亨特对本书的误读简直让我忍俊不禁,比如说,她反驳我在论述因果关系的那章第160页的一句话。我说的是,社会史和经济史已经成为了“新理论”的“主要的受害者”。她反诘道:“这和因果关系有什么相干呢?!”我的回答是,是不大相干,因为这是该章的最后一句话,用意在于引出下一章节对社会史和经济史的讨论。

亨特对本书的错误诠释并未到此打住,甚至在她肯定本书的地方也没有少出错。比如她认为,本书写得最好的地方是“揭示与认识论无关的那些论战,比如关于大卫·阿伯拉罕分析纳粹德国商业集团时,对材料处理方式的争论”。但是,本书之所以复述这场论战,正如我在分析这一事件时清楚说明的那样,是因为它直接触及了历史认识论的一些核心问题,即事实和诠释的关系,引用史实论据时捏造解释的可能性,以及海登·怀特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诠释,比如像阿伯拉罕写的这本书,是不能被证伪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视为相关的论据,并不为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认可。

271

阿普尔比和亨特并不是仅有的把本书视为知识陈旧的批评者。已故的安东尼·伊萨普也认为,《捍卫历史学》一书是对“十足的经验主义的”客观性观念的支持。让我们检视一下他从书中挑出的支持其说法的部分。第一是“过去以一种基本的方式,通过材料来传达过去的真实”。这里的关键词是“基本的”(basic),本书第115页上接着的一句话说得很清楚:“在最基本的层次上,人们不能把本不属于文献的意思读到文献中去。”第二是“过去确实要仰赖于材料才能说话”(第126页)。好吧,这是我的原话,但是我之前一整段的讨论,包括对“阿伯拉罕事件”的长篇叙述,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不是在说普遍情况下历史学家的工作方法(即仅仅倾听材料所说的),我的说法是有限定的和针对性的;而且我的话到此还没有说完,实际上,这只是我一半的观点。这本书实际要说的是,当历史学家在拷问材料的时候,过去只能仰赖于材料才能说话。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我在书中已经一再地说明了。

伊萨普以引用本书句子的方式总结自己的观点道,这本书的“十足的经验主义的结论,无论它是如何的,‘它真实地发生了’,我们就能‘发现它是如何发生的’,并知道‘其所有含义’”。本书的这些话,是我在提到一系列后现代主义历史著作的主题后说的,它实

272 际上是这样的：“我则会谦卑地面对过去，不管他们怎么讲，我要说，过去肯定是发生了，而且我们的确能够——若是我们非常谨小慎微且又能自我批判的话——发现它是怎么发生的，并获得一些站得住脚的结论，即便这些结论并非是关于其所有含义的盖棺论定。”在除去了这段话的全部限定条件后，伊萨普利用它，并使它看来像一种对获得绝对知识的教条式自信，实际上却相差甚远。因此，他指责本书是盲目的经验主义，他所能调动的论据只是捏造和歪曲我的原话而已。

看来对我所谓的历史客观性的误解是流传颇广，加上又有太多的评论者假设我既然敢用客观性这个词，那么我肯定指的是一种坚定而绝对的客观性，实际上，我指的是一种脆弱而有限制的客观性。有鉴于此，我在本书美国版的倒数第二段又加了一句话：“上述分析中所谓的客观的历史（objective history）指的是，在历史事实及其载体的材料所赋予历史想象的边界内，并且在历史学家渴望对自己研究的对象做出一个真实、公正而恰当叙述的动机下，所研究和书写的历史。”

苏联史专家史蒂夫·史密斯的书评对本书的误解，也进一步说明了有必要增加上面这段话。史密斯假定《捍卫历史》一书的观点是“关于过去，我们可以说出的真相只有一个”，而且它可以从历史证据中“被发现”。诚然，本书试图强调历史学家的作品乃他们的目的和观念与他们在材料中的发现之间对话的产物。史密斯却不愿  
273 正视这一点，他继续要用自相矛盾的表述来作茧自缚。他一面说，历史学家对过去事件的阐释之成立与否，是不能以他们与历史论据的吻合程度来判别的；一面却又指责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对1917年俄国革命做出了“极度扭曲的阐释”。

如果史密斯不诉诸历史证据，他又如何能判断派普斯的叙述是

扭曲的呢？这里要考虑的不仅是派普斯引用的证据，更重要的恐怕是，他在叙述中所忽略的大量证据。若是说史密斯提供了一种不同的革命叙述视角，那可算不上是对派普斯的批评，因为按照这种思路，没有什么标准可以鉴别究竟是史密斯的还是派普斯的叙述是失真的。由史密斯的普遍的(*general*)论点必然得出两者同样有效，正如由史密斯的特殊的(*particular*)关于派普斯的论述，必然得出这种普遍的论点是无效的。

然后，还有其他人似乎也认为本书是在为一种“保守的”历史编纂学取径辩护。例如，牛津大学的思想史家彼得·葛士(Peter Ghosh)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声称，本书加入了“自1960年起开始的一场历史学论战”，并守护一种基于“崇拜文献”(fetishizing of documents)的“极端的经验主义”，还说我相信事实和文献“会自说自话的”。如果他真是这样想的话，我很难相信他好好读了我的书，或者他当真熟悉我的其他论著。《捍卫历史》实际上主张的是，从1960年代起，历史学经历着一场我们乐见的复兴；本书明确捍卫并且在第六章着重论述了这一时期历史学科的扩展，而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则希望它能回到以国族的政治史为中心的旧模式。假若没有过去四十年中历史研究发生的变化，我自己就不可能去研究医疗与疾病的社会史、仪式史、女权主义史、死亡史等一系列课题。我的这番反驳也适用于阿普尔比提出的批评，她在书评中说本书“一定能够取悦于那些认为1970年以前的历史学不需要捍卫的人”。我们暂且不去追问，197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一些人认为之后的历史学需要捍卫，而之前的则不需要，这个问题太不可思议了。此外，同样令人费解的是，一本旗帜鲜明地为(1970年前与后的)历史学捍卫的书，居然能取悦于那些认为根本不需要捍卫的人。

274

不过这些糊涂账和葛士的信口开河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他在书评的其他地方，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说，“理论产生自历

史学内部”，并且批评历史学家从别的学科那里借用理论。这是完完全全的蒙昧主义（obscurantism）。1960年代以来以及更早之前的历史研究上的进展，大部分都曾得益于从文献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处借鉴来的理论与方法。

葛士还主张，如果任何美学冲动进入了一部历史作品的结构中，那么该部作品一定在概念上是空洞的。他并且举出我的书《死于汉堡》（*Death in Hamburg*）为例（因为我在《捍卫历史》中以它为例，说明我是如何用美学的标准来组织历史材料的，我的做法和海登·怀特对历史作品的总体描述大致相近）。然而，如果葛士当真读过《死于汉堡》的话，他就会发现该书的框架是建立在一套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之上。问题在于，书写历史过程中的概念和美学两个方面并不相互排斥；如果它们果真无法共存，那么所有的历史书都将完全丧失可读性。

我将上述论点投书给《伦敦书评》，而葛士书评里的混乱和矛盾，完全体现在他接下来对我这封信的回应中。他继续宣称，我在书中所描述的“兰克学派”史学取径是近三十年来的发明，他并且言之凿凿地断言我是兰克学派的。“兰克学派”在这里似乎有一种文献拜物化的意味，这也是葛士在其书评中对我的批评。但是，说到文献拜物化，我对他真真是甘拜下风的，他自己不就明确主张，只有从历史学内部产生的历史学诠释和理论才具有合法性嘛，或者我们可以换句话说，只有从文献中产生的才是合法的？

另外，鉴于葛士还主张，除非有人自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否则别人就无权如此指称他（也许，这是一个概念直接源于资料的例子），我想他会接受我对自己不是一个兰克派的坚称，虽然他还是这样称呼我。《捍卫历史》一书对“兰克主义”（Rankeanism）的肯定，我已限定得非常清楚，该书只是强调，文献考订（resource-criticism）不是在最近几十年才被引入历史学的，兰克本人在19世纪中叶就这样

做了；而且这种方法在稍经修正后，仍然适用于分析档案馆馆藏文件的历史学家。

葛士投给《伦敦书评》的那封信里，带着恶狠狠的“别挡我道儿”的腔调，这已显示出了他的立论意图。他在那封信里说，只有像他这样的职业思想史家才有资格写历史编纂学的著作，而像我本人这样专门研究政治、文化和社会史的人蒙头朝着他挥手的方向前进就可以了。他这样说的依据，是宣判我所描绘的思想史只是在不断重新阐释一小部分的经典文本，“跟思想史的现代学科全无关联”。然而，他接着又注意到，我所说的那个“旧版本”的历史学，总体上“其实很像海登·怀特或安克斯密特类型的后现代主义”。这倒正是我书中的观点。毫无疑问，怀特是当今历史思想和历史书写两方面都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且不管其影响是好是坏。他无数的徒弟和信众都主张，所有文本都能够被无明确限制地重新阐释。怀特的取径并不过时，恰恰相反，它是太时髦了。

276

葛士要宣扬的似乎是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所开创的方法，即通过比较一个历史文本所使用的语言与其同时代的其他文本所使用的语言，来确定该文本的含义。如此这般，譬如对于霍布斯的《利维坦》，我们只要在与其同时代的语言类文本中查到该书所使用的语言和概念的意思，就能一劳永逸地解读出它的含义。这是非常有效且影响颇广的取径，但不等于整个“思想史的现代学科”，而且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已把它视为一种过时的历史主义。

看来正是遵循了斯金纳的取径，葛士才主张现代观念不应被引入对过去文本的分析中。当我们分析诸如约翰·洛克的作品的含义时，这种感觉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如果我们分析的是一个中世纪村庄的社会结构，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问题，这样做恐怕就沒用了。此外，如果葛士像他在书评中所说的那样，相信思想史即“伟大文本”之历史的这一观念已经“不复存在”的话，为什么《伦敦书

277 评》的作者简介上会说,他“正在重新翻译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呢?最后,葛士断言“艾文斯认为昆廷·斯金纳和加雷斯·史泰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等人所从事的现代思想史研究和怀特、安克斯密特一系的‘后现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写过只字片言,可以坐实这种荒谬的指控。这一自相矛盾程度更深的批评,毫无疑问是所有书评中思想最混乱且最盛气凌人的一个。

更有甚者,凯斯·詹京斯在他的《为什么研究历史?》(*Why History?*, pp. 106 - 112)一书中,长篇大论地攻击我所谓的对“兰克学派原则”的捍卫。詹京斯的论点乃建立在一种近乎荒诞的误读之上。在《捍卫历史》一书的第19页,我说兰克的文献考订原则在今天的历史学研究中仍然是有用的,尽管其内容显然已大为扩充了。从另一方面说,本书第十章对兰克思想的其他方面做了详尽的批评,足以显示我并不认为兰克有太多可以贡献给现代历史学家的东西。比如,本书反对那种认为过去可以依其所是的那样被建构起来的历史主义的观点。本书也批驳了那种认可能够排除任何假设的导向性而独立地搭建起论据,然后产生出论点的经验主义观念。因此,詹京斯对这些他所谓的“兰克学派的”论点之攻击是无的放矢。

278 然而,詹京斯在讨论一个“兰克学派的”观点,即通过严格的文献考订我们可以确认一个文献的真实性、出处和它绝大部分的意义时,却令人吃惊地退缩了。在《为什么研究历史?》一书的第108页上,詹京斯开始“王顾左右而言他”了,他声称,后现代主义者从未说过在个人陈述的层面上,不存在“对历史学的认知因素”(cognitive element in history);他们只是说,在阐释层面上不可能有确定性和客观性(或者像他在第109页上所说的,“历史‘真实’(historical ‘truth’) 在较低的句法层面上是没有多少争议性的”)。

此外,詹京斯曾著文和其他人争论过,说我们不可能从文献的



证据中推断出过去的事件、情景、信仰等等。但是，他在这里的论述完全与之相悖。后现代主义者耗费了大量笔墨去证明文献是多么的不可靠，我们从中既读不出任何东西，也不可能复现记录者的真实意图。后现代主义历史学批判的一个根本前提是，一个文献每经过一次阅读，它的意义就被再发明和再阐释过了，所以它不可能有任何固定的意义。如果这一论断不是在告诉我们永远无法通过文献找出基本的历史事实的话，它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詹京斯先在立场上退后，继而又想复进一些，于是他强调通过历史文献来复原历史不容易(*difficulty*)。也许复原的历史是片面或暂时的，包含了作者的观点和阐释，值得商榷，或者说，永远无法定型，但这并不意味着，复原历史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詹京斯之前所论述的观点。看来，詹京斯在这里颠覆了自己更为整体性的观点，并且在朝着经验主义者捍卫“事实”的方向上比我走得更远。

尽管，詹京斯出人意料地放弃了自己的基本理论立场，并转投一种非常传统的经验主义，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将《捍卫历史》一书定义为，参与了保守、褊狭、迂腐而“资产阶级的”阵营对激进、进步、解放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攻击。在论述过程中，他给我硬安上了许多我根本没有的观点。他的论点往往只是猜测性的。比如在这里他写道： 279

如果有人要问理查德·艾文斯(如我就要问的)，什么是“正确的”(proper)历史学，他会立即不假思索地回答，事实上，他正是这样做的。这就是他习得的技艺。问艾文斯何为“正确的”历史，就是要他形容自己的工作。这样，艾文斯等人在回信中再次展现了所有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即把一种派别性的辩护装扮成一种代表所有人利益的发言，好像这不是他们的历史学的危机，而是整个历

史学本身的危机。

然而,詹京斯马上就自相矛盾起来,因为他紧接着的第二句话就断言“历史学本身的确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威胁下有覆灭之虞”( *Why History?* , p. 9)。因此他承认了,本书是有广泛基础的对各种研究过去的取径的捍卫,而不是针对某种特定取径的捍卫。历史学的前提是我们能够知道过去,想想看我们还能找出哪种不以此为前提的历史学吗?

詹京斯太习惯于把自己装扮成( self-dramatization )资产阶级正统的激进反对者而无法自拔,所以他为读者奉上的《捍卫历史》的版本是一副自诩为坐稳官方位子的,可以向所有人发布如何研究历史的金科玉律之样貌。他再三断言《捍卫历史》是为了捍卫“正确的”历史学和“正确的”历史学家而写的。事实上,我根本没有用到这个词,也没有尝试过定义什么是“不正确的”历史学。恰恰相反,我一再不遗余力地主张的是,研究过去的途径十分多样,这种多重性和多样性是我们乐见并要捍卫的。我不会说自己从事的那种历史研究是唯一“正确的”,我压根儿连想都没想过,更不用说这样宣告了。与之相反,倒是詹京斯本人喜欢发号施令,乾纲独断。他不断宣称,后现代性是**唯一**值得取法的正确之知识论、道德和政治立场;而历史学是过时的、没有时代性的、无意义的、难以接受的;历史学家**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入后现代主义者的行列,当然只有先得到后者的认证才行。因之,这里很难容下多重性和多样性。

詹京斯扬言说,我曾自诩代所有历史学家发言( *Why History?* , p. 96)。可我在书里根本没有这样自诩过;我也不会采取如此错误和专断的举动,因为我已经充分意识到许多历史学家将会不赞同本书的诸多观点——比如,我在书中批评了很多历史学家持有的一种观念,即国族的政治史应该是历史学科的核心问题;我也反对所谓

有史以来,广大民众的历史是无意义或不重要的妄言;我还攻击了所谓妇女、性别或性的历史是鸡毛蒜皮、不值一提的观点。

詹京斯告诉人们,我所辩护的只是我个人作为历史学的实践(“艾文斯的历史学家就像他自己:只是他自己的”,*Why History?*, p. 101),并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历史学应该如何书写的范例。如果说我的陈述只能说明我个人作为单个历史学家之实践的合法性,那我又怎么能代表全体历史学家发言?我的观点又怎么能和“艾尔顿、希摩法、约翰·托什(John Tosh)、赫克斯特、麦可拉夫(C. B. McCullagh)、劳伦斯·斯通”( *Why History?*, p. 9)等人的混为一谈?我的论点怎么就被概括成“艾文斯主义/资产阶级的”( *Why History?*, p. 101)? 281

詹京斯还有许多为了便于论战而歪曲我本意的例子。比如,我在书中说,该书讨论的认识论问题涉及到,社会如何获得关于我们时代重大问题的客观确定性,以成为我们对未来进行关键性决策的可靠基础。詹京斯说,这意味着我认为历史的命运是文明的命运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integral)。但我在书中说的不是必要组成部分,只说了两者有关联,这是一个更适当的说法。

詹京斯还无法接受的是,任何人都能够以一种批判的态度看待一个思想家或一种思想体系,接受部分的观念,同时抵制其余的观念。他在《为什么研究历史?》一书中连篇累牍地指责这种有鉴别力的批判之思想是“僵化的”和威权的“同化主义”(assimilationism)。事实上,当然《捍卫历史》确实有意指出,后现代主义观念和趋势,在其可资利用的范围内“被同化”到历史书写与研究的实践中,不仅如此,他们实际上切实地改变了许多历史学家看待过去的方式,这种改变许多时候都是积极的。

詹京斯提出,“埋头于尘封的档案”对职业历史学来说,是一种“相当稀罕的‘匠人’(artisan)特征”,并且说我的书用这一标准衡量

一切,从而宣布历史学是一门历史学家必须得边干边学的技艺(*Why History?*, p. 99)。历史知识生产的这一根本方面,真的有那么“稀罕”吗?至于训练历史学家,我不认为自己可以规定训练的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学者要从事何种类型的历史学。一些比较技术性的历史学研究,比如家庭结构的重组或中古法律史,是不能边干边学的,它们需要大量的前期训练。《捍卫历史》一书也当仁不让地捍卫一切建立在多种基础之上的调查和诠释,哪怕它们并未直接以档案研究为基础。詹京斯又一次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到拙著之中,而忽略了本书申明的一些意思。

詹京斯形容本书是“刻薄的,且常常显得自以为是与盛气凌人”(*Why History?*, p. 95)。但是有什么比他自己的书更配得上这些高帽子呢?在这里,詹京斯多次重复了读者诸君一定很熟悉的断言,即历史学的研究假若说还没有寿终正寝的话,也已到了穷途末路。詹京斯说,我们现在可以忘记历史学了(*Why History?*, p. 9)。任何对历史学的捍卫都是不得要领的,因为“入侵者已经来过并离开了”,詹京斯所谓的“正确的”历史学之大本营已经被摧毁了,“正确的”历史学家的唯一选择就是加入后现代主义者(顺便说一下,詹京斯用这个词都没有任何不便,且他不断自称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行列,如若不然,就只能待在一个过时的且渐行渐远的过去,恰像有人所说的,钻研像中古经院哲学那样的完全僵死的学科。对詹京斯来说,像我这样的历史学家的思想“世界充满了地球扁平说的变种观念(world of flat-earth variety)”(*Why History?*, pp. 95-99),这意味着学生最终将把“理查德·艾文斯当作‘该遗忘的某个人’”(*Why History?*, p. 201)。

然而,有什么证据支持历史是一个关于过去的东西(history is a thing of the past)?詹京斯没有说,我猜,以他的知识论前提来看,他大概也不觉得需要说明吧。实际上,显然我们可以找出数不胜数的

反证。历史书籍的出版数量及其读者的数量,都比以往更多了。那么,为什么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家,不论保守或进步,左或者右,精英或民粹,政治上中立或带倾向,抑或“资产阶级的”,都要参与这项活动呢?詹京斯重复他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观点道,“意识形态的立场……显然是对特定利益的表达”( *Why History?* , p. 99),但是他已经悄然地放弃了自己先前著作中那种生硬的表达方式。现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或者换句话说,一个他所定义的历史学家),不再同证明社会现状的正当性及宣传阻碍社会、文化变革的教条有任何瓜葛。《为什么研究历史?》一书定义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是一个把理想化的自我形象投射到过去之上的人——理性、客观、严谨,诸如此类( *Why History?* , p. 100):

艾文斯在这里所做的……是赋予过去同样的资产阶级特征,犹如他所赋予自己的一样,他(不明智地)假想,假设他以自己(以及资产阶级)乐意被对待的方式(谦恭、严谨、慎重……理性、客观等等)对待过去,那么过去、他自己和资产阶级就能合作愉快。

对任何一个研究纳粹德国的人(如詹京斯所知,我就是)做出这样的评价,是无礼而可笑的。

更有趣的也许是,詹京斯提问,我们能够把我所说的任何历史学家皆可企及的近似而非绝对的真实,摆在什么层次上——“只是一个陈述、中程推论、概况综述,还是别的”?我的回答是,在每一个层次上;无论如何,正如哲学家苏珊·海克(Susan Haack)已经指出的,这完全没有损害到这种概念上的真实。类似地,詹京斯宣称我的客观性概念经不住安克斯密特的驳斥,这是毫无意义的,除非我们双方的观点都得到了陈述,且我对安克斯密特的反驳也得到讨

论,然而詹京斯的书并没有这样做。詹京斯再一次只是轻蔑地将我说的(我应该有思想,这点还算容易看到的),可以通过发现(诸如死海古卷的)新文献而获得历史知识,看作是“文献拜物化”。可给这样一句话安上这样一个蔑视的标签(还有一个是“文献主义”[documentarism]),*Why History?*, p. 104),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只是表明詹京斯不喜欢这句话而已。他要证明自己的观点,就必须证明发现新文献并没有催生出新的历史知识,然而他没有这样做。

在讨论因果关系时,詹京斯恰当地勾画出,要为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找出偶然性的等级和关系是极其困难的;但是他绝没有说明这种做法在逻辑或历史的层面上是不可能的(*Why History?*, p. 105)。最后,詹京斯指责我“误读了”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却没有说我是怎样误读的(同前)。我无法严肃对待这种不给出细节而一味诉诸修辞之暴力的批评。而在詹京斯一反常态地提供细节之处,又往往是离题万里的。因此,他在自己著作的第216页的第1个注解中抱怨说,我所取自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的《文学之外》(*Outside Literature*)的引文,“实际上,是出自我的《论〈历史是什么?〉》(*On 'What is History?'*)”,但改窜引文是贝内特写的,而不是詹京斯写的,可见他的批评是无的放矢的。詹京斯引用了这段话,倒是真的。不过,他的意思是他取得了引用该文的专利吗?或者是他引错了,而我跟进了他的错误?两种情况都不是。所以,他如此大惊小怪要做甚?

285 我们暂且撇开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不说。詹京斯完全没有谈到一个根本事实,即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相对主义并不一定是激进或解放的;他还是像别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样,不加任何证明地以为那必然是激进或解放的。这种臆想使他们相信,任何胆敢指摘后现代主义理论任何方面的人一定是保守的。实际上,如本书所指出的,极端相对主义孕育出激进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也孕育出法西斯主

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因为它使任何人都可以宣布自己的历史观、自己对文献的解读,和其他任何人的一样有效,而我们除了在政治的立场上进行驳斥,别无他法。也许正是由于《捍卫历史》挑战了后现代主义者的这种自封的左翼激进主义,所以才激起了如此众多的怨怒吧。

### 三

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对本书提出了一种更为重要的批评,其所谈的并非客观性这一概念的使用,而是对“一个事实”(a fact)这一概念的看法。例如,安东尼·伊萨普就不同意我把“事实”理解成发生或存在于过去的东西——无论我们是否知道其发生或存在过,他拒绝认为,我们发掘事实是一种盲目的经验主义。但是,我之所以要这样使用“事实”这个词,是因为我要避开一个以为历史研究的都是“事件”的臆想陷阱——海登·怀特就蹈入了这个陷阱,他的这段话也见之于伊萨普的书评。无论何种现实,它都不专由“事件”构成,尽管伊萨普显然认为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a historical fact)也许是封建制之下的一种土地制度的性质,一支军队的装备,一幢罗马别墅的结构,肺结核的死亡率,抑或是一大批不能被描述为事件的事物中的一种。所以,海澄·怀特和伊萨普所使用的“事实”术语,同我对之的使用方式并不一样。

286

就此意义而言,发掘事实乃是历史学家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本书认为,关键的步骤在于,当事实被用来服务于论点时,它们由此才成为证据。如果把怀特的用词换成我的用词,即他的“事件”变作我的“事实”,而他的“事实”变作我的“证据”,那么我将不会反驳伊索普同样认可的怀特的说法,即“我们只能认为事件是既定的(given),它们肯定不是历史学家所建构的”。我怀疑怀特继续

想在这段话里说的是,历史学家感兴趣的乃为对过去到底发生何事进行一个真实的描述,实际上他是在说历史学家感兴趣于对过去所发生之事进行一个令人信服的描述。例如,就目前的政治史而言,怀特(和伊萨普)也许把历史学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描述,看作是他们再现过去之实况的企图,其实我的看法是,对如此复杂又缠绕的事实之网进行描述,必定要包含着阐释(区分责任,联系原因与结果,等等)。

因此,在伊萨普认为的我之所言和我本人确实所言之间,存在真实的分歧。更为复杂的是,在他所认为的历史所是(过去事件的再现)和我认为的历史应该是(一种客观存在,其远比伊萨普所理解的要宽泛、正当)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鸿沟。然而,更为严重的是,伊萨普对我的捍卫资格与调解人身份加以不断的攻击,这种攻击似乎要有偏激的逻辑,因为其由枯燥、极端和泛化的陈述构成。比如,在一般意义上言,如果我说,历史学家不会在一种僵化、狭窄的典范中从事研究,我的意思是说,当然有一些最僵化的教条已经束缚了历史学家,可许多历史学家是在一系列松散与富有弹性的诸如有多种变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预设中从事研究,但是,库恩主义者的一种严格的典范观念,形塑了一个特殊的领域(比如,光学领域)中的所有研究,事实上,这个典范观念并不适用于历史学家之所为。伊萨普暗暗地用“典范”这个术语来描述经验主义认识论,然而,这并非库恩所说的典范的意思,如伊萨普应该已经知道的:库恩不否认一个化学反应的真实性,这与现在怀特承认“事件”的“既定的”本质,差不多半斤八两。

显然,伊萨普这样做了。当然,我意识到了这样一种事实,有大规模的关于这样问题的哲学争论:即是否我们能够证明,通过我们的意识,我们能体验到现实;是否我们能够证明世界的存在,存在之原因为何,等等。总而言之,没有人能在最根本之处及逻辑上证明



我们的确存在,同样,亦没有人能证明我们不存在。这里,伊萨普再次陷入后现代主义典型的自相矛盾中。如果他坚持,正如他感觉好像他主张的那样,“在事实与再现之间”存在一个“固有的、不可弥合的”鸿沟,那么他怎么敢再现我的文本之真实性的呢?并且他怎么敢预设他在这样的做法中就能保持客观公平或精确无误呢?伊萨普抱怨,我对后现代主义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他要求批评者“在他或她意欲攻击时,必须给予其所评论的观点以公平、准确且详尽的描述”,这与要求历史学家对过去要进行一个公平、准确而又详尽的描述有何不同?

伊萨普发现了我陈述中的错误:文本语言对诠释可能性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是由文本的原作者设定好的。这里要做几点说明。第一,通过把第106页上的这句话放入书中稍早直接相近的占两页篇幅的一段话中,伊萨普使之看上去好像我是在认为这里的局限是被文本作者有意设定的。并非如此,拙著接下来认为的是,作者在他或她的文本中也许包含了无意识的东西。再者,进一步说,他所谓的“闪烁其词的资格人”(dodgy qualifier) (“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它显而易见指的就是我,在外交文献(这正是所指那几页中正在讨论的主题)的案例中,曲解与模棱两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还是外交妥协的结果,可能为多种更深入的可能性阐释扫清道路(尽管这些阐释受到了文本语言的限制)。正如伊萨普明确暗示的,我最不想要讨论的是,只有作者的意图限制了阐释的多种可能性。其他相关的因素同样限制了阐释的多种可能性,作者的意图仅仅构建了其中之一种,虽然这些因素与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想让我们相信的远非漠不相关。进而言之,若是伊萨普要求对一个文本的阐释应该公平、准确并且详尽的话,那么他怎么能说,这些描述与作者书写文本时所使用的语言毫无瓜葛呢?

最后,当我第一次读到他的结论时(“尽管他的名字出现在封面

上,但是艾文斯并没有真正写下《捍卫历史》——相反,是英国实证主义传统的主导典范代他捉刀,因为他在字里行间中并没有做出重要的尝试去谋篇布局”),我开始还以为伊萨普正沉溺于一个罕见的后现代主义者自我模仿的时刻。但不是这样,他的意思的确如此。伊萨普通过声称他虽吹毛求疵,至少并非是恨乌及屋,去极力捍卫这种挑起争端的强调和别的评论。我猜测,严格来讲,确实如此,因为假设他认为我根本就没有写这本书,他怎么能够恨乌及屋呢?然而,这并不能补偿其对拙著内容的歪曲与误解。为了绕开那些关键论断,他集中于鸡毛蒜皮的小事以及无关痛痒的问题。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其立场的自相矛盾本质,如果我说他实际上也没有写这个评论,是后现代主义的教条借助其空白的心灵,毫无保留地呈现至其评论中,他可能也会拒绝这样的说法。

究竟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许多评论家会反对本书对此问题的述评,林·亨特在其书中抱怨:“后现代主义……既没有明确的定义,亦没有被认真对待。”在书中,通过列举被描述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多种不同立场,并使用她自己的独特定义来反驳它们,亨特坐实了其批评。她写道:“对历史学家而言,后现代主义一般来说意味着这样一种观点:历史学家不能洞穿语言给历史事实蒙上的面纱,换言之,历史学家仅能书写文学文本,而非真相。”广而言之,在总体上,这包含了一个对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攻击。

亨特抱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并没有在拙著中得到严肃对待。但亨特评论的问题在于,为了支持这个指控,她所提供的一切纯粹是没有根据的断言,她全然没有严肃对待拙著中的论断。因此她指责本书具有“逻辑上的矛盾、哲学分析上的薄弱,并没有抓住后现代主义的要旨”。然而同时,在拙著中所谓的逻辑上的矛盾以及哲学分析上的薄弱之处,她在整本书里都没有挑出一个简单的例子。她提供的

所见,是建立在误现(misrepresentation)的基础之上,仍然是一种缺乏根据的断言,而非以理服人。因之,就以其描述后现代主义关于时间的立场为例,她把其考虑为非决定性,然而却没有精确说明在哪个方面它们具有非决定性。她没有注意到这一事实:对后现代主义时间观立场的分析,实际已经终结,由于主张时间的确有一个前进的方向——这与后现代主义的时间观正相反,尽管在历史化的不同模式和不同领域内,历史的时间在不同的层次上,以不同的速度移动。

故此,透过援引的亨特对本书这些轻蔑的裁断,一言以蔽之,可以说亨特的评论本身就是“一堆混合物,用无根之谈代替事实分析”。但是,亨特的评论至少成功地避免了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自相矛盾。彼得·葛士在《伦敦书评》上提出的批评却大不相同。葛士对《捍卫历史》一书彻底误读,这在其一项声明中臻于极点,此声明认为,《捍卫历史》一书大而化之地把“后现代主义”建构成对真理和客观可能性存在的否认。要是他细心阅读过拙著的话,他就会发现——重复说一次——《捍卫历史》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方便的标签,来涵括这些多种多样的立场;进而,我一点也不含糊地在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之极端相对主义(拙著所反对的)与温和的后现代主义观(拙著整体上捍卫的)之间,进行了区分。

葛士宣称,称呼任何人为后现代主义者是不合理的,除非他们把自己描述成诸如此类的人,或者代表“一种众所周知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事业”工作。他断言,在历史中,不存在人们可以反抗的“自觉的现代主义传统”,言下之意是或许不存在诸如“后现代主义”这样的东西。若是我们坚持这个观点,我们将再也不能使用过去的人们自己也不使用的概念。这会让历史学家的工作彻底不可能。

然而,一方面,葛士试图主张不存在诸如后现代主义这样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在其一段评论中提到“聚合在后现代主义者标签之

下的各式各样的历史思考劳损过度”。在另一段话中他宣称：无论意味什么，“历史领域内的后现代主义都是没有谜底的斯芬克斯（sphinx）”。葛士批评我使用没有定义的标签，他自己恰恰也犯了同样的错误。鉴于这种种的矛盾，我们很难在葛士的批评中看到任何一以贯之的或者思路明晰的东西。

显然，一些历史著作被本书描绘为后现代取向，这可能不会为诸如它们的作者这样的人所接受。然而，在大约过去的20年内，历史研究领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诸如现代化理论这样宏大的、包罗万象的叙述已经解体，历史作为进步的思想也被抛弃。首先，革新来自历史学家书写边缘的、奇异的、个别的和小范围的历史。称呼这些现已终结的后设叙述（metanarratives）者为“现代主义者”，似乎是合情合理，因为这确实是许多后现代主义作者对历史的看法；称呼这种新发展为“后现代”，同样也是合情合理的，即便那些曾引领后现代主义与参与后现代主义的人根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把自己视为后现代主义者。

换言之，我知道奥兰多·费格斯就从来不愿意把自己描述成后现代主义者，因为他曾亲自告诉过我他不愿。可我也知道他的著作《一个民族的悲剧》（*A People's Tragedy*），几乎就是关于俄国革命和内战的自我意识到的一个文学叙述，把个体的故事（有一些是非常模糊的）编织在一起，形成更大的图景，避免那种20或30年前俄国革命史研究中普遍使用的社会经济和数据分析，这本书如果没有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以及宏大的后设叙述之衰落，它将不可能写就，哪怕作者仅仅是受到了间接的影响，而非受到直接的或个人的冲击。

如何给后现代主义下定义这一问题，当然不是本书业已解决的，或者说实际上这也并非我的初衷。指控本书最终没有给后现代主义下定义，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对比之下，伊萨普在《文本实

践》(*Textual Practice*)一书中,对本书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批评,即对诸如索绪尔这样的大思想家进行了错误的再现。也就是说,不像亨特,伊萨普实际上提供了他所谓的误现的例证。由是,举个例子来讲,他认为,本书在第95页说道,索绪尔的术语“能指”(the signified)意为一个词语所表达的东西,而事实上应该是指一种东西的涵义或概念。伊萨普振振有词:“此乃愚蠢可笑的错误。”我认为他言之有理。当伊萨普抱怨,本书在第159—160页上提到德里达“拒绝追求事情之起源和原因,并将这样的追求视作徒劳无功”,可此处没有注释。他在这里也是对的。我应该至少给个注释,或者给出扼要的分析来支撑这个论断。

实际上,伊萨普以此种方式在书中发现了真正的错误,而且是唯一这样做的批评者。然而,伊萨普在提到其他方面时,便不再鉴别真正的错误或疏漏,开始以偏概全,乃至最终完全误现本书的旨趣。这开始于他的抱怨,利奥塔“被作者用一句简单的话就打发了,而且这句话挺古怪,大意是说‘宰制叙述就是由掌权者所讲述的霸权故事’这句话”。实际上,在他质疑的那一页(p. 150)有关利奥塔的一共有九句话,而不是一句话,这九句话提及了利奥塔的观点,即苏联的历史编纂学是一种宰制叙述,理应受到地方性叙述的反驳(或者换句话说,不会遭到对等性的后设叙述的反驳)。这就是伊萨普所谓的古怪句子的上下文。他的误现还夹杂着对以下这个限定的有意忽略,亦即利奥塔“倾向于”说“宰制叙述就是由掌权者所讲述的霸权故事”(就是我用了斜体字的部分<sup>①</sup>)。说到这里,我的意思应该是很清楚了,利奥塔对后设叙述的定义远非仅限于此,还包含了“对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或者财富的创造”等等。尽管

293

① 原书用斜体字标明的地方,为醒目起见,中译文改为黑体标示。——译者注

如此,并非如伊萨普声言的,利奥塔所说的只是,宰制叙述是霸权性的。

294 这里的歪曲大概还算小的。伊萨普接着断言,本书宣称德里达写过语言之外无物存在,相反德里达实际上是说文本之外(extra-textual)无物存在,这就更是无稽之谈了。然而,本书的前一句话并没有被伊萨普所引用,其中明明白白表明,德里达认为“一切皆是‘话语’或‘文本’”。因此,该书毕竟说出了德里达的观点,即文本之外无物。由此推演出德里达主张的是语言之外别无一物,这似乎合情合理。同样,伊萨普还断言本书误解了德里达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可事实上,拙著并没有打算对德里达这一概念进行完整的描述,仅仅是说明了其中隐含的一层意思或者一个面向,即他批评历史学家为“逻各斯中心,即他们设想自己是作为理性的人,参与到一个发现的过程中的”。伊萨普并没有表明这是否为德里达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一部分。

在所有这些批评意见中,本书的缺憾之处在于,我对这些思想家仅是蜻蜓点水,事实上没有对他们的著作进行充分、周到的比较,但是已有别的评论家在这方面贡献了他们的真知灼见,令我难以望其项背。详细地讨论它们,将意味着写一本不同的书了。但是我承认,伊萨普提出这些批评,至少有一部分是正当的,这是其批评的价值所在。

然而,我们必须要继续追问,所有这些在实际上如何影响了本书的关键论断? 这里的答案一目了然,根本就毫无影响。伊萨普在他的评论中所说的,无非是采用一个敌对评论者手到擒来的策略:他把读者的注意力从本书的关键论断上转移到外围的一些细枝末节上的错误(对索绪尔、德里达和利奥塔的简单而又偶尔的提及),力图诋毁本书。伊萨普没有直接批判本书的论点,他一直在逃避和误现书中必不可缺的内容。这很快就使他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自

相矛盾之中。

伊萨普把《捍卫历史》对后现代主义者的立场描绘成一种“讽刺作品”(lampoon),谴责本书忽略基本的训诫:“批评的首要义务就是在他或她意欲批评时,必须对敌方论断先给予公平、准确且详尽的说明。”假设我们按照伊萨普的训诫来阅读其评论,那么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兹引伊萨普开头的两句为证:

《捍卫历史》旨在捍卫历史写作的主流观念,反对“智识领域的蛮族”(intellectual barbarians)(p. 8),也就是“符号语言学派、后结构主义学派、新历史主义学派、傅柯学派、拉康学派等各支进犯部落(p. 9)”。这种陈述是该书典型的腔调……

295

伊萨普通过简单的方法,即除去他所引用的句子中前三个字和后三个字,让人以为本书尽是见识浅陋而咄咄逼人的偏见。我把后面的句子加上去,便可看到原文的完整版:

历史学家应该更加有区别地对待符号语言学派、后结构主义学派、新历史主义学派、傅柯学派、拉康学派等各支进犯部落。有些乍看是敌人,其实何妨当作良师益友呢。

后现代主义者可能认为修改一个文本中的句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没啥大不了,但我却要较真。伊萨普的所为与他在评论中提出的处理文本的应然方式,真是大相径庭。

另外,我用“智识领域的蛮族”这个词显然是在说反话,而且毫无疑问地,我希望人们如此理解。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演化自一个军事比喻,而且实际上这个比喻手法滥觞于乔伊斯,他曾说道,在美

296 国,学院门墙的“战略高地”(commanding heights)业已“落入”(fallen)一伙后现代主义的“散兵游勇”(skirmishing bands)的手里。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凯斯·詹金斯在其书《为什么研究历史?》中对我使用的这个词进一步地曲解。他在书中第8页指出,“各种各样类型的史学家和理论家,包括后现代学者(就是理查德·艾文斯所说的凶残程度不一的‘蛮族’)”。詹金斯为反对我使用这个词,竟耗费了几页篇幅。詹金斯反诘,德里达真是一个蛮族吗?当然不是。毕竟,他能读懂“数种语言”(第97页)!詹金斯连连在这一点上打转,好像他对此发现洋洋得意。毕竟,他推论道,我使用“蛮族”这个词的事实,确切展示了我实际是多么的盲目无知和怀有成见!

我必须承认,当本书在经历审稿时,葛兰塔书店的编辑要求我删掉这个比喻,他认为有些人看到把后现代主义者比作“智识领域的蛮族”,或许会生气。我告诉他,我相信没有人会笨到这种程度,认为我是真的相信后现代主义者是“智识领域的蛮族”,遑论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自己,他们习惯于用反讽的方式阅读文本。他接受我的意见,我们将之保留了下来。我真大错特错了!

类似的反应以一种稍微温和的迹象在一些信件中呈现出来,这些批评本书导论的信件,刊登在1997年9月19日和26日的《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上。例如,约翰·阿诺德(John Arnold)声称,拙著认为后现代主义秉持“存在多个同样有效的真相”,这是错误的。他继续说道,相反,“真相(作为一种宰制性的和根本性的立场之宣示)本身是站不住脚的……所有的真相(truth是小写的‘t’)都是依仗情景而定的,具有政治性的,且易为人利用的。声称某事乃真实的就是试图把它置于讨论之外”。对我而言,这一论断似乎是矛盾重重。难道阿诺德在说根本不存在诸如真相这样的东西吗?或者他在说存在大写的真相和小写的真相?如果是后者,那么他肯定说的是,确确实实存在



多个同样有效的真相；如果是前者，那么他如何相信他自己所说的就是真实的呢？

第二，阿诺德指摘“艾文斯误解了‘文本’和‘话语’的观念”。297  
他似乎认为，我主张话语是关于真相的一个虚假影像（a false image）。然而，事实上，在他看来，话语就是真相，“或者至少接近我们曾经孜孜以求的真相”。他的论点已经充满了混乱。我猜想他试图表达的是，我们根本无法知道真相，一切皆是话语，因为一切都以语言为媒介。我认为这就是我在简要论述后现代主义者的见解后得出的结论，即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文本并不是一个可以使我们得以探知过去之真相的窗户，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文本就是过去的真相，因为他们所谓的过去已经不存在了。我不认为，我会给人以认同话语只是关于真相之虚假影像这种印象；如果阿诺德是从我的书中得出这一印象的话，那他就是误解我的意思了。

本书多处批驳了话语即真相之虚假影像的论断，其中有一句公认的非常赤裸裸的话，即奥斯维辛不是一种话语，把大屠杀视为一个文本，太大题小做。为了反驳我的观点，阿诺德指出，“毒气室是一种特定话语的物理表现形式和结果，这一话语呈现了一种犹太人、同性恋者、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人是次等人类的‘真相’（reality）”。然而，这给阿诺德的论断带来了更大的混乱。因为在这里，他再次提出了奥斯维辛和话语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是后者的产物；对于曾经在理论和实践上撰写过纳粹反犹主义著述的每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这都是完全无懈可击的观点，即便他们曾经使用的词是“意识形态”（ideology）而非“话语”（discourse）。但这是完全破坏了阿诺德较早之论断的一个观点——奥斯维辛本身是话语，因为我们仅能通过语言来认识它，就此而论，话语就是真相。在我看来，这个立场298要得到捍卫，殊非易事。我们可以赞同，由于纳粹的反犹主义话语，犹太人遭打、挨饿，并且被送往毒气室；可当有人试图告诉我们，犹

太人遭打、挨饿致死或者被毒死,也是一种“话语”,这完全不是一回事。

与阿诺德的观点一样,大卫·安德斯(David Andress)的主张也十分混乱,他提出,我没有理解有关真理和权力关系中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安德斯声称,真理是道德范畴,不是由其与真相之间的关系来定义。故此,汤普逊对后来的历史学家影响比艾尔顿大得多,不是因为汤普逊更好地掌握事实,而是因为汤普逊在道德意义上得出的关于英国过去的观点比艾尔顿的更吸引人。正如后来证明的,汤普逊获得了成功,因为他的真相在道德上无疑要比艾尔顿的高出一筹。安德斯得出的此种观点回应了以下论断:即一种特殊的历史著作或历史观点的影响力,并非由于作者拥有的体制内权力之作用,这与诸如凯斯·詹京斯这样的作者所声称的正好相反。因之,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取得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尽管其作者从来都不是大学历史系中的一员。然而艾尔顿的《都铎王朝的政府变革》却备受争议,即便艾尔顿在学院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该书从未被历史学家充分接纳。安德斯认为,是道德的而非体制内权力,让历史论断具有影响力,进而使他们获得了“真理”的地位。故此,在根本上,真理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作用,这与《捍卫历史》中极力声明的正好相反。

299 安德斯的观点既令人感兴趣,也富有睿智,促使我思考,我应该把我的论点稍做调整。因为如果有人仔细思考,汤普逊著作中的关键历史论点——英国工人阶级是在1832年被“造就”的——的认可程度,甚至不及艾尔顿著作中的关键历史论点——在亨利七世统治时期首席国务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的治理下,出现了政府和行政的变革。检视之后的研究专著、论文和教科书,将表明:很少有任何一种历史学家把汤普逊的关键论点纳入到他们的著作中,但至少有史家接纳了艾尔顿的关键论点。二者影响力之差异更多地在于他

们对历史研究采用的方法和取径,在这里汤普逊的影响力无可匹敌,其著作被广为效仿,而艾尔顿的却没有多少。艾尔顿并没有从近代早期史中的一波研究行政和政府的潮流开始,他的研究方法与取径仅仅为他自己少数几个博士生沿袭。汤普逊激起整整一代社会历史学家,去研究工人阶级史相关的各种主题。当从这个观点看时,安德斯是正确的:汤普逊之所以有影响,是因为他的观点与1960年代和1970年代较为年轻的一代社会历史学家更为合拍。

不过,这与真理,或者与两位历史学家对他们正在研究的历史主体和事件所提出的阐释,没有多大关系。故而,安德斯是错误的,他说汤普逊的影响更大,在于他讲述的故事在道德意义上,足以吸引更多的人,让他们认为这故事是真相。汤普逊之所以具有影响力,是因为甚至是历史学家都认为,汤普逊没有展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英国平民和工人阶级的社会与政治的真实图景,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认为汤普逊采用的取径,将会使他们对其选择的、值得研究的(通常是非常小的)历史课题,可以提供展现其真实图景的他山之石。

300

因之,安德斯提出的论断绝不足以支持一种如其主张的(历史……是在语言中的运作,因为它仅能做到的)极端相对论的真理概念。安德斯接受了这种令人担忧的反智立场(anti-intellectual position),即“一个观点背后集结的诸种事实,由于遭到‘我不相信你’,或者‘我不在乎’的回答,而变得毫不相干了”。他说,导致奥斯维辛的这种反犹主义已经死亡了,这不是因为它被揭示是不正确的(untrue),而是因为“我们身处真理统治(truth-regime)之下,那些‘事实’背后的价值观已经被丢弃了”。如果他确实相信理性的论断与此漠不相关,那么他在大学中任教干什么?如果有人告诉他,他或她不接受一种观点,他(她)为何不挑战它,用理性证明其是错误的呢?难道他(她)真的想居在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支持

观点的论据纯属子虚乌有,而倡言背后的道德(或非道德)力量操控一切?确定,一个知识分子或学者的责任,就是与盲目的成见——安德斯非常消极的认为这是无法消除的——作斗争,而非向其屈膝投降。与他所认为的相反,有很多的证据表明,真理终究会获胜,因为它是真理;反犹主义不再被广泛接受,因为它被人们视为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安德斯以一种激动人心的方式重组了权力和知识之间关系的问题,继而他提出了答案,把整个问题化约至最基本的水准,就是“权力即正义”(might is right)。

阿诺德和安德斯攻击说,我论断中的某些方面是所谓的建立在误解后现代主义概念之上的,而威廉·科南(William Keenan)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上亦撰文说,我把后现代主义形容为一个“讽刺画”(caricature)。在一封相当具有火药味的信中,科南批评我“明显无视”这个事实,亦即:我写的一切纯属断言,或者是个人意见,并不是一个客观真理。科南承认他自己的观点也仅是个人意见,接着他问道,在这么一种状况下,我们该如何在各个主张之间作出裁断呢?对此,科南别无良策,他用类似臆想症的断言搪塞,声言对后现代主义者的相对主义的任何批评,均是一种消极的墨守成规的明证,而且也是如我之辈决心“清除学院内异见”的写照。

不幸的是,科南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我对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论之阐述属于他所说的那种“讽刺画”。虽然他极力主张就此话题进行“公开讨论”,但为了评估对立的观点,如果不存在客观的、睥睨四方的证据准则,或者我们可以诉诸的理性,科南根本说不出这是如何发生的。事实上,科南所使用的语言表明,他其实相信对一个论点可以提出一个完整、客观与公平的描述(推测起来应该是讽刺画的对立面),在此基础之上,一个合情合理的争论的确能够发生的。否则,既然他相信一切尽与权力相关,既然他自己为了抵制他所激烈反对的现代主义观点而强词夺理,那么他为何还要对人们杯

葛后现代主义而耿耿于怀呢？这种立场使得科南对任何道德力量的抱怨尽失所依。

#### 四

除了误解或误现后现代主义理论外，一些批评《捍卫历史》的人，指责本书在批评其他人的著作时也有失公允。比如，不少评论者，如约翰·查姆雷与罗纳德·胡顿虽然不一定要捍卫后现代主义，但也认为，凯斯·詹京斯敌视学院里的传统历史学，被《捍卫历史》归咎于他本人未获大学教职的事实。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本书没有说詹京斯之所以持有后现代立场是由于他没有在大学任教。只是说，詹京斯认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之所以持有那些观点，是因为他们在有数百万英镑拨款的大学任教，如果我们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自然会得出上述这种结论。我实际上要用这个例子证明，后现代主义者的论断是多么不公平和简单化。况且，本书也指出了，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在一些著名大学都占据了重要职位。

302

至少詹京斯并没有抱怨我对他不公，最擅长抱怨个人遭受不公待遇的是帕基丝。《捍卫历史》仅仅对她的《历史上的女巫》一书进行了简短的批评，她居然写了两大篇反驳文章，发表在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London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的“历史评论”(Reviews in History)网站上，以反驳《捍卫历史》中对该书简短的批评。帕基丝在文章开始就指控我误引了她的书，声称我没有阅读其著就对之评头论足，或者另一种可能是，我虽然读了，但并没有详细读(这两个指控是互相矛盾的，这似乎没有让她想到——或者，这仅为一个并不打算被严肃看待的修辞上的夸张?)。帕基丝断言我误读该书，且把这当作支持她以下观点的证据：“去读书上有的那些话，只是这些话，不添油加醋，也不偷工减料，只是去读”，但这

样的要求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许多情况下，没有谁能够做到”。假如有人倾向于赞同帕基斯的这一观点，当然会发现她提供了多么令人震惊的证据。

让我们从这个相当微不足道的小例子开始。帕基丝指控：我在《捍卫历史》的第4页上，把一个未具名的“捍卫历史的保守主义者”的观点误归到她的名下。然而，当我们检视《历史上的女巫》的第69页，即那段有问题的话的出处，我们会发现什么？在这段末尾，帕基丝攻击男性历史学家对女权主义及社会性别理论缺乏兴趣，她总结说，通过拒绝接受它，并视其对他们的研究工作无所助益，这些男性史家逃避了这样的理论对真相的伸张(truth-claims)。接下来是这个句子：“后结构主义扬言要让历史学家失业的事实，也没有改变上述情况的真实性。”这个观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的人，基于这里既没有引文的标记，也没有给读者提供注释——不指向身为作者的帕基丝，而是另有其人。

自然而然，引出了另一句话，此语如下：“虽然一些历史学家(帕基丝这里把‘historians’写作‘historinas’，作者注)确实提出别的一些反驳，这些反驳通常是建立在对他们所驳斥的东西之相当容易理解的误读基础上，再次显示了某种程度的解释上的草率。”这段话的注释，像在帕基丝这个文本里的前一个注释一样，引的是阿普尔比、林·亨特和雅各布的《讲述有关历史的真相》(这本书由三个历史学家所写，或许我们应该称她们为“historinas”，她们可不能被指控为对过去采取保守的研究取径，或被指控为对女权主义及社会性别理论缺乏兴趣，或被指控为男性吧)。但这个后结构主义扬言要让历史学家失业的观点，根本就不是在她们三个的书里提出的，就我所知，也不是任何别的书提出的，只有在《历史上的女巫》中提出过。除此之外，凯斯·温舒托尔(Keith Windschuttle)极度杞人忧天式的著作《谋杀历史：一门学科是如何被文学评论家与社会理论家杀害的》

(*The Killing of History: How a Discipline is being Murdered by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在《历史上的女巫》中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被引用, 因而推测起来, 帕基丝在写《历史上的女巫》之时, 还没有读到温舒托尔的书。帕基丝在她自己的书里没有说及这些: 捍卫历史的保守主义者好像经常听起来相信后结构主义将会让他们失去工作。正被讨论的这句话毫不含糊地就是她自己的, 实际上帕基丝在她那篇网上“回应”中之宣示, 将会是非常“妙绝的”, 若是她的确说过后结构主义威胁要让历史学家失业的话, 而这也不会阻止她后来在“回应”中重复此观点, 这里她评论道: “任何在我工作中与艾文斯所做声明有雷同之处, 纯属巧合, 当然, 这样一个巧合肯定会对这个保守的辩论机器 (conservative argufying machine) 有利, 否则我想, 过多巧合势必会互相亲近。”

304

这导向帕基丝的“回应”中一个更为宽泛的假定, 反映了她书中存在的一个更为普遍的偏见, 即《捍卫历史》是一个“保守的辩论机器”的一部分, 意味着, 我本人也属于一个较大的“捍卫历史的保守主义者”群体。既然帕基丝从来没有确切解释此处的“保守主义者”所指为何, 就很难去反驳她的这个指控。然而, 如果她重读了《捍卫历史》这本书, 她将会发现它所维护的是一种广泛的研究取径, 恰如“跋”中先前申明的, 这些取径包括社会史、文化史、女权扩张史, 以及所有近来其他的新方法, 这些都是为像希摩法、艾尔顿、约翰·凯尼恩这样真正的“捍卫历史的保守主义者”所深恶痛绝的, 进而, 毫无疑问地, 拙著的那些年轻又抱残守缺的评论家会认为我对所有的历史学家未能一视同仁。本书认为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黑人与其他激进的历史, 都需要一个真实和客观性的概念, 恰如别的种类的历史同样需要一样, 在原则上我没有说什么话反对它们, 正好相反, 我愿意为它们正名。本书也指出, 一旦你开启了相对主义之门, 不仅保守主义者, 而且法西斯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同样能由此

305

门进出。本书的美国版就提供了新的证据,证明了至少一些后现代主义作者对于历史的保守主义倾向(特别是大卫·哈兰在他的《美国历史学之堕落》[*The Degrad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一书中,呼吁一个更积极的、更爱国的看待美国过去的方法,以把美国的过去从太过严格的现代主义观点下解救出来)。认为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都是激进的,以及认为只要谁批评它们,那此君就是保守的,这样的观点是无稽之谈。此观点没有经过特别的深思熟虑,由詹京斯在其《为什么研究历史?》一书中揭橥,该书中有一整章都是在颂扬大卫·哈兰的作品。

可以读出帕基丝的弦外之音,她也想当然地认为我把女权主义者及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当作“聚众闹事的暴民”(rabble)。我哪里说过这样的话?这完全是信口雌黄。或许帕基丝关注过我在1970和1980年代早期所写的关于女权主义历史的书籍、文章与评论,或者注意过我在近著《报答的仪式》(*Rituals of Retribution*)和《来自德国黑社会的故事》(*Tales from the German Underworld*)之中密切注意和一再关注作为一个社会建构的性别(gender)。或者,进一步说,在《捍卫历史》中对像约翰·文森特这样的历史学家提出的批评,因为文森特近来曾经声称历史就是关于富人与权贵的,“历史骨子里是男性的”。我所反对的不是女权主义史学——这种历史越多越好——而是那种粗糙和明目张胆的性别主义,犹如帕基丝在其《历史上的女巫》一书与其“回应”文中所展现出来的。在“回应”文中,她坚持用“男人”(man)称呼我,背离常规地把研究巫术的历史学家称为“绅士”(gentlemen),她说我认为历史学家应该用“很男人的方式”(manly fashion)辩论,并指控“学院里的历史学家”“严厉打击一个女历史学家(亦即玛格丽特·穆瑞[Margaret Murray],就因为她不知何故地太贴近女巫的形象)”,进一步她认为我主张:“男性历史学家注意植根于理性之上,把女性特质看作问题多多而又不成熟,从



而加以否定。”她继续断言说凯斯·托马斯与阿兰·麦法兰(Alan Macfarlane)——这两个深具影响力的巫术史家,不知不觉地在试图“借用女巫的形象通过男性化的术语来解释历史”。

要意识到这些声明中的大男子主义程度为何,你将不得不颠倒一下这种社会性别的安排。如果帕基丝认为用这些术语来书写男性历史学家是合理的话,那么她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异议?在她面对一个男性历史学家时,该史家坚持指出他不赞成的人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作为这样的学院派“女士”(ladies)中的一员,他指控她想用“很女人”的方式(‘womanly’ fashion)来说服他。不管那将可能是什么,是谁反对她“严厉打击一个男性历史学家,就因为不知何故他太偏离女巫的形象”?是谁提出相似的反对——即关于女性历史学家试图借用女巫的形象通过女性化的术语来解释历史?她都将会不期而遇地发现这样的观点是充满大男子主义与令人不快的。

或者,再次拿帕基丝这本书说事儿。对男性历史学家来说,假若他们把男性认同“植根于”过去的女人是软弱可欺的历史神话中,这样是错误的话,那么对女性历史学家来说,为什么她们把女性认同“植根于”过去的女性是伶牙俐齿的历史神话中,不是在犯同样的错误?再次,这里的关键是:此类论断导致了两败俱伤。如果一个反女权主义者想使用这种性别主义的政治陈述去攻击帕基丝的作品,如果历史研究的说服力不仰仗该论断契合证据的程度,而是依赖其背后的政治与道德预设,那么她在面对批评者之时,将会无力进行自我辩护。例如,帕基丝反对以下这个事实,即托马斯使用女巫的形象作为其学术认同的基石,那么她又有什么理由反对这个观点,亦即:她自己不同样也是在用女巫的形象作为其学术认同的基石吗?

帕基丝暗示我把她描述为歇斯底里的后现代主义者,若是我把其论断描述为歇斯底里的,或者想象她是歇斯底里的——正如她想

象凯斯·托马斯与阿兰·麦法兰那样,那她将感觉如何呢?是“眼泪汪汪地”回应或是“发狂似的喋喋不休地”回应?再一次强调,我没有把“后现代主义”这个标签当作一个谴责性的术语使用,只是把其看成是一个有用的描述,它涵盖了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之一部分,而我把这些形式归因于积极和富有成效的思想发展之结果。我亦同样高兴称帕基丝为一个后结构主义者——这是一个她看起来会赞同的称呼,这也较易为其接受。

遵循帕基丝自己在《历史上的女巫》中的方法,这意味着我要将该书置于在事实与虚构之间无法做出区分这样一个取径所处的语境中,或者将其置于另一种取径中——再现的不同形式。比如,我在此处(第99页)所提到的“那些女巫自身”(the witches themselves)——一个为帕基丝所反对的术语,我不得不解释我之所指是生活在过去的实际存在的人们——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这些人被指控有施巫之罪,出现在法庭上及其他历史记载中。我接着想,在这些人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他们的确在过去存在过——而且有一些人物在文学、诗歌和其他虚构的再现中公开露过脸,但一些人并没有存在过。然而,我不会去说,也从来没有说过,研究后者或者甚至等量齐观地研究那些真实的人与虚构的人(实际上,我在我自己的《来自德国黑社会的故事》一书里已经如此做了),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

这便使我们谈到凯斯·托马斯的《宗教与巫术的衰落》这本书。与帕基丝的声明相反,我在拙著中没有接受托马斯对近代早期英国巫术的解释,无论如何我也不会说《宗教与巫术的衰落》是关于该主题的“登峰造极之作”(last word)(事实上,现在就有一个上乘之作的例证,该作即克拉克[Stuart Clark]的《与神灵一起思考》[*Thinking with Demons*]),其书对巫术这个主体明确地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取径,虽然它并未能成功避免后结构主义理论中的内在矛盾,但仍然

提供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说明后结构主义理论是如何对一个老课题注入新生命的)。帕基丝认为凯斯·托马斯与阿兰·麦法兰把他们的研究建立在“误读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因此他们错了。这是惊人的粗暴和不分青红皂白。与之类似的还有帕基丝的这个指控,即她指控他们把过去的女人描绘得弱小,其用心在于“授权”给当下之男人。他们为证实近代早期社会中年龄较大之寡妇的弱者地位,使用了大量证据;除此之外,还存在整个的女权主义历史书写文类,都强调了女性不得不遭受的成年累月的压迫与不公,这些文类都把女性描述为受害者。

帕基丝指控托马斯只用出版过的材料,“没有小心翼翼或认真地仔细阅读这些材料”,“经常把文学材料与审讯记录没有仔细区分就加以使用”。事实上,在大量档案以及小册子与出版的文学作品基础上,托马斯该书使用了很多手抄本的材料。帕基丝指控我没有阅读这类文献,这是真的,因为我不是一个研究17世纪英国巫术史的专家。要求一本书的批评者或评论家在置喙前必须先去检视该书仰赖的所有证据,这会让原作者之外的所有人都丧失评论的资格。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合理地转败为胜,质问帕基丝:托马斯所使用之证据你曾看过多少?这是不容易得到解答的,因为她不愿自寻烦恼在书中提供她的参考书目。即或如此,通览《历史上的女巫》第三章(“由历史学家处理的女巫——一个偏见与恐惧的故事”),总共80条注释中有7条注释,揭载了其所使用的印刷史料的参考书目,可以列出来的总数只有七本。注释及别的章节举引了少量的手抄本材料,但帕基丝该书几乎完全依靠的是印刷史料。它没有引用哪怕是托马斯引用过的一点点原始资料。帕基丝在其书里说她读到的材料超过她所引用的,尽管是这样,她在其书第三章对托马斯的批评也没有建立在一个可以理解的将心比心基础之上——托马斯之立论依据其所使用之材料,故而帕基丝对我的攻击也没有这样

做,没有根据我对托马斯的《宗教与巫术的衰落》所进行的讨论,退一步说,如此做法肯定显得不够厚道。

不管怎样,帕基丝和我对其著的讨论之间存在的真正争吵,不是与巫术研究的历史编纂学相关,需要再次申明的,而是同后现代主义及“否认大屠杀”有关。帕基丝相当正确地指出,那些大屠杀的否认者声言他们正在讲述真相,而且在大体上并不使用后结构主义的相对主义之概念工具(*conceptual apparatus*)。在其书《历史上的女巫》第70页的这个具有争议性的关键段落里:

历史学家喜欢指出解构在美国的第一个支持者于二次大战期间是个纳粹的同情者和反犹主义者,这显示了解构对传统历史学之挑战所造成的可怕政治后果(*dire political consequences*)。但在那个个案上,传统的实证史学一定也有可怕的暗示(*dire implications*),因为许多新纳粹历史学家采用了尽可能的最保守之发现、揭示与陈述真相的心机。在主张真相的不确定性观念可以用来反对大屠杀否认者自称的确定性方面,该方案可能同样有效。这些否认者预想:关于大屠杀的“真相”无所事事,等着在一个历史的文本中被“发现”和表述;这个“真相”也与作为话语的大屠杀幸存者之证词形成一个最大可能的对比,这证实了再现大屠杀这个事件的终极“真相”之不可能。

310

在她的“回应”中,帕基丝选择性地对她书中的这段话进行举引,再一次使它看起来好像是帕基丝这里把它当作自己的观点提出的,实际这是她对其他人观点的综合。通过有意忽略以上这段话中的第二个句子,她达到了这个意图。假如读者想去查寻拙著中讨论此观点的这段话,他们将发现不是在第140—141页——帕基丝指出的地

方(此处主要是对后现代时间概念的讨论),而是在第 241—242 页。尽管如此,她的确准确地引用了这句话,而且我愿意承认我应该写“可怕的暗示”(dire implications)而不是“可怕的后果”(dire consequences),虽然错写了,但其意义与效果则是相同的。《历史上的女巫》这段话的问题在于,它非常果敢地判定:我们不能在真正的历史学家所用之方法与大屠杀否认者所用之方法之间进行区分,因为两者都以历史真相的追求者之面目出现,都在使用传统的历史研究工具去达到这个效果。不管他们确实是在追求真相,或者他们都在提出伪装成真相的政治论断,两个案例在效果上是旗鼓相当的。

这个论断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大屠杀的否认者并非在从事追求真相的工作,而是在操弄和伪造历史记录以服务于其政治意图。不管他们是否的确相信他们正在追求历史真相,这样一个问题必须依靠关于他们自己心理状态的推测才能被回答,但他们对待史实的方式强烈显示出:他们的弄虚作假是有意识的和存心的。这绝非真正的历史学家之所为。

然而,帕基丝似乎没有掌握这个区别,她在《历史上的女巫》第 311 70—71 页继续说道:

仔细地阅读文本,尤其是仔细地阅读故事,这与大屠杀研究息息相关。详细地阅读并充分注意文本性(textuality),这需要不纠缠于一个固定的或玩世不恭的怀疑论立场,如此细心的阅读意味着(signify)对那些独特的和不断变化的人性之故事(moving humanity of stories)的正当尊重(proper respect)。

为什么不正当尊重大屠杀的劫后余生者讲述的真相?为什么那些故事作为独特而又不断变化的人性如此重要,难道它们真实与否仅

是这样一个次等重要的事情，甚至都不必有提及它们的正当性吗？为什么细心的阅读只是“意味着”尊重而不是有助于我们决定真相，或者决定文本包含的另外之再现？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辩解，即在书写关于大屠杀的历史之时，“真相的不确定性观念”的有效性，这两个句子的确证实了我书中那个说法（在帕基丝的“回应”里，此说法被她描述为：“甚至都不是一个合理的推论”）的合法性，也就是：帕基丝说我们只管去讲述关于大屠杀的故事，而不必杞人忧天地关心这些故事是否属实。

我们质问帕基丝：究竟什么是这些事件中的真相？帕基丝会说：“我们从来不知道”关于大屠杀的“整个的或绝对的真相”，“因为此真相将会超出我们中的任何一人所能承受之程度”。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相，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不能承受它？继续追问她的这个论断，帕基丝不仅让她自己陷入矛盾中，而且还会把一整套我从来没有提出过的主张归到我名下。比如，就像帕基丝所指控，我的书“将大屠杀与巫术审判一锅煮，忽视了每个事件的历史独特性”，这样的指控与我的书风马牛不相及，我看不到书中任何地方有可以支持这个荒诞指控的证据。

312 可是，更重要的，谈到了这个要点，似乎真正激怒了帕基丝，我可从来没有暗示或明示过，把她及任何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或后结构主义者等同于大屠杀的否认者。我之所言是——重复黛博拉·利普塞特在其《否认大屠杀：对真相与记忆与日俱增的攻击》中提出的观点——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相对主义怂恿对否认大屠杀行为的容忍，因为此主义拒绝以下这个理念：我们能从虚构中分辨出真相，从弄虚作假中分辨出解释。帕基丝自己的论断就是这方面的事证。当然，他们自己并不需要为否认大屠杀负责，恰如后现代主义者也不必为否认大屠杀负责一样。在哪里我也没有说过这话，这样一个声明是荒唐可笑的。我不“难受”（如帕基丝宣称的），因为后现代主

义认识论正在威胁要把我和我的“党羽”(party)(我并未意识到我还有党羽——或许帕基丝将愿意提供给我其中一些人的名字?)和那些否认大屠杀的人归到一起。相反地,我认为极端的历史相对主义信奉的这个理念——关于历史的真相从来都不可能被发现,使得它不可能去驳斥大屠杀的否认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自己会与这些观念存在交易,这也是我从来没有宣告过的说法。我没有说过,亦没有想过:帕基丝本人是“大屠杀否认者造成的威胁之一部分”。是她自己声称我曾说过的,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情。

当然,帕基丝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大屠杀或其他任何事情的“完整或绝对的真相”,这是对的。我在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中试图表达这种信仰,只是大多数人都误解了这句话。我们永远不会获得完整或绝对的真相,我们在追寻关于过去的真相中会犯错,关于任何历史主体我们总是会有新的东西要说,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根本不存在真相这种东西。正如苏珊·海克以一种类似的方式所指出的(TLS, 9 July 1999):被接纳为真实的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真相这个概念本身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帕基丝主张“反对‘一个真相’”,并赞成存在“局部的与独特的”“多个真相”。然而,仅以她的“回应”为证,我们根本看不出两者的差别。苏珊·海克指出,被接纳为真实的东西与视角有关,可是真相却与后者无关;“一个陈述,当且仅当它如其所是地呈现它要呈现的事物时,才是真实的。”故此,不可能存在彼此冲突的真相——虽然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尽管事实上如苏珊·海克已经注意到的,“彼此冲突的”意味着“不可能同时为真”),我没有发现帕基丝在其“回应”里采取这个立场。所以,如果她所谓的“局部的与独特的各种真相”都可以和其他那些真相共存,那么它们是真的,它们是一个真相的不同方面,而且帕基丝相信存在一个唯一的真相。

毫无疑问,如海克所言,“每个相信某样事物的人……内心一定承认……存在真相这样一个东西”,因此,当帕基斯和其他批判本书的作者,攻击本书中那些他们认为是错误或虚假的部分时,我备受鼓舞地看到他们是承认有真相存在的,尽管他们的大部分攻击都是无的放矢的。帕基斯一杆子打倒了一大批对巫术的表述,并指责它们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任由空想代替了严谨的研读”,如此一来,她完全可以说,这表明她相信有真相,尽管她在该段话的前半部分还在主张“反对‘一个真相’”。她形容道,“空想”,因此,不是“局部和特殊的”真相,而是虚假。每个人都认为,“严谨的研读”能带出真相而不是空想或虚假。所以,到此为止,天下太平。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314 但是,她也说了,“企图发现‘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注定无望的”。她在自己著作的第3页上说道,诸如英国猎巫潮兴衰的原因等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并且“我不会试图回答令当下许多人执念甚重的经验主义问题”(见第4页)。我们显然要问的是,如果猎巫兴衰的原因是无法回答的,那么关于文本意义的追问为什么又是有答案可寻的呢?如果试图发现真实发生过的事是注定无望的,那么为什么试图发现《宗教与巫术的衰落》这样文本的真正含义就是可以企及的呢?正如我注意到的,帕基斯在原则上的确退而承认了这一点,不过我怀疑,在实践中,当涉及到她的著作提出并解答的问题时,她是否也会坦然接受。

帕基斯反对“把完全不同的材料塞到一个巨大而普遍的假设里的做法”,但是她本人的女性主义取径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前近代妇女通过幻想自己是女巫而使自己获得力量(允许我说明的是,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且值得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或者更宽泛地说,她的大致研究取径是建立在一套更庞大且更普遍的假设之上,即性别关系在过去与当下具有的推动权力(power-driven)



之性质。这一切都伴随着她对历史学家和历史学专业的不断攻击：没有严谨地阅读材料，没有注意到文献的修辞性内容，天真地“把每一个文本都当作一扇透明的窗户，以为能够透过它们看清作者的思想或当时整个社会的心态”（见第71页）。这些攻击都找错对象了，不过没人能够反驳这些建议的睿智。帕基斯又回过头来敦促历史学家更加留意文献的文体和内容、写作动机（如果我们可以发现的话）、作者、受众等等。谁还能不同意这一点呢？

从布雷到帕基斯等人对本书的各种层出不穷的误读、误解和误述，在在显示了，诚如帕基斯自己在“回应”中注意到的，“我们所有人对意义的驾驭能力没有想象的那样大”。在批评我未能准确阅读她自己的作品的同时，她又退回来讲，只要写出一些能够被人准确阅读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驾驭我们自己生产的文本的意义。如果这番话的意思不是指，我们是真心实意地写下一句话的，而读者在准确阅读后就能发现这一点，那么它也不会有什么别的意思了。 315

帕基斯说“意义的生发，完全（quite）是独立于意图的”，但这种说法太缺乏限定、太极端了。意义的生发不是全然（entirely）独立于意图的，否则的话，帕基斯也不必批评我对她作品的意义的阅读了。意义与意图间确实存在某种（some）关系，尽管这并不一定是唯一且直接的（这些都是我在《捍卫历史》一书中说过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次的辩论证明了以上评论所言非虚。在一些情况下，我的表述的确容易引起误解，这可能是因为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完全说清楚（比如，对客观性的定义），或者是我的表达太拙劣。但在其他情况下，我想我是无端受辱，因为无论是保守的还是后现代的批评者，都只是草率地阅读我的文本，从中发现他们需要发现的东西，而罔顾我做出的所有微妙区分和限定条件，试看一下他们对我的攻击就清楚了。在更多的情况下，那些人是刻意地歪曲和操弄我在书中所表

达的意思。而且,在一些情况下,批评我的人是在添油加醋。

316 我承认,本书收到的这些五花八门且完全自相矛盾的回应把我吓住了。我从未想到一本书可以被阅读或误读出这么多种样貌。不过,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刺激辩论,而绝不是终结讨论(这样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也是办不到的)。那些指责本书没有挑战主要的后现代思想家的人正确而有些画蛇添足地指出,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不可能在两三百页的篇幅里得到解决。所以,必须让辩论继续下去。

## 进阶阅读书目

思考诸如客观性、因果关系和个体在历史中的角色这类问题的经典入门书,当属卡尔的《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 London, 1961),该书在卡尔去世后重版,卡尔的合作者——苏联史专家戴维斯(R. W. Davies)根据卡尔为该书修订二版所作的笔记,整理出卡尔的一些再思考,并加进1987年的新版中。卡尔在1982年去世之前,业已完成这个计划好的序言,戴维斯教授亦将该序言与他对卡尔笔记的评论一起付梓。这个新材料是有趣的读物。比如,卡尔明显打算处理结构主义语言学引发的对历史的挑战,可惜死亡阻止了他处理这个问题。卡尔自己的历史作品《苏俄史》(*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14 vols, London, 1950-1978),值得我们去读,以发现他是如何践履其观点的。他的《从列宁到斯大林时代的俄国革命,1917—1929》(*The Russian Revolution from Lenin to Stalin 1917-1929*, London, 1979)一书,是方便的一卷概览。诺曼·斯通(Norman Stone)《恐怖的名家》('Grim Eminenc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0 January [1983], p. 982)一文,对卡尔本人及其作为史家的身份,进行了臭名昭著的摧毁工作。

卡尔主要的保守主义批评者乃是艾尔顿(G. R. Elton),在其《史学实践》(*The Practice of History*, Sydney, 1967)一书中,他非常

痛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不仅有力捍卫了新兰克学派(neo-Rankean)的历史观——其在本质上是根源于材料而非理论及历史学家的思想,而且还对历史研究实践、书写与教学实践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线索。艾尔顿作为实证史家的品质,可以通过他的第一本书《都铎王朝的政府变革》(*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hanges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Cambridge, 1953)来目睹。他在该书中的观点受到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与佩里·威廉姆斯(Perry Williams)、哈里斯(G. L. Harriss)有力的批评。这些文章是:斯通的《过去和现在》(*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London, 1981,该书后来又增加了新的材料,以《修订版过去和现在》[*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问世,涵盖了一些优秀的、极具有可读性的评论文章,主要讨论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作品)一书,以及佩里·威廉姆斯、哈里斯的《都铎史中的一次革命?》(‘A Revolution in Tudor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25 [1963], pp. 3-58)一文。

对那些想更多地了解关于一门学科的史学史的读者来说,这也(主要是附带地)展示在卡尔与艾尔顿著作中,最好的导读是一个选集《历史之多样性:从伏尔泰到当下》(*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Cleveland, Ohio, 1956)——收录伏尔泰以来的史家所发表的对理论的看法,由弗瑞兹·斯坦因(Fritz Stern)编辑出版。对那些想找一个史学史提纲的读者来说,恩斯特·布瑞萨契(Ernst Breisach)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历史学》(*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2nd edn., Chicago, 1994)一书,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但不可避免是简单和有选择性的介绍。在乔治·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的《欧洲史学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London, 1985)一书里<sup>①</sup>,有关德国社会史的部

---

① 该书曾有华夏出版社的中译本。——译者注

分特别有用。对近来德国历史学较具批判性的叙述,可参看拙著《重读德国史》(*Rereading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97)。通过爱德华·穆尔(Edward Muir)和奎多·鲁杰若(Guido Ruggiero)合编的《微观史学与遗失的欧洲民族》(*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s of Europe*, Baltimore, 1991),我们可以最好地认识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家(microhistorians)。

关于美国社会史不断变化的状况及其前景,由彼得·斯特恩(Peter N. Stearns)的以下三篇文章可以窥豹一斑:Peter N. Stearns, 'Some Comments on Social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1 (1966-1967), pp. 3-6; 'Coming of Ag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10 (1976/7), pp. 246-255; 'Social History Update: Encountering Postmodernism',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23 (1989/9), pp. 176-187。

哈维·凯耶(Harvey J. Kaye)的《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350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Cambridge, 1984)一书,是一个有用且具有了解之同情的介绍,涉及了这个社群中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包括汤普逊(E. P. Thompson)、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希尔(Christopher Hill)。还有一本由亨利·阿比拉夫(Henry Abelove)等人编辑的一本启蒙性的对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家及别的左翼史家所作访谈的汇集——《历史之视野》(*Visions of History*, New York, 1978),由那个名称古怪的中大西洋激进历史学家组织(Mid-Atlantic Radical Historians' Organization)出版,最初发表在该组织之杂志《激进史学》(*Radical History*)上。大致而言,现代非马克思主义的英国社会史研究之出现,其先兆是《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966年4月7日的一个特殊专题,其中凯斯·托马斯(Keith Thomas)的贡献可能最引人注目。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

ciety') 刊在《代达罗斯》(*Daedalus*, No. 100 [1971], pp. 20 - 45)。<sup>①</sup> 此文是社会史家对当时他们所感受到之乐观主义的一个典型描述。狄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的《社会史与总体史》('Social History and Total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10 [1976], pp. 237 - 245), 此文出自一位可能曾经较受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学家, 是其怀疑心态的表达。

关于年鉴学派自身, 彼得·柏克(Peter Burke)的《法国史学革命: 年鉴学派 1929—1989》(*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 - 1989*, Oxford, 1990) 只是一部基本性和素描性的小书<sup>②</sup>, 令人失望, 该书几乎彻底无视它所涉及时期中的更为广阔的法国思想史的影响。彼得·柏克所编辑的《历史写作的新视野》(*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Oxford, 1991) 也好不到哪里去, 随意拼凑的文章, 良莠不齐, 其中一些让人感到不知所云。吉姆·夏普(Jim Sharp)的《来自下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 pp. 24 - 41) 一文, 可能是最为人称道的一篇。想了解年鉴学派的最好入门书, 依然是赫克斯特(J. H. Hexter)在其《论史家》(*On Historians*, London, 1979) 一书中那篇精彩的文章, 该文滑稽地模仿了布罗代尔的风格。布罗代尔自己的想法可以参看他的《论历史学》(*On History*, Chicago, 1980); 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者的想法可参看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历史学家之势力范围》(*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 Brighton, 1979)。

约翰·凯尼恩(John Kenyon)的《历史人: 文艺复兴以来的英国历史学职业》(*The History Men: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n England*

---

① 该文中译本收入霍布斯鲍姆:《史学家: 历史神话的终结者》, 马俊亚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79—105 页。——译者注

② 该书有麦田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两个中译本。——译者注

since the Renaissance, 2nd edn., London, 1993), 是关于该主题的一部有趣而且信息广博的概览, 充满引人入胜的细节; 另外一方面, 它展示了英国历史上那么多的本土史学专家具有的根深蒂固的褊狭与保守, 该书可谓是一本典范之作。这同样适用于约翰·文森特(John Vincent)的《一个智者对历史学的擘画》(*An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to History*, London, 1995), 该书是一部简要和经常会启发思考的对历史学的导论, 最初是受牛津大学出版社之约而作, 但后来因为该书明显地(实在地, 绝对有预兆性的)缺乏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意识, 而被退稿。文森特这本小书的观点与凯尼恩所见略同, 但它在后面愈来愈褊狭, 暴露了一些闭门造车和先入之见的部分, 证明作者囿于其维多利亚时代高层政治史这一狭小专业, 对之外的历史学术天地闭目塞听。作为对凯尼恩之书的补偏救弊, 克里斯多弗·帕克(Christopher Parker)的《1850年以来的英国历史学传统》(*The English Historical Tradition since 1850*, Edinburgh, 1990), 则对于历史学职业的经验主义传统施以连续抨击。

维达·麦塔(Ved Mehta)的《苍蝇与苍蝇瓶子: 与英国知识分子邂逅》(*Fly and Fly-Bottle: Encounters with British Intellectuals*, London, 1963), 该书是原刊于《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的系列四篇长文的重印本。前两篇是关于哲学家的; 第三、四两篇则关于历史学家。它们包括对当时大名鼎鼎的学者如休·屈佛-罗帕(Hugh Trevor-Roper)、A. J. P. 泰勒(A. J. P. Taylor), 以及反传统的约翰·布鲁克(Namierite John Brooke)等人所作的一些揭秘性的, 经常又是愉快的访谈, 并且提供了一份有趣的、睿智的、具有可读性的导论, 该导论是关于1950年代与1960年代早期历史学上的一些主要争执, 包括由卡尔的《历史学是什么?》一书所引发的争吵。历史学科在25年后的碎裂化情形, 可参看于连·杰丁纳(Juliet Gardiner)所编的《今日之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 Today?*, London,

1988)。该书收集了许多非常概括的讨论历史学内各专史性质的文章,像政治史、宗教史、军事史之类,它们出自这些领域里的英国实证史家,其中一些史家在文章中心无旁骛,只处理自己领域的问题,有些史家在文章里则不时会谈及较为广阔的研究兴趣。

352 在一些较旧的出版品中,彼得·盖尔(Pieter Geyl)的《同历史学家辩论》(*Debates with Historians*, London, 1955)一书,仍然值得一读,它讨论了从麦考莱(Macaulay)、米什莱(Michelet)以来的许多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是,在书的第五章到第八章,它摧毁了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的观点。盖尔的《拿破仑:支持与反对》(*Napoleon: For and Against*, London, 1954)一书,是一个经典研究,专门讨论史家的判断如何与时俱变、随时而毁,一切皆赖于史家书写时之语境:本书以盖尔的名言——历史是“无止境的争辩”作结。

保守的美国史家希摩法(Gertrude Himmelfarb),是一位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史的专家,在对把政治与大事从历史的中心拉下马的所有形式的历史研究取向进行批评的人物那里,她是一个最为尖刻且又最善于表达自己的学者之一。她的两本论文集:《新史学与旧史学:批判性尝试与再评价》(*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 Critical Essays and Reappraisals*, Cambridge, Mass., 1987)<sup>①</sup>与《朝向陷阱》(*On Looking into the Abyss*, New York, 1994),在本质上是高度可读与发人深省的。但是,她采用了致使其声誉受损的具有争议的技巧,只申明自己的立场,而不解释之,进而只靠对这些另类取径提倡者的动机进行含沙射影地批评,便想摧毁它们这些取径。希摩法从各种各样的历史学研究形式中,发明了她称之为“新史学”(the new history)的东西,然后谴责这种新史学不能达到一致或综合,就像研究政

---

① 该书有新星出版社的中译本。——译者注



治的“旧史学”(亦是出自她之想象)那样。尽管她整个的论证并不真正具有说服力,可沿此路径,她还是成功提出一些至关重要的意见。

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的《那个高贵梦:“客观性问题”与美国的历史职业》(*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1988)一书,是关于美国历史学场景的重要概述,但其涉及范围大大超过题目所限。该书文笔优美,探讨深入,充满吸引人的材料与精密的观点剖析,不仅富有可读性,而且读起来也很享受。诺维克强烈的相对主义立场招致了可以预期的批评声浪。其中,最长也最具有说服力的,可能是托马斯·哈斯克尔(Thomas L. Haskell)的文章《客观性非中立性:彼得·诺维克的〈那个高贵梦〉中之修辞与实践》(‘Objectivity is not Neutrality: Rhetoric vs. Practice in Peter Novick’s *That Noble Dream*’,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9 [1990], pp. 129 - 159),另一篇敏锐的评论是詹姆斯·克罗朋堡(James T. Kloppenberg)的《客观性与历史主义:一百年来的美国历史书写》(‘Objectivity and Historicism: A Century of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p. 1011 - 1030)。狄奥多·哈莫若(Theodore Hamerow)的《对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之反思》(*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 Madison, Wisconsin, 1987)一书,从保守主义的立场,对美国的历史学界,提出了另类的、经常是令人沮丧的观点。

虽然他写了很少的独创性历史作品,可耶鲁的历史学家赫克斯特出版了大量博学、敏锐而且往往是有趣的分析其他历史学家的评论。其中一些这样的文章收在他的《历史学中之重估》(*Reappraisals in History*, London, 1961),还可参看他的《做历史》(*Doing History*, London, 1971),其中讨论卡尔的一章很有见地。赫克斯特的《论历史学家》(*On Historians*, London, 1979)一书,包括对克里斯多

弗·希尔的一个著名攻击,值得我们将之作为基础,讨论意识形态挂帅的历史方法之危险性,以及讨论是否所有的方法都有类似的危险性。威廉·帕勒莫(William G. Palmer)的《证据之重负:J. H. 赫克斯特与克里斯多弗·希尔》(‘The Burden of Proof: J. H. Hexter and Christopher Hill’,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19 [1979], pp. 121 - 129)一文,是针对这种争论所做的相当具有自知之明的文雅描述,但还是成功提出一些好的批评观点。赫克斯特对希尔的抨击最初即是以《证据之重负》(The Burden of Proof)为标题出现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24 October 1975)上;而希尔的答辩《回应赫克斯特》(‘Reply to Hexter’)则见于1975年11月7日的该刊;赫克斯特又在1975年11月28日的该刊上发表了《回应希尔》(‘Reply to Hill’)一文。

哲学家关于历史本质的书写通常都与一狭小范围内的问题有关,这些书写非常抽象,历史的实证著作对此望尘莫及。一个曾最为人们赞扬的这样的作品,是沃尔什(W. H. Walsh)的《历史哲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3<sup>rd</sup> edn., London, 1967)<sup>①</sup>,它令人失望地艰涩,现在看起来已经严重落伍。麦可·史丹佛(Michael Stanford)的《历史知识的本质》(*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Oxford, 1986)在艰涩程度上甚至有过之,该书主要是针对历史学家之所为,发展出一个系统的描述,以便受过哲学训练的读者接受。史丹佛的《历史研究之行业手册》(*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1994),用枯燥的道德说教,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做出了呆板概述。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的《历史

---

① 该书中译本先后为社科文献出版社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1946)<sup>①</sup>,是一部令人难以索解但却值得阅读的经典之作。

讨论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最好的起点,大概是荷兰哲学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的著作:《叙述的逻辑:对历史学家所用语言的符号学分析》(*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The Hague, 1983)、《历史编纂学与后现代主义》('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8 [1989], pp. 137 - 153)<sup>②</sup>、《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Berkeley, 1994)<sup>③</sup>。安克斯密特和他的美籍同道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曾经编过一本丰富多彩的论文选集《一个新历史哲学》(*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 1995),其中以中古史专家南西·帕特娜(Nancy F. Partner)的文章最易理解。激进的美国史家转向后现代主义的情况,可以很清晰地通过艾伦·桑卡娃(Ellen Somekawa)与伊丽莎白·史密斯(Elizabeth A. Smith)的《将历史书写理论化,或“我无法想象为什么它就应那么乏味,因为它的一大部分必然是发明”》('Theorizing the Writing of History, or "I can't think why it should be so dull, for a great deal of it must be inventio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22 [1988], pp. 149 - 161)一文表现出来。大卫·阿特瑞基(David Attridge)等合编的《后结构主义与历史问题》(*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Question of History*, Cambridge, 1987)一书,是另一本拥护“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论文选集。

在所有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中,最有影响的角色可能还是海

① 该书先后有中国社科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译者注

② 该文中译本发表在《东南学术》2005年第3期。——译者注

③ 该书有文津出版社的中译本。——译者注

登·怀特(Hayden White),他那本激起众多讨论、却少有人仿效的《后设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1987)之外,还有一系列的论文搭配,收录在《话语的转义》(*Tropics of Discourse*, Baltimore, 1978)以及《形式的内容》(*The Content of the Form*, Baltimore, 1987)<sup>①</sup>中。就关心这类事情的那些人来说,这些文本是受到结构主义而非后结构主义的启发;但它们运用文学理论来研究历史作品,以及它们相对地将历史书写的实证内容降格为一个边缘议题或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从而为更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如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对历史研究中的真实与客观性理念的攻讦打开了方便之门,她的《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虚构》(*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London, 1988)即是这样的文本。

355 伊丽莎白·迪兹·艾玛斯(Elizabeth Deeds Ermarth)的《历史之续:后现代主义与再现时间的危机》(*Sequel to Histo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al Time*, Princeton, 1992),是讨论历史的最为激进的后现代文本之一,主张舍弃时间的历史概念。对之的尖锐批评,可参看大卫·卡尔(David Carr)之书评(见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2 [1993], pp. 179 - 187)。桑迪·柯文(Sande Cohen)的《历史的文化:论一门学科规范之解码》(*Historical Culture: On the Recoding of an Academic Discipline*, Berkeley, 1986),或许是所有后现代主义著作中最极端的一本,但它值得一看,主要在于它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为宣传他对主题采取的科学研究的取径,一个作者卖力地发明术语之程度。

近来,有一些引人注意的把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想推广的试图。

---

① 该书有文津出版社的中译本。——译者注

一个尚可接近的试图是贝佛利·索斯盖特(Beverley Southgate)的《历史:是什么与为什么? 古代、现代和后现代的观点》(*History: What and Why? Ancient, Modern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London, 1996),书中连篇累牍地讨论古代的史家,可这无助于其对后现代取径之拥护。亚伦·曼斯洛(Alun Munslow)的《解构历史》(*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1997),是另一本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初级读本,它走着与前书大致相似的讨论路线。凯斯·詹京斯的《历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 London, 1991)<sup>①</sup>,是一个令人生气的屈尊训诫及故意含糊的混合体,虽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概览——有时是庸俗化的——一些主要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立场。詹京斯的《论“历史是什么”? 从卡尔与艾尔顿到罗蒂与怀特》(*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1995)一书<sup>②</sup>,更详细地温习了同样的话题,在自1990年代初期开始有关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看法的不断升温的争论中,继续讨论了争论双方的立场,几乎书的一半内容都花在费力讲解理查德·罗蒂与海登·怀特的思想上。吉欧夫·艾理(Geoff Eley)的《整个世界即一个文本吗? 从社会史到二十年后的社会的历史》(‘Is all the world a text?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two decades later’, T. McDonald (ed.), *The Historical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n Arbor, 1992),该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语言学转向”不带批评的描述,到目前为止,艾理书中提出的告诫,他自己也几乎未能将之用于其本人的历史书写中。

截止当下,在回应和批评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的攻击,以及历史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最好的回应与批评都是一些文章。佩

① 该书有麦田出版社中译本。——译者注

② 该书有麦田与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译者注

- 356 瑞·查哥林(Perez Zagorin)的《历史编纂学与后现代主义:再思考》(‘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Reconsiderations’,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9 [1990], pp. 263 - 274)一文<sup>①</sup>,是一个有益的开端。从美国的一个英国17世纪史研究专家的立场,他逐一回应稍早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在同一期刊发表的与他同一文章名字的论文。安克斯密特的《答查哥林教授》(‘Reply to Professor Zagori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9 [1990], pp. 275 - 296)一文,是典型的傲慢自大而又缺乏说服力。海登·怀特的《后设史学》(*Metahistory*)一书,是1980年《历史与理论》杂志第19期专号所讨论的主题,该专号即以《后设史学:六个批评》(*Metahistory: Six Critiques*)命名。在所有对《后设史学》的批评中,最令人信服的批评来自研究古罗马的伟大历史学家阿诺德·莫米吉里诺(Arnaldo Momigliano)的论文《历史的修辞与修辞的历史:论海登·怀特的转喻》(‘The Rhetoric of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Rhetoric: On Hayden White’s Tropes’, *Comparative Criticism: A Yearbook*, Elinor Shaffer (ed.), Cambridge, 1981, pp. 259 - 268)。在美国思想史家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的一些论文中,也吸收了怀特的思想,同时还睿智地进行了批评。他的《历史学与批评》(*History and Criticism*, Ithaca, New York, 1985),是一本简明扼要的论文集,第一篇——《修辞与历史》(‘Rhetoric and History’)尤其切中肯綮。克莱默(Lloyd S. Kramer)的《文学、批评与历史想象:海登·怀特与拉卡普拉的文学挑战》(‘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e Literary Challenge of Hayden White and Dominick LaCapra’,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1989, pp. 97 - 128)一文,对以上这两位学者都提出了批

---

① 该文中译收入李宏图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5—93页。——译者注

评性的意见。<sup>①</sup>

在近来出版的捍卫历史和反对极端的后现代主义之批评的累累诸书中,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林·亨特(Lynn Hunt)与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合作的《讲述有关历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1994)一书<sup>②</sup>,主要关注专门的科学史学领域,该书最后三章是值得阅读的,它试图驳斥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批判所造成的颠覆性涵义。艾伦·斯皮泽(Alan B. Spitzer)的《历史的真相与关于过去的谎言》(*Historical Truth and Lies about the Past*, Chapel Hill, 1996),认为所有关于过去的政治争论,包括那些后现代主义者正牵涉其间的,最终都会诉诸这样一个标准:即客观的真理与历史的精确。在这方面,他对德曼事件的论述尤其具有启发性。

大卫·雷曼(David Lehman)的《时代之象:解构与保罗·德曼的衰落》(*Signs of the Times: Deconstruction and the Fall of Paul de Man*, London, 1991),是一个浅显易懂、诙谐的和具有说服力的描述,这个描述是有关发现德曼战时活动的轰动背景,以及该发现对于后现代理论在某些方面的意味。由沃纳·哈马契尔(Werner Hamacher)、奈尔·赫兹(Neil Hertz)和托马斯·基南(Thomas Keenan)合编的《保罗·德曼战时的报刊文章,1939—1943》(*Wartime Journalism 1939 - 1943, by Paul de Man*, Lincoln, Nebraska, 1988)和《反应:论保罗·德曼战时的报刊文章》(*Responses: On Paul de Man's Wartime Journalism*, Lincoln, Nebraska, 1989)两书,为我们方便地提供了几乎所有相关的材料。这些材料别有线索,而远非来

① 收录该文的《新文化史》一书有麦田出版社的中译本。——译者注

② 该书有正中书局、中央编译出版社的节译本,译名为《历史的真相》。——译者注

自那个重大的丑闻。保罗·珀胡山(Paul Boghossian)的文章——《索卡尔陷阱应该教会我们什么》(‘What the Sokal hoax ought to teach u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3 December 1996, pp. 14 – 15), 恰到好处、又强有力地对关键的后现代主义立场进行了抨击, 该文以引起轩然大波的下面之事为讨论起点, 后现代主义杂志《社会文本》录用了一篇文章, 该文作者索卡尔后来自道, 他之此文是对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滑稽模仿, 其意在戏弄, 文中含有大量故意设计而没有被编辑察觉的错误。<sup>①</sup>

来自左翼的对后现代主义观点进行批评的声音中, 最持平且又最明察秋毫的, 当属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的连载文章《阅读那些符指》(‘Reading the Sign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32 and 33 [1992], pp. 220 – 251)。就像萨缪尔其他的许多著述, 该文没有完成, 承诺中的第三部分——包含着对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相对主义的一个直接批判, 从来没有出现。帕拉莫(Bryan D. Palmer)的《降格为话语: 语言之具体化与历史书写》(*Descent into Discourse: The Re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Philadelphia,

---

① 索卡尔(Alan Sokal)为美国纽约大学的物理学家, 他故弄玄虚、存心挑衅和找如后现代主义者这样的新学家之难堪, 借用人文社科学界流行的让人似懂非懂的新名词, 拼凑了一篇表面上新鲜刺激实则不知所云、漏洞百出、信口雌黄的文章, 投稿给著名的持后现代主义立场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 居然通过了该刊号称“严格”的学术评审而被刊登出来, 见 Alan Sokal, ‘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 *Social Text* #46/47, pp. 217 – 252 (Spring/Summer 1996)。后来索卡尔自我爆料, 揭发此事, 旋即在欧美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 此事也就被称为“索卡尔陷阱”(Sokal Hoax)。来自各个领域包括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许多学者, 都参与了对这个事情的讨论, 成为众矢之的的索卡尔也积极回应, 一度成为学界风云人物。有关的情况可参看索卡尔的个人官方网站(<http://www.physics.nyu.edu/sokal/>)。后来中国的一些学者也对这个事件进行过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讨论和反思。——译者注



1990),对“语言学转向”进行了粗鲁的攻讦,反映了作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立场。在更宽广的阵线上,另外来自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是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后现代主义的幻相》(*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 Oxford, 1996)<sup>①</sup>,该书是一个自我陶醉与废话过多的小册子,甚至都没有提及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形成的挑战。同样让人失望的是,尽管是从完全不同的视角来讨论后现代主义,艾尔顿的《返回本质:对当前历史研究状况的一些反思》(*Return to Essential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Historical Study*, Cambridge, 1991),包含三篇讨论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关系的于1990年在密歇根(Michigan)所做的讲演。这是表明艾尔顿为老糊涂的产品,混合了同样多的偏见与自负,人们只有在饥不择食地胡乱征引时,它才有些许用处。构成这个相当薄的书之剩余部分,为艾尔顿两个稍早时的演讲,其质量同样是半斤八两。

358

波琳·玛莉亚·罗斯诺(Pauline Marie Rosenau)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眼光、袭击和入侵》(*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sights, Inroads, and Intrusions*, Princeton, 1992)<sup>②</sup>,对1990年代初期的后现代主义之现状进行了综述,该综述之水准高出侪辈,且所关极广。它有效地在各种后现代主义的极端变体——这些变体深深颠覆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中进行了区分,而且更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是,后现代主义的这些极端变体有助于而且刺激了我们的自我反省与学科更新。另一个有用的综述出自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后现代主义状况:探究文化变迁的起源》(*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sm: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① 该书有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译者注

② 该书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中译本。——译者注

*Cultural Change*, Oxford, 1991)①。

琼·斯科特(Joan W. Scott)的《社会性别与历史政治》(*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1988),从女性的视角,提出了赞成“语言学转向”的一些后现代主张。恺撒琳·霍尔(Catherine Hall)的《政治学、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历史》(‘politics, Post-structuralism and Feminist History’, *Gender and History*, Vol. 3 [1991], pp. 204 - 210),提出一些温和的质疑。以密歇根大学为基地的历史人类学杂志《社会与历史中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于1993年在后现代主义光谱中的女权主义圈子,发起了一个有趣且重要的交流。罗拉·李·唐(Laura Lee Downs)的《如果“女人”只是一个空洞的标签,那我为什么还怕深夜独行? 认同政治邂逅后现代主体》(‘If “Woman” Is Just an Empty Category, Then Why Am I Afraid to Walk Alone at Night? Identity Politics Meets the Postmodern Subjec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5 [1993], pp. 414 - 437)一文,始自对斯科特研究取径之敏锐批评,但接下来却是冗长的和似乎没有多少道理的对某些心态史著作的描述,她这里是将心态史作为一个可以取而代之的候补。斯科特做出愤怒而又轻蔑的回应,指控李·唐为“无知和歪曲”,其研究方法是“油腔滑调……肤浅之极……和不得要领”,“缺乏职业道德”,斯科特最后总结说,李·唐那篇论文“不可能成为关于后结构主义与心理分析理论对历史学影响为何的严肃讨论基础”。斯科特这篇文章出版之名为《“揭开火山盖”》(‘“The Tip of the Volcano”’,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5 [1993], pp. 438 - 443),在我看来,斯科特这篇回应文章本身,连篇误解、误现,在实质上,部分地还是出自虚构。接下来李·唐的回应

359

---

① 此书有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译者注

《答斯科特》(‘Reply to Joan Scot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5 [1993], pp. 444 – 451), 文章没有增加很多东西, 主要因为该文在此情况下拒绝以同样的语言构造来报复斯科特。

在《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中特定的篇幅之外, 杂志里有关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争论很晚才开始。《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在这个领域首当其冲的文章是约翰·托斯(John E. Toews)的《语言学转向之后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2 [1987], pp. 879 – 908)。接下来, 该刊1989年的主题是两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专题论文。首篇论文是大卫·哈兰的《思想史与文学之回归》(‘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Return of Litera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p. 581 – 609), 此文提出一些后现代主义的个案, 认为试图通过将他们与其所处之语境联系起来, 借此恢复像霍布斯(Thomas Hobbes)或洛克(John Locke)这样的作者所设定的本来意义, 这样的思想史研究仅仅是一个“花招”(trick)。大卫·贺令格(David Hollinger)写了一篇《浪子回头? 历史认识的持久性》(‘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The Persistence of Historical Knowing’,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p. 610 – 621), 回应了这篇论文, 但该文没有能掌握争论中的关键理论点。大卫·哈兰的《答大卫·贺令格》(‘Reply to David Hollinge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p. 622 – 626), 也以其人之道还治了其人之身。第二篇论文是艾伦·梅吉尔(Allan Megill)的《详述过去: 历史编纂学中的“描述”、解释和叙述》(‘Recounting the Past: “Description”, Explanation, and Narrative in Historiograp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p. 627 – 653), 在面对年鉴学派和其他“结构主义”历史学家的批评时, 除了试图重新恢复描述和叙述之作用——年鉴学派和其他“结构主义”

历史学家对此作用很鄙视,仅把其当作考据派,别无意义。接下去是公开讨论“旧史学与新史学”(The Old History and the New)之多元化立场的系列论文:Theodore S. Hamerow,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p. 654 - 660; Gertrude Himmelfarb,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New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p. 655 - 670; Lawrence W. Levine, 'The Unpredictable Past: Reflections on Recent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p. 671 - 679; Joan W. Scott, 'History in Crisis?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p. 680 - 692; 还有约翰·托斯(John E. Toews)写的一篇深思熟虑的总评,《关于“旧史学与新史学”的种种意见:一个评论》('Perspectives on "The Old History and the New": A Commen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p. 693 - 698),该文成功地把哈默若(Theodore S. Hamerow)和斯科特置于同一阵营,把希摩法和列文(Lawrence W. Levine)划为另一阵营,因而巧妙颠覆了其他四位撰稿人预设的对立情形。这个公开讨论引发了更进一步的参与论文,包括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的大文——《一个好的转向值得有下文:走向超越语言学:回应大卫·哈兰》('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 Moving Beyond the Linguistic: A Response to David Harla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p. 1326 - 1332)。接着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又刊出了罗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所写的一篇吸引人的批评文章——《一个新的思想史》('A New Intellectu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7 [April 1992], pp. 405 - 424),随后就是拉卡普拉那篇非常华而不实和索然乏味的回复文章《思想史及其出路》('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Its Way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7 [April 1992], pp. 425 - 239)。

在《中欧史》(*Central European History*)杂志上的争论,尽管聚焦于后现代主义和“语言学转向”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德国历史学家的意义,但此争论亦波及很广。该杂志1989年第22卷的第53—54期也刊登了两组特别的专号,专号文章是关于《德国历史:理论、实践与技术之挑战》(‘German Histories: Challenges in Theory, Practice, Technique’)的,这些文章来自于在1989年10月召开的讨论德国史学面对的后现代挑战会议。这个看起来是及时出版的会议论文,其实不然:出版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Atlanta, Georgia)的该杂志,在出版该专号之时,已经落后预定的时间表数年了,故此,专号主编才看似不合时宜地谈及“数年前”(p. 229)的那次会议,对于那些不知实情的读者来说,看起来在1989年10月那次讨论会实际举办之前,本专号就要出版。其中,最相关的论文当属以下这些:米歇尔·盖耶(Michael Geyer)和康诺德·亚拉许(Konrad H. Jarausch)合著的《德国历史的未来:大西洋对岸对1990年代之反思》(‘The Future of the German Past: Transatlantic Reflections for the 1990s’,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22 [1989], pp. 229 - 259);伊沙贝尔·胡尔(Isabel V. Hull)的《文学之镜下透视女权主义与社会性别史:后现代时期德国的历史编纂学》(‘Feminist and Gender History Through the Literary Looking-Glass: German Historiography in Postmodern Times’,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22 [1989], pp. 279 - 300);鲁迪·柯沙(Rudy Koshar)的《愚弄原始思维:语言学转向之前德国史书写笔记》(‘Playing the Cerebral Savage: Notes on Writing German History Before the Linguistic Tur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22 [1989], pp. 343 - 359);以及康诺德·亚拉许的《朝向一个经验的社会史:理论与跨学科之中的后现代困境》(‘Toward a Social History of Experience: Postmodern Predicaments in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pp. 427 - 443)。所有这些论文都出自一个明

361

确的后现代主义视角。珍·卡普兰(Jane Caplan)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与解构:给历史学家的提醒》(‘Postmodernism, Poststructuralism, and Deconstruction: Notes for Historians’,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22 [1989], pp. 260 - 278)一文,提供了敏锐和令人信服的补偏救弊办法。值得提到的是,虽然该专号的两个编者之一的米歇尔·盖耶,其实证的史学研究作品在最好的情况下都从来不容易被理解,现在更是等而下之,变得彻底莫测高深。另外一位专号编者康诺德·亚拉许的著述,依旧坚持实证做派,似乎完全没有受到他在1989年极力拥抱的后现代主义原则的影响,比如我们可以参看其著《冲向德国统一》(*The Rush to German Unity*, New York, 1994)。

一般说来,在英国杂志上发生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较少具有启发性。在《社会史》(*Social History*)杂志上的争论主要围绕一本(大部分论文以前发表过)论文集进行,该论文集即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葛瑞斯·史特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所著之《阶级语言:英国工人阶级史研究,1832—1982》(*Languages of Class: Studies in English Working-Class History 1832 - 1982*, New York, 1983),它记载了其作者早年对“语言学转向”的狂热。这反映了在左翼——主要是研究19世纪英国劳工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有限领域内,史特曼·琼斯作为一个举足轻重人物的地位,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出争论中存在的褊狭心态与时俱增。争论始于大卫·梅费尔德(David Mayfield)的《语言与社会史》(‘Language and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Vol. 16 [1991], pp. 353 - 358),以及随后的大卫·梅费尔德和苏珊·肖恩(Susan Thorne)的《社会史及其不满:葛瑞斯·史特曼·琼斯和语言政治》(‘Social history and its discontents: Gareth Stedman Jones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Social History*, Vol. 17 [1992], pp. 165 - 188)。接着招来了史特曼·琼斯在剑桥的学生

乔恩·劳伦斯(Jon Lawrence)和迈尔斯·泰勒(Miles Taylor)合写的一个怒气冲冲而又相当晦涩的还击——《抗议的贫乏:葛瑞斯·史特曼·琼斯和语言政治——一个回应》(‘The poverty of protest: Gareth Stedman Jones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a Reply’, *Social History*, Vol. 18 [1993], pp. 1 - 15),还有一个甚至更为恼火的回应,来自无役不与的乔伊斯(Patrick Joyce)——《社会史想象性的不满:简短回应梅费尔德和肖恩,以及劳伦斯与泰勒》(‘The imaginary discontents of social history: a note of response to Mayfield and Thorne, and Lawrence and Taylor’, *Social History*, Vol. 18 [1993], pp. 81 - 85)。这个争论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不断提升着大家参与的热度,而较少产生发人深思之见,各方都诉诸“化约主义”的指控:David Mayfield and Susan Thorne, ‘Reply to “The poverty of protest” and “The imaginary discontents”’, *Social History*, Vol. 18 [1993], pp. 219 - 233; James Vernon, ‘Who’s afraid of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history and its discontents’, *Social History*, Vol. 19 [1994], pp. 81 - 97; Neville Kirk, ‘History, language, ideas and post-modernism: a materialist view’, *Social History*, Vol. 19 [1994], pp. 221 - 240; Patrick Joyce, ‘The end of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Vol. 20 [1995], pp. 73 - 91<sup>①</sup>; and Geoff Eley and Keith Nield, ‘Starting over: the Present, the Post-modern and the moment of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Vol. 20 [1995], pp. 355 - 364; 最后这篇主要局限在试图拯救一种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class)概念,误读了乔伊斯的立场,在极大程度上也回避了那些关键性的议题,一如乔伊斯在其反驳中——《社会史的终结? 简答吉欧夫·艾理(Geoff Eley)和凯斯·尼尔德(Keith Nield)》(‘The end of social his-

① 该文中译收入李宏图编:《表象的叙述》,第19—50页。——译者注

tory? A brief reply to Eley and Nield', *Social History*, Vol. 21 [1996], pp. 96 - 98) 指出的。整个争论都建立在对社会史的一个褊狭理解上,将之看作基本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规划,事实上,社会史当然比这更为宽广和多样化。

363 与这个争论关联不大但仍值得阅读的文章是安东尼·伊萨普 (Anthony Easthope) 的《大话斯通式书写:历史书写与修辞》('Romancing the Stone: history-writing and rhetoric', *Social History*, Vol. 18 [1993], pp. 235 - 249)。该文是对后现代主义者关于历史的思想进行的一个简单呈现,同时对劳伦斯·斯通在 1958 年的一篇文章中所使用之令人烦心的修辞加以有趣的分析。斯通趋向于使用受到陈腔滥调支配的语言,这不是一个全新的发现,其在理论上的后果并非是立即清楚的。伊萨普非常确信,斯通这篇有问题的文章想当然地认为时人购买勋位的原因是物质性的,而非文化上的。这仅是一篇文章而已,毕竟熟悉斯通《贵族政治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Oxford, 1965) 一书的人将会让伊萨普明白,斯通同样已经意识到 16—17 世纪英国上层阶级在其他方面的勃勃雄心。虽然如此,这是相对少的依赖语言学对一个实证史家所出版的作品进行分析的文本之一,不管其他,就此而言,伊萨普这篇文章是重要的。

伊萨普的分析不过是个讨论的起点,当《当代史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发表一个社论文章——阿瑟·马威克 (Arthur Marwick) 的《历史研究的两种取径:形而上学的(包括“后现代主义”)和历史的》('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 The Metaphysical [Including "Postmodernism"] an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 [1995], pp. 5 - 35) 时,一个争执在《当代史杂志》上爆发了。马威克这篇文章是放纵的,且不时对诸多目标滥加不知所谓的攻击,它最初是马威克教授的一篇就职演讲(在他担任广播电视大学 [Open University] 历史系主任职位几十年



后),原题为《后设史学是胡言乱语——历史是必需品》(‘*Metahistory is Bunk-History is Essential*’)。该文应该与同在这期杂志上发表的海登·怀特那篇有分寸的、又令人惊奇地易读的文章《回应阿瑟·马威克》(‘*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 [1995], pp. 233 - 246)合读。这场交锋促生了《当代史杂志》1996年第31卷上的一系列文章,其间的短兵相接很难被我们无视。这些文章主要包括:Christopher Lloyd, ‘*For Realism and Against the Inadequacies of Common Sense: A 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1 (1996), pp. 191 - 207; Beverley Southgate, *History and Metahistory: Marwick versus Whi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1 (1996), pp. 209 - 214; Wulf Kansteiner, *Searching for an Audience: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n the Media Age—A Comment on Arthur Marwick and Hayden Whi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1 (1996), pp. 215 - 219; Geoffrey Roberts, *Narrative History as a Way of Lif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1 (1996), pp. 221 - 228。

比以上这些文章更为要言不烦和鞭辟入里的,是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上的交锋,由劳伦斯·斯通开篇的警告性批评——《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131 [1991], pp. 217 - 218)一文引发,接着有以下诸文回应:Patrick Joyc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133 (1991), pp. 204 - 209; Gabrielle Spiege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135 (1992), pp. 194 - 208; Catriona Kelly,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133 (1991), pp. 209 - 213;更进一步的交锋发生在斯通与乔伊斯之间,他们同一标题的论文刊在《过去与现在》第133卷(第204—210页)和第135卷(第189—194页)上。斯皮格(Gabrielle Spiegel)以下这篇文章也

与之相关: ‘History, Historicism, and the Social Logic of the Text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Vol. 65 (1990), pp. 59 – 96。

关于后现代主义历史可能的形貌,可以一睹这些例证: Patrick Joyce, *Democratic Subjects: The Self and the Social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1994; Diane Purkiss, *The Witch in History: Early Modern and Twentieth-Century Representations*, London, 1996; 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Cambridge, Mass., 1983;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London, 1983。对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与达恩顿(Robert Darnton)两书的两个主要批评引出了许多广泛的议题,其中一篇是: Robert Finlay, ‘The Refashioning of Martin Guer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3 (1988), pp. 553 – 571; 有一个来自戴维斯的回应: Natalie Zemon Davis, ‘On the Lam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3 (1988), pp. 572 – 603。另外一篇是: Harold Mah, ‘Suppressing the Text: The Metaphysics of Ethnographic History in Darnton’s *Great Cat Massacre*’,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Vol. 31 (1991), pp. 1 – 20。西蒙·夏玛(Simon Schama)的《公民: 一个法国大革命的编年史》(*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1989)和奥兰多·费格斯(Orlando Figes)的《一个民族的悲剧: 1891—1921年的俄罗斯革命》(*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 – 1921*, London, 1996)两著,验证了后现代主义对主流历史学影响的最好方面,西蒙·夏玛的《死亡之确定性》(*Dead Certainties*, London, 1991)一书,证明了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最坏方面。

极端相对主义的影响之最值得质疑的一些方面,可以从黛博拉·利普塞特(Deborah E. Lipstadt)的《否认大屠杀: 对真相与记忆与日俱增的攻击》(*Denying the Holocaust: 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 New York, 1993)一书中一览无余。该书对那些

人——他们试图否认希特勒死亡集中营存在的事实及存在导致其出现的政策的事实,做了冷静与可靠的描述。索尔·弗瑞兰德(Saul Friedländer)编辑的《试探再现的边界:纳粹主义与“斩草除根”》(*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92),该书是一本重要的会议论文结集,包括海登·怀特的文章《历史情节与真相问题》('Historical Emplotment and the Problem of Truth', pp. 37 - 53)<sup>①</sup>,此文乃是对其早年立场的再思考。有关“阿伯拉罕的争议”(Abraham controversy),其中引发的关键性议题是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与派系问题,要对这一争议有最好的了解,可参看《中欧史》杂志专门为此做的专号——1984年第17卷。该专号之领衔文为杰拉德·弗利德曼(Gerald Feldman)的长篇批评:《魏玛研究中的一个崩溃》('A Collapse in Weimar Scholarship',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17 [1984], pp. 159 - 177)。

从该书第一版问世以来,凯斯·詹京斯就编辑了一本有用的文选《后现代历史读本》(*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London, 1997),他更激进的观点见之于其著《为什么研究历史?伦理与后现代性》(*Why History? Ethics and Postmodernity*, London, 1999)。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等人合编的《历史视野下的知识与后现代主义》(*Knowledge and Postmodern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1996),是另一个相关文本的选集。大卫·哈兰(David Harlan)的《美国历史学之堕落》(*The Degrad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Chicago, 1997),包括对海登·怀特、理查德·罗蒂、米歇尔·傅柯思想的长篇大论。约翰·阿诺德(John Arnold)的《历史:一个非常简明之导论》(*Hist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2000),试图透过检视一些特别的历史例证,来盘点后现代主义者的一些理念。就后现代

① 该文中译收入李宏图编:《表象的叙述》,第177—182页。——译者注

主义取径对于历史认识论作用之捍卫,目前而言,最好且最具有思想性的作品是罗伯特·柏克荷佛(Robert F. Berkhofer, Jr.)的《超越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Beyond the Great Story: History as Text and Discourse*, Cambridge, Mass., 1995)①。

在晚近对后现代主义历史理论的批评中,最具包容性的是麦克拉夫(C. Behan McCullagh)的《历史之真相》(*The Truth of History*, London, 1998)。麦克拉夫为弱小的但非常具有意义的真相与客观性的概念进行了理由充足的捍卫。凯斯·温舒托尔(Keith Windschuttle)的《谋杀历史:一门学科是如何被文学评论家与社会理论家杀害的》(*The Killing of History: How a Discipline is Being Murdered by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Paddington, New South Wales, 1994),该书是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的一个蓄意批评,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亦存在过犹不及之处。

近来有用的理论文本之选集还有以下这些: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M. Burns)与休·雷蒙-皮卡德(Hugh Rayment-Pickard)合编的《从启蒙时代到后现代性之间的历史哲学》(*Philosophies of History from Enlightenment to Postmodernity*, Oxford, 2000),以及安娜·格林(Anna Green)和凯瑟琳·崔普(Kathleen Troup)合编的《历史之舍:20世纪历史与理论的批评读本》(*The Houses of History: A Critical Reader in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and Theory*, Manchester, 1999)。米歇尔·本特利(Michael Bentley)的《近代历史编纂学导论》(*Modern Historiograph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1999),文如其标题,读起来津津有味,且让人感觉简明扼要。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论历史》(*On History*, London, 1997),则是一本盛气凌人的论文集。

---

① 该书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中译本。——译者注

## 索引

(条目后的数字为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

- 阿兰·麦法兰 Macfarlane, Alan 16, 18, 26, 70, 106, 113, 214  
306 - 308
- 阿诺德·莫米吉里诺 Momigliano, Arnaldo 93
- 阿诺德·汤因比 Toynbee, Arnold 54 - 56, 61
- 阿瑟·马威克 Marwick, Arthur 7, 71 - 73, 149, 182, 261, 262
- 艾登爵士 Eden, Sir Anthony 59
- 艾金生 Atkinson, Ronald F. 11
- 艾兰·罗比-杰瑞雷德 Robbe-Grillet, Alain 141
- 艾伦·梅吉尔 Megill, Allan 4, 58 - 59, 135
- 艾伦·桑卡娃 Somekawa, Ellen 7, 31, 92, 127 - 128, 205, 219
- 艾萨克·牛顿爵士 Newton, Sir Isaac 47, 201
- 爱德华·吉本 Gibbon, Edward 15 - 16, 18, 26, 70, 106, 113, 214
- 爱德蒙·柏克 Burke, Edmund 16
- 爱因斯坦 Einstein, Albert 30, 47
- 安·波琳 Boleyn, Ann 113
- 安·华兹华斯 Wordsworth, Ann 219
- 安德鲁·罗伯斯 Roberts, Andrew 210, 261
- 安东尼·伊萨普 Easthope, Anthony 256, 257, 271, 272, 285 - 288, 292, 293, 294, 295, 362
- 安东尼娅·弗雷泽 Fraser, Antonia 259
- 安妮·科瑞格 Kriegel, Annie 217
- 奥兰多·费格斯 Figes, Orlando 244 - 245, 291
- 奥利弗·安德森 Anderson, Olive 217
- 奥利弗·克伦威尔 Cromwell, Oliver 60

- 奥斯卡·王尔德 Wilde, Oscar 200
- 巴尔扎克 Balzac, Honoré de 100
- 巴枯宁 Bakunin, Michael 228
- 巴特菲尔德 Butterfield, Sir Herbert  
34
- 保罗·A. 大卫 David, Paul A. 42
- 保罗·德曼 Man, Paul de 233 - 238
- 保罗·肯尼迪 Kennedy, Paul  
61 - 62
- 保罗·利科 Ricoeur, Paul 104
- 保罗·珀胡山 Boghossian, Paul  
215, 220 - 221
- 贝达瑞达 Bédarida, François 180
- 贝佛利·索斯盖特 Southgate, Bever-  
ley 4, 108 - 109, 204 - 205, 213,  
256, 257
- 贝内蒂托·克罗齐 Croce, Benedetto  
30
- 比尔德 Beard, Charles 86
- 彼得·盖尔 Geyl, Pieter 54 - 56
- 彼得·葛士 Ghosh, Peter 273 -  
277, 290, 291
- 彼得·克拉克 Clarke, Peter 175
- 彼得·拉斯莱特 Laslett, Peter 40
- 彼得·诺维克 Novick, Peter 17 -  
18, 20 - 21, 28 - 29, 46, 121 - 122,  
172, 176 - 177, 251 - 252, 263,  
352 - 353
- 彼得·斯特恩 Stearns, Peter N.  
169, 202 - 203, 349
- 波拉德 Pollard, A. F. 22
- 伯利 Bury, J. B. 23 - 24, 73, 130
- 布哈林 Bukharin, Nikolai 187
- 布克哈特 Burckhardt, Jacob 100
- 布鲁宁 Brüning, Heinrich 132
- 布特勋爵 Bute, Lord 33
- 查尔斯·色涅波 Seignobos, Charles  
21
- 查理二世 Charles II, King 55
- 大卫·阿伯拉罕 Abraham, David  
116 - 124, 128, 263, 270, 271, 364
- 大卫·安德斯 Andress, David  
298 - 300
- 大卫·格莱斯 Gress, David 268
- 大卫·哈兰 Harlan, David 3, 103 -  
104, 305
- 大卫·卡尔 Carr, David 141, 185
- 大卫·坎纳丁 Cannadine, David 163
- 大卫·梅费尔德 Mayfield, David 6,  
182 - 183
- 大卫·诺利斯 Knowles, David 49 -  
51, 214
- 戴高乐 Gaulle, Charles de 198
- 戴克勋爵 Dacre, Lord, 参见 *Trevor-  
Roper, Hugh*

- 戴内·帕基丝 Purkiss, Diane 4, 98 - 100, 200, 217 - 218, 241 - 242, 302 - 315
- 黛博拉·利普塞特 Lipstadt, Deborah E. 239 - 241
- 丹尼尔·约翰逊 Johnson, Daniel 258, 259, 260, 262, 265
- 德里达 Derrida, Jacques 94 - 95, 159, 231, 235 - 237, 256, 257, 292, 293, 294, 295
- 德罗伊森 Droysen, Gustav 27
- 狄奥多·蒙森 Mommsen, Theodor 23, 64, 110
- 狄奥多·泽尔丁 Zeldin, Theodore 10, 64 - 65, 136 - 137, 151, 169
- 狄尔泰 Dilthey, Wilhelm 30
- 狄姆·梅森 Mason, Tim 118 - 119
- 笛福 Defoe, Daniel 166
- 恩格斯 Engels, Frederick 61, 167, 206
- 法拉第 Faraday, Michael 47
- 费尔南多·布罗代尔 Braudel, Fernand 11, 154 - 156, 192, 214, 356
- 费士 Fisher, H. A. L. 29 - 30, 35
- 弗朗哥 Franco, Francisco 153
-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 Ankersmit, Frank 8, 97, 113, 141, 157, 171, 182, 201, 231, 253, 256, 257, 276, 277, 283, 284
- 弗兰西斯·福山 Fukuyama, Francis 229
- 弗兰兹·巴本 Papen, Franz von 132
- 弗勒 Fuller, J. F. C. 214
- 弗洛伊德 Freud, Sigmund 32 - 33
- 伏尔泰 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Arouet de 26
- 浮罗德 Froude, J. A. 54
- 福楼拜 Flaubert, Gustave 23
- 福斯泰尔·德·古朗治 Coulanges, Fustel de 20, 73
- 傅果 Fogel, Robert W. 12, 39 - 42, 182
- 傅柯 Foucault, Michel 82, 159, 195 - 196, 256, 257
- 富兰索瓦·西米昂 Simiand, François 153
- 戈尔巴乔夫 Gorbachev, Mikhail 250
- 格里格·蒙路 Munro, Greg 268
- 格林 Green, J. R. 166
- 格特德·希摩法 Himmelfarb, Gertrude 135, 161, 163, 182, 217, 280, 304, 352
- 哈洛德·威尔逊 Wilson, Harold 198
- 哈维 Halévy, Elie 180

- 海德格尔 Heidegger, Martin 235
- 海登·怀特 White, Hayden 2, 11, 66, 68 - 71, 78 - 79, 100 - 101, 104, 110, 113, 118, 124 - 126, 138 - 140, 143, 148 - 149, 182, 231, 238, 256 - 257, 267, 271, 274, 276 - 277, 284 - 287, 354 - 356, 363 - 365
- 海涅 Heine, Heinrich 91
- 汉斯 - 尤利·威勒 Wehler, Hans-Ulrich 152, 174
- 汉斯·凯尔纳 Kellner, Hans 96
- 赫伯特·亚当斯 Adams, Herbert Baxter 20, 161
- 赫克斯特 Hexter, J. H. 10 - 11, 121, 123, 280, 350, 353
- 亨利·阿沙比·特纳 Turner, Henry Ashby 117
- 亨利·托马斯·巴克勒 Buckle, Henry Thomas 54, 61
- 亨利八世 Henry VIII, King 113 - 114, 193 - 194
- 霍布斯 Hobbes, Thomas 85, 276
- 霍布斯鲍姆 Hobsbawm, Eric 168
- 吉欧夫·艾理 Eley, Geoff 6, 8, 169
- 季诺维也夫 Zinoviev, Grigori Eseevich 187
- 加雷斯·史泰德曼·琼斯 Jones, Gareth Stedman 277
- 加米诺夫 Kamenev, Leo Borisovich 187
- 加瑞特·马丁利 Mattingly, Garrett 143 - 144
- 杰夫里·艾尔顿爵士 Elton, Sir Geoffrey 1 - 3, 6 - 7, 8 - 9, 11, 40 - 41, 46 - 48, 53, 63, 67, 75 - 76, 84 - 85, 148 - 151, 163, 179, 182, 191 - 195, 208 - 209, 229 - 231, 249, 267 - 269, 280, 298, 299, 304, 348 - 349, 357
- 杰夫里·巴勒克拉夫 Barraclough, Geoffrey 135 - 136
- 杰夫里·罗伯斯 Roberts, Geoffrey 137 - 138
- 杰弗瑞·阿彻 Archer, Jeffrey 72
- 杰克斯 Jacks, L. P. 28
- 杰拉德·弗利德曼 Feldman, Gerald D. 117 - 121
- 杰诺维斯 Genovese, Eugene 152
- 卡尔 Carr, E. H. 1 - 3, 8 - 9, 31, 34, 38, 40, 43 - 45, 48 - 52, 56 - 58, 60, 76 - 78, 81, 91, 93, 129 - 135, 138, 159, 163 - 164, 169 - 170, 172 - 173, 179, 187 - 189, 191, 197, 212, 224 - 231, 267 - 270, 289, 348
- 卡尔·波普尔爵士 Popper, Sir Karl 36, 42



- 卡尔·布瑞登巴 Bridenbaugh, Carl  
213
- 卡莱尔 Carlyle, Thomas 70
- 卡罗·金兹堡 Ginzburg, Carlo 189
- 凯丽 Kelly, Catriona 81
- 凯斯·弗烈特 Flett, Keith 265
- 凯斯·尼尔德 Nield, Keith 5-6, 8
- 凯斯·托马斯 Thomas, Keith 83,  
217-218, 306-309
- 凯斯·温舒托尔 Windschuttle, Keith  
303
- 凯斯·约瑟夫爵士 Joseph, Sir Keith  
45
- 凯斯·詹京斯 Jenkins, Keith 3, 8,  
12-13, 47-48, 97-98, 109-110,  
112-115, 127, 140, 201, 204-207,  
231, 253, 256, 257, 277-285, 295,  
296, 298, 302, 305, 355
- 康德 Kant, Immanuel 91
- 柯林武德 Collingwood, R. G. 10-  
11, 30-31, 91-92
- 科霍 Koch, Robert 20
- 科克 Kirk, Neville 158
- 克拉克 Clark, George Kitson 76-78
- 克拉克 Clark, Stuart 307
- 克拉伦斯·艾弗德 Alvord, Clarence  
29
- 克劳德·朗格鲁瓦 Langlois, Claude  
21
- 克里斯多弗·劳艾德 Lloyd, Christo-  
pher 10, 138, 182
- 克里斯多弗·诺里斯 Norris, Christo-  
pher 238
- 克里斯多弗·希尔 Hill, Christopher  
30, 35, 121, 350, 353
- 克利奥巴特拉 Cleopatra, Queen 130
- 克利斯·哈曼 Harman, Chris 266
- 库帕 Cooper, J. P. 122
- 库特·瓦尔德海姆 Waldheim, Kurt  
233
- 昆廷·斯金纳 Skinner, Quentin  
276-277
- 拉斐尔·萨缪尔 Samuel, Raphael  
7, 82
- 拉甘希尔·哈顿 Hatton, Ragnhild  
217
- 拉卡普拉 LaCapra, Dominick 3,  
68-69, 80-81, 87, 106, 126, 143-  
144, 238, 256
- 劳伦斯·斯通 Stone, Lawrence 4,  
7-8, 38, 67, 81-82, 95-96, 109,  
122-123, 126, 194-195, 208-  
209, 280, 362
- 劳伦斯·维西 Veysey, Laurence 172
- 雷蒙·马丁 Martin, Raymond 12
-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 Hofstadter,  
Richard 148

- 理查德·罗蒂 Rorty, Richard 235  
理查德·派普斯 Pipes, Richard 273  
利奥波德·冯·兰克 Ranke, Leopold von 8, 16 - 23, 25 - 26, 33, 76, 100, 173, 225, 274, 277  
利奥塔 Lyotard, Jean-François 150, 292, 293, 294  
利顿·史崔奇 Strachey, Lytton 22  
列宁 Lenin, Vladimir Illyich 59 - 60, 188 - 189, 227  
林·亨特 Hunt, Lynn 4, 12, 70, 107, 115, 131 - 132, 243, 267, 269, 270, 271, 289, 290, 292, 303  
琳达·欧尔 Orr, Linda 71  
卢瑟福勋爵 Rutherford, Lord 47  
鲁迪·科夏 Koshar, Rudy 200  
路韦士·纳米尔爵士 Namier, Sir Lewis 32 - 36, 151 - 152, 162, 164, 228  
露西·达维斗维兹 Dawidowicz, Lucy 124  
罗伯特·达恩顿 Darnton, Robert 245, 247 - 248  
罗伯特·芬莱 Finlay, Robert 246  
罗伯特·哈里斯 Harris, Robert 263  
罗伯特·华尔波爵士 Walpole, Sir Robert 166  
罗拉·李·唐 Downs, Laura Lee 211, 216 - 217, 358  
罗兰·巴特 Barthes, Roland 94, 231, 253, 256  
罗纳德·胡顿 Hutton, Ronald 265, 302  
罗纳德·里根 Reagan, Ronald 61, 198 - 199  
罗素·雅各比 Jacoby, Russell 68, 69, 126, 360  
罗依·波特 Porter, Roy 106 - 107, 259, 265  
洛克 Locke, John 276  
马丹·盖赫 Guerre, Martin 245 - 247  
马丁·伯纳尔 Bernal, Martin 221 - 222  
马克·安东尼 Antony, Mark 130  
马克·波斯特 Poster, Mark 69  
马克·布洛克 Bloch, Marc 75  
马克·基施兰斯基 Kishlansky, Mark 175  
马克·孟莫尼尔 Monmonier, Mark 111  
马克思 Marx, Karl 61, 85, 167, 183, 189, 206  
马歇尔 Marshall, Brenda 191  
马修·特林卡 Trinca, Matthew 259, 268  
玛格丽特·穆瑞 Murray, Margaret

- 305
- 玛格丽特·雅各布 Jacob, Margaret  
4, 12, 70, 107, 115, 131 - 132, 243,  
270, 303
- 玛乔丽·贝克 Becker, Marjorie 68
- 迈尔斯·泰勒 Taylor, Miles 169
- 麦考莱 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26 - 27, 156, 166 - 167
- 麦可拉夫 McCullagh, C. B. 280
- 麦克·布雷 Burleigh, Michael 258,  
259, 261 - 263, 315
- 麦克尼尔 McNeill, William H. 85
- 麦克斯·普朗克 Planck, Max 21
- 麦特兰 Maitland, F. W. 152
- 梅杰 Major, John 261
- 米什莱 Michelet, Jules 26, 70 - 71,  
100, 352
- 摩根·库瑟 Kousser, J. Morgan  
40, 182
- 莫里森 Morrison, Paul 238
- 拿破仑·波拿巴 Bonaparte, Napoleon  
60
- 纳赛尔 Nasser, Gamal Abdel 59
- 纳塔莉·泽蒙·戴维斯 Davis, Nata-  
lie Zemon 245 - 247
- 南希·帕特娜 Partner, Nancy F. 5,  
80 - 81, 354
- 尼尔·弗格森 Ferguson, Niall 258,  
263, 264, 265
- 尼科斯·勃兰提斯 Poulantzas, Nicos  
119
- 诺曼·戴维斯 Davies, Norman  
175 - 176
- 诺曼·斯通 Stone, Norman 10,  
229, 348
- 诺斯勋爵 North, Lord 33
- 帕默斯顿勋爵 Palmerston, Lord  
105 - 106
- 帕斯卡尔 Pascal, Blaise 130
- 佩瑞·查哥林 Zagorin, Perez  
12, 157
- 皮耶·夏努 Chaunu, Pierre  
192 - 193
- 乔恩·劳伦斯 Lawrence, Jon 169
- 乔叟 Chaucer, Geoffrey 166
- 乔伊斯 Joyce, Patrick 5 - 6, 8, 12,  
96, 109, 252 - 253, 256, 295, 340
- 乔伊斯·阿普尔比 Appleby, Joyce  
4, 12, 70, 107, 115, 131 - 132, 243,  
256, 258, 259, 266, 267, 270, 271,  
274, 303
- 乔治·奥威尔 Orwell, George 227
- 乔治·布什 Bush, George 198
- 乔治·梅利 Melly, George 203
- 乔治·伊格尔斯 Iggers, Georg G.

40

- 乔治三世 George III, King 33 - 34  
乔治一世 George I, King 217  
琼·卡普兰 Caplan, Jane 242 - 243  
琼·斯科特 Scott, Joan 216, 358  
屈威谦 Trevelyan, G. M. 24 - 26,  
28, 31, 162 - 163, 166 - 167,  
250 - 252  
让·戴路米奥 Delumeau, Jean 155  
撒切尔 Thatcher, Margaret 45, 196,  
198 - 199, 209 - 210, 261  
萨缪尔·布列坦 Brittan, Samuel  
258  
赛勒 Sellar, W. C. 49  
桑迪·柯文 Cohen, Sande 148 - 149  
桑格“勋爵” Sanger, 'Lord' George  
77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William 18,  
98, 166  
圣本笃 Benedict, Saint 50  
史蒂芬·班恩 Bann, Stephen 71  
史蒂芬·科里尼 Collini, Stefan  
256 - 257, 263  
史蒂夫·史密斯 Smith, Steve 256,  
272, 273  
史蒂夫·温博格 Weinberg, Steve  
259  
史景迁 Spence, Jonathan D. 181  
史坦利·英格曼 Engerman, Stanley  
L. 41 - 42  
斯大林 Stalin, Joseph Vissarionovich  
50, 187 - 189, 228  
斯卡里布瑞克 Scarisbrick, J. J. 114  
斯皮格 Spiegel, Gabrielle 4, 96, 110,  
114  
斯皮泽 Spitzer, Alan B. 237 - 238  
苏珊·海克 Haack, Susan 283,  
312, 313  
苏珊·肖恩 Thorne, Susan 6,  
182 - 183  
索尔·弗瑞兰德 Friedländer, Saul  
125  
索绪尔 Saussure, Ferdinand de 94 -  
95, 216 - 217, 256, 292, 294  
泰勒 Taylor, A. J. P. 108, 111,  
132, 262, 351  
汤普逊 Thompson, E. P. 35, 83,  
116, 149, 165, 177, 208, 298 -  
299, 350  
陶特 Tout, T. F. 64  
特赖齐克 Treitschke, Heinrich von  
17, 26  
梯也尔 Thiers, Adolphe 27  
托克维尔 Tocqueville, Alexis de  
70 - 71, 100

- 托洛茨基 Trotsky, Leon 59 - 60,  
187 - 188, 228
- 托马斯·哈斯克爾 Haskell, Thomas  
L. 251 - 252
- 托马斯·克伦威尔 Cromwell, Thomas  
193 - 195, 208, 231, 299
- 托马斯·库恩 Kuhn, Thomas  
42 - 43
- 托马斯·尼匹代 Nipperdey, Thomas  
174
- 托尼 Tawney, R. H. 122
- 托尼·贝内特 Bennett, Tony 284
- 威利·勃朗特 Brandt, Willy 198
- 威廉·科南 Keenan, William  
300 - 301
- 威廉·莫尔 More, William 50
- 韦伯 Weber, Max 276
- 文德尔班 Windelband, Wilhelm 58
-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 Scott, Sir  
Walter 16
- 屋大维 Octavius, Caesar 130
- 伍尔夫·康斯坦纳 Kansteiner, Wulf  
206 - 207
- 西蒙·夏玛 Schama, Simon  
244 - 245
- 希尔斯·米勒 Miller, J. Hillis 235
- 希特勒 Hitler, Adolf 19, 50, 59, 115,  
132 - 133, 180, 188, 216, 235,  
239, 263
- 休·久佛-罗帕 Trevor-Roper, Hugh  
19, 122 - 123, 178, 227 - 228, 261,  
263, 264
- 休尔穆·狄华特 Diwald, Hellmut  
152
- 休斯 Hughes, H. Stuart 84 - 85
- 修昔底德 Thucydides 82, 260
- 叶特曼 Yeatman, R. J. 49
- 伊丽莎白·戴兹·艾玛斯 Ermarth,  
Elizabeth Deeds 141 - 142, 156,  
185, 253, 354
- 伊丽莎白·史密斯 Smith, Elizabeth  
A. 7, 31, 92, 127 - 128, 205, 219
- 依曼纽尔·勒华·拉杜里 Ladurie,  
Emmanuel Le Roy 39, 84, 143
- 以赛亚·伯林 Berlin, Sir Isaiah 73,  
129, 227
- 尤尔利希·诺肯 Nocken, Ulrich 117
- 于连·杰丁纳 Gardiner, Juliet  
170, 351
- 约翰·阿诺德 Arnold, John 296 -  
298, 300
- 约翰·鲍斯威尔 Boswell, John 222
- 约翰·布鲁克 Brooke, John 34, 162
- 约翰·布鲁利 Breuille, John. 169
- 约翰·查姆雷 Charmley, John

- 261,302
- 约翰·杰瑞桑姆 Grisham, John 141
- 约翰·凯尼恩 Kenyon, John 178 -  
179,263,264,304,350
- 约翰·肯尼迪 Kennedy, John F.  
198
- 约翰·潘勃 Pemble, John 22 - 23
- 约翰·普鲁姆爵士 Plumb, Sir John  
166 - 167
- 约翰·托什 Tosh, John 3,280
- 约翰·文森特 Vincent, John 34,58,  
111,136,163 - 164,176 - 178,204,  
209 - 210,212 - 213,261,262,264,  
265,305,351
- 约翰·西雷爵士 Seeley, Sir John  
161
- 约翰生 Johnson, Samuel 166
- 约翰松 Johnson, Lyndon B. 198
- 詹姆斯·弗农 Vernon, James 5
- 詹姆斯·克罗朋堡 Kloppenberg,  
James T. 238
- 张伯伦 Chamberlain, Neville 59

## 译后记

曾几何时,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冲击让不少史家忧心忡忡,担心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是否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到了20世纪末,“由后现代主义发动的有关历史、真相和客观性的辩论,已成沛然莫之能御之势。任何人,除非是极端的蒙昧者,都无法对其视而不见”<sup>①</sup>。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历史学专业,尤其是在法国和美国,陷入一个自我定位危机:历史究竟是什么?如何去做历史?是否还能求得过去之历史真相?史家对客观性之坚持是否已成明日黄花?如果材料不能反映现实,而只能反映其他文本,那么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是否就合而为一?是否真如个别学者所言:“不再有真理,也不再有不公平。……总之,不管是道德上的或是政治上的东西,一切都随风而去。”<sup>②</sup>在这后现代气氛弥漫的情况下,整个历史学专业变得异常具有批判性、反思性和理论性,实证史家依赖“常识”行事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他们也应该涉入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参与相关的争鸣与讨论,去做出没有实证经验的理论家无法做

---

<sup>①</sup>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Granta Books, 2000, p. 6.

<sup>②</sup> N. Geras, 'Language, Truth and Justice', Keith Jenkins (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23.

出的贡献,并表明其主张——解释他们所为的工作为何、如何以及为什么,进而阐释后现代主义之于历史研究与我们认识历史的意义;但若像一些后现代理论家那样,史家或理论家无保留地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思考,就可能导致极端的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甚至会否认纳粹大屠杀及死亡集中营存在之真实性,这样的历史研究就很难不走上误人的歧途,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这就是艾文斯教授这本《捍卫历史》一书的书写旨趣。

轻视理论的风气在历史学界似乎一直是比较根深蒂固,坚持实证路线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深信:只要把相关材料搜寻、排列完毕,过去之历史真相就会呼之欲出;理论这种玄虚的东西,谈得再好也只是光开花不结果,对历史的实际研究缺乏正面作用,反易让人堕入以论代史的陷阱或追逐时髦的歧途。基于这种认识,许多历史学家都是凭着“常识”和直觉行事,很少有人愿意涉足理论这个“雷池”,对历史哲学和历史叙述理论也普遍轻视。史学界这种自我满足、甚或有些自鸣得意的情绪,在战后英国史学界的表现非常明显。与美国或其欧洲大陆同行相比,英国史学家对历史编纂学以及历史哲学缺乏严肃的兴趣,如果他们被问及如何描述其学科的认识论,英国史家或许要表示诧异。<sup>①</sup>对文化史之类与理论有紧密联系的学科亦近似于无,如同凯斯·托马斯在1989年指出的:“在英国,并没有文化史这门学科。也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的教学、讲座,没有文化史系科建制,没有文化史期刊,也没有关于文化史之研讨会。”<sup>②</sup>难怪后现代历史理论学者詹京斯抱怨:由于英国主流“史学界文化”的那种令

---

① Peter Burke, 'Historiography and Philosophy of History', Burke (ed.),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48 - 249.

② 转见 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U. K. Malden, Mass.: Polity Press, 2004, p. 32.



人讨厌的、反理论的性格,使得相对上不大有学生,甚或也不大有历史教师和历史学家,熟悉怀特(Hayden White)的作品,有些人甚至连听都没听过呢!①

艾文斯教授虽然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实证史家,在德国史研究方面建树甚高,与一般轻视理论的英国史家不同,他还是一个有浓厚理论兴趣的学者,他在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即 *In Defence of History* (此书最早由伦敦的 Granta Books 在 1997 年出版)。该书从一个实证史家的立场,主要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证方式,辅以作者大量的实际研究实践,旁征博引,既很好总结与反思了以卡尔与艾尔顿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乃至 19、20 世纪的史学史,还讨论了材料、证据、因果关系、客观性等关键的历史概念及其意义的变化,有理有据地反击了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进攻。艾文斯教授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经验主义的学科,它更关注知识的内容而非本质”,可其本人并非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反对者,艾文斯亦指出了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学造成的有益影响,并积极主张将这种有益影响贯彻到当下的历史研究中,“在其更具有建设性的方面,后现代主义鼓励历史学家更贴近地阅读文献,更严肃地对待文献之表面呈现,在新的方面来思考文本和叙述;它还有助于我们开辟新的研究课题与研究领域,同时将以前看来许多已难做出新意的旧课题重新提上研究日程;它也迫使历史学家前所未有地质疑他们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在质疑中,让他们更具有自我批判精神,这皆是非常有好处的;它还会促使读者更加强调对历史学家主观性的公开认可,有助于读者更严格地评价历史学家的工作;后现代主义还改变了历

---

① 詹金斯:《后现代历史学》,江政宽译,麦田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 页。该书即其英文原著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史书写的侧重点——虽然并非是改变了整个历史学科的——从侧重社会科学模式的历史书写转向了侧重文学模式的历史书写,此种改变可以让历史作品更易为学院外的大众接受(实际上也包括学院中的大学生);它还使具有独特个性的作为个体存在的人重新恢复了在历史中的位置,而社会科学取径的历史研究则或多或少地把他们排除在外。进而,后现代主义还促使了,或至少刺激了过去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许多杰出的历史作品之产生”。艾文斯教授同时澄清了人们关于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以及对于这本《捍卫历史》的不少误解,这从其特意在新版中增加的“跋”里即可管窥。艾文斯教授相信,“若是我们非常谨小慎微且又能自我批判的话”,“客观的历史知识既是 can be expected,也是能够得到的”。

这本《捍卫历史》现在已经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八种语言,英国的英文版也已经是第七次印刷了,足可见其受欢迎程度。就其意义而言,该书对于中国历史学界更好、更全面认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冲击及后现代史学研究,应该有极大助力。眼下看来,中国大陆虽然已经翻译出版了不少关于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著述,但这些著述大多为理论家或史学史家撰写,从事实史学研究并深知其中甘苦的史家,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或有能力写出自己的理论思考以及结合实践对理论的反省。这也正是艾文斯此书的难能可贵之处。

而经由艾文斯这本书,我们也可看出,后现代冲击所导致影响已体现在历史学家的思考和工作中,明显表现就是史家对精英史学、宏大叙述的抵制,以及对线性进化论史学的遗弃;尤具有意义的,也是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学上留下的最成功的烙印,则是历史学家愈来愈注意书写历史中的小人物及历史上的“他者”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后现代理论应用于下层研究、文化研究与性别研究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诸如性别史、疾病史、环境史、疯癫史、同

性恋史、阅读史、身体史、表象史等新研究领域的开拓可为明证。事实上,我们或可说,后现代主义并未对历史研究构成多大威胁,仅是进一步提醒了历史学家重新思考其工作尤其是其书写的性质。历史学的根本仍是不变的,历史著作的完成仍要依靠对第一手材料的掌握,仍然需要研究者运用理性在史料中进行广泛而又艰苦的爬梳整理以及解读。

对于实证史学来言,后现代主义的确能为当前处于困境中的历史研究提供一些出路和思路,为了更好地研究与理解过去,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或刻舟求剑,历史研究的实践需要援引后现代主义的智识资源,历史学家也应该了解和接受后现代主义的正面作用。对于现代化情节浓厚的中国史学界来说,为了更好地理解与研究中国问题,忽视或敌视类似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或理论已非明智之举,就其对中国史学研究情况的一些切中肯綮的批判和指引,我们还是应该怀有开放的心胸,结合中国社会和文化需求的实际,给予理解与批判地吸收。

当然,后现代理论家的一些过激观点亦是我们应该批判的,比如他们认为现代主义历史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穷途末路之时,所谓“在我们自己身处的后现代里,现代主义的解释如今是过于天真的:现代主义者的历史端点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看到‘何谓历史’的现代主义版本的结局了”<sup>①</sup>。这未免就太一厢情愿,或者说太过武断与急切了。实际上,在眼下,就算是接受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大多数史家,他们也不曾完全按照后现代主义的取径从事“制造历史”(make history)的工作。况且,后现代主义在理论层面的标榜并不能代替经验层面的实践,材料和史家自身的局限并不能构成史学不存

---

① 詹京斯:《后现代历史学》,第60页。

在的理由；历史书写中的文学性质并不意味着历史可以等同于文学，也不意味着史家就可以对过去进行随意想象与组合；关于过去的绝对真实虽不可及，但这并不能否定史家对客观性、对真实追求的合理性，人类既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必然有了解事物真相的需求，这也要求史家努力寻求客观的阐释作为认识真相与事实的助力。<sup>①</sup> 同样，读者自然亦不希望历史学家给他们提供的“历史”只是一种文学上的想象，而非基于史料基础上的“真实”。如何看待过去以及有什么样的关于过去的知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下人们的体验与想象。发生在过去之事会影响于当今，也会影响到发生在将来之事，无论如何我们都是过去的产儿，过去构成我们存在之一部分，关于过去一历史的知识究竟如何，对于社会、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sup>②</sup> 故而，不管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或者历史研究的典范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追求客观性与真实都应该仍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和历史研究的最终悬鹄，也应该是社会及读者对历史学家与历史研究的要求。如果失去了客观性与真实，如果连历史学家都不再追求和尊重这类价值标准与道德准则，如果历史仅是泛滥的、误导的哗众取宠式宣讲，那么历史学家的良心何在？这个世界还有何公道可言？肯定会变得谎言充斥、黑白颠倒、虚假横行，历史学家也会同流合污、助纣为虐，既无法对生者负责，更不能向逝者交代。<sup>③</sup>

---

① Mark Bevir, 'Objectivity in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3 (1994), pp. 328 - 344.

② Arthur Marwick,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 Great Britain, Palgrave, 2001, p. 2.

③ Jonathan Gorman, 'Historians and Their Duties', *History and Theory*, Vol. 43 (2004), pp. 103 - 117.

需要说明的是,该书中文繁体版2002年即由台北远流图书公司出版,译名是《为史学辩护》,译者潘振泰先生。潘译依据的是该书1997年的初版本,而该书2000年的修订本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书后增加了一个近4万字的跋(Afterword),初版正文中的许多内容及“进阶阅读书目”中的一些内容也被删除了(美国Norton的1999、2000年版还大致与1997年初版相同);还有一个明显之处是,1997年初版征引了法国著名文化史家夏特里埃(Roger Chartier)的很多论述,在本次修订版中却全部被删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考虑到作者艾文斯教授的意愿、版本问题,以及潘译中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决定重译。在时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吴道如兄的游说下,我们在2008年3月中旬接受了这个任务。

转眼,从我们承乏这个翻译算起,已经七个月了。七个月之中,颇历经曲折,堪称“为伊消得人憔悴”了。所幸经过我们集体的努力,译稿终于杀青了。本译稿的“导论”、第一、二章系由潘玮琳译,第三章由章可译,第四、五、六、七、八章与“进阶阅读书目”则由张仲民译,“跋”的第一、二节与第四节的最后三页由潘玮琳译,第三节和第四节的大部分则由张仲民译。译稿由潘玮琳、张仲民校对,人在美国杜克大学的潘玮琳君费力尤巨,张仲民对译文进行了润色与统一。另外,为方便读者阅读与核对,我们将原来的书末注释改为页下注,并对某些问题补充了“译者注”。翻译过程中,我们在一些地方也参考了潘振泰先生的译本,从中获益良多<sup>①</sup>;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的侯艳兴兄也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

① 比如潘先生把通常翻译为“最终解决”的“Final solution”,翻译为“斩草除根”,笔者就认为此译非常精确且形象;又如潘先生把“Further Reading”翻译为晚清民初时期常用的“进阶阅读”,就比我们平常翻译为“进一步的参考阅读书目”要好得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最后要声明的是,时间紧迫,译者又学识有限,加之书中某些表达确实佶屈聱牙,译文难免存在未妥之处,敬祈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改正提高。

张仲民谨志

2008年10月14日